史家名著书系

丛日云 主编

牛津欧洲史 Ⅲ

CRISIS AND CONFLICT

[美] 罗宾·W. 温克 [美] R.J.Q. 亚当斯 著
贾文华 李晓燕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卷

1890-1945

危机与冲突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欧洲史.第3卷，1890～1945年：危机与冲突／（美）温克（Winks,R.W.），（美）亚当斯（Adams,R.J.Q.）著；丛日云主编；贾文华，李晓燕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1

ISBN 978-7-80762-873-6

Ⅰ．牛…　Ⅱ．①温…②亚…③丛…④贾…⑤李…　Ⅲ．欧洲－历史－1890～1945　Ⅳ．K5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003581 号

书　　名：牛津欧洲史（第3卷）
著　　者：[美]罗宾・W.温克　R.J.Q.亚当斯
主　　编：丛日云
译　　者：贾文华　李晓燕
出 品 人：周殿富
总 策 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曹海军
责任编辑：王　莹
封面设计：刘友丽
装帧设计：郭孟楠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 号(130021)
印　　刷：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 × 980mm　1/16
印　　张：26.5
版　　次：2009 年4 月第1 版
印　　次：2009 年4 月第1 次印刷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栋底商 A222 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80762-873-6
定　　价：56.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致　谢

作者感谢理查德斯托克顿学院(Richard Stockton College)的威廉姆·鲁贝诺(William C. Lubenow)教授、德克萨斯A&M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的萨拉·阿尔佩恩(Sara Alpern)教授、阿诺德(克拉默尔(Arnold P. Krammer)教授及罗杰·里斯(Roger R. Reese)教授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作者亦感谢阿肯色大学(University of Arkansas)的托马斯·肯尼迪(Thomas Kennedy)教授、伊利诺伊大学阿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的皮特·菲里奇(Peter Fritzche)教授及阿尔布莱特学院(Albright College)的纪尧姆·西翁(Guillaume de Syon)教授对初稿的认真审读及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出现的一切错误均源于作者自身的原因,并应对这些错误负全部责任。

罗宾·W. 温克
R. J. Q. 亚当斯

目　录

地图与案例小品

地图

案例小品



第一章

新时代

从早期教会将耶稣的诞生日确立为新纪元至今，每个世纪之交都可谓是富于变化的不凡时刻，20 世纪的到来毫无疑问也当属此列。旧的世界正在逝去，而充满非凡奇迹的 20 世纪已经到来。此番世纪之交所带来的喧嚣与沸腾，或许不能与 1999 年 12 月 31 日的千年之交同日而语，但也堪称为历史之最。对于当时的一些乐观主义者而言，未来将是一个令人憧憬的时代，人类将会告别过去的奴役、瘟疫与无知，并有希望根除疾病、饥饿及战争的蹂躏与摧残。但在持有悲观论的其他人看来，新时期正在缓慢地但却不可逆转地受到平等主义的侵蚀，"品质高贵者"(men of quality)的主导权日益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参与性政府(participatory government)的兴盛。文明世界正面临国际冲突、物质主义、不可知论的威胁与折磨，时代正朝着由错误民族所掌控的错误价值最终获胜的方向演进。

不论是满怀憧憬的乐观派，还是担忧世界将惨遭蹂躏的悲

观论者(也包括众多对此未作过深入思考的人),都预见了一个不同于过去任何时代的新世纪,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仅是一致的,而且都是完全正确的。

一、欧洲的人口

20世纪是公认的转型时代,习惯上被称做西方的世界正是推动这场转型的发动机。"西方"主要指欧洲,包括大不列颠、法国、低地国家、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德国、瑞士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也包括正在扩张的奥匈帝国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地跨欧亚两洲的)国家俄国,往往也包括欧洲文化在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扩展。

人口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的显著增长,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的人口增至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860至1910年,大不列颠(包括当时仍属于联合王国的爱尔兰)的人口从大约2900万增至4500万,奥匈帝国从3300万增至5100万,德国从3600万增至6500万。尽管没有俄国相对可靠的数据,但其人口在1900年已超过了1.25亿,俄国同期的人口增长无疑也是相当可观的。在大国行列中唯有法国人口增长较为缓慢,仅从3700万增加到了3900万。美国同期内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十分惊人,从3100万猛增至9200万。

人口的显著增长主要有下述各方面的原因:出生率持续上升,跨越大陆的西进移民潮使更多的人聚集于西方。现代医疗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使死亡率明显下降——婴儿的存活率显著提高,人口寿命不断延长。抗生素的应用以及对病菌日益深入的认识,使人们对困扰人类的传染性

疾病有了广泛而成功的反制。与此同时，农业技术的进步提高了食品的生产能力，人们因此享有更加健康的饮食。在人们寿命日益延长的同时，欧洲也渐渐迈入了不断强化的城市化浪潮。

1800年，伦敦是欧洲唯一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一个世纪后，巴黎、维也纳、柏林、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五个城市的人口均超过了100万。到20世纪中叶，人口逾100万的城市增至11个。与此同时，中小城市的人口同样体现出迅猛增长的势头。1800年，欧洲拥有22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一个世纪后这样的城市增至80个，并且没有任何放缓的征兆。毫无疑问，这是上述医疗与卫生条件改善的结果，而且城市医疗卫生方面的进步较农村更为明显——城市毕竟聚集了更多训练有素的医生和装备齐全的医院。19世纪中叶，首先在英国和德国兴起了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改善城市公共卫生环境的运动，此后这一运动逐步扩展至欧洲其他各地，并最终促成了负责水洁净、食品与药品监管、确立医疗卫生标准的地方性公共卫生权力机构的建立。到19世纪末，英国政府在社会改革者的压力下，开始为城市贫民提供公建住房。这种举措不久便被其他各国效仿，并体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

与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密切相关的显然是欧洲内部的移民潮。城市不仅富于经济机会，并且有多彩的生活、丰富的文化、极具魅力的娱乐以及不论身份的生活等。凡此种种都是乡村所没有的，成千上万的人因此离开农场而涌入了城市。但更为重要的是，进入城市为他们走向自由，摆脱传统的对农民的等级与家族的压迫以及贫穷的困扰提供了可能性。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乡村生活或者已变得不可忍受，或者对于那些富于冒险及雄心勃勃的人而言太具局限性，而城市生活意味

着机会、成就与回报。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城市生活导致了孤独、疏远、贫困、剥削,造就了贫民窟与工资奴隶。显然,一个人只有尝试过才能领略城市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

尽管当时没有人能知道,西方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减退,原因并非是传统的瘟疫、饥荒或战争,很大程度上是自主选择的结果:家庭规模在逐渐繁荣的西方变得越来越小。尽管有悖于传统并遭到各种道义机构的谴责,避孕套及子宫帽避孕套(diaphragm)等避孕工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那些难以承受这些奢侈品的人则选择体外射精、晚婚或者充满风险的堕胎——数百年来,这在整个西方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多次生育给妇女健康带来的损害,激励一些先驱创建了现代生育控制运动。19 世纪 80 年代,荷兰第一位女医生与社会活动家阿莱特·赫里特森(Aletta Jacobs Gerritson,1854—1929),率先在阿姆斯特丹致力于妇女健康及生育控制的医学实践。在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1847—1933)以及现代计划生育机构创始者美国人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1879—1966)等积极运筹与不懈努力下,生育控制运动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人口减少首先明显体现于欧洲国家出生率的下降。1850 年,英国每千人的生育率为 33.4,1900 年降为 28.7‰,1914 年进一步降为 26.1‰,1930 年更降至 19.6‰。德国 1870 年、1900 年、1914 年、1930 年的生育率分别为 38.5‰、35.6‰、26.8‰、17.6‰,法国 1850 年、1900 年、1914 年、1930 年的统计为 26.8‰、21.3‰、18.1‰、18.0‰。意大利(没有 1850 年的可靠数据)1862 年的生育率为 39.4‰,1900 年降为 33.0‰,1914 年进一步减至 31.0‰,1930 年更下降至 26.7‰,其他欧洲国家也体

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然而，家庭规模的缩小并非仅仅是妇女健康问题导致的结果，还有诸多跨越社会阶层以及国界的其他因素：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的繁荣、技术变革带来的工业化与规模化生产的奇迹等，为许多人实现富裕生活创造了条件，并且生活质量与水平的提高，在小型家庭中更易于实现。另一方面，西方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家庭农场对劳力的需求随之减少。因此，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大家庭这个多少世纪以来始终为农场的支撑，并作为繁荣、天赋与神授的象征，随着20世纪的发展日益成为主流之外的特例。

欧洲人口增长趋缓的另一原因是，这一时期的跨国移民达到了可与中世纪媲比的峰巅。1880年，每年大概有50万欧洲人移居美国、加拿大、拉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其他地方，30年后欧洲外移人口的数量增加了3倍。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移人口的国别背景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早期的欧洲对外移民绝大部分都是不列颠人，或欧洲西部边缘地区的欧洲人。19世纪后期，廉价的旅费，移入国提供的优惠接收条件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吸引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俄国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捷克人以及犹太人前往新世界追求商机，或者为逃避铁血政权、宗教、文化、民族与种族歧视等等。移民们很快发现新世界并非黄金遍地，而且很多人因其外来者的身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然而，新世界没有强制性兵役，没有土地贵族的奴役，亦没有国家宗教机器的迫害，最重要的是新世界没有大屠杀。截止到1930年，欧洲外移人口超过6000万。数以百万计的移民虽然失望而归，但绝大多数人却留在了新世界并致力于新家园的建设。

二、创新的激情

1. 绘画

应该说刚刚进入 20 世纪的西方人,依旧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观察和体验生存其中的现实世界。然而,各种观念与价值同时也面临极富生命力的新挑战,并且寻求突破的各种尝试同样富有活力,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现代主义"的新现象。这一术语虽然最终被广泛运用于道德、时尚、宗教学等各领域,但现代主义无疑在艺术领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艺术的"官方"世界始终主宰于强有力且根深蒂固的正统标准,即绘画以及人和物的形态必须看起来像现实的人和物,亦即人和物应是观察者期望看到的。艺术品因此应富于美感,能给多数的欣赏者带来愉悦,并且顺从传统的模式、画法、色彩等等。法国印象派早在数十年前就走出了画室,他们不再遵循传统去描绘事物的"实际"形象,而是反映经他们自己选择而看到的周围世界。他们观察到的实际是光线作用于物体的效果——印象,但印象派或多或少仍属于现实主义画派,其作品仍体现出依稀可辨的真实性。

19 世纪末期,继印象派之后兴起的后印象派走得更远,认为摄影技术的发展使得艺术家舍弃了写真的古老责任,因此坚持绘制他们自己所认识的现实世界,即他们而非他人在题材中所透视到的本质。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抛弃了印象主义所秉承的美感追求,并试图在肖像画与静物画中展现事物背后的几何图形,即"使印象主义固定化与持久化"。在

他们看来，艺术只有以可辨别的体系为基础，并探求规则与持久性才能完成展示的使命，英年早逝的乔治·修拉(Georges Seurrat，1859—1899)因此在巨幅画布上，将他所熟知的巴黎描绘为无数用各色颜料涂抹出的圈圈点点。其他如富有悲剧色彩的荷兰人梵·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及其挚友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则寻求其他的展示方法，其画作更多的是他们内心世界与现实生活结合的写照。在他们看来，艺术作为"文明化"的文化在精神上受到了损毁，其作品因此完全抛弃了传统艺术所秉承的规则：梵·高描绘更多的是他在周围世界看到的黑暗与堕落；高更最终彻底放弃了"文明"，并移居到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Tahiti)，目的是能够以一种更加纯朴的风格，描绘在他看来未遭污染，并且在精神上较欧洲更为纯洁与高尚的人民和土地。

法国人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854)主导的另一个群体走得更远。被批评家冠之以野兽派(fauves)的马蒂斯及其同仁，拒绝任何三维意义上的创造尝试，并将题材过滤为仅对他们有意义的必要元素来表达他们所看到的景象。野兽派将鲜亮的颜料泼洒于画布之上以表达对事物的认识，全然不顾约定俗成的创作规则与观点。

西班牙人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是较上述多数人更为年轻的下一代艺术家，他在世界艺术领域的影响超过了他的前辈。毕加索年轻时曾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工作和学习，并尝试过各种不同的绘画技术与风格。他在塞尚试图将视觉映象转换为几何图形的基础上发展了立体画派(cubism)，并因此而崭露头角。毕加索 1907 年的杰作《亚威农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描绘了 5 个表情紧张、身体



《马蒂斯夫人》,作者亨利·马蒂斯。作品体现了马蒂斯引领的野兽画派意欲表达的力量与迷茫,表现的是丈夫眼中的妻子的脸,而非漫不经心的旁观者或者照片反映的形象。在当时许多绘画界的权威看来,画像粗俗甚至丑陋,但在画家本人及其追随者的眼中,它却是视觉真实具体的写照。(The Barnes Foundation, Merion, Pennsylvania, USA/Bridgeman Art Library; © 2003 Succession H. Matisse, Paris/Artists Rights Society(ARS), New Y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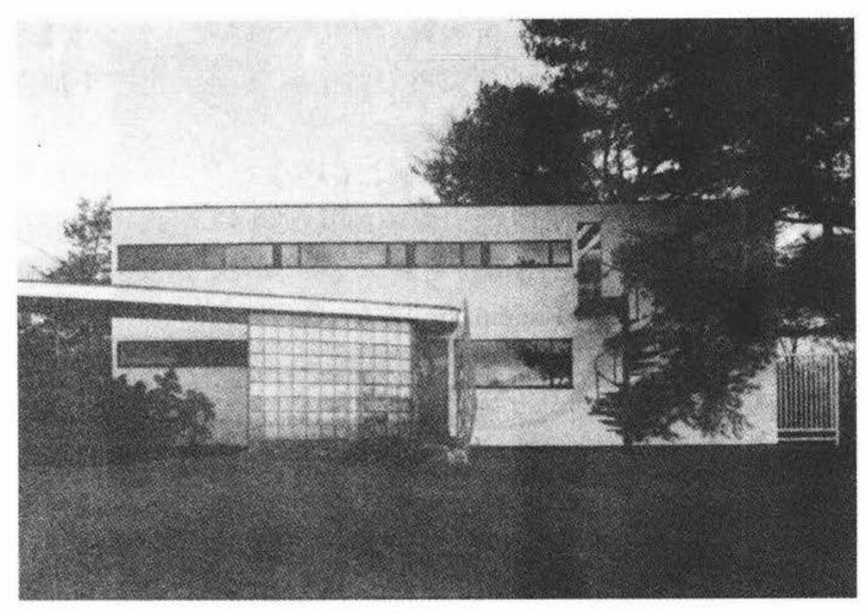
扭曲的裸体女人,高度抽象的画面体现出超常的震撼力。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批评说画布"就像是一块破玻璃",但即使不喜欢

这幅画的人也感受到了它所表现的力量。继《亚威农少女》之后，他又推出了其他具有同样震撼力的作品，从而开启了毕加索主导世界画坛的漫长历程。

艺术世界很快发现，即使立体画派也不是现代主义的终极形态。野兽派、毕加索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其他画家，呈现了他们自身关于真实世界高度内在化的见解。但其他画家如俄国人瓦西里·康定斯基(V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却开启了另一个方向。康定斯基曾作为青骑士社(Der Blaue Reiter)的成员在德国工作，并创建了抽象表现主义画派。该画派完全放弃了表象，试图用野兽派的亮色展现精神的真实性，但却不以任何现实世界中可辨别的事物原形作参照。在欧洲各国首都的著名艺术学院年复一年地拒绝此类画作的同时，两场著名的展览——第一场在伦敦，1910 年 12 月由批评家和画家罗杰·弗赖(Roger Fry,1866—1934)举办；另一次于 1913 年在纽约举办——却使这些绘画领域的新流派备受瞩目。这些新流派的画作及其秉承的风格，遭到了正统评论家甚至整个国际传统艺术界几近一致的批判与排斥，但不容置疑的是，绘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被永远地改变了。原式住宅以及后来的大型建筑，则充分展现了他的立体派设计

2. 建筑

西方传统的建筑艺术见证了近似于绘画领域的剧烈冲击。在美国，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1856—1924)将现代摩天大楼的外形特色推向了极致，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为富人建造的棱角分明的草



格罗皮乌斯宅邸,林肯镇,马萨诸塞州,1937 年。沃尔特·格罗皮乌斯背离注重刻意修饰的古典主义建筑格调,是崇尚反映工业化时代追求宽敞、实用风格等新建筑流派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纳粹认为格罗皮乌斯的观念颓废,他因此遭到了驱逐,来到美国后曾执教哈佛,其间设计了这一住宅。(Library of Congress)

原式住宅以及后来的大型建筑,则充分展现了他的立体派设计风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赖特致力于追求"形式服务于功能"的主旨,其风格集中体现于国际上流行的朴实无华的大型建筑。这一流派缘起于德国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发起的包豪斯建筑学派(Bauhaus),后在生于瑞士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的推动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他所设计的纯朴的玻璃与钢结构摩天大楼,最终成为 20 世纪中后期城市商业建筑的模板。与此同时,西班牙人

安东尼奥·高迪(Antonio Gaudi,1852—1926),以完全不同的风格设计了看似用面团而非石料建造的大型公寓楼和教堂。

这些建筑虽然风格各异,但都是设计者为了实现美术界野兽画派或立体画派所追求的目标,即从过去的传统规则中解放出来,并创造一种更为纯真的形式和更为进步的现实。如同画家努力去描绘人"是什么",而不是简单地描绘他们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眼中的外在表现一样,建筑师们所追求的也不仅仅是人们的容身之所,而是与环境完美结合的建筑。在批评者看来,这些结构违背了建筑的形式要求,所以既没有艺术价值也缺乏魅力。但到了世纪中叶人们却清晰地认识到,这些建筑师们创造了一种挑战传统的不同建筑流派,大型的商业和公共建筑因此不再仿照希腊神庙或英国庄园的建筑式样。

3. 音乐

音乐同样成为传统与革新角力的战场。世纪之交,新音乐的领军人物是法国人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1862—1918),他在音乐领域的追求类似于数十年前印象派画家所追求的目标。他的作品尤其是钢琴曲,意在把他所体验到的世界转化成音乐的灵感,并通过彰显真实性与鲜明性实现了新的突破。德彪西优美的《牧神午后》(*Afternoon of a Faun*,1892),为追求美感而抛弃了传统的作曲规则,并成为挑战传统与建立现代音乐的宣言书。

新音乐与传统彻底的分道扬镳,是在俄国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1882—1971)引领下实现的。当他首次推出一系列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作品时,就以一位芭蕾音乐作曲家而闻名。1910 年的《火鸟》(*The Firebird*)以及 1913 年

更具影响力的《春之祭》(*The Rites of Spring*),震撼甚至激怒了公众。在《春之祭》的首映式上,其不协调的旋律、舞者粗鲁的装束以及笨拙原始的舞姿,引发了观众不满的呼喊甚至骚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失常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特别是赞助商的极度好奇,他们无论认同与否都去观看演出,《春之祭》因此而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

对传统最具挑战力的作曲家,应首推曾以写作和表演酒吧歌曲为生的维也纳人阿诺德·荀伯格(Arnold Schönberg,1874—1951)。由于对严肃音乐秉承的各种形式化限制不满,他曾对此进行过多种尝试性改进,但最终彻底背弃了传统音乐所坚持的原则。荀伯格的作品令那些习惯于传统音乐的人感到震惊。1907年,《第一室内交响曲》(*First Chamber Symphony*)的首场演出引发了骚乱,大批愤怒的观众冲向舞台,并向乐团和演奏者投掷杂物以示轻蔑。但无可置疑的是,荀伯格移居美国后不仅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音乐教师,而且开创了一个新的作曲流派,荀伯格也因此成为现代音乐的代名词。

4. 文学

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作家们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主流现实主义学派、自然主义学派以及清晰化和精确性的运动。这一运动源于19世纪末期法国诗人斯特芳·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引领的象征主义学派,后经大批追随者的推动,在20世纪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象征主义者无视现行的诗歌创作规则,在他们看来,任何词汇都没有绝对的准确性,并且也不存在专门阐释某一特定事物的最好词汇。词汇因经验

而存在,因特定的情境组合或拆分。秉承印象派画家的精神主旨,这些诗人所追求的并非是对读者的教诲,而是为满足作者抒发情怀所体验的纯真的愉悦。这样一来,这些作品有可能美妙至极,但又往往晦涩难懂。这场运动吸引了众多作家的加盟,从而迅速风靡整个欧洲。象征主义学派孕育了一批天才的诗人,如德国的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1933)、奥地利的雷诺·玛丽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爱尔兰的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等等。然而,他们在当时赢得的仅仅是评论家的非议,并且那个时代的读者也因未能理解其真谛而反响不一。

小说创作领域也经历了同样富于生气的革新运动,其主旨在于摆脱左拉(Zola)、托尔斯泰(Tolstoy)以及上世纪末仍占据主流的自然主义所遵循的呆板式创作风格。以爱尔兰人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和英国人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为代表的年轻小说家,开创了“意识流”(stream-of-consciousness)创作流派。“意识流”作家更注重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刻画,而非传统小说那样专注于故事情节及人物的塑造。这些作家虽然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广受关注,但“意识流”学派的发展及其对现代小说的贡献实际是在战前完成的。

确实也有一些秉承传统并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共鸣的佳作。英国人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就继承了传统的社会批判主义写作风格,他于 1906 年出版的《有产者》(*A Man of Property*),是英国贵族家庭传奇系列小说的第一部。《有产者》既无夸张与矫饰之词,更没有喋喋不休的讲道,但作者通过对福塞特家族(Forsyte clan)延续达三代的传



出生于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曾在医学和音乐界谋求发展,但均未获成功,最终在英国文学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其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1922 年)和《芬尼根守灵》(1937 年),全然不顾及传统小说对时间及情节的交待与刻画。在乔伊斯看来,人物与意识就是一切,他因此被誉为现代小说的天才和开拓者。(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奇式演绎,对英国中产阶级追求安逸的维多利亚价值观提出了质疑。德国人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早在

25岁时便因《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而名声大噪。曼的作品对德国的物质主义、家庭、社会以及艺术家的责任等具有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予以了深刻的考察,而《布登勃洛克一家》只是其多部同类作品中的第一部。在此类作家的笔下,严肃文学及其提出的同样严肃的问题,依然是文化以及普通民众切身感受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新科学

在19世纪中期,受过教育的人虽然对牛顿宇宙说的起源及其验证知之甚少,但其理论却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因为普通人仅仅在原理及逻辑的层面上接受了牛顿惊人的伟大发现,并且宇宙说支持而非违背了人们所习惯的常识。由此不难理解,有关偶然坠落于头部的苹果激发了牛顿探寻宇宙奥秘的传说,为什么不胫而走、代代相传。对于牛顿的贡献,18世纪的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曾有过这样的评论:其实上帝似乎说过,"牛顿一出,世界被照亮"。然而,当时光的快车驶入20世纪,科学又经历了一场更具革命性的剧变,并导致了最为引人瞩目的一大后果,即科学家们的发现与普通民众的理解能力之间,产生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随着现代科学的日益发展,量化界定完全超越了感官所及的能力界限,即要测量或者量化的对象或者太小,或者太大,或者太快,或者太远,以至于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感知与理解能力。然而,当人们关注事物和信息更新与变化的速度时,却感受到了更加强烈的惊诧。

19世纪的人们将原子论奉为真理,认为所有的物质都是由被称做原子的微粒组成的。这一理论似乎在迎合牛顿的经典物

理学,并且事实的确如此。时至19世纪末,安托万·巴克奎罗(Antoine Bercquerel,1852—1908)却在他的铀实验中证实了放射线的存在,并断定存在亚原子微粒。与此同时,法国的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1859—1906)和玛丽·居里(Marie Curie,1867—1934)通过合作研究又发现了其他两种放射性物质钋和镭。这三位科学家在1903年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玛丽·居里夫人是第一个荣获该奖的女性,并在1911年成为两次获得该奖的第一位女性)。上述发现充分证明了英国科学家J.J.汤普森(J.J.Thompson,1856—1940)和新西兰裔英籍科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的科学论断,即原子并非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微粒。

在实验室辉煌迭出的同时,旨在解释世界新概念的理论物理学取得了同样辉煌的成就。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于1900年提出了震撼牛顿经典物理学的新理论,即量子理论。他认为放射性能量并非以连续不断的流的形式存在,而是由被他命名为量子的微粒组成。然而,当时供职于瑞士专利局的犹太小职员艾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提出了更让人吃惊并且也令外行人更难理解的理论。爱因斯坦曾是一个充满好奇但又看似笨拙的男孩,对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爱因斯坦早年成绩平平,其天才直到大学时代才有所显露。他曾尝试在大学中担任教职,遭拒绝后便在伯尔尼的专利局审查专利申请书,由此开始了一段看似枯燥的生活。这个相对轻松的职位,给他留下了足够的时间继续研究他感兴趣的数理物理学。他于1905年发表了一篇长达30页的论文,首次提出了关于宇宙的全新概念。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指出,时间和空间并非是它们所展示的

那样连续且一成不变，它们与观察者是相对的，只有光的速度是不变的。

对于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慢速运动物体来说，牛顿经典物理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是实用且"正确"的，但它已经失去了绝对意义上的"正确性"。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理论不仅难以理解，甚至也难以对此做出有效的说明与解释，这些成果因此增大而非缩小了科学家与外行人的距离。"终极概念"如速度、质量和时间本身变得如此难以理解，甚至受过高等教育但不是科学家的人，也只能毫无选择地接受他们的观点。在对宇宙进一步探秘的过程中，这一代天才理论物理学家的新发现更是晦涩和神秘，他们同时代以及后来的人们甚至可能认为这些发现非常可怕。当然，不论是科学家、技术工作者还是外行人都没有预见到，正是这些高深难懂的理论，催生了喷气式推进器、太空旅行以及原子弹的问世。

四、新的社会视野

在科学家热衷于超越其前辈的同时，新世纪的许多思想家也对诸如人性、高品质生活、最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等古老的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这些新尝试大多都在寻求改变传统，并且许多都是以牺牲道德或物质享受为代价实现的。

1.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

部分昔日曾广为传播的非传统观点在新世纪得以进一步发展，其中几种非常有害。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虽然曾是英国的一名工程师,但却对科学与哲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在辞世的前十年完成了代表作《综合哲学提纲》(*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这本书的追捧者认为,斯宾塞将查尔斯·达尔文生物学巨著中极具洞察力的理论思想引入了人性与社会等领域的研究,并富于先进性和实践性。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看来,人类历史实际是一个漫长且残酷的适者生存演进过程。自然界虽然当时看来充满了丛林中的残酷,但从长远的角度审视又不乏仁慈,而居于主导地位的力量是适者生存并得到进化的物种。社会发展遵循着同样的规律,虚弱、愚蠢及残病者虽然被消灭,但强壮、聪明及有能力者将得以继续生存,人类因此在总体上得以进一步优化。斯宾塞貌似有理的观点极富蛊惑力,而那些自认为受自然选择的人更将其奉为人类发展遵循的恒久性规律。

部分杰出的生物学家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庸俗性,认为他们滥用了达尔文理论而没有真正理解其真谛。然而,这些反对的声音远不足以抗衡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追捧,而西方的中产阶级更将其奉为认同他们成功的神旨。在中产阶级看来,人类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原本就褒奖勤劳、负责、节俭、智慧和自助,惩罚懒惰、浪费、愚蠢、性乱及依赖救济,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此提供了科学的验证。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似乎已证明,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缺乏适应性或天生不宜于生活在充满竞争的社会之中,私人救济或国家劫富济贫的行为因此是违背进化规律的无用尝试。斯宾塞对此作了如下的归纳:

“与其他所有更为低等的生物一样,人同样遵从适者生存的法则。在成年人中,最能适应环境者理应得到最为充分的发展,

而那些最不能适应环境者理应最为孱弱……保护愚钝者的最终结果是让世界充满愚者。”*

斯宾塞后来虽然调和了其哲学中最具残酷性的观点，但他从未容忍“保护愚钝者”。在他看来，仁慈、怜悯、爱等宗教所崇尚的价值观，在宗旨上与进化论并不矛盾。斯宾塞以及其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相互残杀是动物而非人类遵从的法则，不拘私利的慈善行为只是进化达到的最高境界而已。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面临一个首要难题：达尔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证明，特定种群内部或对立物种间的生存竞争是宇宙的一大法则，但人类历史以及人类所怀有的情感却显示，人并不会视痛苦而无动于衷。摆脱这一两难困境的出路在于调和争斗并使之人道化，没有竞争力的人因此被忽视而不是被毁灭。持有此论者最终转向了优生学和良种选育说，因为严格意义上的达尔文进化论认为，后天的特性不会遗传，任凭怎样操控社会环境、优化制度建构都难以改变人类的本性。许多认同这一理论的人因此坚信，如果促使人口退化的各种因素诸如社会经济的失序、低能人群、精神失常人群、罪犯等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社会中的优质要素如领导者、成功人群等就会日益式微，唯一能保障种族不断进步的方法因此在于审慎的优者间配种，不鼓励甚至阻止退化物种的繁衍。随着本世纪初优生性社会在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的逐渐形成，优生论的影响也得以进一步扩大。

然而，优生论者很快就面临一大难题。在选择配偶时人类单体会受到很多动机的影响，并且配种的主导者也无法决定具

---

* 赫伯特·斯宾塞：《伦理学原理》(1879 年)，(纽约：D. 阿普尔顿，1900)，第二卷，第 17 页；斯宾塞：《自传》(伦敦：威廉姆斯和诺之特，1904 年)，第二卷，第 100 页。

体的配种对象。在任何一个国家,即便缺乏最基本的民主自由,也不管其信仰的是世界上哪一种主要的宗教,如此大范围的试验都是无法想象的,激进优生论者因此局限于演讲与宣传以实现他们的愿望。然而,他们并非一无所成,即便像美国、大不列颠及其帝国等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也依据种族和需要限制入境者。20 世纪初叶,这一运动的影响及其合法性得以进一步扩大,20 年代达到顶峰,但不久之后便因纳粹分子在德国及其他地区的恐怖性试验迅速走向衰落。

2."种族爱国主义"、反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摆脱窘境最为基本的观念基础是,诸如部落、部族、民族国家等人类有组织的群体之间,不仅存在为生存而争斗的现象,而且从生物界的个体争斗上升为政治共同体间的冲突。在战争中击败他族的群体显示了比战败者更高的适应能力,它因此有权——的确也是进化赋予的一种责任——消灭战败者,并由其更为优秀的成员占领战败者的领土。英国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约翰·罗德斯(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曾认为,一个完全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占据的世界将是一个最好的世界。罗德斯的观点被称为种族偏见主义或我们现在所称的种族主义,认为不同种族内在的差异性决定了其文化与个体的水准,一个种族因此在特定的环境下优于另一种族。虽然今天的我们已熟谙其危害性,但在 20 世纪早期,罗德斯的观点却被认为是对基因科学和生物科学最充分的阐释,而欧洲的种族主义者在环顾世界后更加确信,他们自己的见闻充分证明了自身所拥有的优越性。

"种族爱国主义者"(其追捧者惯用的名称)相信,现代人(Homo Sapiens)已经发展为具有实质性差异的不同种群。例如黑皮肤就是黑人天生低劣的标志,他们(或美国的土著人)应该重蹈恐龙的覆辙。风俗或法律反对不同种族间的联姻,因为这不仅违背上帝的旨意,而且将使"高等种族"变得低劣。尽管很少有人敢于明目张胆地鼓吹种族屠杀以及劣等种族灭绝论,但多数种族主义者却主张,"劣等人"应服从于"优等人","应被限制在他们自己的区域内"或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同类中"。

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只有美国有着相当数量的非白人少数民族。然而,自称为文明的美国虽然废止了种族奴隶制,并且因内战和解放宣言而通过的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废止了种族歧视,但这一新世界的伟大共和国并未找到一条种族共容的有效途径。截止到 19 世纪 80 年代初,老邦联各州、边疆州及中西部地区,都通过了以战前民谣命名的"吉姆克罗"(Jim Crow)黑人法案。这些法案对就业、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的种族分离予以了明确的规定,并由此派生出社会交际领域具有同等约束力的非正式隔离体制。在大部分地区,学校、住房、医院、公园、火车、公共汽车,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诸如公用电话、自来水等都受到了隔离。新世纪前夕,美国最高法院在"普莱西控告弗格森"(plessy v. Ferguson,1896)一案的判决中,以美国公民无论黑人和白人,都拥有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的方式,支持了"分离但平等"的原则。隔离有失公平的观念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才被公众广泛接受。

尽管达尔文主义及其社会领域的不同分支,被误读为社会进步应遵循的基本信条,并且这些学说均支持工业社会对无限增长的向往,但达尔文主义以及绝大部分种族主义者,在本质上

却是极其悲观的。达尔文强调偶然性而非秩序构成了因果关系的本质。与更为激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许多评论家相信“低等种族”将最终获胜,因为野蛮人较敏感的文明人更富于力量。“低等种族”更具繁衍力,并且更加缺乏选择性,而民主的平等主义却鼓励无能者而打击优秀者,其结果将是进化的滑坡而非兴盛。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许多沮丧的思想家已经在研究约瑟夫·阿瑟·德·戈宾诺伯爵(Joseph Arthur , Count de Gobineau, 1816—1882)的《论人类的不平等》(*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s*, 1853—1855)。这位法国外交家与作家得出的结论是,种族间存在清晰的等级界限,而“纯种”的德意志人(在他看来,德意志人并非仅仅指现代的德国居民,而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英国、北部法国以及比利时等地的蓝眼睛白种人)居于种族金字塔的顶端。这一理论经古怪的霍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得以进一步完善。张伯伦是一个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两个著名将军的侄子及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女婿。张伯伦背离了祖国,生活于他认为高度发达并天生优越的德国人之中。他在其名作《十九世纪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899和1911年分别在德国和英国出版)中论证说,欧洲文明受到了他所认为的低等和混种民族包括亚洲人、非洲人、地中海欧洲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威胁。这一丑陋的思想倾向在此与古老而褊狭的反犹主义融为一体,并为反犹主义添加了新的伪科学遗产。

犹太人虽然在19世纪的西欧获得了政治解放,但反犹主义的幽灵并未彻底销声匿迹。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更为民主的英

国、法国、美国出现了更具文明的现象:英国有犹太出身的基督徒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首相,1916 年的美国有犹太高级法官路易斯·D. 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其他国家的司法系统如英国上议院也已经有了犹太人议员,维也纳的大部分报刊为犹太人所有,犹太人也进入了医学和教育等很多高级行业,并且许多重要的银行以及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报公司等均为犹太人所有。如果没有犹太作曲家、画家、作家的贡献,很难想象那个时期的艺术、文学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但在这些文明的表象之下仍存在着反犹主义。在一个天主教居主导的社会中,犹太人仍被称为是“基督的谋杀者”,在清教文化中,他们仍然是不能皈依并难以拯救的灵魂。“他者”(otherness)的感觉使其他民族难以完全接受犹太族,而这个民族自己却有诸多的理由对完全被同化存有疑忌。因此,法律虽然赋予犹太人完全的公民自由权,但他们却被不成文地隔离于国家机构、大学和军旅之外。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那样,曾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掀起波澜的法国“德莱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说明即使在欧洲最伟大的共和国内,反犹主义也是一个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丑陋现象。

然而,还有更为丑陋的。国家容忍甚至支持的反犹集体暴力,在俄罗斯帝国依然司空见惯。在 1897 年的维也纳,恶意反犹的卡尔·鲁格 (Karl Lueger,1844—1910)在公众的欢呼声中当选为市长。鲁格对犹太人的仇恨是如此粗俗和残暴,以至于帝国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Emperor Francis Joseph),好几年都拒绝授权对他的任命。正是在鲁格的维也纳,年轻的希特勒形成了其纳粹种族主义的思想纲领。

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许多欧洲犹太人,尤其身处反犹最

为剧烈和残暴的东欧犹太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通过移民躲避反犹主义的迫害。部分犹太人则转向了政治激进主义,希望能在社会主义那里找到一个更好、更具宽容的世俗国家。另一些犹太人,尤其是更具民主的西欧国家犹太人,认为犹太族的未来在于同化,即在保持其宗教信仰的同时,融入居住国的文化之中。亦有另一种答案,并将注定成为 20 世纪主要且充满争议的力量。1882 年,俄属波兰籍犹太医生莱昂·平克斯(Leon Pinsker,1821—1891)在德国出版了富于预见性的小册子——《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平克斯曾一度坚信,欧洲国家有保障的公民自由权是解决反犹问题的最终答案。但在目睹了 1891 年俄罗斯的反犹暴力后,他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实现基于犹太民族意识的政治独立是犹太人唯一的希望,即犹太人必须建立自己的祖国。

深受平克斯观点影响的维也纳记者、剧作家、出版商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认为,集体屠杀及德莱弗斯案件均表明同化毫无结果。在赫尔茨看来,犹太人是一个散布于世界各地并永无自卫能力的少数民族,犹太人除非聚集一处恢复其伟大的犹太民族国家,否则他们将永远处于自身不保的状态。赫尔茨在其极富影响力的《犹太国家》(*The Jewish State*,1896)和《古老的新土地》(*Old New Land*,1902)中,详细阐释了其理想中得以重建的以色列国家,赫尔茨的努力因此肇始了犹太复国主义。

1897 年,赫茨尔在瑞士的巴塞尔(Basle)召集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宣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基斯坦地区,建立"一个受国际公法保护的犹太人家园"。然而,当赫茨尔在全世界搜罗犹太移民时,却遭到了其同教派人士的不少批评。犹

太人，特别是民主国家的犹太人，仍坚持以同化来应对反犹太主义的迫害。赫茨尔虽然于 1904 年去世，但犹太复国主义得以继续发展，并最终在信教与不信教的犹太人中取得了同样的胜利。虽然赫茨尔的梦想将得到大国的支持，但在一战前的那些年中，没有人能预见到欧洲犹太人数十年后经历的恐怖。

3. 其他反响：实证主义与精英主义

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分离主义外，人们对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还给出了其他的答案。部分思想家开始对 19 世纪的实证主义，即确信人基于理性和原则而行事的乐观实证主义提出了质疑。美国医生、哲学家及早期心理学原则的奠基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在对其所处时代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人并非依照规则行事，而是在外界事物刺激下做出注重实效的反应(实用主义从此便铭刻于现代词汇之中)。他进而对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并提出其著名的格言："我们不是因悲伤而哭泣，但因哭泣而悲伤。"(We do not weep because we are sad, but we are sad because we weep.)形而上的制度体系对于詹姆斯来说完全是空话：规则不是因为真实而起作用，而是起作用才变得真实(Principles do not work beause they are true—they work and therefore become true.)。

受詹姆斯推崇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是另一个反对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手。柏格森坚持意志的重要性，认为推动人类进步的核心要素是对创造的渴求(the élan vital)而非自然选择。与詹姆

斯一样,柏格森也认为人类的理智总受制于情感。

精英主义是实证主义具有危险性的另一个分支。他们虽然有时也从詹姆斯和柏格森那里汲取养分,但更接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选举权的推广、资本主义的扩张甚至公共教育的普及等等,均引发了精英主义者的不安与惊恐。在他们看来,实证主义者的乐观主义情怀有悖于现实,因为西方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西方的领导者、美德及高贵因混杂的大众民主而失纯,西方是否会因此而走向衰落?精英主义者给出的答案是,希望取决于以品质、能力和美德而非种族与民族为基础的"最优秀"人群。

意大利保守的法学家及参议员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1858—1941),在其作品中得出结论认为,不论差别有多大,政府各种制度体系的权力都将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精英者手中。社会主义者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1876—1936)从另一个层面论证了少数人统治的必然性。米歇尔是一个出生于德国并在德国受教育的社会科学家,因抨击德国政权被迫到意大利和瑞士的大学避难。1911年,米歇尔出版了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政治党派》(*Political Parties*),并提出"寡头统治铁律"理论。米歇尔认为,即使那些拥有完全民主议程的政治组织,也将不可避免地倒向权力和影响落入少数人之手的寡头政治。与莫斯卡一样,米歇尔也认为,诸如富丽堂皇的"人民主权"观念及已被现实证实的民主政治哲学思想,无论通过传统还是革命的途径,都将注定成为精英主义者手中的工具。

毫无疑问,精英主义哲学家中最难归类的应是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尽管他的生命随着20世纪的到来而终结,但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被人们察

觉。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学人,他在25岁时便接受了瑞士巴塞尔大学一个颇有声望的教授职位。但仅仅过了10年,他就因健康原因离开了讲坛。在此后的10年中,他几乎与世隔绝,1889年,他的精神彻底崩溃。在此后的岁月中,他神志不清,隔离居住,一个崇拜他的妹妹照顾着他,并坚持不懈地宣传其兄的思想。

尼采虽师从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但他很快便抛弃了这个悲观主义者所教授的一切,而形成了自己更加深奥的世界观。他反对政治民主的一切要素,并在他的巨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1883—1885,直到1909年才出现译著)中颂扬超人(übermensch)的领导、矢志维护生灵的武士贵族、拥有极限力量的上等人以及强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从叔本华那里引来的概念),主张由此来掌控国家,并将其引向光荣与真理。

尼采虽然是一个极度虔诚的年轻人,但他却反对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宗教,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强调的服从、慈善和牺牲,本质上是"奴役精神"。在他看来,对同胞的同情就像这些宗教制度一样受人鄙视。尼采当然也鄙视唯物主义、资本主义、民主以及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他同时也憎恨军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认为前者虚荣而愚蠢,后者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自我辩白与嫉妒。

尼采从未意识到他在知识圈之外的影响力,因为他的作品在他开始发疯前并不出名,而且直到他死后才被广为翻译和流传。即使到那时,要完全理解那些作品仍然不易。他的推理复杂而不确定,甚至有些模糊。他并不以哲学家惯用的散文体进行创作,而是采用一种无韵诗(blank verse)的格式抒发思想。此外,其作品并非是结构严谨的议论文,而是更多地使用警句和

格言来吸引读者的关注。关于信仰他写道,"凡事无实,一切兼可能"(Nothing is true;everything is allowed.);关于苦难和进步,他认为,"人称为高级文化之一切,实基于残忍之净化与浓缩"(Almost everything we call higher culture is based upon the spiritualizing and intensifying of cruelty.);关于宗教,他宣称,"上帝死了,我们把他杀死了。"(God is dead. We have killed him.)因此,人应独自站立,依靠自己的意志:"你将成为你自己。"(You shall become who you are.)

如此强有力且高深的思想具有无穷的价值,而这也是此类预言家面临的一大古老的负担,即那些审读者将随意阐释并运用其思想。尼采显然没有预见到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以及法西斯主义者,用他的话来说将"走向光荣",而且尼采毫无疑问也鄙视这些人。尼采曾使很多人激动、愤怒甚至备受激励,但其思想及声望却最终难逃被残暴的纳粹政权歪曲与剽窃的命运。

五、弗洛伊德与精神科学

在本书所涉及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中,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那样,与现代存在如此高的一致性。这一界定并非言过其实,我们还能说出谁对现代的"精神科学"比他更有发言权?在如此深奥和博学的领域,谁的研究能像他一样成为今天人们思想和语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弗洛伊德出生于当时仍属于奥地利的摩拉维亚(Moravia)的一个小镇,孩提时就受反犹运动迫害被迫随家逃亡,后在维也纳长大成人,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才因纳粹驱逐离开了维也

纳。弗洛伊德很小就对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于 1881 年取得医学学位,此后其兴趣逐步转向对神经病理学(neuropathology)及精神紊乱(mental disorders)的研究。弗洛伊德起初与资深的医生合作,主要依靠催眠法缓解病人的焦虑,但他最终还是不满于这种"疏泄式"方法论("cathartic"methodology),并经十年的钻研、协作以及自身的努力,最终发展出一套新的治疗方法。

1896 年,他将这种治疗方法定名为精神分析法(psychoanalysis)或"闲谈疗法"(talking cure),即通过对病人谨慎的询问或对某些问题的"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来探查造成其精神紊乱的原因和经历。弗洛伊德确信,精神紊乱与肌体类疾病一样,治愈的关键在于发现病因。这些有害的经历隐藏于人们的无意识中(unconscious),可在病人过去的经历中发现,疏导和消解它们才能使患者恢复精神健康。他确信,这种有害的经历深藏在人们的无意识中,为了解释它们如何隐藏的和对患者康复的危害,弗洛伊德创造了"压抑"(repression)和"阻抗"(resistance)理论。压抑是防护性的精神机制,通过它,痛苦的和有害的经历被掩盖在意识下面。阻抗是一种防御,使病人意识不到被压抑的记忆的存在。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认为,揭示这些有害经历的关键在于寻找通向无意识的通道,而这一通道就是大部分人都经历的无意识状态——梦。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治疗方法主要形成于这一时期,具体包括:一间光线昏暗的房间,一张床,放松的氛围,患者视线范围外的心理医生。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最早见诸于其第一部重要著作《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1900),并经随后出版的《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1904)得以系统性的阐释。在他看来,无意识以及压抑与阻抗性

活动存在于有意识的日常生活的表面之下,这样被称做"弗洛伊德失语"(Freudian slips)的语误以及健忘和失眠等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均成为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构成要素。然而,在弗洛伊德的著作、演讲及论文中,争议最大的当属性本能理论,即认为没有一种力量能像性欲那样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人胆敢在公开场合讨论性的话题,弗洛伊德因此被称为创新者、好辩者甚至革命者。1905年,他出版《性学三论》(*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其中最令同时代人震惊的是,认为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人都有性经历和欲望。弗洛伊德认为,男孩自幼就有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即占有其母并取代其父的欲望。女孩则有厄勒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但因阴茎嫉妒(penis envy),往往会在孩提时代就形成破坏性的性别自卑感。弗洛伊德进一步认为,正是诸如此类被埋藏和抑制的性欲导致了许多人的神经错乱。显然,这对因循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构成了太大的冲击,但这仅仅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一小部分。

像表现主义画家康定斯基、诗人马拉美(Mallarmé)及预言家尼采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答案在于无意识,即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图谱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人格三要素理论,即自我(ego)、超我(superego)和本我(id)。自我是个体受理智控制的部分,即构成文明的要素。超我本质上是人格结构中代表良知(conscience)的部分,即人类道德的储藏室。本我指原始的自己,包含非理性、欲望及不顾及后果的各种冲动。自我和超我存在于每个人之中,并与本我相对抗。大部分人要想进入不受其喜好决定的社会,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依靠自我和超我抑制和压服本我的冲动,由此导致的冲突或内战,成为人类精

神疾病产生的温床。

尽管弗洛伊德的作品激怒了大批的同行，但他仍在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患者帮助下，于 1902 年在维也纳大学得到了一个教职，从此开始系统地教授其理论。短短几年内，弗洛伊德周围就聚集了一个国际化的杰出专业团队，并于 1910 年促成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的建立。这些人学习并将弗洛伊德的理论付诸实践，精神分析法因此在他们那个时代即已得到传播。不久之后，部分人因反对弗洛伊德过分突出性本能的作用，转而创立自己的理论学说。1911 年，奥地利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离开弗洛伊德从事个体心理学的调研。弗洛伊德的密友瑞士人荣格（ Carl Jung，1875—1961），也于 1913 年拂袖而去，并创立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学派。有必要指出的是，大部分人仍追随弗洛伊德留在维也纳，或回到自己国家去实践和教授弗洛伊德的理论。

弗洛伊德进而将研究扩展至文化与宗教领域，发表文学与政治评论，并建立了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弗洛伊德确信已纠正了人类对自身精神世界的认识错误，因此毫无矫饰地将自己与哥白尼相提并论。弗洛伊德为开创医学领域新的分支奠定了基础，并且首创了新的治疗方法。尽管医学界对其方法甚至部分理论认识不一，但弗洛伊德革命性的发现，无疑成为现代医学基本原则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要寻找证据，我们只需翻一下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电话簿，你在“内科医师”栏下看到的将是“精神分析医师”。

六、新女性

1. 走向平等

在19世纪,西方上层社会强调秩序、推崇权威的主流价值观,也对女性的地位做出了较为明确的界定。虽然不能说这一时期的女性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但主流观念的确认为男女有不同的生活与社交领域,并且这一观念因女性的生理差异等受到了法律、传统及宗教等多方面的保护。从这一点来看,女性承担着社会发展最重大的责任——生育,而这也是她们天生应对人类历史做出的重要贡献。她们在体质上"明显"比男性柔弱,因而她们在生理上也被认为更加脆弱。她们更为敏感,更为情绪化,没有冷静应对商务、公共生活及战争的能力。她们像儿童一样没有强烈的性欲。总之,她们不是更加接近上帝(在正统的宗教中显然没有女性牧师),而是更加接近天使。尽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亲眼目睹着所有这些观念的极度虚伪性,但它们早已潜移默化于人们的认识之中,对其挑战就意味着一个人将被贴上革命者的标签,而这恰恰是社会习俗的力量所在。

随着私域与政治交织度的不断强化,我们这一时代见证的最富有意义的一大事实是,西方的公民自由与政治权力,较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得到了更为严格的保护。然而,我们却难以否认同样的一大事实,即每个国家都存在根深蒂固并受法律保护的性别歧视。

实际上,在20世纪的前十年中,西方所有国家成年女性的

法律地位与前一个世纪相比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例如,女性获得了掌管自己财产的权利以及包括高等教育的受教育权,尽管许多大学并不十分情愿接受女性学生。离婚法针对男女的条款更加平等,并且更趋自由(在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中,离婚仍然是社会习俗严格禁忌的范畴。在美国,离婚虽然更加普遍,但仍然是不受欢迎的),需要高深知识的职业(除了已认可的教育和护理等"女性职业")也开始缓慢地向女性开放。在许多忧心忡忡的男性或女性批评家看来,"新女性"随处可见。她们着装大胆,要么身穿"灯笼裤",脚踏自行车,参加诸如网球或高尔夫球等激烈运动,要么宣传弗洛伊德或英国医生亨利·哈维洛克·埃利斯(Henry Havelock Ellis,1859—1936)关于性解放的思想。这两位学者反对过去对女性的许多不合理的界定,认为女性与男性具有同等水平的性欲要求。被后人称做女权主义的现象虽然并非诞生于20世纪,但却在20世纪趋向成熟,并开始威胁传统的观念,而两者显然不会也不可能共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现时代唾弃的吸烟行为,也曾是极端女权主义者挑战传统的一种方式。据传,1896年,放荡不羁的女公爵克莱蒙特·唐纳瑞(Duchesse de Clermont-Tonnerre),曾在上流人士出入的沙威酒店(Savoy Hotel),公然点燃香烟羞辱伦敦社会,其行为却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赞赏与欢呼。

2. 为选举而斗争

选举权问题是争取男女法律平等的最为主要的问题。19世纪是男性争取普遍政治参与的时期,正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大部分西方世界所见证的那样,获得选举权的男性公民的

规模有了显著的扩大。不难理解,妇女和越来越多支持其事业的男性,都将政治选举权视为政治平等的象征和有效工具。在一个思想与观念极富变化的时代,许多注重变革的人认为,妇女的要求是合乎逻辑的。随着改革性立法的不断推进,选举权的重要性更加凸现。对于妇女参政主义者(对致力于这一事业的信徒们的称谓)来说,投票权本身就是目的。而在其他人看来,如果妇女选举权得以保障,所有其他的不公将会随之消失:在民主政治中,数以百万计的妇女投票者将会使这一进步势不可挡。

致力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组织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得以迅速发展,其中英语世界的发展态势最盛。在美国,曾支持废奴和禁酒运动的新英格兰人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1815—1902)和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1820—1906)建立了全美选举权协会(National American Suffrage Association),其成员至一战前已达数千人。在英国,米利森特·加勒特·佛赛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1847—1929)领导了国家女性选举权社团联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 NUWSS),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则建立了更为激进的女性社会与政治联盟(WSPU)。美国与英国的情形大体相同,全国女性选举权社团联盟与更加缺乏耐心的妇女党(the Woman's Party)展开了同样激烈地争论。

这场运动显然并非没有成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妇女早在1867年即已获得了选举权,美国怀俄明地区于1869年(其他11个州截止到1914年)以及新西兰于1886年给予了妇女选举权。1894年,英国妇女也获得了地方选举的投票权,但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中,只有芬兰(1906年)和挪威(1913年)的妇女获得了投票权。

美国和英国的妇女运动不仅引发了最为激烈的争论，同时也为后来妇女争取权利及政治变革开启了一条普适性道路：利用一切机会在公共集会宣传自己的观点，组织地方及全国性协会，筹集基金，发起公开性运动，聚会，合法的游行活动等。毫无疑问，她们促成了变革，但她们也常常遭遇抵制、反对甚至羞辱。她们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反对者的强大阻力，引发了严重的不安与困惑：处于政治劣势的妇女是否将继续依照规则进行游戏，还是将采取更为激进的方法采取行动？这样的方法将是和平的还是富有攻击性的？

究竟是英国女性社会与政治联盟的激进运动，还是其美国姐妹引发的剧烈反响最终推迟了投票权的实现？这样的问题显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从中可以看出，如何推进现代民主国家的变革，尤其是极易引发强大阻力的变革，的确是一个广为争议的问题，并且本书的其他章节也将再次面临这一问题。然而，这些女性无疑是各种变革途径的拓路人。

七、本章小结

在人口稳定增长了几十年后，欧洲的出生率从 1900 年开始下降，但健康、卫生以及饮食条件的改善又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并且也提高人的预期寿命。这些因素加上区域内部的移民潮推动欧洲进入了一个城市文化日趋发达的新时期。与此同时，大量的出境移民（许多人去了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欧洲的人口过剩问题。

随着现代主义日益成为推动艺术革新、反叛传统的强大力量，艺术家们转而描绘他们自己而非他人看到的现实世界，由此

奠定了现代艺术发展的坚实基础,新世纪也因此见证了艺术领域强大的革新运动。“新艺术”虽然并没有很快被公众所接受,但民众的冷漠并没有引起艺术家对此的顾虑,而这一问题本身也缺乏受重视的价值。

在建筑领域,大胆的革新者同样用他们新的理念与风格,取代了古典主义长期坚持的设计原则。音乐领域亦经历了相同的变革。面对大批无所适从的听众,作曲家们以他们反叛性的创造力,永远地改变了音乐历久不变的创作原则,而公众对此表现出了同样缓慢的适应力。

在文学领域,旧的规范也遇到了新作家的严重挑战。他们用全新有时甚至是令人惊诧的方式驾驭和使用语言,无论诗人还是小说家,都以他们自身的感知展示世界,全然不顾及读者的意愿与理解力。

科学领域令人眩晕的变革,给一个尚无准备的世界带来了剧烈的冲击。20 世纪初,科学对于物质和能量属性的理解,开始沿着一条不断延伸并具革命性的道路前行。科学家们证实了放射能和亚原子微粒的存在,光的量子理论也得以系统化。物理学可谓经历了永久性的变革,牛顿经典的宇宙观被完全颠覆了。1905 年,这一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爱因斯坦,出版了永久推翻人们时空常识的《狭义相对论》。其高深的理论显然超出了外行人的理解水平,而这又清楚地表明,未来有关速度、质量及时间等终极概念将很难被非科学家所理解。

20 世纪早期也见证了社会秩序的新观念。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其发展同样遵循无情的适者生存原则。一些人据此认为不同的种族应有高低贵贱之别,种族歧视因此并不违背自然规律,甚至是一种有益的制度。

由此不难看出，一些欧洲人正是以这样的道德观，来证明其帝国主义行径的正当性，而这同样为美国“吉姆克罗”种族主义制度提供了合乎理性的辩白。

反犹主义是普遍存在于欧洲的一种古老的种族主义，其在俄罗斯帝国体现的尤为严重。作为回应，欧洲犹太人发起了犹太复国运动，他们反对同化，呼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国家。

对社会秩序的挑战也来自其他的思想家。许多人崇尚力量与权威，其中尤以尼采最烈。他认为社会应被高贵的统治者所掌管，并应超越普遍道德、基督教、民主、资本主义的制约，其奇特的影响一直延及新的世纪。

对人格的重新解释是由弗洛伊德完成的，其关于无意识、性欲及个体发展理论的影响，显然不能被过分夸大。然而，心理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尽管遇到了强有力的反对，依然在正统的医学领域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

妇女选举权运动在一战前即已日趋活跃，并在战争期间取得了首次成功。芬兰、挪威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欧洲率先承认了妇女的选举权。然而，主要的民主国家并未采取效仿性的举措，并且这一重大问题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得以逐步解决。

第二章

国家的现代化

近些年来历史学家们经常反思，国家或社会是否为历史研究中的最佳研究单位，因为很难在一国的界限内，对许多广泛涉及人口和社会的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当然，就本书上一章讨论的问题而言，跨国的解读路径无疑更加有效。但 19 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非常强盛，国家作为一个研究单位，因此成为理解 20 世纪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由于人类都试图借助特定的民族、教会、意识形态、经济学说或者部落等寻求安全感，亦即将曾经分散的各种小团体聚集为具有共同身份认同的大团体，因此在促进某些团体间合作的同时，也加剧了另一些团体间的竞争。

认为人类可以通过努力改进世界的"世界改良论"(Meliorism)，为现代政治领域的各种主义如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民主本身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推动力。与此同时，过去曾局限于某些特定区域的各种运动与威胁（如饥荒）等，其影响现在变得更加广泛。例

如，西非经济作物价格的下跌、中东石油生产的衰竭或日本的重要技术革新，都能很快在欧洲和北美引起强烈的反响。19 和 20 世纪的科技必将给世界带来剧烈的变化，未来人们在十年内经历的变化将比过去一个世纪内看到的还要多。这一时期的大国，亦即现代最大、最强有力的政治实体，在彰显他们各自的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基督教文明、政治制度以及他们的雄心与目标的同时，又将意识到他们亦是西方这一强大整体中的一员。毫无疑问，20 世纪的政治史将是国家自身利益与国际合作相互交力的历史，因此首先需要对这些政治观念及相关的国家进行简明扼要的梳理。

一、政治观念

20 世纪的西方并没有创造出全新的政治思想，而是满足于从已有的思想中提取精华。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下文的阐释将有助于我们对此作出基本的界定。

对于欧洲保守派来说，过去便是未来的向导，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准则。君主政体是最好的统治制度，最好的宗教制度是延续几个世纪的古老民族宗教信仰体系，如果能吸纳服务于国家的忠诚、法律或献身精神将变得更加完美无缺。保守派“深知”构建等级体制的必要性，以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均能“适得其所”并坚持特权与责任并存。尤为重要的是，保守派反对自由主义对人类理性力量抱有的信心甚至信仰。

尽管如此，19 世纪所经历的尝试性变革，使保守主义难以继续固守传统的信条，即任何变革都将导致更坏的结果，因此应予以坚决的反对。西欧保守派因此提出了更具现代性的理论主

张,以抵御其他思想流派带来的挑战:20 世纪初期,英国、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保守党都着手制定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几乎所有地方的保守派,都诉诸原本主张革命或自由主义信条的民族主义,而欧洲大陆的部分保守主义者则转向了形形色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精英主义及种族主义。

作为西方保守主义的一大传统敌手,自由主义主要形成于19 世纪,其理论核心是牛顿式政治观,即相信人类的智慧、理性以及人类拥有解决自身社会问题的能力。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人拥有学习和改进的能力,因此是“趋向完美”的动物。如果人们理性地追求“自我利益”并尊重同行者的利益,社会最终将转变为富于仁爱的有机组织。因此,进步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是现实可信的事实,历史则为此提供了不容辩驳的证据:难道奴隶制没有被废除吗?难道西方的饥荒没有被彻底消除吗?难道科学没有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可知更加舒适吗?

与保守主义不同,自由主义从一开始便体现出明显的经济取向,原因在于其理论内核具有资本主义的属性。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庆幸他们拥有最好的国家范式,即一个追求和平、节俭、革新和自由贸易的国家。它尊重邻国,严格限制财政开支,注重社会发展,并且崇尚自由贸易,因此是国家发展的最佳形态。

如果说保守派追求井然秩序的热情更能迎合农民阶级和贵族,自由派对资本主义的崇尚则更接近资产阶级的价值追求。虽然自由主义追求变革的信条,对于那些不满现状的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但社会主义显然对庞大的工人阶级群体更具感召力。

犹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那样,社会主义形形色色、多种

多样。部分人由马克思主义蜕变为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有些社会主义者强调秩序与改革,另一些则主张建立温和的立宪党派。然而,无论崇尚改革还是革命,它们拥有相对一致的共同信仰。进入 20 世纪后的社会主义,反对社会演进一定程度上将“自然地”趋向正确的推论,既不认可保守主义关于社会将以传统为导向前行的立场,也一致反对自由派笃信资本主义以及社会必然趋向进步的观点。

有些社会主义者可能宣称《新约全书》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另一些则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汲取营养,他们可能致力于通过民主政党和议会选举获取权力,也可能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但他们都致力于实现社会正义,即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竞争及经济结构不再将人们区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新世界。

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都主张完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或至少实施彻底的改良,并由一种新的制度体系取而代之,其中“生产工具”——经济基础设施——应该由多数人,即工人们自己的代表来掌控。

截止到 1914 年,遍及欧洲各国的工会组织都或多或少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虽然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每一个甚至只具有初级民主的国家,都存在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在拥有选举权的工人阶级中争取选票,其中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最大,而美国则最弱。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曾是欧洲各国政府一致诅咒的对象,但现在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认可了它的存在。

二、英国:走向民主与危机

20 世纪伊始,英国仍然保持着由维多利亚女王(1837—

1901 年在位)统治的君主政体。她当时已在位 50 多年,是一位杰出并强有力的统治者,但政治权力更多地由议会掌控。作为都铎王朝以来最受人欢迎的英国君主,维多利亚不仅是其臣民尽忠爱国的偶像,而且通过子孙们的联姻,她也成为欧洲各国皇室敬仰的长辈。但国家权力实际由内阁以立宪君主的名义行使,而内阁则向议会负责。

英国的立法制度是诸大国中最古老的立法体系,由上下两院组成。下议院由男性选民在接近普选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上议院主要由未经选举的世袭贵族组成。两院虽然在理论上拥有同等的权力,但除了出现明显争议的情况外,民选的下院因男性民众选举权的获得及控制公共财政的古老传统,往往拥有更大的立法权。1911 年的议会法案进一步强化了下院的优势地位,上院仅保留拖延批准下院法案的延搁否决权。世袭贵族虽然是 20 世纪英国上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世袭原则最终于 2001 年被废止,上院议员从此由经任命且不能世袭的终身贵族(除一小部分"世袭者"外)充任。

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英国虽然不排除第三党的出现,但却形成了与选举制度密切结合的两大党竞争体制。两党制在英语世界(英国、自治领和美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欧洲大陆往往更盛行多党制或联盟体制。无论是法国、意大利、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主国家、瑞士、荷兰及比利时,还是于 1876 年建立了两院制的西班牙均实行多党制。两党民主政治在澄清问题、优化选择以及增强安全感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两党制与议会制政府都没有成为新独立和现代化国家追求的样板。

在世纪之交的英国,围绕选票与权力的争夺主要在保守派

和自由派之间进行。前者宣称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君主制的恢复。保守派的政策主张对于地主阶层、军队、传统教会的追随者和农业工人极富吸引力。到我们这个时代，其支持者转变为商人、城市工人、爱国者、乐观的帝国主义者，当然也包括那些主张通过关税阻止不公平国际贸易并保护国内市场的复兴论者。

自由派的政治先驱是早期的辉格党，其支持者主要是商人、非国教教徒、白领激进分子以及富有政治觉悟的工人。与部分保守党人坚持高关税的政策主张不同，自由派仍致力于实现 19 世纪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即自由贸易，并且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就在爱尔兰的自治问题上坚持广为争议的不同主张。

到 19 世纪末，繁荣、自信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与社会革新氛围一并趋向衰萎。农业经济萧条，工商业的发展也不如人意。在一些人看来，由尽忠职守向浮夸的不幸转变，标志着爱德华时代的到来——以维多利亚的继承者，喜欢享乐却富于博爱的爱德华七世(1901—1910 年在位)命名的时代。英国还面临一系列其他的难题：爱尔兰的政治地位，棘手的布尔战争(1899—1902)，南非说荷兰语的白人少数民族，谁来控制好望角的战略要地，以及令人担忧并代价高昂的英德海军军备竞赛等，而这一切同时又与工人的社会改革风潮交织在了一起。

在此条件下，很多英国人开始质疑中世纪以来长期坚持的自由贸易政策。德国和其他国家不仅在英国本土外的市场低价抛售产品，甚至也侵入了英伦三岛的国内市场。英国为什么不像其他工业国家一样以高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在很多英国人看来，人口稠密的本土虽然难以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简单的关税壁垒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但他们拥有遍及世界且富



四代英国君主:维多利亚女王身后右侧为其子亦即将继承王位的爱德华七世,左侧为其孙即未来的乔治五世国王。女王手牵着的是乔治王子的儿子,即将短暂执掌王位的爱德华八世。(Hulton Archive/ Getty Images)

于农业资源的帝国体系,因此能够继续 18 世纪的古典重商主义传统,通过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的交换(在理论上)实现经济的

平衡。

作为一位来自伯明翰的改革派领导人，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因爱尔兰自治(Irish Home Rule)问题与自由党决裂并倒向了保守党。张伯伦是贸易保护主义者的主要领军人物，极力主张建立帝国特惠制，以期将英王治下的所有领地纳入同一个关税同盟。很多保守党人支持张伯伦，而那些对世界秩序充满忧虑并渴望实现帝国统一的人，对此则抱有更高的热情。1903 年，张伯伦推出了名为关税改革与帝国特惠制的新计划，建议免除帝国内部贸易的一切关税，但对外国的原材料、工业制成品以及食品征收适量的关税。然而，对食品课征关税的建议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保守党新首相阿瑟·詹姆士·巴尔弗(Arthur James Balfour，1848—1930)尽管总体上赞同新计划，但却对张伯伦的仓促冒进充满了忧虑。如果自由派坚决反对关税改革计划，很多忠贞的保守党人也将因担心丧失选票发生动摇，因为计划不仅将终止延续达 50 多年的自由贸易，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活成本的上升。首相最终没有签署“激进”的关税改革计划，张伯伦因此于 1903 年辞职，并在巴尔弗的支持下就关税改革问题游说全国。保守党内部支持与反对计划的呼声一样强烈。为了避免政党和内阁的分裂，出任首相仅一年的巴尔弗也被迫辞职，但保守党政府最终仍于 1905 年 12 月因严重分裂而倒台。自由党人在随后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共赢得 400 个下院议席，而巴尔弗的追随者只获得 157 席，其余的 113 席被其他小党派占有，自由党随即组建了 20 年以来的首届长寿政府。

自由党上台伊始就确立了建立福利国家的政策方针，主要包括：建立养老金制度，建立基于义务保险及公共财政支持的社

保体系,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法规,延长免费公共义务教育的年限,强化各种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等。自由主义者曾长期信奉严格的小政府理念,并伴有温和的改良主义色彩,但上台伊始的"新自由主义"者,却以人民的名义开始实施积极的干涉主义新政策。

1909 年,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 1863—1945)提出"人民预算案"(People's Budget)。英国早在 19 世纪便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现代累进税制度,高收入者承担了最大份额的直接税,"人民预算案"则进一步扩大了课税的范围。计划建议提高收入和遗产的累进税率,以使富人承担福利政策所需的资金。计划实际上走得更远。为了对土地的"非应得增值"部分(土地无需所有者劳动随时间推移实现的自然增值部分)课税,计划要求授权对全国所有土地进行再估价。这无异于改变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制度结构。议案虽然获得了下院的通过,但却遭到了上院的否决。尽管上院中的多数保守党人事实上赞同预算案,但自由党在 1910 年 1 月和 12 月的两次选举中却丧失了多数派的优势,两党在下院中各获得 272 个议席。为了继续执掌政权,自由党寻求与旨在实现自治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结盟,并最终获得了该党的支持。1911 年,在《议会法案》(*Parliament Act*)获批的过程中,爱尔兰民族主义党完全倒向了自由党。依据该法案的规定,上院在财政议案上不再拥有决定权。这样上院中的贵族,将仅能保留对下院连续三次获批议案不超过两年的延搁否决权。新国王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 1910—1936 年在位)几经犹疑后表示,如果议会法案在贵族院受阻,他将通过增加任命组成新的多数派。贵族们被迫做出了妥协,但却进一步丧失了自身的政治权力。从这一点来看,自由

党的社会改革计划并非缺乏基本的稳妥性。

1880 年以来，英国政党的政治取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很多曾坚信政府只有少管才能管好（成本也低）的自由党人，也开始主张国家应适当干预国内政治生活，以帮助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穷困者。自由党最终采纳了劳合·乔治的税收改革计划，以通过由税收支持的社保制度对国家财富实施再分配。与此同时，曾在 19 世纪中期赞同实施劳工法案及适度福利的保守党，其许多成员转而支持放任政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其主张实际与 1850 年的自由党几无二致。

发生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素是，处于侧翼的劳工运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06 年，劳工运动在下院赢得 30 个席位。如果算上在自由党旗帜下竞选的自由劳工党人（Lib-Labs），总数大约有 50 席。他们正是在这一年开始自称为工党，主张建立福利国家，很多人甚至要求建立对主要工业实施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新生的政党得到了很多中上层选民的支持，他们对社会改革的呼声抱有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很多像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H. G. 韦尔斯（H. G. Wells，1866—1946）、G. D. H. 柯尔（G. D. H. Cole，1889—1959）以及悉尼（Sydney，1858—1947）和比阿特丽丝·韦伯（Beatrice Webb，1858—1943）等著名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工党，其中的悉尼和韦伯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便组建了颇具影响力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费边社成员宣扬"渐进的必然性"，反对革命，主张通过渐进、和平的议会选举战略实现社会民主。他们取名于古罗马将军费比乌斯·昆克塔托（Fabius Cunctator），这位公元前 3 世纪的罗马将军，正是通过耐心的"等待"最终耗尽了迦太基人的实力。

文献记载

比阿特利丝·韦伯:关于“我为何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比阿特利丝·波特(Beatrice Potter)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位知识分子成员,她是费边社会主义者和行政官员悉尼·韦伯(Sidney Webb)的妻子。在《我的学徒生涯》(*My Apprenticeship*)中,波特回答了“我为何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我简单描述一下我在转向社会主义过程中经历的几个阶段。

我对伦敦东区生活的研究已充分表明,聚集于19世纪商业和工业中心的大批人口,因地主和资本家榨取高昂的租金与利润经受着身体上的痛苦与道德上的堕落。在我看来,导致这些恶果的诸多因素诸如低薪行业中的低工资、长时劳动、卫生条件恶劣以及码头工人的长期失业等,可以通过颁布相应的法规及工会的压力得到缓解或杜绝。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体力劳动者只要能够找到工作,就可以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改革因此首先需要背离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个人主义传统,并以共同体利益为基础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经济活动实施全方位的控制。

然而,在我看来,无论国家的规制与工会的介入多么深入并富有技巧,都无法摆脱周期性通货膨胀与经济萧条不断加剧的困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萧条意味着过度劳作与失业的交互打击,而这一切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投机及有产者对利润的疯狂追逐所致。另一方面,“人不能仅靠面包维持生存”。虽然资本主义政府也不得不承认部分“社会主义”举措的合理性,例如基于税收并对公众开放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花园以及

对老年人、弱者及被迫失业者的救助等，但其迟缓的反应既不能阻止种族的不断退化，也难以改变私有制不堪革命冲击的命运。使每一个公民合法拥有维持文明生存的最低条件，因此成为我转向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基本认识。

Beatrice Webb, *My Apprenticeship* (Ham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38), II, pp. 439—440. Copyright by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截止到 20 世纪初，费边主义的影响得以不断扩大。依靠部分劳工选票来维持多数的自由党，因此通过了很多有利于工人的重要立法：承认和平游行、工会基金的合法性以及雇主对意外事故的补偿责任（均在 1906 年）；国家财政支持适度的养老金（1908 年）；健康与失业保险（1911 年）以及最低工资标准的法规（1912 年）。自由党推进社会立法的动机在于抢占工党的立法主导权，但从长期来看，绝大多数工人选民倾向于支持工党。由此开启了自由党漫长的衰落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趋于瓦解，其右翼最终倒向了保守党，左翼则投入了工党的怀抱。

然而，作为自由党的一个分支，帝国主义自由党人不甘接受日益衰落的事实。张伯伦曾是这一派别的主要领军人物，但他最终却倒向了其对立派。1901 年，费边社与坚定的自由党人结成了联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有必要建立一个旨在追求民族利益的新的民族政党。随着自由党的进一步分裂、衰落，以及为聚拢其追随者以反对工党的崛起，这一新派别更多地

是一个联盟,而不是两党体系内一个功能完备的政治整体。然而,它在一个问题上(也有特色鲜明的例外情况)仍然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即大英帝国的重要性。正如一位议员(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哈尔福德·J. 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所言,自由贸易将保护帝国主义。他坚持英国应成为一个"组织者"和工人的国家,身处其中的工人阶级怀有的爱国主义情结,将会促使他们意识到,其主要的使命就在于实现国家的目标。

历史学家乔治·丹泽菲尔德(George Dangerfield),在 20 世纪 30 年代首次出版的一部颇具争议的作品中,将英国临近一战的年代描述为深陷"动荡"的时期,其广度与深度均超出了单纯的政治范畴,并切实威胁到了这个国家的社会机体。尽管那个时代的普通人较之我们更缺乏经济学知识,但所有艰难谋生的人都切身感受了货币贬值的严重后果。在这些年里,伴随着英国工业垄断性优势的日益丧失,收入也随之明显下降,并危及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而处于收入阶梯底层的工资劳动者显然感受最深。在一个工会组织(工会原本完全由技术工人组成,但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及无技术男性工人也加入了工会组织)较为健全的国家,经济滑坡不仅引发了提高工资的强烈呼声,而且导致了遍及整个工业领域的罢工潮。"劳工动荡"虽然因战争的来临而结束,但为劳资纠纷而浪费的时间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维多利亚时代劳资间的和谐荡然无存;组织起来的工人更加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大型工会组织间建立伙伴关系,以期在未来的行动中进行合作;不称职的工会领导人受到了普通工人的挑战。然而,这一困难时期最重要的副产品,是社会主义者

称之为“阶级意识”的崛起。1926 年，英国经历了唯一的全国总罢工。这一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后来证明是一场失败），很大程度上是 1910 至 1914 年劳工动荡影响的结果。

正如上一章所提及的，英国同期内也经历了较为激烈的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在 1914 年以前的年份中，妇女争取选举权尽管已是一个老问题，但 1914 年以后运动的参与者及采用的方法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不满于已有组织框架下取得的缓慢进展，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夫人于 1912 年创建“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带领中上层妇女进行日益激烈的“直接行动”。她们撕碎国家美术馆的画卷，冲击政治会议，羞辱政客，袭击伦敦的高档商店，并用铁链将自己成排绑在栏杆上高呼“为妇女们投票！”违法者的行为无疑将引发政府的强烈反应（当时的自由党内阁中多数人是温和的参政权扩大论者），并拘捕了（自称为）好斗的“妇女参政论者”。然而，被判入狱后她们转而进行绝食抗议，陷入尴尬的当局被迫将其释放。但获释后她们又故伎重演，结果多次入狱又多次获释。“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规模不大，成员仅数千人，而参加“暴力游行”者人数更少，但其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温和派。同样有趣的是，潘克赫斯特夫人及其追随者，不仅将所有的男性拒之社团的门外，而且与其（被认为是）天然的同盟者社会主义运动、禁酒运动及和平主义也分道扬镳。

劳工与选举权运动之间显然不存在稳固的因果关系，而其组织或领导者之间更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联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两大政治运动都缺乏可预期性，并且共同加剧了那一时期的紧张氛围、戏剧性变化以及人们的焦虑。另外值得

提及的是,尽管激进的"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的目标未能在战前实现,而且很多人认为其极端方法不是促进而是延缓了妇女选举权的获得,但她们在这一运动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却不容否认。她们的行动唤起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并在新的20世纪中寻求甚至索要更加充实、更加完整的生活。

在临近一战的数年中,英国还面临直接危及国家凝聚力的第三大难题。它不仅超越了阶级、性别及经济界隔,并且涉及种族、宗教以及联合王国统一等根本性问题,即"爱尔兰问题"。

"爱尔兰问题":争取自治的斗争

正如东欧一样,19世纪末期的英国也面临一个日益尖锐的民族问题。在爱尔兰占据压倒性多数的凯尔特人及罗马天主教人口中,还存在一个拥有特权的新教徒少数派。他们通过古代的征服、移民或购买等获得了大片土地,但这些人往往为非在田地主,并且与其他的爱尔兰人存在明显的距离。这部分人虽然数量极少,但在爱尔兰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拥有明显的政治与经济优势。他们只在东北部阿尔斯特地区的六个郡中占据多数,其祖先多为苏格兰血统虔诚的新教徒,是16、17世纪顺应英国政府移民政策移居此地的英国人。尽管统治阶层中也有地道的爱尔兰人,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英国化并开始信奉新教。

三个世纪以来,爱尔兰的宗教、政治和经济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随着19世纪的演进,爱尔兰作为联合王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加入了英国(1801年),但这一方案从一开始便

遭到很多爱尔兰人的反对。1829 年,英国政府给予爱尔兰天主教徒完全的政治权利,并在爱尔兰推行 19 世纪的一系列改革。然而,这一切仍未能满足那些希望分离的爱尔兰人,并且很多人怀有的不满,在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的全国性"马铃薯危机"后,转变为明显的仇恨。100 多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及相关的疾病。幸存者指责伦敦政府没有采取应有的赈灾措施,其中的 100 多万人带着他们的愤怒移居美国、澳大利亚或新西兰。

政府随即实施了进一步的改革,但仍未能消除众多爱尔兰人追求自治的渴望。尽管出现了时断时续的暴力冲突及政府的报复性打压行动,但自治运动仍处于无组织状态,而这一重任最终将由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1846—1891)承担。巴涅尔是一个美籍英国新教地主,将爱尔兰自治当做自己的事业。他组建了爱尔兰民族党,并于 19 世纪 80 年代成为真正的"爱尔兰无冕王"。

1886 年,自由党领袖威廉·伊华特·格拉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对爱尔兰人的要求做出了回应,提出一项给予爱尔兰人有限自治的法案。法案虽然使张伯伦及其帝国主义追随者永远离开了自由党,但却在议会中遭否决,并导致了保守党的获胜。1893 年,84 岁的格拉斯通第四次重掌政权,并提出第二个自治法案。法案虽然获得下院的批准,但遭到了上院的否决。两年后获胜的保守党,转而在爱尔兰推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政策,以期"友善地消除自治"。然而,除了自治,联合王国尽其所能提供的一切,均难以满足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

在诗人 W. B. 叶芝(W. B. Yeats,1865—1939)、剧作家约

翰·米灵顿·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1871—1909)和奥卡斯塔·格里格力女士(Augusta Gregory,1859—1932)等的推动下,爱尔兰掀起了一场英语和盖尔语的文学复兴运动。格里格力女士是都柏林阿比剧院的一名股东,该剧院主要上演带有深刻爱尔兰主题的剧目。爱尔兰人的国家意识因此得以明显强化,各地的爱尔兰人,特别是美籍爱尔兰人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唯一能满足其需求的就是一个独立的爱尔兰国家。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英国自由党在1910年的两次选举后发现,他们需要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选票来削减上院的权力。两党随后敲定的协议规定,自由党作为回报支持自治,但爱尔兰人需要对1911年议会法案投赞成票。议会法案通过以后,自由党于1912年提出了爱尔兰自治法案。权力受到削弱的上院虽然无力阻止法案的通过,但却可以行使延搁否决权。很多保守党人、英爱联盟的支持者以及好斗的阿尔斯特新教徒,决定挫败自治法案。如果不能完全阻止法案的通过,至少要避免将阿尔斯特置于受天主教爱尔兰多数人掌控的从属地位。自治引发的危机因此日趋加剧。倾向于自治的人抱有同样强硬立场。随着1914年大战的日益临近,自治法案也将依据议会法案的相关规定开始生效。爱尔兰对立双方公开在各地训练各自的私有军队。人们担心内战极有可能爆发,而英国军队绝不会以武力胁迫阿尔斯特接受自治。1914年一战的爆发暂时搁置了爱尔兰问题,但当1918年西线的厮杀停止以后,爱尔兰对立问题重现于都柏林和科克的大街小巷。当1921年解决方案出台时,联合王国框架内的地方自治,已难以满足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是将爱尔兰岛一分为二:该岛的绝大部分转变为天主教人口占多数

的自治领(即爱尔兰自由国家,1937年宣布独立,1948年最终成为共和国),而新教徒主导的东北部六个郡,则成为并且现在仍然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尔兰岛的分割,在新生的自由国家内引发了称之为"暴乱"的惨烈内战,并在多年之后引发了我们这个时代有关北爱地位问题的激烈争议。

三、法国:第三共和国(1890—1914)

1870年,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因法军在普法战争中的溃败而垮塌,新生于混乱和羞辱中的第三共和国(依次参照18世纪和19世纪的两个革命共和国而命名),将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管理国家的使命。第三共和国建有两院制国民大会。下议院或众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由普选产生,上议院或参议院主要从地方选举产生的官员中任命。国家元首为总统,但实权归总理,总理不向总统负责,而是依靠下院多数派的支持行使权力。

在经历了两个拿破仑以及若干潜在独裁者的荣辱沉浮之后,第三共和国刻意构建了防范军事独裁的制度体系,即阻止所谓的马背人掌权。但到了1889年,骁勇的乔治·布朗热(George Boulanger,1837—1891)将军却企图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作为一名受人欢迎的英雄,布朗热得到了君主制主义者、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共同支持,因为他们都寻求一场针对德国的复仇战争。布朗热最终虽然丧失了勇气,逃往他国并自杀,但无论是共和国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会轻易忘记布朗热的存在。

政治共识本身很难在新的制度体系内生成,第四共和国因此必将面临各种分歧与争吵的困扰。部分人赞同共和制,另一些人则主张恢复某种形式的有限君主制,而保皇派内部也争吵不休。正统派支持波旁皇族的后裔,奥尔良派则支持法国最后一个国王路易斯·菲利普(Louis Philippe)的继承人,而他们同时又强烈反对共和制的支持者。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天主教徒与反教权主义者之间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共和国秉承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旨,并没有调和天主教多数派强烈的宗教情怀,他们坚决反对建立不承认宗教特殊地位的政府,而由教会、军队及富有者组成的右翼,仍然希望由一个铁腕人物来掌管政府。与此同时,政治左翼内部也四分五裂,争吵主要在支持或反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之间进行。

在19世纪最后的几年中,争执的激烈氛围并未随一系列丑闻的发生而缓减。总统的女婿涉嫌出卖国家最著名的军团荣誉勋章;承建巴拿马地峡运河的公司因财政丑闻而破产。费迪南德·勒塞普(Ferdinand Vicomte de Lesseps,1805—1894)曾因1869年成功开凿苏伊士运河闻名世界,但巴拿马运河公司的丑闻却使其名声扫地。部长及副部长们因收受贿赂而支持摇摇欲坠的运河公司,而数名犹太金融巨头卷涉其中为反犹主义提供了口实。然而,这一切与德莱弗斯案件相比却黯然失色,其中显露的赤裸裸的反犹太主义,首次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上尉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阿尔萨斯被德国占领后逃到了法国,他是一场间谍阴谋与当时盛行于法国的反犹太主义的意外牺牲品。德莱弗斯被指控向德国人出卖军事机密,当局草率地

对其进行了审判。德莱弗斯是第一个为法国总参谋部服务的犹太人，这实际是他被选作替罪羊的主要原因。1894年，他因叛国罪终身监禁于远离南美海岸的恶魔岛。1896年，法国情报局官员乔治·皮卡特(Georges Picquart，1854—1914)上校发现，起诉德莱弗斯的相关文件是伪造的，真正的叛国者是声名狼藉的冒险家费迪南德·艾斯特海兹(Ferdinand Esterhazy，1849—1923)少校。皮卡特因此被秘密发配到非洲，但德莱弗斯的家人通过独立的调查，证实艾斯特海兹是真正的叛徒并要求重审此案。艾斯特海兹虽被起诉并被宣判无罪，但这一事件已在公众中沸沸扬扬、难以平息。1898年，著名的小说家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1840—1902)，在报纸上发表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使危机再起波澜。左拉逐一声讨那些军事领导人，为了挽回军队的名誉不惜故意牺牲一个无辜者。

法国随之形成了德莱弗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两大派。在媒体和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德莱弗斯案被重审。文件伪造者的自杀给军事法庭提供了新的证据，但德莱弗斯依然被判犯有叛国罪。共和国总统最终赦免了德莱弗斯。1906年，紧张局势稍趋缓和后，他被民事法庭宣告无罪，并恢复了其部队中的少校军衔。

德莱弗斯案件尽管造成了严重的分裂，但经过数年的争论，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反教权主义者以及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都对教会、军队和反犹主义者持有怀疑的立场。双方围绕“两个法国”的争吵完全淹没了德莱弗斯问题，并形成了歇斯底里的对峙局面。一派主张共和制的法国，即大革命和1789年原则的继承者。另一派坚持君主制的法国，即国王、圣坛和军队的法国，它从不曾向大革命原则

妥协过。

随着德莱弗斯支持者们的胜利,共和国因其支持军队和德莱弗斯的反对者惩罚了教会。通过1901年至1905年间的一系列举措,共和主义者摧毁了1801年拿破仑一世与罗马教皇达成的协议,罗马天主教会因此丧失了在法国享有的特权。天主教教学体系被强行破除,大约1.2万所天主教学校被关闭。国家不再给神职人员发放津贴,信徒中的一些私人企业接管了教堂并承担所需的一切费用。但天主教并没有丧失合法的地位。天主教教育尽管受到了严格限制,但并没有完全被扼杀。事实上,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会在法国的基本社会地位。上层阶级和北部、东北部及西部地区的农民阶层仍然笃信天主教,很多城市中层和劳动阶层以及南部、西南部及中心地区的农民仍然是中立的天主教徒或坚定的社会主义者。

第三共和国较前体现出更加明显的共和色彩,但却没有走向福利国家,其根源在于此时的法国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第三共和国仍处于小农经济的汪洋之中,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工业多为经营方式较为保守的家庭式小企业。法国商人倾向于从国内筹措资金,原因在于他们希望继续保持较高的独立性,而公司本身又是其家庭财产的一个部分。许多商人倾向于预留充足的准备金,以应对国外市场突变及新技术带来的剧烈冲击。

对于很多法国人来说,这一期间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尽管这是以众多其他人的流离失所为代价实现的。新兴的城市中充斥着大批的流浪人群,他们不时从事犯罪或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并与守法的贫穷移民形成对立,促使后者在新兴的工业领域或新的工会组织寻求庇护。交通运输体系难以承受人口流动产生的巨大压力,很多地区的资源不时因人口的大批量聚集显得

非常稀缺,而这又加强了激进主义者和愤怒者们共同的社会认同感。尽管对妇女开放的往往是技术要求最低且工资也最低的职位,但她们已逐渐成为城市劳动力的一部分,并分享城市带给她们的苦难与发展。到 19 世纪末,妇女已经遍及金属铸造场、漂白工厂、陶器场、砖厂以及煤矿和采石场,但绝大部分非农业女性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纺织行业、服装行业或家政服务行业。

法国妇女在公共福利教育领域,显然落后于她们的英国和美国姐妹。政府虽然早在 1880 年就容许女生进入中学接受教育,但并未给予她们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这一时期法国大学里为数不多的女学生因此仍明显少于其他国家。然而,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截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公立或私立中学以及大学中的女生人数始终在稳步增长。这种状况实际与法国妇女拥有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法国妇女争取政治权力的运动,远没有达到英语国家的规模与激烈程度,而且法国女性事实上直到二战后才最终获得了选举权。

尽管小资产阶级常常因通货膨胀入不敷出,但社会的中上层却在家庭主妇们的精心料理下过着舒适的生活。与此同时,"二手"食品却成为贫民餐桌上的寻常物。这些食品本为富有家庭预备,但其中剩余甚至变质的部分,往往又被转卖给较为穷困的家庭。二手货的交易在巴黎尤其繁盛,因为人口的超速增长完全超出了经济及交通运输体系的供给能力,食品和水所以成为 19 世纪中产阶级关心的主要问题。纺织女工的处境显然更加艰难。她们每天工作 15 至 18 小时,完全暴露在机器的危险之下,缺乏必要的卫生设施(很少有公共或车间厕所),因化学品及纤维侵害导致褐肺病甚至英年早逝,而她们希望得到的仅仅是维持生存必需的食品。然而,法国的男男女女仍一如既往尽忠于祖国(La

Patrie),而逐渐成长的民族主义意识使他们日益明确地认识到,公共权力机构必须担负起处理健康、交通和安全等问题的责任。

四、意大利:统一与挫折

中世纪以来,意大利长期分裂为由大国、小国及自由市构成的不同属地,1861 年前的意大利因此是一个民族,而不是一个国家。在来自萨沃王室(House of Savoy)并任皮德蒙特—撒丁尼亚(Piedmont-Sardinia)国王的维克多·厄曼努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的领导下,意大利掀起了迈向统一的复兴运动,并在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主义冒险者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i Garibaldi,1807—1882)及其私家"红衫"军和维克多·厄曼努尔的首相卡米洛·加富尔伯爵(Count Camilo Cavour,1810—1861)的共同努力下,意大利最终建立了统一的新王国。新王国囊括几乎整个半岛及周围的岛屿,并定都佛罗伦萨。前罗马教皇的属地都选择加入了新王国,而这些地区的传统霸主历来是教皇,这使得罗马教皇与新王国又持续了 60 年的敌对状态。罗马作为教皇神权统治的最后遗存,则由自命的保护者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守卫。1870 年,法国皇帝为对付普鲁士召回了军队,失守的罗马被并入新王国,并成为新王国的首都。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持反对意见的教皇们不断抱怨,自己实际是囚禁于梵蒂冈的"囚犯"。

意大利的新王国并非没有难题,教皇的极度不满意味着,意大利如同法国一样,也面临教权主义和反教权主义间的严重分歧。狂热的天主教徒愤恨没有经过教皇同意就失去了教皇国家。尽管现在的意大利已跻身大国的行列,但却是其中最弱的一个。

意大利自然资源贫乏,尤其缺乏煤、铁资源,而且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意大利中部山区及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生产力十分有限,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并充斥着大量的文盲农民人口及一小簇顽固的封建贵族。农业在经济中居于主导性地位,但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广袤的土地多被少数大家族占有,农业生产主要在被称之为"大庄园"(latifundia)内进行。在统一的新王国中,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怨恨北方人占有的绝对政治优势。在阶级对抗已经根深蒂固的意大利,至少有一半国土缺乏自治的经验。意大利尤其缺乏信任政府的传统,而炽热的地方忠诚经常会领先于民族意识。

意大利无疑将缓慢地走向民主。国家立法机构中的下院或众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享有相当大的权力。众议院由普选产生,但最初的选民只局限于一个非常小的范围。1881 年以后,选举资格的财产限制减至支付一定量的直接税,但近似于普选的制度直到 1912 年才得以实现。

由于罗马仍然是永恒之城,梵蒂冈仍为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天主教徒的神经中枢,"复兴运动"后的教皇因此拒不承认意大利王国的合法性,禁止信徒们(很大程度上没有成功)参与政治并抵制这个新生的国家。"罗马问题"直到 1929 年才最终得以解决。依据贝尼托·墨索里尼与教皇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达成的一致,意大利承认梵蒂冈城的独立地位,罗马教皇属下的 108 英亩土地随之转变为微型的主权国家。

然而,新王国的经济的确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国家的铁路建设很快推进到欠发达的南部,新的商船队以及陆军和海军得以使意大利跻身大国行列,甚至国家的财政状况也趋于好转。然而,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却面临严重的挑战。严重

的政治腐败及无耻的政治机会主义使国家负荷沉重。与此同时,工业无产阶级势力微弱,劳工组织发育不充分,民主社会主义者规模小且处于严重分裂的状态,这一切使意大利未能形成推动进步与改革强有力的反对派。而且,在北方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南方仍处于贫困、受盘剥、被忽视的境地,这不仅加剧了地区间的矛盾,而且也有损于为实现国家共同发展的奋斗精神。

随着 20 世纪的临近,在复兴运动最后一位杰出人物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1819—1901)的领导下,意大利逐步形成了追求大国的热望。在一些人看来,英国和法国都拥有帝国体系,而真正的大国必须要有一块"阳光普照之地"(place in the sun),意大利如果想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就必须要通过某种方式进行领土扩张。这样的逻辑具有十分危险的缺陷:意大利在经济上并不必然需要殖民地;与其邻国相比,它也不具备获取殖民地所需的巨大实力;意大利急剧膨胀的剩余人口的确给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担,但这些人口很容易找到理想的移民接受国。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仍滞留于其可怕的邻国奥匈帝国境内,一些民族主义者对此十分不满,而克里斯皮对这种不满情绪确实非常担忧。但意大利向其他地区实施帝国扩张,将使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们忽略未收复的意大利领土。克里斯皮也许认同这样的主张,但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分子却另有想法:他们的帝国扩张梦想完全建立在对殖民地纯粹的欲求,即大国理应拥有殖民地。犹如德国卓越的怀疑论者俾斯麦亲王(Prince Bismarck)尖刻但相当精确的总结:意大利"有好胃口,但却没有好牙齿"。它仅有的成功是于 19 世纪后期获得的两块十分贫瘠的非洲领土:红海的厄立特里亚以及红海与印度洋交界处的非洲之角索马里兰。


大西洋
爱奥尼亚群岛
直布罗陀
西属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摩洛哥
（法国的保护国，1912年）
马德拉
（葡）
加那利群岛
（西）
阿加迪尔
突尼斯
马耳他（英）
地中海
奥斯曼帝国
塞浦路斯
波斯
的黎波里
亚历山大
开罗
苏伊士
阿尔及利亚
里奥·德·奥多
埃及
阿斯旺
阿拉伯
撒哈拉
红海
法属西非
冈比亚
乌姆杜尔
喀土穆
亚丁
尼立特里亚
法属几内亚
英—埃苏丹
不林
英属索马里
葡属几内亚
阿善堤
索科托
富拉尼帝国
法绍达
尼日利亚
塞拉利昂
黄金海岸
拉各斯
喀麦隆
阿比西尼亚
利比里亚
多哥
意属索马里
费尔南达（西）
比夫拉湾
乌干达
英属东非
普林西比（葡）
法属刚果
法属赤道非洲
（肯尼亚）
圣多美
莫尼河区
比属刚果
蒙巴萨
印度洋
卡奔达（葡）
德属东非
（坦噶尼喀）
桑给巴尔
东北、
（罗得西亚）
安哥拉
西北
（罗得西亚）
莫桑比克
罗得西亚
南
（罗得西亚）
马达加斯加
比利时殖民地
英国殖民地
法国殖民地
德国殖民地
意大利殖民地
葡萄牙殖民地
西班牙殖民地
共管领土
英国占领地
独立国家
贝专纳
尼亚萨兰
渥尔维斯湾（英）
德属西
南非洲
德兰士瓦
比勒托利亚
约翰内斯堡
毛里求斯（法）
英属贝专纳
斯威士兰
布隆方丹
南非
纳塔尔
巴苏陀兰
开普殖民地
开普敦
奥兰治
0
500
1000 英里

非洲和中东（1910 年）



图为埃塞俄比亚皇帝万王之王孟尼利克二世,被尊称为征服犹大国的狮王。1896年,他领导的埃塞俄比亚在阿杜瓦打败了意大利,成为现代史上第一个打败欧洲军队的非欧洲国家。(Hulton Archive/ Getty Images)

意大利企图吞并非洲唯一的独立君主国阿比西尼亚(现称埃塞俄比亚),但却惨遭失败。1896年,意大利军队向阿比西尼亚进军,令世界震惊的是,意军被皇帝孟尼利克二世(Menelik II,1889—1913年在位)在阿杜瓦(Adowa)彻底击败。蒙受羞辱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意大利,其程度犹如德莱弗斯案件之于法国一样强烈,而接踵而至的银行丑闻与经济萧条进一步加剧了意大利面临的危机。1898年5月,米兰爆发严重的面包暴动。1900年,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了1878年继承维克多·厄曼努尔二

世的洪柏特一世(Humbert I)国王。博学的新国王维克多·厄曼努尔三世(1900—1946年在位)深得民意,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是一个相对平静、繁荣并与教会相对缓和的时期。另一方面,1890至1914年前往北美和南美的大规模移民,吸纳了大量的过剩人口,因此在短期内缓减了经济面临的巨大压力。

然而,饱受挫折的意大利帝国主义仍在寻找新的出路。1881年,意大利攫取突尼斯的企图因法国对该地的占领归于失败,此后又被赶出了阿比西尼亚。意大利最终从大国那里获得了在的黎波里自由行动的权力。这是一片贫瘠而干旱的土地,原属于奥斯曼帝国,今天则被称之为利比亚。1911年,意大利与土耳其间爆发了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这一次它成功地占有了的黎波里。俾斯麦据说曾对意大利断断续续的北非帝国做出过这样的评论:“谁承诺的沙漠最多,谁就将成为意大利追随的对象。”

1880年以后,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扩及欧洲大陆。意大利的某些领域呈现出实质性的工业化,但另一些领域却继续处于落后与萧条的境况。在工业化快速改变德国之时,意大利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边缘,因为赢取海外帝国是当时追求的首要目标。北方的热那亚、米兰和都灵工业三角与南方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到1900年,意大利南部占全国42%的土地和26%的人口,但产业工人只占全国的17%,可征税财产仅占12%。南方的市场难以吸纳北方提供的商品,而北方则难以为南方过剩的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结果导致了大规模的对外移民,其规模在欧洲仅次于爱尔兰。

人口和经济因素使意大利国内陷于分裂,而这种分裂既以地域为标志,又以阶级为界限。政治左翼宣称要进一步推进社

会改革以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但因内部分裂而成效有限。复兴运动左翼的残余势力分裂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中产阶级中也没有产生立意改革的强势党派,议会主导的政府仍然软弱无力。意大利的阶级结构妨碍了多党政治应有的发展,而政治争论日益被知识分子左右,他们或声称自己为精英统治集团的代言人,或将自己标榜为意大利民众的代表。

五、德国:民族国家

德意志民族国家直到 1871 年才最终形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奥托·冯·俾斯麦公爵(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俾斯麦才华横溢、不择手段、冷酷无情,善于操纵权力并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1862 年以后,他控制了普鲁士本土,并作为总理掌控了其缔造的新德国,直到 1890 年突然被新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liam,1888—1918 年在位)解职。新君主威廉二世,是在其身染重病的父亲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主政仅三个月后登上王位的,当时只有 29 岁。威廉二世足智多谋、野心勃勃、意志坚强,对民族主义充满激情,并崇尚德国的军国主义传统。他坚决反对其父母倾向自由主义的立场,尤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冲动而傲慢的人,绝不愿在总理的阴影下扮演二流角色。

俾斯麦深信政治是"创造可能性的艺术"。既然未来进一步的冲突不可避免,明智的做法是适度抚慰战败的敌人,因为他们日后很可能将成为联盟者。德国当时的政治状况错综复杂,整个社会犹如一个不断变化的万花筒。不同的社会阶层、政党、利益集团、地方势力以及对各自民族及州有广泛影响力的权力放

纵者都十分活跃。在此条件下，很难精确地判断出谁将成为国家未来的联盟者。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因此应常备可供选择的灵活行动方案，即不能招致可靠的联盟者的反对，又要为变通留有足够的余地。然而，俾斯麦以后的德国很显然忽视了这些原则。

上台伊始，威廉二世便宣称他同情劳工阶层。在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案的更新问题上，德皇坚持削减法案的强制性权力。该法案规定，国家有权监督并控制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其他激进团体。俾斯麦拒绝了德皇的要求，并且在召开国际工人大会，处理与俄国的关系以及德皇单独召见大臣等问题上，都拒绝了威廉二世的要求。1890 年，威廉最终命令俾斯麦辞去了总理职务。

年轻的威廉二世才智出众，深具爱国热情，但他又是一个缺乏稳健、神经质、用心险恶的人，而且他尤其缺乏应对威胁应有的意志和勇气。威廉不具备治理国家的才能，更何况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富有军国主义传统且高度工业化的德意志帝国。这里的社会关系极度紧张，缺乏有效的政治平衡。俾斯麦主政时期的各种趋势变得更为明显，普鲁士军队，特别是预备役军官对威廉二世的影响越来越大。德国的政党结构充分反映了社会中制约进步的因素。代表大商业集团利益的自由党，在国民议会的下院中几乎没有多少影响力，而且因地方和地区间的对抗处于严重分裂的状态。与此同时，大地产者则联合起来反对削减农产品进口税。1894 年，他们组建农业联盟，并借此出台了一系列保守性措施。在大地产者的联合压力下，德国最终于 1902 年退回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

与英法不同，德国妇女在改革运动中没有获得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由于没有投票权，她们往往被政治和工会组织拒之

门外。法国妇女传统上在艺术领域处于引领者的地位,但德国的女性甚至没有接受专业教育的权力。尽管19世纪90年代建立了第一批女子公立中学,但与高质量的男子高级中学差距甚大。女性虽然在世纪之交后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但对多数人而言,取得更高的学位仍然困难重重,妇女们的职责仍被界定为给丈夫和家庭成员提供“一个适宜的家庭氛围”。

因为社会主义者倡导酬劳对等原则,那些极少数积极参与政治的妇女,往往加入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到1900年,德国有850多个争取妇女权利的协会,但在帝国期间,他们所确立的目标几乎完全未能实现。虽然进步党从1912年开始支持给予妇女普选权,但并没有为此采取富有成效的实际行动。很多妇女开始进入纺织工业,并于1878年开始进入德国文职机构工作,但这并非是女权主义者奋斗的结果,而是女性更适宜从事电报员、话务员和打字员等工作。中层妇女逐步成为劳动力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薪水却明显少于男性。

女性首先在儿童培育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源自德国的幼儿园运动中,妇女更扮演了无与伦比的重要角色,而这最终将为她们打开进入教育领域的大门。部分人认为幼儿园运动具有太多的进步性,因此在普鲁士遭到取缔,但却在西欧其他地区获得了发展,并在不久之后又重新在德国兴起。德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坚持应将儿童护理视为一种职业,认为妇女的职责在于承担民族母亲的神圣角色,主张妇女应率先行动推动妇女法案的实现。他们坚持,国家应通过立法承担起保护妇女儿童的责任,使她们居有其所,并免受丈夫和父亲的虐待。德国1896年统一的民法草案,承认了女性对儿童的监护权,以及保姆作为一种职业的合法性。妇女也在反对婴儿死亡率的运动中

起了带头作用，并激发了关于重复生育权利和人口质量问题的大辩论，从而催生了社会工作这一全新的职业。曾在瑞士学习法律的弗蕾达·丁辛(Frieda Duensign，1864—1933)，回国后进入了儿童福利领域，并成为妇女运动的一名领导人。在她的努力下，德国的女性工作者得以在迅速发展的青少年法律系统内占据了核心的职位。

与此同时，军事、殖民地以及外交方面的问题使德国紧张的国内政治更趋复杂化。1897年，阿尔弗莱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1849—1930)上将出任德国海军大臣。他试图说服德皇建立一支深海舰队，以取代只具有近海作战及商业护航能力的小规模海军。这完全迎合了德皇威廉二世的想法，因为他对海军霸主英国始终抱有一种爱恨交错的奇特情感，并渴望成为世界最强的海军强权。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但德皇对二人的态度却渐然不同，而他对祖母的敬仰几乎与他对自己母亲怀有的鄙视一样强烈。在威廉二世的眼中，祖母凌然而强势，母亲却充斥着自由主义的迂腐。威廉二世尤其讨厌作为舅舅的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国王，认为他放荡、怯懦、不称职。威廉尊崇甚至嫉妒大英帝国，但更嫉妒大英帝国的联合舰队。他非常喜欢叔叔送给他的英军制服，强烈渴望建立一支属于自己，并足以对已有衰萎迹象的英国形成挑战的庞大舰队。

应该说，陆军和海军只是大国最为显耀的力量体现。随着德国在远东和非洲地区的领土扩张，为支持海外扩张而建立的殖民地也急剧扩大。尽管国民预算因此而枯竭，因为这些殖民地绝大部分都无利可图，但却进一步加剧了扩张的欲望。泛德主义者计划修建一条柏林至巴格达的大铁路，并要求进行更多

的冒险,征服更多的土地。与意大利的帝国主义者一样,德国帝国主义者也表现出狂傲不逊、缺乏理性的民族主义骚动。然而,两者间又存在明显的不同,即德意志帝国不仅拥有一个好胃口,同时也拥有一口锋利的牙齿。

威廉的海军和殖民地政策,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德国与传统海洋强权英国的关系。德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英国的传统盟友。只要能够控制俾斯麦,英国就有理由相信德国将限制其改变欧洲既有秩序的野心,但 1890 年以后,德国似乎已经表现出改变世界权力均势的企图,英国感到其利益正面临来自德国的直接威胁。例如,德国人难以对这样一个问题给出合理的解答:建一支庞大的新舰队去对付谁?

英德两国的对外政策,都是由涉及宗教与文化的社会、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等混杂因素塑造而成的,并随着政党、新闻、压力与官僚集团不断变化的态度而变化。两国的商业和政治领袖,虽然都致力于维护两国间的和谐关系,但他们最终却失败了。

除了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原因外,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加剧了英国对德国的忧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在重工业生产方面赶超了英国,并且在很多主要出口贸易领域成为英国的竞争对手。德国的飞速发展加剧了军国主义的膨胀势头,而军国主义反过来又刺激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由于起步晚于英国且没有多少优势,德国认识到商业方面已落后于英国,因此致力于发展新技术。犹如英国一样,铁路建设促成了第一轮的增长,紧接着就是鲁尔区域工业的飞速发展,德国因此很快在钢铁、有机化学和电力生产方面超过了英国。

在德国,经济进步往往优先于政治发展。当人们发现鲁尔

区富含煤炭资源且运费不高的情况后，由个人发起并得到国家支助的混合力量，几乎在政治决策形成之前已经使该地区实现了工业化。与此相类似，林业领域也自主采纳了现代化的科学生产方法，农业也因此变得更加富有效益。在活跃的合作运动及国家支持的农业学校与实验站的帮助下，德国的谷物生产者在 1873 年以前长期向国外输出粮食，但 1873 年以东欧的廉价谷物涌入德国市场，经济政策日益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不论规模不断扩大的工厂、公司及卡特尔，还是生产力不断增长的农业领域，提高效率几乎是各方都认同的首要目标。截止到 1914 年，德国在众多工业领域都基本实现了自给。

六、奥匈帝国：将人类区分为不同的民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是 19 世纪出现于欧洲用来解释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变化的学说，而这些变化在当时正需要有一个新的术语来阐释。民族性的概念很容易使人们认为，人类因神的旨意、自然或历史的力量被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而历史发展的进程必然导致那些民族的自决。美国独立宣言坚持了这一原则，法国革命及随后几十年的辉煌已经证实了它的力量。到 19 世纪，西欧的大部分人认为，西方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政府，就是能够带领一个社会走向独立的政府。

大多数民族主义评论家认为，“民族”存在某些可予以客观界定的共同特征。民族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效忠对象（往往被称为祖国）；拥有在同一片领土上因相似的自然环境和共同的外部政治压力而形成的共同生活方式；拥有有利于促进同质性发展的群体意识，而这一共有的身份认同，将在共同的语言（或其变

量)、宗教和相互依存环境下,因坚持共同的偶像、仪式及社会传统得以不断强化。一般而言,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刻意关注其他群体所缺乏的上述特点,集体认同表现出的这些正面特征将会显得更加突出。

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曾提出"致命谎言"的概念,即笃信被认为是正确的信仰,而这一信仰在集体认同中又居于如此重要的位置,以至于任何质疑都将被视为不忠。民族主义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致命谎言"的激励。某些并非正确的历史观念甚至谎言,仅仅因为得到了广泛的信仰而富于活力,并发挥真理的作用。例如,大部分现代社会群体不仅认为其生活方式优越于其他群体,而且相信自己是上帝或历史的选民。

在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将民族及民族认同视为实现群体和个体安全与稳定的力量源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共识。然而,这些在 20 世纪看似十分自然的观念,在 19 世纪并不为人们所熟悉,并且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仍处于缓慢的形成阶段。这在拥有众多语言群体的奥匈哈布斯堡帝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这个 1867 年形成的二元帝国来说,"现代化"意味着分裂而非统一,意味着趋向代议制政府的演变进程,但其主旨不在于解决国家面临的新问题,并且仅仅与各民族间的矛盾与分裂密切相关。奥匈帝国分崩离析,缺乏现代民族国家实现统一的一切原则,是一个十足的时代弃儿。然而,这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庞然大物,却得到了其他欧洲国家理所当然的认可,原因在于拥有如此众多民族、人口及可观经济实力的松散帝国,其崩溃将直接危及大国间的脆弱平衡。

经过一代人的"德意志化"及以帝国首都维也纳为中心(失败)的独裁统治后,1867 年的奥匈协定(Ausgleich)或妥协案,将

帝国重组为一种合伙性体制。行政权由奥地利和匈牙利分享，国王作为统一帝国的元首同时领有奥地利和匈牙利。二元帝国中，双方各有自己的议会和行政机关，但外交、军事以及财政权则掌握在皇帝任命的三个帝国部长手中。帝国在经济上立足于每十年更新的关税同盟，并且双方为帝国承担的共同支出，也需以十年为基础重新分配。“代表团”作为帝国的立法机构，由双方议会各选派 60 名议员组成。他们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交替会晤决定共同预算，之后下达给两个议会，并据此对帝国的三名部长实施监督。事实上，代表团很少会晤，几乎从来没有就相关的政策问题进行协商。这一体制对于匈牙利非常有利。它拥有40%的人口，但对帝国的财政支出从来没有超过总额的三分之一，围绕摊款及关税调整的危机因此每十年便爆发一次。曾一度为匈牙利国王及奥地利皇帝的君主，现在成为阻止这一制度走向瓦解的关键因素，而担当此任的重要人物，是执政期超过现代其他任何君主的弗兰西斯·约瑟夫(Francis Joseph，1848—1916 年在位)。

1. 帝国的民族问题

没有取得自治的少数民族，是二元帝国中双方面临的一大共同问题，其中捷克、波兰、罗塞尼亚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奥地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人更多地居于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人则成为奥地利和匈牙利共有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处于民族意识的不同发展阶段。部分少数民族受控于帝国外的同胞民族，而每一民族都拥有相应的领导人，其中的一些领导人敦促其同胞与奥地利占主导的德国人及匈牙利占主

导的马扎尔人妥协,而另一些人则主张反抗甚至革命,结果使二元帝国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境地。

经过多年的动荡之后,世纪之交的一项新法案似乎最终化解了长期引发争议的一大问题。依据新法案,捷克人占多数的波希米亚地区,将停止实施“德意志化”的旧政策,容许该地区的公务员从1901年开始使用双语(他们起初只允许使用德语)。然而,法案却遭到了维也纳议会中德意志人的强烈反对,政府因此而倒台。与此同时,捷克极端主义者开始恶意夸大俄罗斯领导下的斯拉夫人与奥地利德意志人的未来冲突。奥地利议会完全陷于瘫痪,只能以皇帝名义维持政府的运转。

持续的骚乱使帝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同时也因受到了俄国立宪主义者胜利的影响,弗兰西斯·约瑟夫最终决定改革选举制度。1907年,奥地利的所有公民都获得了选举权,他们将选出新议会中233名德意志族和107名捷克族代表。捷克族当时占奥地利人口的23%,议会代表名额因此主要依据人口比例而确定。然而,波希米亚省立法机关却于1913年遭解散。随着1914年欧洲大战的临近,奥地利议会中的捷克族议员阻滞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行,战争爆发时波希米亚和奥地利议会均被解散,国家由皇帝及其部长们统治。早在1867年奥匈协定签订之初,捷克人就试图实现自治。匈牙利的马扎尔人早已享有完全的自治权,但捷克人却始终未能如愿,这实际是导致议会瓦解的主要原因。

捷克的民族主义并没有被胁迫或缺乏诚意的妥协扑灭,反而在捷克语言出版运动、爱国社团、捷克学校以及索科尔(sokols,鹰: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体育运动)等刺激与鼓舞下日趋强烈。在古老的布拉格大学,捷克学者们赞同独立身份认

同的观念，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1850—1937）。马萨里克教授是哲学及斯拉夫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坚持民主思想并深刻地影响了几代学生。他激励诗人和小说家们为广大读者创作出一部辉煌的民族历史，从1907年开始，他正式开始领导捷克独立党，并于1918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首任总统。

在帝国的所有少数民族中，捷克人拥有赢取独立的最佳条件。他们拥有相当规模的人口，有一大批精通军备、瓷器、玻璃器具、编织、酿造以及制糖工业的专业人才，拥有便于接触外部世界的发达旅游业，而且处于日益兴起的重工业的中心。

波兰人（占人口比例的18%）是奥地利少数民族中公开表示不满程度最低的一族。绝大部分波兰人居住在加里西亚，并且是这一地区地主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像捷克人一样，波兰人要求马扎尔人式的自治虽然遭到了拒绝，但他们却拥有自己的学校，而且波兰语也是地区行政及法庭的官方语言。波兰人不仅在财政安排上居于有利地位，并且维也纳也于1871年设立了处理加里西亚事务的特别部门。

波兰人在奥地利受到的平等待遇，与普鲁士及俄国波兰人所遭受的残忍待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世界各地的波兰人因此将加里西亚视为波兰民族生活与文化的中心。被流放的波兰人往往在克拉科夫（Kraków）与来姆贝格（Lemberg，即后来的利沃夫，Lvov）寻求避难。这里有著名的大学，并易于获得为哈布斯堡王朝地方行政服务的机会。这些大学培养了几代波兰人，并为日后走向独立的波兰储备了人才。波兰文学及波兰历史研究日趋繁荣，工业化在缓慢地兴起，并逐步形成了富有潜力的石油工业。然而，罗塞尼亚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却继续遭受着制

度性的歧视与苦难。

奥地利的其他少数民族数量极少。在1910年的总人口中,意大利人不足3%,斯洛文尼亚人约占4.5%,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亦不足3%。然而,集中于提洛尔(Tyrol)南部及伊斯的利亚(Istria)的意大利少数民族,显示出的力量与其有限的规模并不匹配。在所有的奥地利少数民族中,意大利人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欲望最为强烈。与意大利族不同,奥地利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内部都存在分歧,有些人希望在帝国内实现自治,其余的人则希望有一天能在南部建立一个斯拉夫国家。

2. 匈牙利的少数民族

匈牙利的少数民族问题更加尖锐。这里的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以及克罗地亚人,成为马扎尔化政策最严重的牺牲品。马扎尔人的目的是破坏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并将他们转化为马扎尔人,语言则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武器。

马扎尔人只占国家(除克罗地亚外)人口总数的55%,对自己的语言拥有一种强烈的热爱之情。马扎尔语实际是一种亚洲语言,与德语、斯拉夫语或罗马尼亚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相去甚远,但马扎尔人却试图将此强加于受支配民族。这种语言同化尤其体现于教育领域,所有的国立学校,不论其坐落何处,从幼儿园至大学都必须讲授马扎尔语,而且邮政、电报及铁路服务只使用马扎尔语。

占据匈牙利人口总数11%的斯洛伐克人,是马扎尔化程度最深的民族。他们大部分为贫苦的农民,其更大的抱负往往是



中东欧的民族分布(1914年)

通过接受马扎尔语,使自己融入马扎尔人的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斯洛伐克人,逐步倾向于同奥地利境内往来密切的捷克人实现统一。这些人多为自由主义者和新教徒,但信仰天主教和保守的斯洛伐克人则主张斯洛伐克自治。

1910 年,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占据多数的罗马尼亚人,占匈牙利总人口的 17%。数个世纪以来,他们始终在为正统的希腊教赢取合法性而斗争。尽管法律企图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但同化招致了罗马尼亚人强烈的反抗。有些人希望特兰西瓦尼亚能够像过去那样再度实现自治,很多人因此强烈要求执行 1868 年具有自由主义精神(被忽视)的民族法。然而,当他们于 1892 年就这些问题向维也纳请愿时,请愿书甚至未经开启就被当局退回。之后他们在国外广泛散发请愿书,许多领导者因此遭审判和监禁。

奥匈协定签署以来,一些居住在匈牙利中心区域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在马扎尔人的统治下尽管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但依然对匈牙利的统治表现出一定的不满,并希望与南方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联合。君主国的绝大部分克罗地亚人居住于克罗地亚,他们因一个世纪前拿破仑一世的占领已经形成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马扎尔人当局因此给予克罗地亚省有限的自治权:匈牙利政府中设有处理克罗地亚事务的专门部门,主要负责财政和安全事务。每当涉及克罗地亚事务时,该省首府萨格勒布的地方议会便派代表参加布达佩斯的议会,并且克罗地亚代表在匈牙利帝国“代表团”中占有正式的席位。在任何机构或会议中,克罗地亚代表有权使用自己的语言,并且克罗地亚语也是其地域范围内军队的指挥用语。克罗地亚人在自身的教育、法律和警察等领域享有相当大的控制权,但税赋的课征权仍

然由布达佩斯掌控。

这一安排在20世纪的前十年开始面临巨大的压力。克罗地亚权力党的民族主义者寻求彻底的自治，但他们却鄙视塞尔维亚人及非天主教的南部斯拉夫族。在宗教问题上，克罗地亚天主教徒歧视那些说克罗地亚语的塞尔维亚人。这些人信仰希腊正教，是克罗地亚的少数派。另一方面，布达佩斯任命的省长，更倾向于同马扎尔化了的克罗地亚人合作。这些人多数在当地拥有地产，或者在皇家政府部门供职。从1907年开始，布达佩斯政府强制要求铁路部门的雇员使用马扎尔语，克罗地亚人认为这是对其语言和文化的侮辱，并对匈牙利商品实施抵制。1909年，大约50名克罗地亚人，因涉嫌策划将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并入塞尔维亚遭到起诉，并被裁定为有罪。地方法院的判决虽然最终因证据不足被高院驳回，但本已紧张的局势却因此更趋恶化。更为糟糕的是，民族主义者开始诉诸恐怖主义，波斯尼亚青年学生于1912年、1913年、1914年多次试图刺杀匈牙利统治者。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在二元帝国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尽管在理论上仍属于土耳其帝国，但1878年的柏林会议事实上已将这两个省划归奥匈帝国。该地区的人口主要是南方斯拉夫人，但也存在穆斯林和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少数民族。信奉正统基督教的多为农民，绝大部分在穆斯林的庄园中劳作。

这些省份长期面临着发生爆炸性事件的威胁。维也纳的许多观察家极力主张建立一个南方斯拉夫王国来化解危机，主张将达尔马提亚（Dalmatia，亚得里亚海沿岸狭窄的克罗地亚占领区）、克罗地亚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统一于弗兰西斯·约瑟夫治下并于匈牙利平等的新王国，将现有的二元帝国转变

为三元君主帝国,但这些史称为"三元论者"的主张却遭到了马扎尔人的强烈反对。

1908年,由年轻军官领导的土耳其革命,为奥地利外交大臣阿洛伊斯·格拉夫·埃伦塔尔(Alois Graf von Aehrenthal,1854—1912)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创造了机会。鉴于事先已经与俄国达成了秘密协定(他实际上违反了这一协定,因为采取行动前没有按照约定取得俄国人的同意),埃伦塔尔于10月吞并了这两个动荡不安的省份,并承诺两个省将会拥有自己的议会。这一举动使欧洲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并有可能促成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但危机最终得以缓减,因为咄咄逼人的俄国(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战败)并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这使塞尔维亚人深感失望,也使巴尔干半岛陷入了严重的混乱之中。

3. 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与政治

19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掀起了两场政治运动:泛德意志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19世纪80年代早期,温和的奥地利德意志人,主张将他们管理的斯拉夫土地移交给马扎尔人,然后在经济上将奥地利与德国联合起来。泛德意志者更加激进,主张天主教的奥地利人彻底转化为新教徒,并鼓动与德国的政治联盟。与此同时,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天主教徒占人口总数90%的国家内逐步发展为奥地利最重要的政党。该党公开宣称忠于天主教会及哈布斯堡王室,他们反对大企业,支持社会立法,因此对农民和小商人富于吸引力。维也纳市长卡尔·吕格勒(Karl Lueger,1844—1910),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党最著名

的一个领导人。吕格勒虽然是一名反犹主义者，但作为奥地利社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却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他积极推动城市设施、公园及操场等的公有化，为学童提供免费牛奶，而其反犹主义主张，同时也迎合了追随者们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马扎尔人的仇恨心理。

1888 年创立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则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反对泛德意志主义者及基督教社会主义党。他们主张在生产领域实现国有化，坚持以阶级而非民族为基准组织政治行动。但社会民主党并不主张革命，并将普选权、基础教育及 8 小时工作制确立为在社会与政治领域追求的近期目标。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多为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很多犹太人，但追随者主要是不断增加的工人群体。在民族问题上，社会民主党赞同民主联邦制，主张每个民族都应拥有在自己领土范围内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保护混合领土上的少数民族，关涉共同利益的事务交由中央议会决定。

弗兰西斯·约瑟夫始终认为自己是最后一位"守旧派君主"。他工作尽职尽责，每天都花大量时间批阅国书，但他缺乏想象力，顽固守旧，而且极度保守。他非常尽责，并因长期在位变得更加忠于职守。然而，他往往久拖不决，而做出的决定常常收效甚微，他因此应对事态的发展负有重大的责任。

这个年迈的君主屡遭痛苦的折磨。其子鲁道夫(Rudolf)，在经历桃色丑闻后于 1889 年自杀，作为继承人的侄子弗兰茨·斐迪南(Francis Ferdinand)，又于 1914 年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并引起一场世界大战。然而，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富有毅力的统治，仍将比欧洲其他任何君主更加长寿，并将对哈布斯堡的忠诚坚持到最后一刻。

尽管存在皇帝的悲剧和分裂的政治,但维也纳仍是当时欧洲乃至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其大都市的氛围、快速的发展以及交织一处的轻浮与严肃,都体现得非常明显。维也纳引以为荣的文化艺术生活,如同其丰富的历史、美丽的建筑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烹调风格一样丰富多彩。维也纳拥有一个尽忠职守的君主以及众多美丽的教堂,俨然是一座十足的天主教大都市,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庞大而有影响力的犹太社团的家园。维也纳被誉为“官方文化”(绘画、歌剧及文学)与正统学派的欧洲之都,而这里的咖啡馆及廉价的住房,更是吸引帝国各地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磁铁石,而这些人正致力于反叛旧的规范。

匈牙利的形势与此迥然不同。忠于王朝的土地贵族虽然人数极少,但每人都拥有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匈牙利几乎一半的不动产都控制在这一小簇土地贵族手中。匈牙利的乡绅阶层规模更大,他们的财产虽然明显少于大贵族,社会地位也较低,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却更大。19 世纪中期以来,乡绅阶层中的很多人进入政府部门或从事技术性行业。乡绅和农民阶层在整个 19 世纪不断进入城市,城镇的马扎尔化随之不断提高。社会金字塔的底部是城市里的产业工人,他们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面粉加工行业。

犹太人口因移民也获得了快速的增长,但很多犹太人被迫改变信仰并被马扎尔化。然而,如同奥地利的犹太人一样,他们仍然是受歧视的对象,歧视程度在人口较少的城市及农村表现得尤为强烈。这里的人们往往将犹太人与高利贷和房屋租赁相联系,而这两种行业往往会使农民负债累累。尽管如此,匈牙利的反犹太主义,从来没有像奥地利一样演变为一场重要的政治运动。

天主教会强大且富有，但它在总人口中只拥有大约60%的信徒。宗教改革以后，一些显赫家族及大批乡绅并没有重返天主教堂，而是继续信奉加尔文教。特兰西瓦尼亚的数十万德意志人信奉路德教，还有一些人信奉马扎尔一神教，匈牙利的教权主义因此未能像奥地利那样转变为社会的主导力量。

匈牙利的社会和宗教结构与奥地利不同，因此没有产生像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社会主义党那样的强大政党。匈牙利1874年的法律只赋予6%的人以选举权，而这一规定始终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匈牙利在二元帝国中的地位问题，实际是引发马扎尔人政治分歧的唯一原因。19世纪中叶，倾向于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路易斯·科苏特(Louis Kossuth，1802—1894)及其追随者，主张彻底的独立。其余被称之为猛虎(Tigers)的马扎尔人，主张通过加强对自身军队、外交及财政的控制，提高匈牙利在二元帝国中的地位，即除了保持同一个君主外，匈牙利应终止从属于奥地利的其他一切关系。猛虎派虽然在总体上居于主导地位，但科苏特派却于1902年促使政府倒台，并在1905年布达佩斯的议会中赢得了多数。弗兰西斯·约瑟夫拒绝了新议会多数派提出的要求，并任命一位忠诚的将军出任匈牙利的总理。科苏特派则鼓动爱国者拒绝纳税及服兵役，议会因此直到1910年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境地。匈牙利正是在这样一种不安的氛围下，于1914年6月28日获悉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

七、俄罗斯帝国：为现代化而斗争

俄国的现代化进程远远滞后于西欧，原因主要有：直到

1861 年才废除了农奴制;进入 20 世纪的俄国,既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立法机关,也没有一部宪法;来之不易的改革仅仅是军事失败的产物,即 19 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及日俄战争(1904—1905)的羞辱所至。在一战前的大部分时期,俄国的沙皇们都宣称自己在行使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曾经行使的统治权。

1894 年,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1894—1917 年在位)成为俄罗斯的新沙皇。他英俊潇洒,拥有帝王之相,同时也是一位模范的丈夫和父亲,但尼古拉二世严重缺乏担任皇帝所需的政治素质。他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不可救药的仇外心理,笃信东正教,并对其庞大的人口充满了神秘的自信。他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无能之辈,并像其他时期及其他地方的同类统治者一样,以持续不断的政治与社会高压手段,掩饰自己的寡断与昏庸。在他看来,他的国家就是“神圣的俄罗斯”,自己则是这个国家的“慈父”。在他的想象中,国王、祭坛和贵族构成了俄罗斯的一切,三者依靠严格的臣服关系并在与现代性隔绝的氛围中结合一处。

像其父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1883—1894 年在位)一样,尼古拉二世也反对并唾弃西方式的自由改革。这些反动的君主依赖庞大而牢固的官僚集团维系统治,严格限制公众在地区委员会(或地方自治组织:zemstvos)及形成于 19 世纪 60 年代市镇议会的参选资格(圣·彼得堡有资格的选民仅占其城市总人口的 1%),并通过称之为“俄罗斯化”的政策对少数民族特别是犹太人进行残酷的迫害。1891 年,2 万名莫斯科的犹太人被驱逐到面积相当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隔离定居区”(Pale of Settlement)。少数民族往往是官方大屠杀的直接对象,这在



图为俄国皇家与哥萨克人在一战初的合影，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右侧为皇后，左侧是王储，身后为三名公主。(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基辅体现得尤为明显。为限制犹太人进入高中和大学，政府实施严格的配额制度，结果导致大规模的犹太人外移。500 万犹太人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离开俄国，其中很多人去了美国。这一政策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大批不满的犹太知识分子，被迫参加了多种反对沙皇高压政策的革命运动。

与其他西方大国相比，俄国的社会发展仍然停留于中世纪的水平。占总人口极少数的贵族阶层，占有绝大部分可耕土地。规模有限的城市中产阶级，操纵商业并垄断着市政服务部门，并将在 19 世纪后期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占据压倒性多数的农民阶层，则因无知和贫困被固着于广袤的乡村地区。这里没有立法机关或独立的司法机构，也不存在西方所谓的公

民自由。尽管从19世纪中期以来创建了大批的学校,但远远不能满足大规模人口的实际需求,更何况俄罗斯又是大国中文盲率最高的国家。唯有富有的特权阶层能够尽享奢华,但绝大多数人都不得不为生存而奔波。

然而,其他领域却不乏成效。1892年入主财政部的谢尔盖·维特伯爵(Count Sergei Witte,1849—1915),上台后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发展的重大举措。维特启动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工程,将俄国纳入金本位体系,积极吸引国内急需的外国投资(特别是法国资本),并通过政府垄断伏特加酒的销售等实现了预算平衡。1894至1904年间,铁路总长度翻了一番,而对铁轨的需求又刺激了钢铁业的快速发展。城市工人的数量随之成倍增长,工人因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进行的罢工也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政府因此于1897年将成人的工作日减为11个小时,并颁布其他法规来改善工作环境。然而,这些法规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阻力,其实际效果因此微乎其微。

在这种环境下,很多将要成为革命者的青年都转向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相信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资本主义最终衰亡的预言。1894—1895年,知识分子、学生、教授以及其他受过教育的当局反对者,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知识阶层团体,主张联合一切当局的反对者推翻现政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1870—1924),是这一团体中最重要的一员。列宁是一位中产阶级律师,曾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过长达五年的深入研究,并决意贯彻马克思的理论主张。列宁的活动引起了秘密警察的关注,并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三年的有期徒刑。被释放以后,列宁领导的地下组织与其他组织,共同于1898年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其中的大部分

成员若干年后都流亡海外。

新政党围绕组织建制问题出现了分歧。一派主张新政党应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领导下统一行动,另一派坚持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分支自由行动追求各自确立的目标。列宁坚持由一个小而紧密团结的领导群体从中央进行统一领导。1903 年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的党的大会上,多数人投票赞成列宁的主张,这一派从此之后就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主张松散与民主建制的另一派被称为孟什维克,即"少数派"。孟什维克赞同另一个被流放者乔治·普列汉诺夫(George Plekhanov,1857—1918)的观点,认为俄国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及工业化的充分发展,才能具备推行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条件。这两派实际都属于社会民主党人,或经常被人们简称为社民党(SDs)。

与此同时,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也于 1901 年组织了一个政党,即社会革命党或社革党(SRs)。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社民党人最初只对城市工人阶级感兴趣,但社会革命党人是民粹主义者,主要关心农民阶级,目标是重新分配土地。由于在沙皇政府的打压下被严重边缘化,他们最终转向了恐怖主义,并且在 1902 至 1907 年间暗杀了数名内阁部长。他们反对政府提出的各种不彻底的改革方案,坚决要求对俄国社会进行彻底的重组,并提出"我们不需要渐进式改革,而需要彻底变革"的口号。

温和派和自由派是第三支政治力量,主要由不满于政府高压政策的知识分子组成,仅仅主张推行教育及土地改革。然而,顽固不化的政府,并没有将它们与恐怖主义者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区别对待,温和派因此也被迫组织起来。1905 年,他们建立了立宪民主党,并依据俄文首字母 KD 被称做立宪党人(Kadets)。

1. 日俄战争

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计划激发了俄国进一步扩张的欲望,并希望获得在中国满洲地区的筑路权。日本在1895年战争中击败中国之后,圣·彼得堡就开始采取旨在阻止日本在中国大陆立足的外交行动,但条件是中国允许俄国在满洲地区修建铁路。1897年,俄国占领了亚瑟港(旅顺港),即最早脱离日本控制的那个港口,但进一步的冲突发生在日俄都感兴趣的朝鲜。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起义,欧洲列强与美国均派兵镇压这一反西方的起义。起义被镇压之后,其他列强撤走了军队,俄军却留在了满洲。随着俄国国内主战派的日益强盛,日本于1904年突然袭击了停泊在亚瑟港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随之爆发。

绕行欧洲、穿越印度洋并最终到达太平洋的俄国主力舰队,在对马海峡战役(1904年5月27日)中被日军彻底击败。这一结果极大地震惊了那些希望欧洲列强获胜的人们,他们因持有种族主义偏见拒不承认日本的大国地位。对于俄国人民来说,战争是一场神秘而遥远的政治冒险,他们不愿涉足其中,但却因此而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很多知识分子反对这场战争,而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公开希望俄国战败,以期能够动摇沙俄的统治根基。面对国内的动荡及军事上的失败,俄国政府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其中1901—1919年为总统)的游说下,最终同意接受美国的调停。罗斯福本人非常担心日本的过激行动将破坏亚洲的政治与经济平衡,而日本也希望尽快解决这一冲突,结果日俄最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

1905）。

从一开始便反对这场战争的维特，作为俄国代表被派往朴茨茅斯参加和会。在美期间，维特不仅为俄国争取到了许多有利条件，并且给美国公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此之前，美国人眼中的俄罗斯人要么是残忍的独裁者，要么是投掷炸弹的革命者。依据 1905 年的条约，俄国正式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将旅顺港、库页岛南部以及太平洋的捕鱼权转让于日本，同意撤出满洲。作为远东的大国，俄国的地位并未因战败而受到严重的影响。然而，亚洲主导权的变化促使俄国重新转向欧洲，而这里正孕育着一场世界性的大危机。

2. 1905 年革命

战争刚一结束，未来的立宪民主党就在全俄境内举行宴会集会，主张建立由地方自治组织代表参加的国民议会。尽管国民议会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但该方案有关制订国民宪法、保障公民自由、阶级与少数民族平等以及扩大地方自治组织权力的主张，却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与认可。然而，尼古拉二世却发布了一个含糊的声明并采取措施限制自由言论，变革的希望因此而变得更加渺茫。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警局安插的密探点燃了致命的火花。乔治·盖庞神甫（Father George Gapon）是一位受人欢迎的牧师，政府指派其打入社会民主党破坏圣·彼得堡的工人组织，并建立他自己的组织来取代原有的工人组织。他组织工人进行和平游行，并直接向沙皇请愿，要求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国民议会，实现公民自由，给予工人罢工权力等。当工人们试图将

请愿书递交给冬宫的沙皇时，尼古拉二世却拂袖而去。惊慌失措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开了火，而其中很多人都举着沙皇的肖像以显示其忠诚。在这个声名狼藉的“血腥星期日”(1905年1月22日)*，数百名工人惨遭杀害。这场大屠杀激起了城市工人的革命，日益绝望的温和反对派也加入了激进者的行列。

在骚乱的高峰期，政府倾向于组建咨询会议(zemski sobor)。虽然不具有立法功能，但仍属于某种形式的国民议会。沙皇对此如同往常一样优柔寡断，示威运动因此在1905年夏全面爆发。进入10月份，印刷工人开始罢工，报纸发行完全终止，而且印刷工人在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组建了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随着铁路工人罢工的实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的交通完全中断。与此同时，苏维埃成倍增长，沙皇与其臣民间的关系趋于崩溃。

布尔什维克党人将苏维埃视为建立临时政府、实现民主共和及召集制宪会议的政策工具，这一方案与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相差无几，而这些自由主义者最初希望保留君主制，通过压力而非暴力实现其目标。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那时的布尔什维克认为，俄国在推行无产阶级革命前有必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他们也迫切希望帮助资产阶级进行革命。

犹如维特(当时为俄国首相)所言，尼古拉二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推行军事独裁，二是召集立法议会。沙皇似乎选择了后者。1905年10月，他发布了一则宣言，承诺立即实现完全的公民自由并建立立法议会——杜马。12月份的一项补充性宣言保证，杜马将由男性成人选民在普选的基础上产生。由于杜

* 本书中所有日期都采用西方日历(在俄国，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才开始使用)，而不是俄国旧历。

马在立法方面比沙皇拥有更大的权力，十月宣言至少从理论上结束了俄国的独裁统治。

然而，十月宣言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受政府支持的右翼政党俄国人民联盟，专门举行了反对十月宣言的示威活动，声称永远效忠于沙皇，并组建了他们自己的“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ds)突击队。百人团仅在宣言发布后的第一周内，就杀害了3000多名犹太人。左翼势力中，布尔什维克人和社会革命人，数次尝试实施暴力革命，但都失败了。1905年12月，在经历了数天的巷战之后，政府逮捕了左翼领导人，莫斯科起义归于失败。一个有产者组成的自由主义中间派，对宣言较为满意，主张以十月宣言为基础实施温和的改革计划，这一派因此而获得了“十月党人”的称号。立宪民主党等其他温和派别，也主张通过合法的手段实现进一步的改革。与此同时，维特政府的实力因远东调回的大量部队得以明显增强。随着军队的不断介入，革命之火到1906年初渐趋熄灭。

3. 1906—1914 年的杜马

依据新的杜马选举制度，男性选民虽然拥有普选权，但杜马并非直接选举产生。投票者首先选出一个选举团，然后由选举团推选出412名杜马代表。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抵制选举，结果立宪民主党成为杜马中最大的政党。然而，早在新的立法机构正式运行前，维特就大幅削减了杜马的权力：杜马对政府清单范围内的“根本法”没有决定权；杜马无权干预政府借贷并没有监督财政的强制性权力；外交以及涉及和平与战争问题的权力归皇帝所有。财政部拥有借贷和发行货币等方面的全部权

力,皇家委员会转变为由沙皇任命的拥有200名成员的帝国委员会,拥有与杜马同等的立法权,并有权在杜马通过的预算案外提出不同的年度预算案,而沙皇则拥有二者择其一的充分权力。更有甚者,沙皇只要确定了新的选举日期,就可以随心所欲解散杜马。杜马休会期间,沙皇有权自行颁布法律,杜马只有在下一届立法会议的前两个月内采取行动,才能修改君主颁布的法律。

史称为"充满激愤"的第一届杜马,于1906年5月至7月间开幕。它提出了一系列招致沙皇不满的法案,其中包括将国家和教会土地(也包括一些私人大地产)重新分配给农民的激进式土改方案。土改法案遭到了沙皇的严词拒绝,杜马也随即被解散。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坚持皇帝解散杜马是非法的,他们穿越边界到达芬兰境内(1905年改革之后,芬兰获得了行政自治权),并在那里发布宣言,号召俄国人民抗税或拒绝服兵役,以迫使皇帝恢复杜马。政府对宣言的作者们进行了缺席审判,并剥夺了他们担任公职的资格,未来的杜马也因此而失去了一批才能卓越的温和派人士。

伴随着5月份的政府倒台,维特也最终退出了政坛。在新大臣中,彼得·斯托雷平(Peter Stolypin,1862—1911)才能最为出众,他坚决反对革命,出任执掌重权的内务大臣。斯托雷平推出了一系列的农业改革法案,大批自农奴制终结以来仍严重束缚于村社的农民获得了解放。许多农民获得了小块份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村社的依附。1906至1907年间,900多万农民家庭摆脱了村社的束缚。这一成就引发了列宁及其他革命者的疑虑,他们深知离开农民,俄国革命将难以取得成功。

在实施农业改革计划的同时,斯托雷平开展了一系列打击恐怖分子和革命党人的行动。他千方百计阻挠第二届杜马的选

举，但仍有大批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人入选，结果导致杜马（1907年3月至6月）与政府争执不断。斯托雷平企图逮捕社会民主党议员，但杜马拒绝中止他们的议员豁免权，杜马因此再度遭解散。

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以后，政府非法改变了选举法，减少了农民和少数民族代表，增加了贵族代表，政府因此赢得了多数席位。第三届杜马（1907—1912）和第四届杜马（1912—1917），都圆满完成了各自的五年任期。虽然代表性不足并且权力有限，但它们终究仍具有国民议会的性质。在这两届杜马任期内，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国防建设也得以加强，政府的工作效率也因杜马委员会与部长的积极合作得以明显提高。然而，第三届杜马却因继续实施俄罗斯化政策受到了指责。

政府在第四届杜马时更加趋向反动。左翼分子通过组建工会、合作团体、工人夜校以及与其他劳工组织构建网络关系等，积极筹划另一场革命，但他们每一刻都面临着庞大的警察间谍网络的威胁。与此同时，皇帝家族也陷入了危险的境地。格里高利·拉斯普金（Gregory Rasputin，1872—1916）是一个极富魅力、半疯癫、权力欲极强且刚愎自用的无赖神甫，但因为拥有为患有血友病的小皇子止血的神奇力量（事实上可能是一种催眠术），所以博得了虔诚而专断的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Alexandra）的完全信任，而皇后又对丈夫尼古拉二世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外界因此谣传这个臭名昭著的神甫是俄国的实际统治者。这使国王那些忠诚的支持者们极度恐慌，同时也为首都那些善于操作谣言的人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之时，俄国正处于由政府的反动政策、拉斯普金丑闻以及对杜马的愤慨等共同促成的危机之中。

八、1914年的独裁君主政体

到1914年,俄国、哈布斯堡帝国及德国的现代政党,都已确立起各自将致力于遵循的特定原则,而每个政党所确立的宗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产生的特定环境。这些君主制国家的政党,都存在一定跨越国界的相似之处。尽管德国或奥匈帝国不存在可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相比拟的政治团体,但德国自由党、奥地利自由党及俄国立宪民主党或十月党人,却持有相似的观点。极端民族主义的泛德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立场也非常相近,而三国中的社会民主党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是其革命性在俄国较德国和奥匈帝国体现得更加强烈。

在这一时期,所有的欧洲大国都经历了经济繁荣和偶有的萧条。中东欧地区的工业革命虽然来得较晚,但其发展速度却非常惊人。到20世纪初,德国的钢铁业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其产量超过了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钢铁生产国。奥匈帝国尽管在资源和技术上都远远落后于德国,但也很快开始了工业化,俄国的交通与工业同样体现出了繁荣的景象。在上述三国中,只占人口总数极小部分的土地贵族,继续对政治施加着与其规模不成比例的强大影响力,但三国中大批被剥夺基本权利的城市工人阶级的涌现,激励着各地的知识分子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团体,宣传阶级斗争。除了俄国外,这些团体都主张竭尽全力改善工人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不赞同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

俄国于1861年解放了农奴,19世纪现代化速度最快的美国也在两年后解放了奴隶。美利坚合众国与欧洲的发展存在一

定的差异，它注重开发自身广袤的边疆地区，其现代化体现出非凡的发展速度，到19世纪末已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美国虽然拥有近似于英国的政治制度，在工业化上又与德国存在可比性，但其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却体现出诸多不可比拟的独特性。

九、美利坚合众国：崛起中的大国

尽管远离欧洲大陆，并且从大不列颠独立出来已有一个多世纪，但无论从文化、语言还是政治传统上来看，美国都无可辩驳地拥有近似于欧洲大国的特性，其人口、疆域以及巨大的潜能同样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更令人惊叹的事实是，它仅用了一个多世纪就从一个弱国发展为一个强国。下述两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1790年美国的领土面积仅为89.2万平方英里，1910年扩大为375.4万平方英里。更为重要的是，1790年美国的人口总数为392.9万，到1910年已增至9197.2万，虽然不及俄国，但却远远超过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德国和英国。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可开发的自然资源及其向工业和农业的转化能力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其煤炭、铁矿石和钢铁产量也位列世界之首，而这又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性条件。美国不仅拥有稳定的政治制度，并且拥有其主导下的两大洋保护，人们因此很难否认这一年轻共和国所具有的大国地位。

移居新世界追寻梦想的英国人，带来了他们的语言文化、政治经验以及为实现公民自由的献身精神。这个新生的国家得益于其他移民的大量流入以及这片处女地丰富的资源，但对稀疏分布的土著居民却缺乏耐心，甚至表现得非常残忍。到19世纪中叶，这一年轻的共和国开始面临国内冲突的严峻考验，但它最

终以血腥的方式永久摆脱了分离主义和奴隶制的困扰。在新世纪来临之际,虽然美国人仍没有做好扮演大国角色的心理准备,但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具备了赢取大国地位的条件与能力。

1. 自由企业与政府(1890—1917)

截止到内战的美国经济仍属于“殖民地”经济,即主要生产食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国外的工业制成品。在金融领域,美国同样依赖海外市场。然而,美国仅在半个世纪内就转变为工业国。这显然得益于充足的劳动力,而19世纪90年代来自东、南欧的大规模移民又进一步丰富了这一资源。与此同时,开拓与自由企业精神培育了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民族意识,而原住民印第安人则在进步的名义下受到驱赶或打击。

国家财富的急剧扩张是在广受支持的自由观念氛围下实现的,即除了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合同履行、控制货币发行以及维持这一时期至关重要的保护性关税外,联邦政府不应该直接干预企业的商业活动。部分州虽然偶有突破,但各州总体上亦不愿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

很多曾推动英国改革的举措逐渐引入了美国,主要包括最低工资法案、对童工与女工的限制、卫生管制、工时限制以及对工人的赔偿等。到20世纪早期,公众舆论已逐步转向支持政府干预并调节经济生活。

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承诺给予工人“公平待遇”,并将坚决“取缔垄断”,即打击那些开始垄断美国重要经济部门的大型托拉斯或联合体。尽管罗斯福未能兑现所有的承诺,但其领导下的政府的确采取措施打击了铁路和烟草领域的托拉斯,并不断向联邦政府施压进行反垄断立法。约翰·D. 洛克菲勒

加拿大
（通过1783年《巴黎条约》获得）
（1949年的英加边界）
（佛蒙特）1791年
新斯科舍
1820年前属马萨诸塞的一部分
俄勒冈，1846年
（与英国的条约）
路易斯安娜，购买，1803年
太平洋
大西洋
最初的13个州
---目前各州的边界
得克萨斯，吞并，
1845年
葛士顿，购买，
1853年
1810—1813年
吞并的领土
1819年通过与西班牙的条约获得
0 100 200 300 400 500 英里
墨西哥
墨西哥湾
古巴
太平洋
夏威夷
（1894年成为共和国；
1900年成为美国的领土）
（1959年3月成为第50个州）
0 50 100 英里
阿拉斯加，购买，
1867年
（1959年1月成为第49个州）
0 500 1000 英里
（1898年成为美国领土；
1953年成为自由邦）
维尔京群岛
波多黎各
美国领土
美国领土（1917年从丹麦购买）
0 50 100 英里

美国的扩张

(John D. Rockefeller,1839—1937)强大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控制着美国大部分的石化工业。它虽然于1911年被分解,但拆分是在政府诉讼送达联邦最高法院以后才最终实现的。社会立法者、新闻记者以及作家,揭露商业不法行为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美国大企业在后西奥多·罗斯福时代经历了更快的发展,但赢取公众舆论的意识同样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在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9,1912—1921年为总统)的第一任期内,规范企业商业活动的行动力度有了进一步的强化。例如,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给予联邦官员在银行、信用卡以及货币流通领域更大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使所得税合法化,第十七条修正案实现了参议员的直接选举,现实中的联邦共和国因此变得更加民主。在一些局外人看来,美国的政治生活与美国所有其他方面一样,往往分歧严重、争吵不休,美国人几乎在关涉国家政治的任何问题上都存在严重的分歧与矛盾。然而,这一明显喧嚣而混乱的社会,却取得了非凡的物质发展与政治稳定,而这实际需要千百万人在现代化的目标问题上达成共同的默契。

尽管存在普遍的公众信任危机,但政府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却得以不断强化。虽然地方和州政府的作用也得到了加强,但联邦政府的职能显然增长得更快。伴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大,州政府的权能受到了明显的制约,而在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美国的民族主义也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2. 向世界大国的转变

尽管美国人对此认识不一,但美利坚合众国显然已经成为国

文献记载

海权的影响

新的“海军至上主义”中的很多原则，都来自于美国军官阿尔佛雷德·T. 马汉(Alfred T. Mahan, 1840—1914)的著作，并得到了英国和德国的认同。马汉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890)及其后续作品，将海军视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首要因素，其思想在国内外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德国、英国和日本的影响尤为强烈。

人们认为，在当前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条横穿巴拿马地峡的运河就会给美国带来军事上的灾难，尤其太平洋沿岸将面临更大的威胁。一旦运河修成，大西洋沿岸的处境虽然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只能与多数无抵御能力的国家共同面对因外力引发的纠葛，但太平洋海岸面临的威胁将会急剧增加，因为运河将会大幅缩短太平洋海岸与欧洲的距离，并且地峡将会被更具实力的海洋强国控制。其危险不仅在于为欧洲强国派遣舰队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通道，而且使其能够在太平洋沿岸保有一支比先前更为强大的舰队，因为舰队在需要时可以迅速调回国内。然而，如果我国政府能够采取明智的举措，我们就可以利用太平洋港口的巨大弱点在这一地区保持一支具有优势的海军力量。旧金山和普吉湾(Puget Sound)两个中心港口口径大且海水深，鱼雷艇因此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的保护。由于舰队能够经由炮台火力射程外的通道进入港口，所以仅仅依靠加强岸上的堡垒工事并不能确保港口的安全。尽管岸上的工事是有必要的，但还应另外派驻海岸防御舰队，它将和炮台相互配合反击敌人。作为港口不可或缺的防卫力量，这些舰只的活动范围不应远离海港，并在出现以港口为中心的战争冲突中给公

海行动的海军提供战略支持。海岸防御船只应加强装甲和火力配备以取代长距离航行的装备,亦即具备更强的防御和攻击能力,从而为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舰队提供一种独特的战略支持。除了英国以外,其他国家均没有接近我国太平洋海岸港口的实力,并有能力将此纳入其海岸防御舰队的行动范围……

太平洋沿岸各州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强化这一区域的军事防卫可以留待将来处理,但我们拥有的时间并不充裕,相关的筹划必须立刻付诸实施。

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Atlantic Monthly*, LXVI(December 1890), pp. 22—24.

际舞台上的大国。美国从一开始就设立了专事对外事务的外交部,并向外派驻了传统的公使、领事以及后来的大使。19 世纪 20 年代门罗宣言出台以后,美国的立场趋于强硬,明确反对欧洲大国进一步在西半球扩张领土。门罗宣言表明,美国要求在自身领土范围外发挥更为广泛的影响。美国虽然没有在 19 世纪欧洲的均势政治中扮演角色,但却对远东的均势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兴趣。美国与中东存在长期的贸易关系,并致力于商业领域的"门户开放"政策。1898 年,美国与西班牙在古巴进行了一场短促的战争,美国借此从西班牙手中夺得菲律宾群岛和波多黎各,而新"独立"的古巴也随之成为美国事实上的保护国。在居住于夏威夷王国的美国居民的策动下,该岛也于 1898 年被纳入了美国的版图。

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积极的扩张主义者,他将自身政治上的发迹部分归功于其在美西战争中的杰出表现。他积极推动

于1914年通航的巴拿马运河工程建设，宣扬门罗宣言以证明美国对拉丁美洲军事干预的正当性，极力拓展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并主张扩建海军。罗斯福期冀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本人在1905年日俄和约中的斡旋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财富和贸易扩张之后，美国已完全融入了国际商贸体系。联邦政府除了在内战期间曾对南部联盟实施过封锁外，始终致力于捍卫联邦的对外贸易权益。然而，如同对外贸易将美国拖入了1792—1815年的世界性战争一样，它同样将美国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截止到1917年，美国虽然仍极力避免与他国缔结有约束力的正式联盟关系，但它已成为国际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一员。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统一、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知识分子骚乱等等现代欧洲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在美国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美国人因此很难否认，他们也是世界历史大潮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十、本章小结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西方绝大部分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主要坚持三种意识形态信仰。保守主义强调历史、道德、共同体及秩序，其传统的对立派自由主义，则更多地信奉人类理性、机会、进步、资本主义以及物质主义。新生于19世纪的社会主义则反对资本主义伦理，倡导“社会正义”，即通过国家干预重新分配社会财富。部分社会主义者主张革命，另一些社会主义者则坚持民主。

1900年的英国是一个议会君主制的民主国家。自由党在本世纪初取代保守党上台执政，并将非社会主义的干涉主义改

革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世界大战的日益临近,英国政治因爱尔兰问题陷入僵局,即是否在联合王国框架内给予爱尔兰自治。截止到 1914 年,这一问题始终主宰着英国的国内政治。与此同时,向结盟政策的回归最终使英国与昔日的对手法国和俄国结为新的同盟。

1870 年普法战争失败后产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致力于在君主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对抗中构建一个稳定的制度体系。虽然通向稳定的道路困难重重,但截止到 1900 年,多党民主制已经开始运行。严重的经济不公、迅猛的社会变革以及传统敌手德国的迅速崛起,使法国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与英国的和解又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法国面临的巨大压力。

意大利直到 1860 年才最终实现了统一。步入 20 世纪以后,多党立宪君主制的新王国面临政局动荡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意大利人口、资源、工业化和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差异。意大利是一个名不副实的大国,而企图在北非帝国恢复昔日罗马荣耀的尝试,丝毫未能缓减王国所面临的各种严重挑战。

生成于 1871 年普法战争胜利后的德国,呈现出一派富于活力与成功的景象。起步较晚的现代化成就显著,具有独裁主义倾向的君主政治体现出相当高的稳定性。德皇威廉二世年轻、冲动又富有野心,并立志使其治下的德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德国也面临严重的问题:皇帝受到了军界的强烈影响,政党间的关系反映出,稳定中潜藏着不同阶级和地区间的矛盾与冲突。更为危险的是,皇帝和狂热的爱国分子都决意打造世界首屈一指的海军,以进一步强化已经是欧洲最为强大的军

队。这最终使帝国走上了与英国对抗的道路，而这一传统盟友很快就丧失了对德国的信任。

奥匈是一个由哈布斯堡王朝属下各地区组成的多民族帝国。奥地利统治着西部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各个民族，帝国东部则由马扎尔人统治。帝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受支配民族的严重不满。经过多年的镇压之后，统治者从 1914 年开始实施融合少数民族的新政策（绝大部分在东部被延搁）。然而，变革不仅微乎其微，而且也为时太晚。

像奥匈帝国一样，俄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帝国。俄国拥有前现代的政治制度，没有宪法和议会，1894 年后由多疑而反动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引发了 1905 年革命，并最终导致了宪法宣言以及立法机构杜马的建立。然而，这些仅仅是表层化的变革。古老的秩序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长期威胁沙皇统治的暴力革命仍在继续。这一巨大的力量催生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而这最终将成为革命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19 世纪，美国领土囊括了几乎整个北美大陆，而其财富和人口（受大规模移民的刺激）也获得了相应的增长。世纪之交，两党民主治下的美国人，在大国问题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1898 年，来自新世界的美国首次击败了古老的殖民大国西班牙，那些赞同大国道路的美国人随之占据了上风。然而，社会变革以及其他现实的政治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第三章

世界大战与大革命

1914 年 6 月 28 日，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哈布斯堡大公弗兰茨·斐迪南及其妻子索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在波斯尼亚省会城市萨拉热窝遇刺，而此地自 1878 年以来就被奥匈帝国占领。暗杀者加夫里洛·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是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分子。受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恐吓的奥匈帝国，借此向塞尔维亚发出非常苛刻的最后通牒。塞尔维亚的严词拒绝，导致奥匈帝国于 7 月 28 日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欧洲大国一周之内都卷入了一场轴心国(奥匈帝国和德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先后加入)与同盟国(塞尔维亚、俄国、法国、英国，最终得到其他 18 个国家的支持)间的大规模战争。

普林齐普的刺杀行为最终造成了 3600 万人的伤亡与失踪。战后，特别是和平努力归于失败以及领导者"以战止战"的天真想法破灭之后，公众围绕战争的责任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而有关战争起因的争论最终又与战争责任的道义问题混杂在了一起。

一、战争的起因

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是导致战争的一大因素。这两个新兴大国的出现改变了欧洲原有的均势结构,而政治家随后40年中旨在调整这一体系的努力最终又归于失败。传统大国并不愿放弃既得的利益。1850年以后,国家主权原则得以进一步确立,大国吞并西欧小国的可能性随之降低,欧洲再没有多少可供变通的领土。19世纪后期,土耳其帝国日趋没落,唯有其属下的巴尔干半岛,有可能成为满足大国领土野心的牺牲品。然而,即使在巴尔干,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各族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也使得吞并变得异常困难。

与此同时,欧洲各大国在来自欧洲和海外竞争者的影响下,开始通过缔结盟约与协定组建联盟,并于20世纪初形成了军备急剧发展的两大武装阵营:三国同盟(包括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和三国协约(法国、英国和俄国)。1900年以后,几乎任何危机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战争。

1. 重塑国家的自我形象

民族主义以及相伴而生的均势力量的变化影响着公共舆论,而受媒体引导的公众舆论往往对民族主义与均势结构的变化发挥着更为显著的影响。在西欧地区和美国,旨在扩大发行量的强势媒体竞相争夺“新闻”,但多数报纸并不认真分辨流言与事实,也不在意哪些是庸俗的情感宣泄(即使是真实的),哪些是对这些情感产生背景的客观阐释。

技术进步使印刷成本较以往大为降低。1711 年,极富影响力的英国报纸《旁观者》(*The Spectator*),每天的发行量仅为 2000 份,并且没有多少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1916 年,巴黎一家报纸每天的发行量超过 200 万份,而且拥有数以百计的竞争者。通过印刷文字传递信息的革命发生于 19 世纪。伦敦的《泰晤士报》于 1814 年开始使用蒸汽印刷,其印刷速度较以往高出了 4 倍。铁路在英国、法国及稍晚的中欧地区的飞速发展,为报刊的全国性发行创造了条件——法国各地都可在第二天读到巴黎的报纸。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电报的发明促成了新闻服务业以及驻外记者的飞速发展,全国各种不同的报纸因此可能刊发同一则新闻。

1847 年,纽约人理查德·霍伊(Richard Hoe,1812—1886)发明了一小时印制两万份报纸的轮式印刷机,现代报业随之而产生。随着莱诺铸排机(Linotype)及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单字铸字机(monotype machines)广泛应用于书籍的排印,截止到 1914 年的各种读物的销售量都实现了跨越式突破。这一变化促使多数国家强化了新闻审查制度,因为各国均日益明确地意识到,印刷品极易成为受政治操纵的服务工具。

印刷品随插图的广泛运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美国媒体早在内战期间就将战场图片呈现给了公众。银板照相法取代绘画术逐步成为传播事实真相的主要手段。19 世纪 80 年代,批量生产的照相机得到迅速推广。简易的箱式照相机柯达于 1888 年问世,同期内网目版视屏画的商业化程度也得以进一步深化,新闻图片因此变得随处可见。

报纸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更加突显。英国的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1865—1922)、法国的查

理·迪皮伊(Charles Dupuy,1844—1919)以及美国的两位竞争者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847—1911)与威廉·鲁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共同推动了大众新闻业的形成与发展。普利策与赫斯特极力支持1898年的美西战争,而受其影响的所有报纸都赞同他们传统的沙文主义观点。

欧洲大陆国家和平时期的义务兵役制,进一步促进了小学义务教育的发展,随后又推动了成人普选权的实现。这些变化扩大了读者的数量,新闻报道中的政治性内容随之不断增加,并进一步推动了排版技术的飞速发展。截止到1900年,"公众舆论"实际已成为世界事务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1914年战争爆发时,每一好战国政府因此都得到了公众广泛的支持。走上战场的人们相信战争是必要的,甚至连社会主义者都支持战争。然而,如果日益复杂化的联盟体系没有剥夺了国家的选择权,如果领导者没有选择他们所选定的道路,公众舆论很可能会倾向于反对战争。例如,在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后历时五周的狂躁中,德皇威廉二世曾试图避免大规模战争。但在之前的1888到1914年间,他始终是一个热衷于扩张且好斗的领导者。他鼓励德国青年相信,虽然敌人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德意志拥有的精神力量足以战胜敌人的野蛮力量。

德国的野心和恐惧使其对英国产生了极大的仇恨。起初很少有英国人理会这种仇恨,但随着英德海军军备竞赛的日益激烈,以及德国工业品在欧洲、北美、南美、亚洲的大规模倾销,英国人开始担心自身的繁荣和领导权。他们对日趋萧条的工厂以及远不如德国的生产效率顾虑重重,也不满于其在海外的商业失利,部分人更对英国日益增长的自足心理充满了畏惧。显而

易见,英国的帝国主义正面临一场来自国内的政治危机。

法国战前的国际政治主张形色各异,不一而足。在战争威胁不断加剧的条件下,力量强大的社会主义左翼致力于和平主义和国际工人大罢工,但一群激愤的爱国者极力主张复仇,为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雪耻。复仇派组织爱国社团并刊行爱国杂志。像英国一样,法国也支持国际和平运动,例如红十字会、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会议以及国际工人运动倡导的各种未果努力。然而,法国外交部仍继续坚持并强化反德同盟,并于1914年7月最终做好了开战的准备。

2. 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1879—1918)

1871年以后,俾斯麦长期致力于建立孤立法国的同盟体系。他在积极维持与奥地利和俄国良好关系的同时,更为艰难地推动这两个国家改善相互间的关系。俾斯麦面临的任务尤为艰巨,因为奥地利与俄罗斯都想主宰巴尔干。

1879年与奥匈帝国缔结的防御性同盟,为俾斯麦进一步构建反法联盟体系奠定了基础,而且这个同盟一直延续到1918年。与此同时,俾斯麦又通过三皇同盟(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 1872—1878,1881—1889),将德国、俄国以及奥地利捆绑在了一起。三国同意在土耳其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如果三国中任何一国与土耳其以外的第三国开战,其他两国应保持善意的中立。俾斯麦随后又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构建了直接针对法国的同盟,即1882年的三国同盟。三国同盟条约多次续签,并在形式上一直维持到1914年。

在19世纪80年代的动荡局势中,俾斯麦经营的均衡虽然

极为脆弱,但仍能继续维持。在俾斯麦看来,最为可怕的后果莫过于俄法结盟。俄国对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图谋长期耿耿于怀,而法国始终在设法突破俾斯麦建构的孤立网。1877 年俄国果然拒绝续签三皇同盟条约,但俾斯麦通过秘密的俄德协定即《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修复了俄德间的裂痕。两国彼此承诺,如果其中一个与第三国交战,另一个国将保持善意的中立。但如果德国主动进攻法国或俄国主动进攻奥地利,则中立不复存在。由于俄国的民族主义分子仍在继续煽动反对奥地利和德国,俾斯麦于 1888 年将德奥同盟条约公之于众,三国同盟条约中的主要条款因此以非正式的方式为公众所知,其目的则在于警告俄国。

1890 年,威廉二世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因与"两国同盟"(1879 年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存在严重的抵触,幕僚们极力说服德皇不要续签俄德《再保险条约》,俾斯麦曾竭尽全力避免的局面很快就出现了。经过长期的秘密谈判,俄法于 1894 年将两国同盟条约公之于众,法国最终摆脱了长期的孤立境地。俄法条约是一个防御性的协定,双方约定,如果其中一方遭到德国或奥国的侵略,另一方应提供援助。

英国仍然没有与欧洲大陆的盟国缔结正式的盟约,因此仍处于不介入的状态。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英国通过非正式的协议开始与三国同盟对立。英国起初试图与德国达成谅解,遭回绝后便于日本缔结了正式的同盟关系(1902 年),不久之后又与传统的对手法国(1904 年)和俄国(1907 年)达成了非正式"谅解"(协约)。负担沉重的英德海军军备竞赛以及公众舆论的快速变化,促使英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行动。在英国看来,俄国的威胁远大于德国,这一点促使英国与日本结盟。通过缔结两国

《谅解协议》(*Entente Cordiale*),法国给予英国在埃及的自由行动权,而英国则给予法国在摩洛哥的自由行动权。更为重要的是,这为日后的进一步协作创造了条件,尤其为战争临近时的陆海军先期合作奠定了基础。

1907年,俄国与英国达成谅解,两个阵营对峙的局面最终形成。英俄两国在波斯湾、阿富汗、西藏等地区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英国甚至在俄国军舰进出博斯普鲁斯及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上也作了一定的让步。这虽然是一个非正式的协定,并且英国也因此没有受到欧洲大陆任何同盟体系的严格束缚,但协定的签署仍然促成了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的对峙。

随着协约国体系的日益完善,一连串的军事与外交危机点燃了公众舆论炙热的激情,并进一步压缩了双方间的变通余地。首先是德皇刻意的戏剧性表演。1905年,威廉二世对摩洛哥的丹吉尔(Tangier)进行了礼节性的访问,意在表明德国并不承认英法协定中关于摩洛哥的安排。英国随即明确表示将支持法国,而且英法两国已经开始举行非正式的陆海军会议。至少在法国看来,这些变化意味着,一旦遭受德国的攻击,英国将会对法国提供军事援助。

1906年,各大国在西班牙的阿尔黑西拉斯(Algeciras)召开关于摩洛哥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国际会议。德国虽为会议的首倡国,但其主张却遭到了与会国的反对。法国则寻求与西班牙瓜分摩洛哥,并将其转变为保护国。阿尔黑西阿拉斯会议也是美国介入欧洲事务的最早尝试。1904年,一个摩洛哥军官扣押了一名被认为拥有美国国籍的公民,西奥多·罗斯福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两年前,在美国犹太人的极力要求下,国务院对罗马尼亚迫害犹太人的行径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从对罗马尼



坚不可破的同盟者：这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与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一战爆发初的合影，印于宣传卡片并大量发行，以动员两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Österreichische Gesellschaft für Zeitgeschichte，Photoarchiv，Vienna)

亚内部事务的抗议可以看出,美国显然不会在涉及其公民的问题上无动于衷。罗斯福因此派出两位代表参加了阿尔黑西阿拉斯会议,并帮助调解两大阵营间的矛盾。

1908年,奥地利正式吞并了占领已达30年的土耳其省份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局势随之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奥地利的举动激怒了企图吞并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而且也激怒了俄国人,因为他们并不知晓,俄国外长早已与奥地利达成了容许其吞并的非正式协议,以期换取奥地利向俄国军舰开放两海峡。然而,俄国最终一无所获,因为英国人拒绝开放海峡。

1908年夏,青年土耳其党人反对土耳其苏丹的起义获得了成功,这成为刺激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直接因素。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俄国曾征服了土耳其部分独立的公国,而目前俄国正在这些公国中强行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来自中亚的土耳其人因此发起了泛突雷尼运动(Pan-Turanian movement:以其突雷尼游牧祖先命名)。他们试图将中亚的土耳其族与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及匈牙利的马扎尔人联合起来,但奥地利则决意继续维持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统治。

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西欧的紧张局势。为了对法国占领菲斯(Fez)城表示抗议,德皇向摩洛哥的阿加迪尔(Agadir)港派出了一艘名为"豹"号的炮舰。接下来的谈判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德国同意给予法国在摩洛哥的自由行动权,但却提出了被法国认为是敲诈的苛刻条件,即将部分法属刚果割让给德国。法国国内对谈判结果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并最终导致了政府的垮台。从此之后,法国任何一届政府都不敢再对德国做出妥协。

事件产生了一系列相互交织的严重后果。1911年,意大利

利用阿加迪尔危机向土耳其索要的黎波里(Tripoli)。在随后持续达一年的土耳其与意大利战争中,由浪漫主义诗人和冒险家卡波列莱·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领导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终于有机会见证了帝国所取得的巨大收益。意大利吞并了的黎波里,轰炸了叙利亚海岸,占领了罗德斯岛(Rhodes)以及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 islands)的其他岛屿,并最终得到了 1912 年 10 月《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的确认。

与此同时,巴尔干各国开始袭击土耳其占领者,的黎波里(利比亚)战争因此成为 1912 至 1913 年巴尔干战争的前奏。黑山首先对土耳其宣战,十天以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也加入了反对土耳其的战争。战争的主旨在于反对土耳其,但俄国警告不断推进的保加利亚人不要占领君士坦丁堡,否则将动用俄国舰队攻打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人攻陷了阿尔巴尼亚并到达了亚得里亚。为了阻止塞尔维亚人接近亚得里亚海,奥地利支持阿尔巴尼亚独立。俄国人则支持塞尔维亚,并于 1912 年 11 月与奥地利同时开始军事总动员。然而,俄国逐渐意识到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于是放弃了对塞尔维亚的支持,并最终导致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及土耳其间的和约。依据 5 月 30 日达成的协议,土耳其放弃了欧洲的大片领土以及对克里特岛(Crete:被并入希腊版图)的主权要求,并将阿尔巴尼亚及爱琴群岛的最终地位问题交由列强处理。

一个月之后,保加利亚军队指挥官在未通知其政府的情况下,突袭了塞尔维亚和希腊,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由此爆发。塞尔维亚和希腊被迫应战,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也加入了反对保加利亚人的阵线。保加利亚在短短的六周内丧失了《布加勒斯特条约》(*Treaty of Bucharest*)给予的绝大部分权益,并在与土耳其

的另行协定中被迫归还了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在谈判的过程中,塞尔维亚侵入了阿尔巴尼亚,直到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才被迫撤军。

同期内的英德海军军备竞赛仍体现出不断加剧的势头。1912年2月,英国防务大臣霍尔丹(Lord Haldane, 1856—1928)赶赴柏林,试图说服德国冻结其舰队规模,作为交换英国将支持德国在非洲的扩张,但遭到了德国的拒绝。

英国随即陷入了两难的境地。1897年的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随着1905年庞大而昂贵的无畏级战舰(Dreadnought)的下水,海军的装甲与装备标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德国很快便赶了上来,英德军备竞赛的升级势头仍在继续。极力倡导现代化海军的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于1911年出任英国首任海军大臣,但1912年的新海军法案充分表明,德国将决意赶超英国。英国最终认为,只有与法国进行海军合作才能缓减军费开支的进一步上涨。英国人计划将地中海地区交由法国海军控制,英国海军将集中关注北海、海峡以及近东地区的安全。

3. 最后危机(1914年7—8月)

外交家和政治家们都被拖入了战争,因为他们相信外交上的失败或使国家蒙羞比战争更糟糕。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哈布斯堡属地上塞尔维亚对南方斯拉夫人的煽动问题,奥匈帝国责难塞尔维亚政府是加夫里洛·普林齐普的同谋,并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此次密谋的实际策划者是黑手党恐怖组织。虽然该组织也包含有部分塞尔维亚军官,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塞尔

维亚政府涉足了谋杀。奥匈帝国在行动前咨询过德国，德国表示将支持奥匈针对塞尔维亚的一切政策，这等于给奥匈开出了一张拥有无限权力的外交“空白支票”。

受到鼓舞的奥地利政府于 7 月 23 日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并要求其在 48 小时内做出答复。奥地利也许刻意提出了令塞尔维亚难以接受的最后通牒，要求查禁一切反奥出版物，取缔一切反奥爱国组织，禁止学校带有任何反奥倾向的教学，辞退参与反奥宣传的官员，逮捕涉嫌参与刺杀的塞尔维亚官员，并对奥地利做出正式道歉。塞尔维亚本来可以接受这些要求，但其他两项则超出了塞尔维亚人容忍的限度，即奥地利官员与塞尔维亚政府联合调查谋杀事件，并审判联合调查中发现的所有疑犯。塞尔维亚虽然接受了通牒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但回避了其中最重要的条款，而且在正式答复前就开始动员军队。塞尔维亚显然希望通过这种策略为进一步的谈判争取时间，但奥地利部长很快就离开了贝尔格莱德，奥地利也开始动员军队，并于 7 月 28 日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

德国支持奥地利的这一决定，但其外交官仍然含糊其辞。德国一边向维也纳施压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一边试探英国是否会在大战中保持中立，而这是德国长期追求的目标。如果战争最终到来，德国希望将其罪责推到俄国身上。由于俄国正在进行军队总动员，德皇于 7 月 29 日给俄皇尼古拉二世发去了一份私人电报，表示他将敦促奥地利实施妥协。德皇的电报迫使俄国将总动员改为局部动员，奥地利与俄国的谈判随之于 7 月 30 日恢复。如果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1921)能够在表面上将欧洲大战的责任归咎于俄国，这位德国总理仍有希望争取英国的中立。

然而,对于幅员辽阔且交通落后的俄国而言,军事动员并非易事。俄国军队担心敌人会占据上风,政府因此决定恢复军队总动员。德国立即要求俄国停止总动员,遭到拒绝后,德国也于8月1日下午4点宣布总动员,三个小时后正式对俄宣战。

与此同时,法国决定支持其盟友俄国,并于8月1日下午3:55开始总动员。由于未能迫使英国敦促法国保持中立,而且确信法国将会支持俄国,德国于8月2日入侵了卢森堡,并向比利时提出过境要求,以此来换取比利时的中立。遭到比利时拒绝后,德国于8月3日向法国宣战,同时入侵比利时以占领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并从西部扑向巴黎。

英国一直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虽然英法协定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约束力,但却促成了两国陆海军官员的密切合作及联合制定防御计划,英国因此终将参战。德国对中立国比利时的入侵成为英国参战的首要因素。爱德华·葛雷(Edward Grey)爵士抓住德国入侵比利时的有利时机,敦促英国采取行动,并坚持英国参战主要出于政治的考虑。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贝特曼·霍尔维格在获悉英国参战的消息后表示,英国加入战争只是为了"一张废纸",即1839年给予比利时永久中立地位的条约。这一不幸的言论不仅强化了英国舆论支持战争的力度,而且也成为日后将战争罪责归咎于德国的重要原因。

4. 其他大国的参战

8月6日奥地利向俄国宣战以后,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的所有成员都卷入了战争,唯有意大利宣布中立。德国与奥匈帝国组成的轴心国与俄国、法国、英国以及塞尔维亚组成的协约国

展开了对决。日本于 8 月末加入了协约国阵营，土耳其则于 11 月加入了轴心国阵营。在协约国与同盟国均作出极富竞争性的领土承诺后，意大利最终于 1915 年 5 月加入了协约国阵营，葡萄牙和罗马尼亚也于 1916 年加盟协约国。战争最终席卷了全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截止到 1918 年底，共出台了 56 份战争宣言。

美国人不希望卷入欧洲的冲突，但公众舆论曾一度存在严重的分歧。很多美国人支持英国和法国，认为这两个国家在为欧洲的民主而战，但也有很多美国人将英国视为传统的敌人。美国人依然倾向于坚持孤立主义传统，认为这是避免战争的有效途径。事实的确如此，1815 年以来，不曾有任何海外的入侵者踏上美国的领土，政府因此很快就制定了中立政策。

然而，随着战争在欧洲的肆虐，美国公众日益倾向于反对轴心国，对德国的敌意尤其强烈。美国人从英国的新闻报道中了解战争，聆听那些矛头直指德国的残暴故事，并认为哈布斯堡旨在压制各民族自治的合法要求。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从美国购买了大量的商品，美国因此从欧洲战争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战争仅开始一年，美国经济就与协约国交织在了一起。

然而，在中立带来的巨大收益面前，商业界仍不主张美国参战。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 1916 年的竞选中承诺，将尽其所能避免美国卷入欧洲的冲突。威尔逊显然对此充满了疑虑。如果德国继续对美国前往英国的商船队采取冒险行动，美国将很难置身局外。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德国人看来，美国人所谓的中立海运无疑是对英国的公开支持，德国因此开始使用其最强有力的海上武器潜水艇，并于 1915 年宣布环不列颠群岛水域为交战区，任何进入视线的敌国商船都将被击沉，进入该区

域的中立国船只后果自负。美国人坚持公海的自由航行权，并包括搭乘客轮的战斗人员。1915 年 5 月 7 日，英国一艘跨大西洋的汽船“路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被德国潜艇击沉，1198 人死亡，其中包括 124 名美国人。

美国对此提出了措辞激烈的抗议。在 1915 年剩余的时期内，德国潜艇有了明显的收敛，明显减少了对货船的攻击。然而，类似的事件仍时有发生。1916 年，德国正式宣布放弃无限制潜艇战，并在不久之后发起了和平攻势，但却遭到了协约国的拒绝。1917 年初，德国陆军占据了上风，并于 2 月 1 日实施攻击中立国与交战国船只的新政策。三天以后，一艘美国军舰在得到警告后被击沉，威尔逊请求国会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在随后的一个月中，又有 6 艘船只被击沉。在此期间，俄国于 3 月 12 日建立了一个新的民主政府，俄国被迫退出战争，德国军队因此得以从东线调往西线。威尔逊指责德国的潜艇政策是“反人类的战争”，并于是 4 月 6 日对德宣战。但美国依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仍没有正式加入协约国集团。

德国恢复潜艇战显然是美国参战的直接原因，但并不乏其他的因素。虽然中立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美国的利益集团认为参战将会取得更加丰厚的收益。美国借给协约国大量的资金，如此巨大的债款将使债权人难以承受协约国战败的后果。德国的潜艇政策也使公众舆论义愤填膺。很多美国人担心，如果德国获胜美国的安全将面临威胁，世界秩序也将随之重组。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在感情上更倾向于英国而非德国，并对德国主宰下统一的欧洲缺乏心理准备。威尔逊毫无疑问并不相信他正在从事一场“使世界更加安全与民主”的战争，但他却坚信，如果轴心国取得了胜利，民主将不会有安全。

5. 民族主义

为什么战争会在这样的特定地点、以这样特定方式发生？是否被卷入的所有国家都有必要参战？哪个国家应对战争发生负主要责任？而在那个国家中哪些集团、哪些领导者应负主要责任？战争发生以后，是否有必要采取所采取的方式？部分原因在于历史由胜利者撰写，而多数历史学家都将战争的罪责归咎于德国或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然而，大多数历史学家在关于战争爆发的相关问题上依然存在一致的看法。

民族主义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被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匈因此决意通过让塞尔维亚做出羞辱性让步来扑灭其民族主义。由于俄国是塞尔维亚人的保护者，而且也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因此被拖入了战争的漩涡；德国作为奥地利的保护者，认为除了采取侵略行动外并无其他更好的选择，而俄法结盟又将法国拖入了战争。各方都以防御为托词，但事实上都在实施进攻。如果能够预料战争将带来的巨大破坏性，或者部分国家选择放弃履行条约义务，情况或许会截然不同。一定意义上来说，战争是由一系列对于敌人的意图、实力以及国家自身利益的误判导致的。

即便战争已经发生，但其他国家如果没有对一个或多个可能出现的敌人抱有如此强烈的恐惧感，战火也不至于吞没整个世界。英国确信德国人一心一意想成为世界强权，而对比利时的入侵至少验证了德国主宰欧洲的企图。奥斯曼帝国惧怕俄国，并对法国和英国在近东和中东的图谋充满了疑虑，而意大利和日本则执意要参加战后的权力再分配。美国不希望德国取胜，



一战时期的海报,表明善良的男女法国人如同士兵慷慨奉献生命一样奉献他们的财富。海报艺术在19世纪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并成为战争期间有力的政治宣传武器。(Library of Congress)

更不愿看到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因为这将危及美国的发展及其崇尚的民主制度。战争最终演变为世界大战,原因在于已经拥有或想要拥有海外殖民地的交战国,也包括交战

国的殖民附属国及其觊觎已久的其他领土，全部被拖入了战争。

二、战争的进程

包括领导者、士兵、普通民众等所有被卷入战争的人都认为，这场战争将会像 1870 年的普法战争那样短暂而富于决定性。然而，他们都大错特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夺走了 800 万士兵的生命，战争引起的疾病和营养不良又造成了更多的死亡，战争造成的经济混乱以及育龄人口的丧失导致出生率严重不足。俄国经济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与传染性疾病意味着，在战争中崛起的西北欧，尽管经受了严重的军事损失，将再一次恢复其主导性地位。

1. 交战国的资源

即使在美国参战之前，协约国在人口和资源上均占据压倒性优势。轴心国本土的人口不足 1.5 亿，而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本土的人口比轴心国至少多出 1.25 亿。此外，协约国在海外领地还拥有包括 3.15 亿印度人的大量人口。物质资源方面，轴心国尤其是德国，拥有组织完备的工业以及进行持久战丰富的煤矿和铁矿资源，但协约国在这方面同样占据着压倒性优势。尽管德国的潜艇和海面攻击严重破坏了协约国的交通运输体系，但协约国总体上仍然能够从海外获取食物及其他供应。

从长远来看，拥有人口和资源优势的一方拖垮了对手并赢得了战争，但这决不是一场力量不对称的较量。轴心国赢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而且在紧要关头几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德

国与奥地利相互毗连并形成了较完善的内部运输系统，这就保证了部队的快速调动，并且德奥间的联盟基础非常稳固。最重要的是，德国已做好了战争准备，拥有高效运行的军事机器以及大量的军需储备。德国民众一致支持战争，并享有处于进攻态势以及战胜敌人的心理优势。

与此相反，地理及语言障碍将俄国与西方的盟友分离开来。德国对波罗的海以及土耳其对海峡的控制，成为俄国与协约国沟通的巨大障碍，促使俄国不得不绕道或通过十分困难的路线与西方联系。对于协约国而言，在东西线之间调动军队即使不存在政治上的障碍，在军事上也不具有可行性。

俄国、英国和法国间的联盟形成不久且不稳固，彼此间依然存在很多冲突的根源，他们缺乏互相合作的经验，也没有共同的语言。法国和英国的民众虽然都支持战争，但两国都是民主国家，英国尤为不习惯中央集权的军事和政治管制模式。俄国和西方协约国之间从未形成统一的军事计划和运作方案。即使西线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统一步调直到 1918 年法国将军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出任联军总司令后才得以实现。

到 1914 年，协约国中只有法国做好了战争准备，但三国中法国人力资源最弱，被迫以 3900 万对抗德国的 6500 万人口。英国虽然做好了海战的准备，但海军难以直接对抗德国的陆军，而且爱尔兰的局势仍然十分紧张。俄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并拥有一支庞大的陆军，但俄罗斯空间跨度大，缺乏发达的铁路运输系统，重工业相对滞后，而且军事与政治组织体系受到了低效与腐败的严重困扰。

2. 军事战役(1914—1918)

(1)西线 德国经由比利时发起的攻击,是施利芬计划的第一步。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1833—1913)曾于1891到1906年间担任德军总司令,并制定了进攻法国的战略计划。依据施利芬计划,德军强大的右翼将占领巴黎并从背后攻击法军,左翼则从正面压制法军。在法军被迅速消灭以后,德军将合兵转而进攻俄国,而此时的俄国仍未完成军事总动员。英国是一个与欧陆分离的岛国,可以暂且不理,但必要时亦可对其实施攻击。

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德国计划的破产。第一,施利芬的继任者德军总司令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1848—1916),削弱了右翼的实力,将其中几个师调到了东线。当右翼接近巴黎时,由于兵力不足难以攻陷巴黎并按计划击败法军。第二,法军尽管最初准备向东展开攻击,但却及时向北向西调动军队迎战入侵的德军。在小股英军的支援下,法军充分利用德军间的一条断裂带展开攻击,德军被击垮,这便是著名的第一次马恩河战役(1914年9月5日至9月12日)。

敌对双方随即展开了称之为"向大海赛跑"(Race to the Sea)的争夺战。德军试图从侧翼突破协约国军队并抢先占领英吉利海峡的港口,以切断便捷的英国海上增援通道。但德军又一次失利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加来港(Calais)和布伦港(Boulogne)以及比利时的西南角一直掌控在协约国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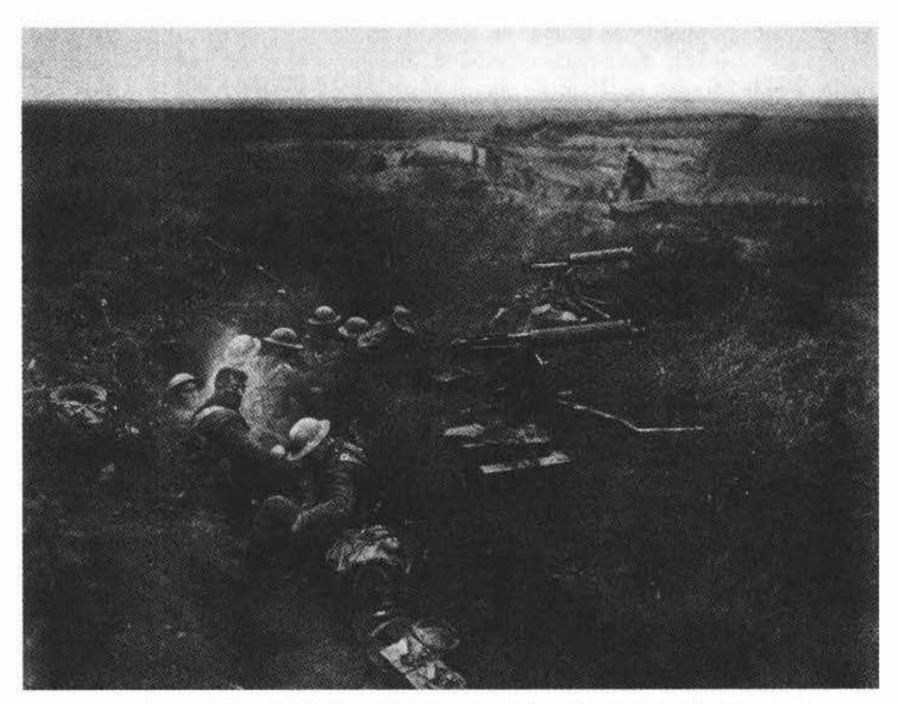
截止到1914年秋,西线战况趋于稳定。在海峡与临近巴塞尔的瑞士边境阿尔萨斯之间,成千上万的士兵在连绵不绝的战

线上形成了对峙。双方都在挖掘简易的防御工事,最终形成深及一人的两条平行堑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堑壕又增添了挡墙、机枪掩体、进出堑壕的通道及战略要塞,整个战线最终变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防御工事。在四年的堑壕战中,成千上万的局部行动使堑壕的走向不断发生变化,双方的战线都曾被局部突破,但西线的战争总体上局限于一条狭长的有限区域之内,而且不断更新的武器装备使防御较进攻变得更加容易。

(2)东线 东线对稳固西线的协约国联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俄国在东线面临着德国及奥地利两个敌人,双方都有大量兵源投入。如果俄国人难以固守到 1917 年底,西线的协约国将难以抵挡德国与奥地利对法国和意大利战区的增援。尽管东线战争比西线更富于动态性,但也不乏长时期的僵持。

俄国人在战争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战果。他们首先占领了加里西亚首府伦贝格(Lemberg),即现在的利沃夫(Lvov)。截止到 1914 年 9 月,俄军已到达了穿越喀尔巴阡山脉进入匈牙利通道的北端。1914 年 8 月 19 日至 20 日,俄军取得了贡宾年(Gumbinnen)战役的胜利。惊慌失措的德国军队重组了东线的指挥系统。受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 1847—1934)指挥的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 1865—1937)将军,在杰出的参谋马克斯·冯·霍夫曼(Max von Hoffman, 1869—1927)的协助下,率领德军战胜了俄国的两路军队。德军于 8 月底在坦能堡(Tannenberg)重创俄国军队,俘虏俄军 10 万人。9 月初,德军又在玛苏里安湖(Masurian Lakes)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俘虏俄军 12.5 万人。

德国承受巨大压力的南翼盟国奥地利开始告援,西线同时也需要兵源补给,兴登堡及其同僚不得不调集手中所有的力量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堑壕战。西线的战争总体上处于胶着状态，虽然双方在四年中进行了血腥的进攻与防卫战，但双方的战线最终基本于1914年战争开始时没有什么差异。1917年11月，英国军队在康布雷(照片拍摄于此地)实施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坦克攻击。尽管初期取得了成功，但不久便受阻，最终没有占领敌方的阵地，双方遭受了4万多人的伤亡损失，这也成为此次战役的一大特点。(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应付这一切。他们通过波兰的一系列战役最终缓减了奥地利的压力。1914年底的奥地利被拖在了加里西亚，但德国所处的战局相对有利并得以将战线从东普鲁士推进至波兰基地。通过1915年5月和7月的两次大规模联合进攻，轴心国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装备欠佳的俄军损失惨重，并且再也没有从这一失败

中真正恢复过来。

1916 年,新司令官阿列克塞·布鲁西洛夫将军(Aleksei Brusilov, 1853—1926),指挥俄军对南部的奥地利军队发起新一轮进攻。俄军的进攻是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展开的。布鲁西洛夫首战大捷,奥军多处防线后撤 80 多英里,并俘虏 20 万奥军。德国又一次赶来救援,并用从西线调来的精锐部队成功阻截了布鲁西洛夫,俄军损失高达 100 万并耗尽了所有的给养。

正是这场惨败孕育了 1917 年 3 月初的俄国革命。在布尔什维克 1917 年 11 月革命爆发前相对温和的革命阶段,布鲁西洛夫发起了最后一场孤注一掷的进攻,但受钳制的俄军很快就开始瓦解,并为布尔什维克履行和平承诺打开了通道。截止到 1917 年底,俄国完全退出了战争。

轴心国迫使俄国签订了惩罚性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Peace of Brest-Litovsk*,1918 年 3 月),依据条约,俄国失去了在波兰的领土、波罗的海各省、乌克兰全境、芬兰以及高加索地区的部分领土。高加索地区的原俄罗斯领土划归土耳其,其他绝大部分划给了德奥两国,但后来的结果表明德奥对此的统治是极其短暂的。

(3)意大利战线　在此期间,意大利与英、法、俄三国在 1915 年 4 月秘密签定《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作为加入协约国集团的条件,三国承诺奥匈帝国与土耳其的塔兰托(Trent)、的里雅斯特以及其他领土,未来将划归意大利。意大利于 5 月正式向奥匈帝国宣战,并在奥意边境至亚德里亚海沿线开辟了新的战线。由于这一战线大部分处于山区,战争被局限于大约 60 英里的伊松佐河(Isonzo River)沿岸地区。在随后两年的拉

锯式厮杀中,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但却钳制了奥军几十万军队。然而,随着俄国接连不断的失利,意大利在1917年秋末几乎被击垮。德奥军队最终得以在卡普利托(Caporetto)突围,意大利军队被迫退往威尼斯平原。英法军队虽然疾速越过阿尔卑斯山实施了增援,但阻止德奥军队继续推进的主要障碍是严重滞后的军需补给,意大利军队最终在皮亚韦河(Piave River)沿线稳住了阵脚。

(4)达达尼尔海峡与巴尔干 1915年的达达尼尔战役意义重大。随着1914年11月土耳其加入轴心国以及西线法军对德军的成功阻击,英国高层认为有必要在爱琴海地区进行两栖作战,以期占领君士坦丁堡并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极力支持东方计划,主攻目标是阻割黑海与爱琴海两海峡中偏西南方向的达达尼尔海峡。这就是著名的加里波利战役(Gallipoli campaign),因位于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狭长半岛加里波利而得名。

1915年3月,英法舰队曾发起夺取海峡的军事行动,但最终因舰船不堪水雷的破坏而终止。不久之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法国军队,又在达达尼尔海峡亚洲和欧洲两侧海岸的多个地点展开登陆作战。由于联军内部缺乏密切的协调与配合,并且遭到了土耳其人的激烈抵抗,协约国军队最终无功而返。加里波利战役代价巨大,伤亡高达50万人。澳新(Anzac: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认为,他们被英国军官拖入了毫无意义的大屠杀,澳洲人独立的民族主义也首次得以明确的显现。

塞尔维亚在引发大战的危机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就应该有一条巴尔干战线,而且所有的巴尔干国家最终都卷入了战争。在巴尔干战线上,奥地利军队同样经历了

失败。奥军虽然曾一度占领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1914年12月),但不久即被赶了出来。对立双方都曾极力拉拢保加利亚,但它最终于1915年秋加入了轴心国集团。德国向巴尔干派出了援军及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1849—1938)将军,并在其指挥下最终击败了塞尔维亚。

为了抗衡德奥在巴尔干的进攻,英法军队将数个师的兵力调往希腊城市萨洛尼卡(Salonika),并在马其顿地区开辟了战线。希腊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国王君士坦丁(Constantine,1868—1923)为首,同情轴心国,但主张希腊中立。另一派支持协约国,以总理韦尼泽洛斯(Eleutherios Venizelos,1864—1936)为首,并秘密同意协约国军队在萨洛尼卡登陆。在协约国的巨大压力下,君士坦丁国王于1917年6月将王位传给次子亚历山大(Alexander,1893—1920),韦尼泽洛斯随之掌握了实权并正式对轴心国宣战。

与此同时,俄国千方百计想将罗马尼亚拖入战争。协约国承诺将奥匈帝国的领土割让给罗马尼亚,不堪诱惑的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加入了协约国集团。轴心国军队横扫了罗马尼亚并于1917年1月控制了罗马尼亚的绝大部分领土。1918年3月,俄国单独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罗马尼亚被迫将部分领土割让给保加利亚并将其原油产地租借给了德国。

截止到1918年夏,马其顿战线始终处于僵持的状态。随着美军迅速开入法国,协约国的将领们决定增兵萨洛尼卡。此次增兵成效显著。在法国将军弗朗彻·德斯佩雷(Franchet d'Esperey,1856—1942)的指挥下,马其顿战线的协约国军队最先彻底击败了敌人。进入9月份以后,法国、英国、塞尔维亚及希

腊军队，沿亚德里亚至保加利亚边境一线全面推进，并迫使保加利亚于 9 月 30 日签署了停战协定。到 11 月初，协约国军队在多处突破了多瑙河。随着 11 月 11 日西线停战的实现，高举三色旗及其他旗帜的法国等协约国军队，一路高歌直指维也纳。

(5)近东和殖民地地区　这场扩及近东、非洲、远东以及各大洋的世界大战，充分显现了非大陆事务的重要性。近东地区的战争更直接激发了延续至今的民族主义。经德国专家训练和指挥的土耳其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抵抗。1916 年 4 月，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现伊拉克)的库特(Kut)地区迫使英军投降，并挺进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谷(Tigris-Euphrates Valley)。但英军于第二年挥师北上攻陷了巴格达，彻底瓦解了土耳其人对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

1894 年，亚美尼亚人的起义被残酷镇压，英国和法国因此向土耳其施压要求实施改革。但改革没有得到推行，亚美尼亚人的起义仍不断发生，1895 至 1897 年间 8000 亚美尼亚人因此而丧生。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一直在等待时机，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们看到了新的机会。当俄国人在凡湖(Lake Van)地区发起攻击时，附近的亚美尼亚人率先攻下了土耳其要塞并交给了俄国人。土耳其政府据此宣称各地的亚美尼亚人都在协助俄国人，因此下令所有的非穆斯林撤离交战地区及交通要道。成千上万受驱赶的亚美尼亚人惨死于炎热的大沙漠，大批男人遭屠杀，女人遭强奸，幸存者被迫皈依伊斯兰教。战争结束时，亚美尼亚人的数量大幅减少，战争中丧生的亚美尼亚人约达 100 万。

英国统治的其他阿拉伯地区也对土耳其人抱有敌意。具有传奇色彩的陆军上校 T. E. 劳伦斯(T. E. Lawrence, 1888—1935)非常了解阿拉伯人，在他的协调下，埃德蒙·艾伦比爵士

(Sir Edmund Allenby, 1861—1936)(将军)率领阿拉伯起义者从埃及出发进行远征。截止到1917年底,英国已经占领了耶路撒冷。1918年9月,英国在叙利亚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英国人取得了重大胜利,并迫使土耳其于10月30日签署停战协定。

这些战役不仅催生了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而且也孕育了犹太人的民族国家以色列。1917年11月,英国发表以外交大臣及前首相亚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命名的《贝尔福宣言》,承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这实际是1922年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的结果,英国将依据授权对拟建中的犹太人家园提供保护。

在英国海军的阻截下,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大多与本土失去了联系,但这里的德军仍能有序运作。在东非地区,他们成功地顶住了一系列进攻,并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日到来时仍保有相当的兵力,其指挥官直到11月23日才最终投降。但德军在其他殖民地的战绩并不理想。由于缺少足够的基地和兵力,到1914年底为止,德国的其他海外殖民地均被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法国及日本等协约国军队占领。

3. 协约国的胜利

(1)海战 从长远来看,英国的海军力量及美国的补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协约国对海洋的控制,为其调用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提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协约国得以借此将大量的英美军队调往西线的关键战区,并切断了德国及其盟国利用外海殖民地资源的通道。协约国的封锁使德国日益面临巨大的压力,军队给养及民众的食品供应都受到了严重的制约。战争结

束时，很多德国人营养不良，老人和儿童的死亡率急速攀升，这也是促使德国投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正是海上航行自由原则将美国拖入了战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德国在海战中的失败是双重的。它背弃了传统的战争封锁原则，即袭击前要进行堵截与搜查，并要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美国人坚持海上航行自由原则，但如果潜艇不改变水下偷袭的战略，这一原则显然将难以得到遵守。

显而易见，通过无限制潜艇战，德国猛烈袭击了英国所赖以生存的商船队。截止到 1917 年底，沉船总吨数高达约 800 万吨，其中大部分是潜艇所为。随着护卫舰、深水炸弹、反潜巡逻艇以及快捷的驱潜艇与驱逐舰的大量应用，极具杀伤力的潜艇才受到了明显的压制。

德国于 19 世纪 90 年代营建的水面舰队，始终未能在战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德国的水面舰队曾使英国海军遭到重创，但英国巡洋舰于 1915 年 1 月在多格海域(Dogger)击败了德军，迫使德国海军在随后的十余个月中局限于布雷及潜艇战等有限的行动。1916 年，德国新任指挥官决定强化其远洋舰队的进攻力度。驱逐舰队展开了一系列进攻行动，巡洋舰则对英国海岸发起攻击。同年 5 月，德国人企图围攻停在海港的部分英国主力舰队，提前接到警报的英国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John Jellicoe)及时率队迎击德军。1916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双方在北海的日德兰(Jutland)展开运动战，英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最终迫使德军仓皇逃回港口。从此以后，德国的水面舰队再也没有力量威胁英国对欧洲水域的控制权。

(2)新武器 空战首次出现于这场世界性战争。1916 与 1917 年，德国飞艇(齐柏林飞艇)对伦敦进行了多次袭击，双方

都使用飞机轰炸邻近的城市。但空袭的总体破坏程度相对较轻,并未对最终的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但飞机在侦察方面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战斗机在这场战争中也得到了显著的改进,为现代空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尽管飞机的发明没有改变传统的作战方式,但堑壕战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在西线体现得尤为突出。机关枪、连发枪及速射炮在侦察飞机的引导下,能够以强大的火力对攻击方实施致命的打击,结果双方都难以对对方的堑壕系统实现大范围的突破。由于新技术与堑壕战的应用,双方都遭受了以往不可比拟的巨大损失。

两种新式武器的应用几乎打破了双方间的僵持局面。其一是毒气,德国人于 1914 年 10 月首次在炮弹中使用,但效果并不理想。1915 年 4 月,德国人使用罐装氯气打击敌人,法军四处逃散,致使 5 英里宽的战线失去了防御。但德国人并未及时跟进,毒气散尽以后,法国人重新控制了阵地。军事技术人员发明了防毒面罩,这种简易的防御工具很快就成为双方士兵不可或缺的装备。

第二种新式武器几近成功的应用对战局产生了更为明显的影响,这便是英国人发明的坦克。早期的坦克模型在装船运输时上面覆盖着篷布,好奇者获悉是盖着的水箱,坦克由此而得名。这一新武器的应用太显仓促。1916 年,英国未经充分的试验就将数量有限的坦克用于索姆河战役。1917 年底,经过实质性改进的坦克再度应用于康布雷(Cambrai)战役,300 辆坦克冲破了德军的防线。由于未能迅速跟进,获得喘息的德国人击退了英军。然而,此次战役却清楚地表明,运用得当坦克将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3)美国的参战 交战双方都知道,如果战争再持续一年,拥有充沛武装力量及巨大工业潜力的美国无疑将会参战。然而,在美军到达战区之前,轴心国却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法军处于崩溃的边缘,战争的重担从1917年开始就日益落在了英国的肩上。协约国曾于1917年春季倾全力在西线进行了一次"大推进"。阿拉斯(Arras)的英军与维米岭(Vimy Ridge)的加拿大人均取得了胜利,但法军在崎岖不平的埃纳(Aisne)地区并未取得将领们所预期的胜利,精疲力竭的法军甚至发生了哗变。为了牵制德军,道格拉斯·海格(Douglas Haig,1861—1928)将军指挥英军,在泥泞的战场上连续发起了9次进攻。但在7月31日至11月15日的第三次伊普尔战役(Battle of Ypres)中,除了加拿大夺取了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之外,英军只向前推进了9000码,却付出了伤亡约50万的巨大代价。随着伤亡率的急剧上升,军队士气日益低落,才能不济的英军领导层面临进一步的压力。为了统一协约国的战略,11月底组建了最高战争委员会(Supreme War Council),但这一举措仍未能改变协约国的混乱与分裂局势。

1918年初,德国决定在美国军队大规模到来之前,倾全力向西线的协约国军队发起攻击。德国部分东线部队此时已经到达西线,鲁登道夫将军决定通过密集的炮火攻击突破敌人的防线。德军首先通过长时间的炮击在敌人的防线上撕开一个缺口,为先头部队开辟无人区,并将敌人压回到后方的堑壕。最初的炮击包括毒气弹,主要目标在于打掉敌人的观测哨位及炮兵阵地。接下来便开始推进式炮火攻击,以每小时一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步兵团则紧随其后。这一战术曾在浓雾的环境下运用于索姆河战役,德国人曾借此突破了英国长达41英里的战

线,俘获 8 万人,20 万英军伤亡,而且使德军逼近了交通枢纽亚眠(Amiens)。正是在这场危机期间,曾受命协调协约国军队的福煦将军出任了联军总司令。

战局逐渐发生了逆转。德军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又缺乏后备军。英法军队在利斯河(Lys River)的一次进攻后顶住了压力,鲁登道夫秘密将部队压向马恩河一线,并突破至距巴黎仅 40 英里的区域。6 月 1 日至 4 日,提埃里堡(Chateau-Thierry)的美国和法国军队实施了顽强的抵抗,并最终守住了马恩河南岸的战线。鲁登道夫于 7 月再次向马恩河沿线发起了攻击,但德军此时伤亡已高达 80 万人,最终在美、英、法联军的巨大压力下大幅后退。8 月 8 日,英军使用 450 辆坦克发动突袭,突破了德军在亚眠附近的防线,德军因此陷入了混乱的状态。9 月 26 日至 11 月 11 日,英法联军与美法联军同时从西、南两个方向发起攻击,处于半包围境地的德军被压制于阿贡森林(Argonne forest)与默兹河(River Meuse)沿线的钳形地区。德军虽然实施了有序的撤退,但士气低落,供应短缺。为了避免协约国军队入侵德国本土,鲁登道夫于 9 月 29 日呼吁政府请求停战。德国总理于次日辞职,新任总理直接向威尔逊总统呼吁以其十四点纲领为基础召开和会。协约国倾向于拒绝接受德国的和谈条件,但威尔逊暗示美国人有可能单独与德国缔结和约。10 月 27 日,濒临崩溃的奥匈帝国也请求停战。11 月 3 日德国驻基尔港(Kiel)的舰队以及西北部的大批部队发生哗变,11 月 7 日巴伐利亚(Bavaria)爆发革命,战争最终被迫终止。鲁登道夫遭解职,威廉二世于 11 月 9 日退位并逃往荷兰。11 月 8 日谈判正式开始,11 月 11 日上午 5 时交战各国缔结了停战协定,西线最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文献记载

堑壕战

堑壕里的战争沉闷无比，只是不时被瞬间的激烈行动所打断。一位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卡林顿(Charles Carrington，1897—1981)，当时曾是索姆河上的一位年轻人，在战争结束很久以后写下了他的亲身经历：

一场战斗过后，我们埋葬了战友，并用写有名字的木十字架给他们的坟墓作上标记。如果有时间且不太危险的话，也会尽力埋葬其他的英国死难者。敌人最后提前来了，我不止一次清理战壕里的尸体，将其扔到挡墙外，希冀有人或许会在战斗结束后将其埋葬。1916 年 11 月，我在康托美森(Contalmaison)总能看到大批在各处清理尸体的人群。但推进到新的战线后情况往往有所不同，因为掩埋尸体要冒更大的危险。随着部队缓慢地向前推进，身后留下大片人们无需也不愿涉足的荒漠。这里的冬天沉闷得无以形容，只有以尸体为食的硕鼠穿行其间。夏天则被美丽无比的野花从覆盖，因挖掘或炮弹炸松的白垩质土壤蔓延着鲜红的罂粟花丛，并不时伴有云雀的鸣唱。然而，很久以后人们仍可在偏僻的荒野中发现尸体。

死伤者大多是在进出堑壕时被骚扰性炮火击中的。白天绝不敢露头，进入夜晚之后，白天已瞄准的机枪会扫射每一条你有可能通行的道路。不时遭到炮弹轰击的巴波姆路(Bapaume Road)，是废墟中通往村庄的必由之路。如果你能有幸到达防空洞，就能够蜷缩在里面，但如果第二天能活着走出来，就得再次与巴波姆路的交叉火力赛跑。防空洞狭小无比，根本没有办法

挪动身躯,里面没有热食,也没有机会弄到加热的食物。更为糟糕的是,你要忍受冬季持续不断的寒雨以及接近零度的低温的折磨。如果温度再低一点,里面的泥泞也许会更易于处理,生命已变得麻木不仁,因为你什么都不能做。不时会出现战斗间歇期,因为战士们无力一场接一场地打下去;战壕也难以得到加固,因为任何努力都会被炮火瞬间摧毁。

三、后方战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与海员,绝大部分为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平民。处于后方的家庭因配给制及军事化管制的约束,也成为这场"全面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17 年"大推进"失败以后,民众及军队的强烈不满虽然一度瓦解了法国的士气,但民众依然是战争的一大支撑。在德国,巨大的精神与物质压力达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停战一定意义上是民众心理防线崩溃的结果。

德国在组织全面战争方面行动相对滞后,并且缺乏较为均衡的食品供应与分配制度。随着 1918 年的逝去,城市人口开始遭受严重的营养不良。德国战前高效的工业生产曾激发了人们极高的预期,但战时的金融与生产体系却远不如战前富有效率。

所有卷入战争的国家,或迟或早都将被迫实施严格的战时

经济。英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王国国防法》(*Defense of the Realm Acts*),严格限制了人们的言论与自由行动权利。1915 年 5 月,英国这一自由民主国家通过了第一个《战时军需法》(*Munitions of War Acts*),政府不仅控制了战争所需的一切工厂及原料,而且这些工业中的管理、劳务及利润分配也要受政府的管治。从 1915 年开始,许多商人及学者成为"应征人士"(men of push and go),临时进入政府部门帮助处理急剧增加政务。1917 年美国参战之后,也采取类似的方法征召所谓的"无薪人员"(dollar-a-year men)。与他们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同行一样,这些来自商界和大学的外来人,帮助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央集权政府,对经济实施了以往从未有过的严格规制。当然,所有的交战国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战,亦即人们后来所称的心理战。

协约国在军需生产方面赢得了胜利,而美国人在其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最终的结果表明,民主国家的政府控制(仿照 1915 年建立的英国军需部)较独裁国家更为有效。协约国的军需生产起步较慢,并屡经失误、瓶颈制约以及草率试验等困扰。在战争初期,协约国在生产及军事战略目标方面都存在矛盾,但最终却充分挖掘出了较同盟国更具优势的物质资源潜力。

协约国也赢得了宣传战的胜利。他们极力说服中立世界,特别是美国、拉丁美洲、瑞士、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及西班牙,促使其相信协约国而非轴心国在为正义而战。西方的多数中立国很早就确信协约国具有正义性,或至少认为协约国将最终获胜。中立国持有的这一信念,因公众更倾向于认同英法的自由主义传统而非德奥的独裁政治得以进一步强化。

协约国更多着力于散布大量夸大其词的信息,尤其大肆渲

染了"德国佬"(Hun)在比利时的可怕暴行。尽管比利时的德国占领军不乏野蛮,但由国家支持的协约国宣传机器,显然夸大了德军在比利时的恶劣行径。少量的证据往往辅以大量言过其实的说明,结果给公众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协约国的宣传同时也强调,是德国首先发动了战争,并且入侵了自己通过正式条约承认的中立小国,奥匈帝国同样也侵略了另一小国塞尔维亚。上述宣传掩盖了战争爆发过程中各国隐藏于事实背后的野心,但这些不可否认的军事意义上的事实,却在1919年和平条约缔结过程中,成为世界谴责轴心国的重要依据。

在俄国,四年的战争并未使其政治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轴心国虽然仍保留着没有多少实权的议会制政府,但议会总体上处于屈从性地位。法国、英国及美国尽管在战时加强了政府控制,但民主制度仍得以坚持。在英国,大卫·劳合·乔治于1915年12月接替善于运作但优柔寡断的自由党领导人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 1852—1928)上台执政,并明显促进了英国军需生产的发展。1917年底,在友国和敌国中同样享有猛虎美名的克里孟梭(Clemenceau)掌握了政权。此时正值失败主义严重威胁法国的关键时刻,克里孟梭坚决强化战争举措,果断地遣散了持有不同政见的政客。

战争给后方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英法整整一代年轻人被消灭,他们都是潜在的经济与政治精英。在英法及美国,妇女受雇于工厂、公交及政府基层部门,并在紧邻前线的军队医院从事护理工作。战争结束以后,大量的复员军人失业,许多战时学到了技术的女性也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很多人转向了社会主义。

两性道德规范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男人们认为很可能难以

从前线生还，因此抛弃了传统的渐进求爱方式，而且军人可以不受谴责地违背传统的婚约，但妇女们则必须忠诚于远离她们的丈夫。战争虽然加剧了两性道德规范中的双重标准，但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随着家庭、教堂及学校固有的道德权威面临广泛的挑战，性乱及"社会性疾病"变得更为盛行。

四、和平协议

交战国在凡尔赛及巴黎周边的其他城堡会晤解决与德国及其他轴心国的问题。和会从不曾在一个真正和平的环境下召开，因为和会经常伴有后续的局部战争、危机与骚乱等。这些问题在 1918 至 1919 年的巴黎和会期间非常严重，并明显制约了和会的有序运行。与此同时，1918 至 1919 年爆发了自黑死病之后最具毁灭性的传染性疾病，2000 万人因此而丧生，世界各地的社会生活及生产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1. 战后的不稳定性

俄国的危机引发了极度的不安。德国人被赶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地区之后，协约国立刻向黑海、白海及太平洋等俄国周边的多个战略要点派出了特遣部队。协约国对布尔什维克的最终胜利及其向西方的扩散充满了恐惧，并且凡尔赛和会的气氛也因此而变得十分紧张。

布尔什维克主义很显然在向西方扩散。社会主义者支持了 1918 年 11 月的德国革命，共产主义暴动和起义贯穿了 1918 至 1919 年的整个冬天，4 月巴伐利亚宣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德

国新共和政府虽然镇压了这些共产主义运动,但却给未来留下了不祥的阴影,因为新政府不得不求助于那些残留的旧军队以及极度仇恨共和的旧军官。奥匈帝国于1918年秋季崩溃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继承国,都陷入了严重的社会与经济动荡之中。在匈牙利,曾在莫斯科与列宁一起工作过的贝拉·库恩(约1886年至约1940年),借助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联盟建立了布尔什维克专制政权,库恩最终于1919年8月在罗马尼亚军队追击下外逃。与此同时,由充满怨恨的退役军官及无法适应平民生活的复原士兵组成的“自由军团”(Freikorps,后有大学生参加),极力要求恢复君主制并袭击共产主义者。两位著名的理论家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与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19),在押往监狱的途中被士兵杀害。前者建立了发起1919年起义的“斯巴达克同盟党”(Sparticist Party),后者协助建立了德国共产党。

协约国在近东面临更为严峻的不稳定局势。希腊的民族主义者重新唤起了恢复拜占庭帝国的希望,并发起了反对土耳其的武装斗争。1919年春,希腊军队在小亚细亚的士麦那(Smyrna)登陆。授权控制前土耳其帝国各部分的法国和英国,从一开始便与阿拉伯的领导者发生了纠纷。与此同时,犹太人迫切要求根据贝尔福宣言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而这一要求却遭到了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

在印度,随着流行性疾病横扫次大陆,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体现得尤为充分。加盟协约国的印度职业军人在战争中表现突出,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认为实现进一步自治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1919年4月的阿姆利则(Amritsar)大屠杀,则将严重的混

乱局势推向了极致，其间英国将军命令士兵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火，导致大约 1600 人伤亡。

中国的局势更加不稳定。1911 年至 1912 年革命，结束了满族王朝的统治并建立了一个极不稳定的共和国。中国人的内部分歧及俄国的衰落重新激发了日本侵占华北的野心。与此同时，美军对俄国北部的阿尔汉格尔（Archangel）与摩尔曼斯克（Murmansk）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港的占领，显然将影响未来的美苏关系。

当协约国聚集一处缔结和约时，世界正处于混乱之中。和平缔造者面临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复杂的并且往往是难以解决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似乎都难以找到令各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然而，与以往相比，世界对和会抱有的期望更大。在很多人看来，这场战争将“使世界变得更加民主与安全”，是一场终止战争的战争。

这些希望主要体现于伍德罗·威尔逊 1918 年的十四点纲领，其核心主张是通过保障海上自由及创立国际联盟来实现战后的和平。十四点纲领的主旨在于为战后谈判提供参考基础，威尔逊及其幕僚因此曾对其中的细节进行过深刻的推敲，以期适用于彻底的胜利、僵持局面甚至战败等不同的结局。然而，十四点纲领最终却成为和会必须严格遵循的条件，具体内容包括：

1. 签订公开和约，杜绝秘密外交。
2. 确保海上航行的绝对自由。
3. 消除一切贸易壁垒，建立国家间平等贸易的环境。
4. 各国必须保证裁减军备。
5. 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并兼顾殖民地居民的利益

要求。

6. 外国军队必须撤出俄国。

7. 恢复比利时的主权。

8. 外国军队撤出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

9. 根据民族分布情况调整意大利疆界。

10. 允许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自治。

11. 外国军队撤离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给予塞尔维亚出海口。

12. 保障土耳其的主权地位,但应给予土耳其治下的其他民族自治的机会,达达尼尔海峡开放为自由通行航道。

13. 重建独立并拥有出海口的波兰国家。

14. 建立旨在保障大小国主权地位的国家联盟。

十四点纲领并没有体现其他与此相抵触的希望与承诺,主要有三大类:协约国先前做出的外交承诺;民众因宣传战以及战争结束时部分协约国领导承诺而激发的希望;各国受习惯和传统影响而确立的支配性政策与发展趋势。

在第一类外交承诺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包括俄国在内的前协约国,承诺给予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的哈布斯堡领土。第二类包括英国和法国人深信不疑的承诺,即德国必须赔偿战争的全部费用,惩罚战犯,接受肢解使其永远丧失侵略能力。第三类中包含有各国进行战争的实际驱动力,即法国希望报复德国,获取欧洲霸权及实现安全;英国希望重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安逸及经济主导权,消除德国激烈的商业竞争以及中欧的民族主义期盼建立新国家。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人希望尽快远离欧洲的盟友并摆脱相关的纠缠。

和会虽然在德国的战争罪行问题上形成了明确的定论，但这一问题在后来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复活的德国民族主义不仅否认战争罪行，而且也反对最终的处理办法。历史学家围绕战争的罪责、战争的主要责任、战争因果链条的实质等展开了广泛的争论，但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德国学者坚持德国不应承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战争的罪责问题显然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在点燃战火的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然而，两个弱小而欠发达的国家不可能将整个世界拖入战争，参战国特定的领导者作出的决定显然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尽管如此，当人们问及究竟是哪个国家最终打破了欧洲的现状并引发了战争时，德国显然是问题的最佳答案。

2. 和平与领土协定(1918—1923)

首次和会于 1919 年 1 月 18 日正式召开，近 30 个参与反对轴心国战争的国家派代表与会。俄国没有派代表出席和会，和会也刻意没有邀请战败国代表与会，德国人更缺少对相关条款进行评论和批评的机会，而协约国对其新共和国的不公平对待引发了德国人强烈的不满，并最终在希特勒的崛起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会议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似乎能够保障和平，人们因此相信，拟议中的国际联盟以及与此协同运作的议会，将最终消除各国昂贵而沉重的军备负担。然而，会议并没有打破常规，小国仍无权参与实际的谈判，会议主要在战胜国的四巨头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孟梭及意大利总理维托里

奥·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1860—1952)间秘密进行。决议仅仅是对公众舆论间接咨询的基础上形成,并且以前和会中常见的压力、密谋、妥协及讨价还价等在凡尔赛和会中均有充分的体现。

小国的职业外交家们从不曾奢望得到平等的对待,但将他们完全拒之门外却招致了强烈的不满,同时也激怒了小国的民众。更为重要的是,大国都有大批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历史学家及其他各领域的专家与会,他们非常自信地认为能做实事,并能做出真正的决议。这些专家草拟了一份又一份报告,但他们无权制定政策。这些专家中有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他代表英国财政部出席凡尔赛和会,但最终却愤然辞职,并写下了极富批判性与影响力的论著——《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凯恩斯将成为20世纪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其著作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他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批驳了凡尔赛和会的谈判者,尤其批判了威尔逊和劳合·乔治。凯恩斯有力地论证了条约的不可行性与非道德性,并认为凡尔赛和约将最终导致整个欧洲经济的瓦解。此后,在那些曾与德国为敌但并未遭受其入侵的英语国家中,兴起了修改《凡尔赛和约》的"修正主义"运动,极力要求减少和约中严酷的惩罚性规定。凯恩斯的思想在英、法、美三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为他所预见的大萧条提出了应对策略。凯恩斯认为政府在面临通胀时压缩支出的一贯政策是错误的,政府应通过扩大支出将经济拉出萧条的困境。凯恩斯的观点为政府扩大财政赤字铺平了道路,据此形成的财政政策在取得短期收益的

同时，也引发了部分长期性的问题。

在多方的游说下，威尔逊及其专家组逐渐倾向于制定苛刻的和平条款，德国的赔款数额随之得以进一步增加。波兰、意大利和日本提出的一系列领土要求，因这些地区强烈的民族自决要求难以得到满足。威尔逊虽然在诸多问题上作出了妥协，但反对意大利拥有阜姆(Fiume)，因为阜姆地区虽然讲意大利语，但在历史上与威尼斯的联系更为密切。其他大国本来倾向于满足意大利对的里雅斯特及特兰提诺(Trentino)的要求，可意大利代表却愤然退出了会议，而这依然没有促使威尔逊改变立场。

《凡尔赛和约》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国际联盟。国联是依据战胜国及部分中立国的提议建立的永久性协商机制，并非是一个超国家权力体。国联没有阻塞德国与俄国加入的大门，而且两国不久就加入了国联。联盟设有每个成员国都拥有一个投票权的大会，以及由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五大国组成的常任理事会。理事会还包括由大会选出并有具体任期的其他四个非常任理事国，联盟的具体事务由设在日内瓦的常设性秘书处负责。国联从不曾满足人们对其抱有的热切期望，它不仅在裁军领域毫无建树，甚至也未能阻止侵略。大国仍一如既往自行其是，政策制定者们只有在对其有利的情况下才诉诸国联。

领土变更引发的诸多问题成为巴黎和会关注的主要事务。和平缔造者不仅要面对战胜国的领土要求，而且需要应对众多新兴国家提出的各种问题。面对这些新生于奥地利、俄国、土耳其帝国的独立国家，和平的缔造者不得不满足大国对领土的渴求，但同时又不能明显地侵犯“民族自决”原则。“民族自决”原则在中欧地区的实施难度尤为突出，该地区拥有不同语言和国家意识的众多民族混杂一处，其结果只能是主权国家的极度繁殖。

法国重新夺回了普法战争中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萨尔盆地实现了与德国的暂时分离,并作为独立的国际行政区由国联监管 15 年。在此期间,该地区出产的煤炭将运往法国,期满之后将通过全民公决决定其最终的政治归属。莱茵地区仍属于德意志共和国,但该地区将实现非军事化,并暂时交由协约国军队控制。部分德国与比利时交界地带的小城镇将划归比利时。丹麦依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进行了全民公决,最终夺回了丹麦国王于 1864 年割让给普鲁士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北部地区。1795 年从地图上消失的波兰将重获主权地位,并恢复波兰 18 世纪被瓜分前的领土,其境内将包括大量德意志及其他少数民族。

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被彻底肢解。1916 年登上哈布斯堡王位的查尔斯一世(Charles I, 1887—1922)试图代表帝国媾和,但其治下的王朝却如同春日河流中的冰层一样迅速破碎:1918 年 10 月 15 日,波兰宣布独立;10 月 19 日,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及萨格勒布的斯洛文尼亚人宣布建立拥有独立主权地位的南方斯拉夫政府;11 月 1 日,查尔斯承认了匈牙利的独立。这样,奥匈虽然于 11 月 3 日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此时的帝国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原帝国的德语核心区域建立了禁止并入德国的奥地利共和国,马扎尔语中心地区建立了幅员较小的匈牙利王国,捷克人居有的波希米亚(Bohemia)和摩拉维亚(Moravia)并入斯洛伐克,同时合并东部邻近喀尔巴阡—乌克兰边境的卢西尼亚(Ruthenian)组成捷克斯洛伐克“继承国”。

另一个继承国是由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及斯洛文尼亚人组成的南斯拉夫王国,其领土为战前的塞尔维亚及哈布斯堡南方斯拉夫的疆土。罗马尼亚获得了前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

省及布尔什维克人难以防守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俄国省份。希腊不顾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利益要求得到了色雷斯(Thrace)。威尔逊反对南斯拉夫、意大利及希腊瓜分阿尔巴尼亚的图谋,从而挽救了这个濒临瓦解的小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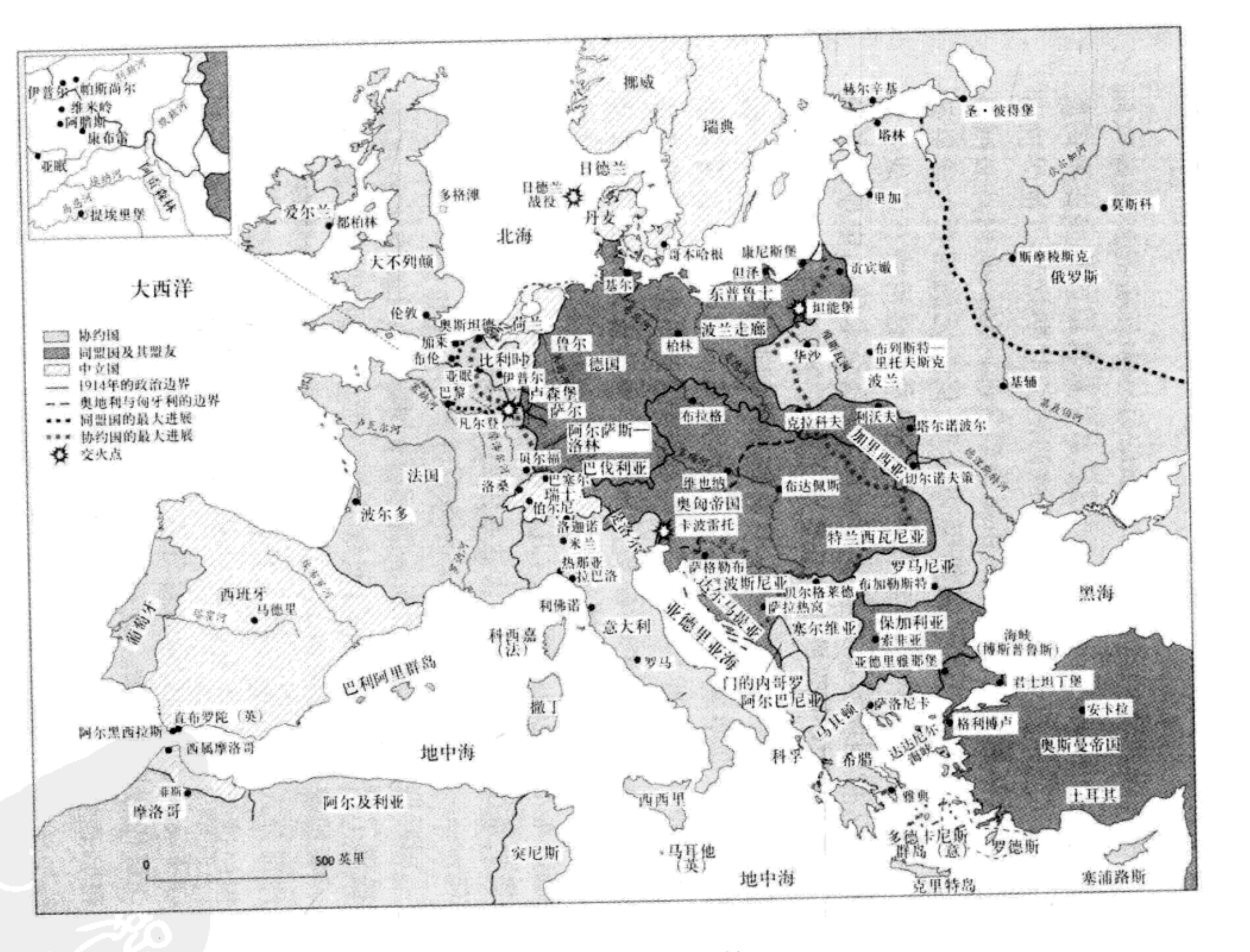
战争结束后,在德国人控制的前俄罗斯帝国的(除波兰之外)领土上,成立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东普鲁士(East Prussia)和西里西亚(Silesia)的部分地区,届时将通过全民公决决定划归波兰还是德国。新建立的波兰取得了沿"波兰走廊"的波罗的海出海口。狭窄的"波兰走廊"历史上曾属于波兰,后来成为德国领土,其终点是德国的港口城市但泽(Danzig)。波兰人要求得到但泽,但协约国只作出了部分妥协,宣布但泽为自由市,允许波兰人在此进行自由贸易。"波兰走廊"于是将东普鲁士与德国的其余领土分割为两部分,德国人只能在封闭的火车中穿行其间。

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近东的问题尤为严峻。根据1920年10月的《色佛尔条约》(*Treaty of Sèvres*),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的小块区域,在亚洲地区只保有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由英国委任统治,叙利亚与黎巴嫩则由法国委任统治。希腊将对士麦那及邻近的小亚细亚进行5年的控制,期满后由混居此地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通过全民公决决定最终的归属。尽管土耳其苏丹签订了《色佛尔条约》,但条约并未付诸实施。以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为首的军官,在安纳托利亚发起了反对君士坦丁堡政府的起义,土耳其的民族主义随之复兴。在1921—1922年的希土战争中,土耳其人将希腊人赶入了大海,并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建立了以安卡拉(Ankara)为首都的共和国。1923年,协

约国被迫与土耳其新政府缔结《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曾划归希腊的伊兹密尔(Izmir:土耳其称之为士麦那)和东色雷斯重归土耳其,土耳其因此获得了较《色佛尔条约》更为有利的条件。

《洛桑条约》中包含有一个非常极端的创新,即波及200万人的人口大迁徙。土耳其境内除伊斯坦布尔(前君士坦丁堡)外的所有希腊人都迁回了希腊,而希腊除西色雷斯外的土耳其人都迁回了土耳其。条约规定,两国政府都有义务妥善安置各自的移民。人口大迁徙虽然导致了诸多的困难,但这一计划总体上运行良好。然而,在英国控制的东地中海岛屿塞浦路斯,并没有实施类似的人口互换计划。这里的希腊人约为土耳其人的4倍,而且希土两族在城市和乡村完全混居在一起,因此难以实施人口互换方案。《洛桑条约》也没有采取措施,满足东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库尔德人及基督教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要求,其中很多人现在分散在安纳托利亚的东北部至叙利亚北部的广大区域。

在委任托管制下,国际联盟授权大国对被征服领土实施控制,国联将监督受权国履行委任统治的相关条款。委任统治的主旨在于为殖民地人民最终独立准备条件,德国的前海外殖民地及奥斯曼土耳其本土以外的领土因此被战胜国分割。在德国的非洲领地中,东非被划给了英国,西南非洲划归英国的自治领地南非联邦,喀麦隆和多哥兰被英法瓜分。在太平洋地区,新几内亚岛的德国部分划给了澳大利亚,西萨摩亚群岛划给了新西兰,加罗林、马绍尔及马里亚纳群岛划给了日本。在近东地区,法国获得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取得了对巴勒斯坦、外约旦及伊拉克(阿拉伯人所称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领土变更完成之后，和会面临的另一大任务是解决赔款问题，其中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土耳其及德国将是主要的赔付国。显而易见，正是德国的赔款问题长时期扰乱了世界的和平与经济发展。德国被迫承诺赔偿战争期间对民众财产造成的一切损失，并在 1921 年前每年支付 50 亿美元的赔款。战胜国确定最终的赔款数额以后，德国应在 30 年内偿清所有的战争赔款。由于协约国内部存在分歧，凡尔赛和会未能确定最终的赔款数额，但拟议中的最终赔款数额无疑是个天文性数字。

凡尔赛和约同时强迫德国将其大量的商船移交协约国，并在十年期限内向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运送大量的煤炭。西部边境至莱茵河东岸 50 公里的地区彻底实现“非军事化”，即撤除所有的防御工事及德国驻军，协约国在 15 年或更长的时期内维持对莱茵河左岸的军事占领。禁止德国拥有潜艇和战斗机，并严格限制海军水面舰船的规模。《凡尔赛和约》第 231 条为特别的“战争罪责条款”，强迫德国承认轴心国对 1914 年战争的爆发负完全责任。

国际联盟的建立，为新一代国际问题专家调解传统敌对状态提供了潜在的条件。赔款数额能够而且的确有了相应的削减。新国家的大批涌现，实际是民族自决意识长期发展的结果。虽然部分人会对“欧洲的巴尔干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但却无法拒绝捷克人、波兰人、波罗的海民族以及南斯拉夫人的民族独立诉求。对于德国的处置尽管不乏苛刻，但并没有像 18 世纪的波兰那样被彻底肢解。新的德国共和国仍然保留着大部分的领土和旧君主国的人口，并拥有再次成为欧陆强国的潜能。由于条约中的部分内容过于苛刻或落实不当，凡尔赛和约与以往诸多条约一样，最终实现的仅仅是一种妥协式和平。

然而，条约中包含有过多需要美国人民作出妥协的内容，而此时的美国人还不习惯于签署国际性条约。美国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是多种力量作用的结果。国内政治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共和党人通过 1918 年 11 月的选举控制了国会。作为民主党人，威尔逊基本没有考虑共和党人的要求，既没有带着共和党人参加巴黎和会，也没有接受或许能满足共和党人要求的修约方案。参议院惧怕国联将美国拖入未来的战争。威尔逊虽然宣称国联盟约的 X 条款已使门罗主义转变为世界主义，因为所有联盟成员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将因此而得到保障，但反对者认为美国一旦在盟约上签字，国联将有可能干涉美国的关税及移民法。参议院最终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与德国的战争状态因此直到 1921 年 7 月 2 日的国会决议通过后才得以终结。美国据此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另行签订了条约，并最终得到了《凡尔赛和约》给予的一切权利。

即使是一个比威尔逊更加圆滑与老道的总统，也难以推动国会批准一个由英、法、美组成的防御性联盟条约。没有美国的参加，英国拒绝与法国组建双边联盟应对德国的袭击。仍在寻求加强自身安全的法国，不得已与德国东部和南部的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及罗马尼亚等，拼凑了一系列并不理想的联盟，以弥补英美拒绝加盟造成的缺失。

和平实现以后，法国对欧洲的主宰极不稳固。法国需要继续裁减德国军备，需要继续削弱德国的经济实力，需要继续孤立俄国，需要得到新联盟缺乏保障的支持，以此维护对欧洲大陆的主导权。另一方面，战争使法国在人力和物力方面均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德国事实上仍然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这场大战虽然遏制了德国主宰欧洲大陆的能力，但并未完全瓦解德国

的这一潜能。

凡尔赛和约没有直接触及的另一重大问题是俄国,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很大程度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后果是促成了这一新国家的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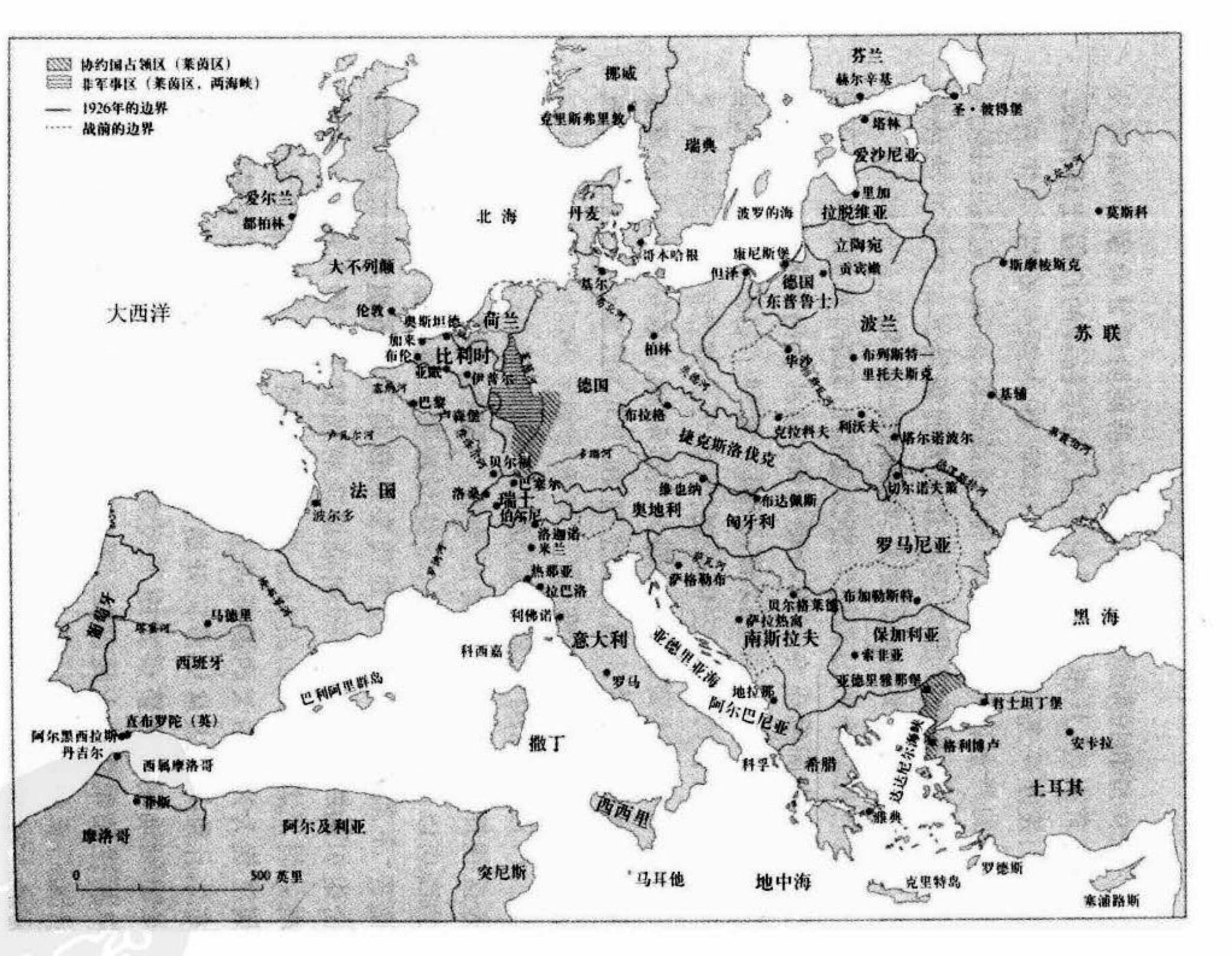
五、1917 年的俄国革命

1914 年的俄国虽然因国内危机深受震动,但仍以强烈的爱国主义迎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杜马支持战争,左翼政党虽然在战争贷款问题上投了弃权票,但却主动为国家防御献策献力。然而,正是这场战争及当局对危机的失当处理促成了革命的爆发。

1. 革命的直接条件(1914—1917)

由于地缘方面的阻隔,俄国难以从协约国获得应有的军需供应。俄国虽然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及巨大的工业潜力,但战争初起时的运输体系并不完善。火车被迫用来调动军队,可城市却因此面临食物短缺的困扰。战场上的损失一开始就十分惊人,俄国在战争的第一年就付出了近 400 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

截止到 1915 年年中,杜马中称之为进步集团的中间派和左派,极力主张进行适度改革,如终止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及加强地方自治委员会的权力等。1915 年秋,进步集团要求建立一个对杜马而不是对沙皇负责的内阁。作为回应,尼古拉二世解散了杜马并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国家政权由圣·彼得堡的皇后执掌,但具体事务却由其宠臣拉斯普京处理。


协约国占领区（莱茵区）
非军事区（莱茵区，两海峡）
1926年的边界
战前的边界
芬兰
赫尔辛基
圣·彼得堡
挪威
克里斯蒂安尼亚
塔林
瑞典
爱沙尼亚
里加
拉脱维亚
爱尔兰
都柏林
北海
丹麦
波罗的海
莫斯科
立陶宛
哥本哈根
康尼斯堡
考纳斯
大不列颠
斯摩棱斯克
但泽
德国
（东普鲁士）
基尔
大西洋
伦敦
奥斯坦德
荷兰
波兰
苏联
加莱
柏林
布伦
比利时
华沙
布列斯特—
里托夫斯克
亚眠
巴黎
德国
基辅
布拉格
克拉科夫
利沃夫
捷克斯洛伐克
塔尔诺波尔
贝尔福
切尔诺夫策
法国
洛桑
巴塞尔
维也纳
布达佩斯
瑞士
伯尔尼
奥地利
匈牙利
波尔多
洛迦诺
米兰
罗马尼亚
萨格勒布
热那亚
拉巴洛
布加勒斯特
贝尔格莱德
马德里
利佛诺
萨拉热窝
黑海
葡萄牙
西班牙
科西嘉
意大利
南斯拉夫
保加利亚
索非亚
亚德里亚海
亚德里亚那堡
罗马
巴利阿里群岛
地拉那
君士坦丁堡
直布罗陀（英）
阿尔巴尼亚
阿尔黑西拉斯
格利博卢
安卡拉
丹吉尔
撒丁
达达尼尔海峡
西属摩洛哥
科孚
希腊
土耳其
非斯
西西里
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
雅典
突尼斯
0
500英里
马耳他
地中海
罗德斯
克里特岛
塞浦路斯

欧洲领土的变更

在女皇和拉斯普京的统治下，一群阴险的冒险家、勒索者及奸商买官卖官，从事军需投机买卖，推举各自的傀儡出任部长，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丑闻。1916 年，国内深受动荡、罢工及失败主义的严重困扰。与此同时，前线部队因缺少运输工具、装备、军需供应及医疗服务经受着巨大的牺牲。保守派开始公开谴责拉斯普京。1916 年 12 月，拉斯普京被谋杀。

尽管杜马中的温和主义者反复提出警告，认为政府自身因反对责任内阁制正在促成一场革命，但沙皇仍无动于衷。当拉斯普京的死讯传到柏林以后，德国人看到了迫使俄国人彻底退出战争的机会，并通过支持乌克兰、波兰及芬兰的独立运动以及援助俄国革命达到了目的，部分皇族和杜马成员同时开始密谋尼古拉二世的退位问题。截止到 1917 年初，革命的条件已经具备，但革命者尚未做好准备。

(1)三月革命 首都截止到 2 月只剩下 10 天的面粉供应，地区指挥官被迫实行食物配给制。排队等候配给的人群、关闭的商店以及对饥荒的恐惧，最终导致了严重的骚乱。杜马开始谴责“不称职的部长”，左翼代表则转向了秘密组织。在这些秘密组织的鼓动下，公众开始抗议政府因罢工开除大批工人的举措。罢工者走上大街游行示威，并与其他不计其数的工人与家属汇集为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但最终被全副武装的警察驱散。布尔什维克党人从第三天开始组织进一步的罢工与游行示威，沙皇则动用秘密警察实施了大规模的拘捕活动。与此同时，军队拒绝堵截从工人区出发经涅瓦河(River Neva)涌向皇宫的工人游行队伍。3 月 10 日(俄国旧历的 2 月 27)，很多士兵向人群交出了武器，起义者占领了藏有 4 万支步枪的军械库，革命者随之控制了彼得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

1917年2月和3月革命，更多是民众绝望与激愤的产物。革命仍处于缺乏领导者与指导纲领的无组织状态，因为实际的革命者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仍在国外或被流放，而激进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样对革命感到惊诧。然而，截止到3月份，从1613年以来统治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完全丧失了希望。

彼得格勒驻军的不忠成为沙皇遭颠覆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当沙皇命令军队向起义群众开枪时，只有一小部分人服从了命令，而且大批抵制命令的士兵甚至加入了起义队伍并追捕警察。3月12日，杜马中的进步集团组建临时政府，负责在制宪会议召开前维持秩序。3月14日，沙皇最终决定成立责任制内阁，但已为时太晚。3月15日，沙皇被迫退位并将皇位让给其弟米哈伊尔(Michael)，但米哈伊尔却于次日决定拒绝接受王位。

在此之前，包括被起义者从监狱释放的许多人构成的左翼分子，于3月12日模仿1905年苏维埃建立了工兵苏维埃委员会。工兵苏维埃委员会通过“一号军令”(Army Order No. 1)，在军队的所有基层单位中建立了控制武器的士兵委员会，军队原有的原则与组织建制受到了重创。工兵苏维埃同时建立了食品供应委员会并出版发行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党人组成的15人执委员会成为革命的实际政策制定者。苏维埃总部与杜马处于同一栋大楼，并很快与杜马发生了冲突。杜马主张临时政府尽快投入运行，恢复公共秩序，并为俄国的荣誉继续进行战争。部分杜马成员主张君主制，另一些人要求继续战争并占领君士坦丁堡，但绝大部分杜马成员认为公民的权利问题是次要的，当务之急在于处理国家面临的其他诸多紧迫性问题。然而，苏维埃却深知，广大的俄国人民并不在乎君士坦丁

堡,他们需要的是和平、土地与食物。

苏维埃领导阶层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孟什维克人)认为,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前有必要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在他们看来,苏维埃本身并不是权力机关,所以他们虽然拒绝参加临时政府,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临时政府。杜马与苏维埃尽管在政治与经济目标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两者都同意立即给予公民政治自由,并召开确立未来政府模式及制定宪法的立宪会议。临时政府主要由立宪民主党人和其他的温和主义者组成,由倾向自由主义的王子佐治卢获夫(Georgi Lvov,1861—1925)领导。苏维埃成员温和的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 1881—1970),担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并兼任杜马议员。

(2)临时政府 1917 年 3 月中旬至 11 月初执政的临时政府,丝毫没有扭转日益恶化的局势。俄国的温和主义者没有执政经验,并且是在大战期间获得了执掌政权的机会,而内部又因巨大的社会阶层差异发生了分裂。临时政府一方面认为有必要继续坚持战争,同时又要对难以操控的庞大帝国实施再造与民主化。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苏维埃掌握着多数权力工具,但却拒绝承担责任。首都的工人和士兵完全支持苏维埃,而临时政府任命的各省新省长,除了耐心的劝说外,没有任何可借用的力量驾驭选举产生的地方农民苏维埃,而且其数量正急剧增加。

农民的不满与继续战争是临时政府面临的两大问题。农民渴望得到土地,并且想立刻得到土地,但临时政府坚持依据法律慎重行事。临时政府不但拒绝批准农民夺占的土地,反而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收集资料为将来的土地立法做准备。至于战争,临时政府仍然不切实际地认为俄国将取得胜利,并会得到协约

国许诺的领土。但苏维埃却发表了《士兵权利宣言》,前线部队的军纪以及军官的权威因此趋向瓦解。与此同时,流亡归来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人,也坚决要求俄国立刻终止战争参加和平谈判。

2. 列宁

列宁是流亡归来的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曾回国参加 1905 年的革命,但 1908 年再次流亡西方。他在国外曾与部分社会主义者联合反对战争,并极力主张将军事战争转化为阶级斗争。在他看来,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而帝国主义本身又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要进行社会变革,就必须首先摧毁战争、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

列宁尽管曾一度有些悲观,认为有生之年将难以看到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他还是迫不及待地赶回了俄国。德国总参谋部认为,列宁的回国将有助于瓦解俄国继续战争的努力,所以德国军队安排一节专门的列车车厢,将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从瑞士经德国送到了波罗的海。1917 年 4 月 16 日,即二月革命刚刚结束一个多月,列宁到达了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

大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直认为,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阶段,他们因此准备采取行动将俄国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支持建立民主共和国,并坚信充分的政治自由是其获取权利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尽管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唯一的核心推动力量,但列宁很快就意识到,在“无产阶级”只占总人口约 1%的俄

历史写真

简单的错误:西方与俄国的历史

当涉及俄国时,对一些简单问题的处理方式反映出西方并没有充分理解这一相对孤立国家的历史。例如,多年来一些学者不理解俄国人和共产主义者关于缩写和笔名的习惯,坚持认为列宁的名字是尼古拉(Nikolai)或尼古拉二世(Nicholas),因为他使用首字母 N,而且这一"发现"直到最近的 1983 年仍重现于美国的媒体。

事实上,不仅许多著述中有关事件的日期与本书不同,而且在事件的准确进程以及杜马和第一个苏维埃领导权的性质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本书中根据西方日历发生在 3 月份的事件,经常因为不同的俄国日历被认为发生在 2 月。不同的著述对于一些示威游行、兵变、战役的死亡人数均有很大的差异。这些苏联国内和现代西方有关俄国革命研究中存在的不一致性,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俄国被隔离于西方的实际状况,简单明了的年表、事实,甚至名字或生卒日期因此成为俄国国内或国外传闻与宣传的题材。后来,为了杜绝俄国公民接触其他的信息,苏联领导层命令重写了绝大部分俄国的历史,俄国历史变得更加混乱,并因此招致了更多的猜忌。

俄国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在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社会或人们不能对其历史进行开放式的多种解读时,精确地记录历史并富有智慧地解释历史拥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它同时也表明,政治领导层是能够通过改写过去从而使历史服务于现实的目标与追求。

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寻求其他同盟。列宁早在 1905 年革命期间就极力强调,有必要在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之间建立有限的战术性联盟,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当联盟的目标实现之后,社会民主党人转而消灭社会革命党人,并最终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然而,列宁的观点甚至没有得到大部分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认可,他们仍继续与孟什维克党人一道,致力于推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革命。

列宁不相信群众能够促成革命(列宁认为,群众仅靠自己只能够培养出工会意识),因此主张布尔什维克党应对工人阶级实行专政。列宁也不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中的普通工人成员,所以支持一小部分精英对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实行专政。与此同时,列宁除了自己的观点外不相信其他任何人的观点,因此倾向于由他自己(尽管从未有过明确的表达)对这个精英集团实行专政。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879—1940,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布朗斯坦,Lev Davidovich Bronstein)很早就警告说,列宁的观点意味着个人独裁。

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俄国的资产阶级非常弱小,工人阶级应从长远出发将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统一为不断推进的运动。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完成革命以后,工人可以立即掌握权力并实现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尽管会出现国外干涉和内战,但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久也将发动革命,并汇入俄国无产阶级的队伍。除了最后这一点,托洛茨基精确地预见了事件的过程。

列宁是一位天才的战术家。早在 1917 年回国前,他就预见了临时政府面临的困难,并认定群众很快就能够接管权力。他因此一回到俄国就号召在世界范围内开展革命,声称做为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阶段的帝国主义即将寿终正寝,并要求将一切权

力立即移交给苏维埃,这就是著名的《四月纲领》。

只有列宁认为组织松散的苏维埃能够统治俄国,并且战争将会在混乱中拖垮资本主义世界。列宁不仅号召人们废除临时政府并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而且要求没收不动产,土地国有化,废除军队、政府官员及警察。列宁的主张立刻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并且也立刻满足了饱受战争折磨的民众对和平的渴望。这一纲领较临时政府通过法律途径实现改革的谨慎做法,更符合民众的要求。列宁独断,反对妥协,并坚信唯有他自己有勇气指出真理,其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因此迅速发展为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将夺取政权。

3. 十一月革命

临时政府不久就陷入了危机。国防部长克伦斯基逐步取得了主导权,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军队的士气已经到了难以恢复的地步。7 月 1 日发动进攻的命令完全归于失败。士兵们拒绝服从命令,擅自逃离队伍,大批人迫不及待地返回家园抢占渴望已久的土地。与此同时,苏维埃日益倾向于接受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在 6 月份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的比例不足 10%,但其提出的和平、面包、自由的口号却赢得了与会者的广泛支持。

在布尔什维克纲领的鼓舞下,部分军人组织了武装暴动,但暴动者却发现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公开表示不愿夺取政权。尽管大批群众怒吼着要求推翻临时政府,但苏维埃两个星期后才决定讨论这一问题,并同时继续维护着临时政府的执政地位。临时政府宣布列宁是德国派来的间谍,列宁随即秘密逃往芬兰以躲避政府的拘捕。

文献记载

列宁在芬兰火车站的演讲

列宁到达彼得格勒的芬兰站后，宣称必须将世界大战转化成一系列的国内战争，并将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一场社会革命，从而激发欧洲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一次较为激烈的争论中，列宁明确表示不接受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温和立场。下面是当时在现场的一名记者日记中的摘录：

火车晚了很多……但最终还是来了。站台上响起了嘹亮的《马赛进行曲》，迎接的人群中爆发出欢迎的呼喊声……列宁紧随主持人快速走进了房间。他头戴一顶圆边帽，脸部冻得有些发青，手里拿着一束耀眼的鲜花。列宁疾步走到房屋中央时猛然在齐赫泽[(N. S.)Chkheidze，1864—1926，苏维埃的主席]面前停了下来，好像突然遇到了不曾预想的一大障碍。齐赫泽仍然阴沉着脸，以布道者的口吻及语句道出了如下的“欢迎词”：

“列宁同志，我们欢迎你回到俄国。但是——我们认为民主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防止来自内部和外部对革命的侵蚀。我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的不是分裂，而是停止依据民主实施的等级划分，我们希望你将与我们共同努力以实现这些目标。”……

列宁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好像发生的一切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转身离开执委会代表团后做了如下的“回答”：

“亲爱的同志们、战士们、海员们、工人们！我很高兴为俄国革命的胜利向你们致意，你们作为世界无产阶级军队的先锋，我向你们致敬……强盗式的帝国主义战争只是欧洲大规模

国内战争的开端……作为我们的同志，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当时还在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反对其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时刻已为时不远……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出现于地平线上……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随时将会垮台。由你们完成的俄国革命已为此铺平了道路，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伴随着嘹亮的马赛进行曲以及成千上万人的呼喊声，并在探照灯照射下熠熠发亮的红金两色相间的标语丛中，列宁从正门走出了会场。当他正准备进入一辆密闭的汽车离开时，却被人群挡住了去路，列宁因此不得不爬上汽车再次发表演说。

N. N. Sukhanov,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trans. Joel Carmichae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272—274, quoted in M. C. Morgan, *Leni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1), pp. 104—106. Sukhanov (1833—1931?), while in favor of revolution, was anti-Bolshevik. Although Lenin criticized Sukhanov as a Social Democrat who did not understand the workers, he accepted his account of the revolution as factually accurate.

克伦斯基出任总理后，任命拉弗尔·戈尔什科夫·科尔尼洛夫(Lavr Georgyevich Kornilov, 1870—1918)将军为新的军队总指挥，这为保守派各团体带来了新的希望。科尔尼洛夫于8月份密谋了一起政变，企图驱散苏维埃。与此同时，科尔尼洛夫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变得更加模糊，如果政变成功了，他很可能会清洗其中的激进分子。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变化，科尔尼洛夫与其上司克伦斯基的关系更趋紧张，苏维埃则因害怕科尔尼洛

夫的打击支持克伦斯基。克伦斯基最终决定解除科尔尼洛夫国防部长的职务，但科尔尼洛夫拒绝辞职并筹划进军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人见状立刻投入了自卫的准备。军事政变最终被瓦解，科尔尼洛夫本人也于 9 月 14 日遭逮捕。

科尔尼洛夫事件使军队的反叛演变为一场大范围的起义。在农村，农场被烧毁，领地上的房屋遭破坏，大地主遭杀害。大量不动产处置完以后，农民开始袭击小业主，但部分地区允许地主通过再分配占有其原有的小块地产。

列宁正是在这一乱局中回到了彼得格勒。有传言认为克伦斯基正谋划将彼得格勒出让给德国，托洛茨基借机控制了旨在保卫彼得格勒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将其转变为革命的总指挥部。托洛茨基从 11 月 4 日开始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队伍及民众集会发表演说，11 月 7 日（俄国旧历的 10 月 25 日），托洛茨基所预计的大规模起义终于爆发了，失败的二月革命随之被十一月革命取代。

彼得格勒的革命因做了充分的准备几乎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很快就控制了全城的主要战略要点。布尔什维克人攻入冬宫后，逮捕了正在那里开会的临时政府部长。克伦斯基成功逃脱，军事革命委员会随即接管了政权。11 月 8 日，代表全俄近半数苏维埃的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列宁和托洛茨基与会。当孟什维克党人与右翼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会议时，托洛茨基谴责他们为垃圾，并最终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桶。布尔什维克实现了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并采纳了他们的土地方针。列宁宣布没收教会、地主及皇室的财产，将相关的土地移交给地方土地委员会及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从而将农村已经开始的土地变革一举纳入了“合法

化”的进程。他同时极力主张立刻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并号召德国、法国及英国的工人支持其主张。布尔什维克最终组建了称之为人民委员会的新政府，列宁任主席，托洛茨基任外交人民委员。

布尔什维克任命年轻的格鲁吉亚人约瑟夫·朱加施维里(Joseph Dzhugashvili，1879—1953)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朱加施维里曾改名为斯大林，意为像钢铁般坚硬。在列宁的教导下，斯大林成为党内少数民族事务问题上的权威，并于1913年出版了一本相关的小册子。

彼得格勒之外的革命进展较为缓慢。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红军与反布尔什么维克的白军(当时对反革命者的称谓)进行了一周的激烈巷战。在其他地区的工业城镇中布尔什维克推进迅速，但在非工业地区进展往往较为迟缓。布尔什维克快速获胜的主要原因是，各州的地方军队都反对战争并愿意与工人结盟。大多数地区都很快建立了地方军事革命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新的地方苏维埃。西伯利亚及中亚的绝大部分地区都转向了布尔什维克，但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被孟什维克掌控，他们在此作出决议主张召开制宪会议并继续进行战争。随着科尔尼洛夫、其他将军以及杜马中的部分政要汇集于邻近亚述海的罗斯托夫(Rostov-on-Don)，这里逐渐成为白军反抗势力的中心。

依据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左翼11月底达成的协议，社会革命党左翼有三个人参加了政府，并同时开启了与德国的和平谈判。革命的高潮渐趋过去，列宁也最终掌握了政权，但俄国仍处于四分五裂及破败不堪的境地。11月25日，布尔什维克举行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自由的立宪议会选举。正如人们所料，布尔什维克在城市的得票率最高，特别是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

而社会革命党人则主要得到了乡村的支持。

虽然有 62%的选票投给了对手，但列宁却漠视这一事实，仍坚持他得到了“最先进”分子的支持。立宪议会只在 1918 年 1 月召开过一次会议，列宁在第二天便强令解散了议会，并派出武装军警阻止议会再次集会。这一违宪行为引起了反布尔什么维克多数派的愤慨，但并没有发生激烈的抗议活动，代表们最终被驱散。出现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已经满足了人民最为迫切的需求，即和平、面包与自由，另一方面是因为俄国缺乏议会民主的传统。

4. 战时共产主义(1917—1920)

1917 年底至 1920 年底是苏俄历史的第一个阶段，通常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或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这一术语表明，军事活动决定着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内战席卷了全国，国外势力侵入了俄国的领土。然而，这一术语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又存在其他的含义。这一时期是战争时期，但更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其标志是 1918 年初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国共产党。与此同时，首都从俄国西部边缘难以防卫的彼得格勒迁至更为安全的莫斯科，新报纸《共产主义者》开始出版发行。布尔什维克人坚信世界革命即将到来，革命可能首先在德国爆发，之后扩展至英国，并最终扩及美国。在这一认识的鼓舞下，布尔什维克人加快了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步伐。

截止到 1920 年，国家接管了所有雇用 10 人以上的企业。劳动属于强制性义务，但罢工是非法的。国家建立起一整套取代市场的实物分配制度，法律禁止内部贸易，只有政府食品供应



图为列宁于1918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首次庆典期间向莫斯科红场的群众发表演说。(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委员会拥有交易权。货币因国家接管了生产与分配而消失,银行遭国家没收,储蓄也因此不复存在。法令禁止教会干预国家政治,法官被迫离开岗位并由地方苏维埃任命的官员取代,九个反对党被取缔(其中有立宪民主党)或遭迫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

政府强制性推行十分苛刻的农民余粮征集制度,并动员贫农反对富农。为了号召饥饿者联合起来对付富农,政府故意散布阶级仇恨并在农村挑起内部冲突。1917年12月,政府颁布法令建立秘密警察"契卡"(Cheka,由"特别委员会"一词的首字母组合构成),恐怖活动从此成为内部斗争的一大武器。

在共产主义政府开始运行前首先需要实现和平,因为军队

事实上已不复存在。俄国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谈判延及1918年，并最终于1918年3月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俄国丧失了整个乌克兰、波罗的海各省、芬兰及部分高加索等三个世纪扩张取得的所有领土，条约同时使俄国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80%的铁及90%的煤炭资源。很多共产主义者宁愿辞职也不愿接受和平条约，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也因此退出了政府。德国人大肆践踏了乌克兰与克里米亚，并在此建立了一个高度独裁的政权。与此同时，白军在德国人的帮助下打败了芬兰的红军。

5. 国内战争(1918—1921)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的几个月里，由征集制度和阶级斗争引起的农村地区的混乱局面，最后演变为大规模的国内武装冲突。早在战争期间，俄国境内就形成了一支由捷克居民及溃散的哈布斯堡军队组成的军团。当俄国退出战争时，捷克民族主义领导人托马斯·G. 马塞里克(Thomas G. Masaryk，1850—1937)，要求将捷克军团派往法国前线。捷克、苏俄及协约国代表因此决定将捷克军团运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再从这里经海路前往法国。当捷克人聚集起来以后，共产主义者开始怀疑他们另有企图并命令他们解除武装，捷克人于是控制了西伯利亚铁路。苏维埃政府试图打击这一支总数约3.5万人的捷克军团，捷克人随之占领了西西伯利亚的部分城镇。地方苏维埃并未做好准备，社会革命党人则同情捷克人，地方上的反布尔什维克武装随之纷纷涌现。进入7月份以后，由于担心白军会营救当时软禁于乌拉尔山叶卡特琳堡(Ekaterinburg)的前沙皇及其家属，当地

的苏维埃领导认为没有必要再保留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残余。在列宁的鼓励下,他策划了对尼古拉二世、皇后亚历山德拉、沙皇的儿子与四个女儿、医生、仆人们以及沙皇爱犬的残忍谋杀事件。他们的尸体被运到乡下后倒入了一口废弃的水井,直到80年后苏联解体才被发现。

在谋杀事件发生之前,协约国决定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干预俄国事务。俄国退出战争对于协约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现在希望保护仍滞留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阿尔汉格尔的大量军需品,并同时希望能借此在东方开辟另一条抗击德国的新战线。

捷克人于1918年6月推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地方苏维埃,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的武装力量也于8月初在此登陆。美国人占领了捷克人后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以保护铁路交通,但在协约国中只有日本人对这一地区拥有蓄谋已久的领土野心。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在西伯利亚的政权已经瓦解。社会革命党人驱散了这一地区的苏维埃,并恢复了地方自治会。不久之后,西伯利亚三个核心地区出现了三个反布尔什维克政府,一小部分英国和美国军队也于1918年8月在阿尔汉格尔登陆。11月30日,一名社会革命党刺客刺杀了彼得格勒的契卡首领,当时在莫斯科的列宁也两次遭枪击。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担心爆发大规模的反革命运动,而且医务人员也可能卷入其中,所以列宁虽然伤势严重,但决定将列宁直接运回其寓所进行救治。被指控企图杀害列宁的那一名妇女未经审判就直接被枪杀了。由于始终没有找出其幕后的指使者,流言飞语蜂拥而起。布尔什维克将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莫斯科的契卡射杀了600多人,并在其他地方也实施了大规模的报复。

布尔什维克政府随即加快了备战的步伐。国防部长托洛茨基命令强行征兵，5 万名沙皇时代的军官出于爱国热情或担心对其家人的报复加入了军队。1918 年秋，红军重新占领了伏尔加河流域的喀山（Kazan）与萨马拉（Samara），暂时扭转了苏维埃面临颠覆的危机。截止到 1920 年，托洛茨基创建的红军已发展至 300 万。

德国 1918 年 11 月在西线的溃败，为布尔什维克否认《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提供了契机，并在面临地方武装反抗的条件下收回了部分乌克兰的领土。其他地方的反对势力主要由三支军队组成。白军由罗斯托夫向南穿过高加索山脉，得到了法国和英国的援助。西西伯利亚的其他武装势力，推翻了鄂木斯克（Omsk）的社会革命党政权，其指挥官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Alexander Kolchak，1874—1920）成为该地区事实上的独裁者。另一支包括前德国军人的军队主要在波罗的海区域活动，从西边威胁彼得格勒。

红军于 1919 年春打败了高尔察克，并于同年冬季占领了鄂木斯克。红军虽然一度夺回了乌克兰，但因内部的哗变未能巩固这一胜利成果。1919 年夏，白军占领基辅后继续向北进攻，并逼近距莫斯科不到 250 英里的区域。另一支军队一度推进至彼得格勒郊区，但截止到 1919 年底白军的威胁基本被消除。1920 年，只有白军将领拜伦·彼得·弗兰格尔（Baron Peter Wrangel，1878—1928），仍在克里米亚保有部分军队。随着军事威胁的日益消除，托洛茨基号召军人参与劳动以重建这一饱受创伤的国家。

红军击败白军以后，又于 1920 年被迫面临与波兰的新战争。波兰方面的领导者是民族英雄约瑟夫·毕苏斯基（Josef

Pilsudski，1867—1935)。毕苏斯基长期致力于争取波兰独立的斗争，组建了波兰独立军团并在大战中率军抗击俄军，战后出任波兰共和国临时总统，此时为波兰陆军元帅。毕苏斯基急欲恢复 1772 年波兰首次遭瓜分时的领土，企图在 1920 年将布尔什维克赶出乌克兰，建立由乌克兰与波兰联合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并试图将白俄罗斯、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并入这一联邦。如果波兰军队获胜，苏俄将丧失大量攸关存亡的矿产资源和海岸线，这是西方大国转而支持毕苏斯基的重要原因。

红军虽然在初期遭受了一定的挫折，但很快就占据了优势，并一度直接威胁华沙。由于迫切希望消灭白军的残余势力，并认为波兰没有希望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红军最终未能占领华沙。苏俄于 1920 年 10 月同波兰缔结和平条约，波兰获得了大部分白俄罗斯及西乌克兰。这一区域虽然没有波兰人居住，但在 18 世纪波兰被瓜分前一直由其控制。这一区域位于“寇松线”东部，这是一条由英国外交大臣寇松(Curzon，1859—1925)在凡尔赛谈判中提出的民族分界线，但遭到了毕苏斯基的拒绝。1921 年在里加(Riga)确立了最终的分界线，沿东方天主教(承认罗马教皇正统地位的东方教派)与东正教汇合处将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大致划分为两个部分。依据该条约划入波兰的大批少数民族受到了华沙政府的歧视，成为除军事独裁外困扰两次大战之间波兰稳定的重要因素。

红军转而对付拜伦·弗兰格尔，他从克里米亚向北进军，并在已占领的区域建立了一个温和政权。在红军的攻击下，弗兰格尔于 1920 年 11 月在法国舰队的协助下实施撤退，白军威胁最终被解除。很多因素促成了白军的失败与红军的胜利。白军除了拥有消灭红军这一共同的目标外，在其他所有的政治方案

上都难以达成一致，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严重的分歧。白军中既有沙皇派，也有社会革命党人。各派在俄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互不妥协，最终只好推迟讨论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白军政权往往实行高压统治，因此没有得到地方实力派的追随与支持，而且军队往往纪律涣散。另一方面，尽管其活动范围主要在西伯利亚、克里米亚、乌克兰、高加索及波罗的海等俄国外围区域，但白军从来没有和这些地区的非俄罗斯少数民族达成实质性的谅解。

尤为重要的是，白军没有得到农民阶级的支持。他们不但没有保证经布尔什维克认可的土地分配结果，反而在暂时控制的区域恢复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对白军和红军都深感不满，食品生产大幅缩减，暴行肆虐频繁。白军的军事实力也远不如红军，红军不仅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大量曾经为沙皇军队制造的先进装备。红军占据着核心区域，有着统一而灵活的指挥系统，并可通过铁路快速调动部队。白军则从外围挺进，至少分为四个主要分支，也难以充分利用铁路等交通设施。另一方面，协约国支持白军所进行的干涉是无效而低劣的。干涉事实上有损于白军追求的目标，因为红军可以借此声称自己为民族的护卫者而将白军描绘为外国雇佣军。如果没有“资本主义者”及白军在外围的威胁，中心地区很可能不会团结一致支持列宁。

俄国内部的权力争夺并没有随内战的结束而停止。饥荒盛行，阶级仇恨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工业生产只及战前的八分之一，农业生产下降了 30%，配给制被迫停止，新政权面临民众支持日益下降的挑战。但截止到 1921 年初的西方各大国，也经历着激烈的政治变革。各国都在竭尽全力安置大批的退役军

人,恢复战前的秩序,战败国则仍然经受着失败的困扰,并出现大范围的动荡局面。

俄国人口在19世纪增长了近200%,农村的人口密度随之大幅增加。1870年至1914年间,500万人迁往了西伯利亚,并另有300万人移居新世界,大量农村人口同时也涌向了城镇。俄国因此获得了现代国家及革命所必需的人口条件,即城市工人阶级。在西伯利亚及其他外围地区,这一群体虽然只存在于少数几个中心城市,但在列宁确立自身权威的地区却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俄国尽管在大战中损失了近400万人,革命和内战期间又有1400万人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严重的生育不足,但俄国仍体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喀琅施塔得1921年3月的海军叛乱被镇压以后,列宁领导下的俄国走上了统一发展的道路。苏俄因革命、战争和饥荒锐减的人口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并仍期盼爆发国际共产主义革命。1921年底,列宁开始患病。这一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人开始准备接班人。列宁最终于1924年1月病逝,西方此时已充分意识到,凡尔赛和会并没有给欧洲带来安全,俄国革命及其后续影响给世界许多地方带来了持续的动荡。然而,这场灾难性战争还产生了一个人们未曾预料的结果,即导致了现代环境运动的诞生。

六、环境

尽管人类对环境问题早就有过大量的思考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观点,但截止到20世纪中叶,环境保护的概念特别是生态学(研究生物体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意义上的环保概念并

没有成为人类关注的首要问题。18 至 19 世纪初期，特别是进化论得到广泛传播以后，海路探险（部分有科学家参与）使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类生活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性，物种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包括气候变化等周围环境的影响，人类通过自主选择反过来又对环境做出了什么样的改造。曾游历世界各地的查尔斯・达尔文（1869—1882）和拜伦・洪堡（Baron Humboldt，1769—1859），都见证了这些变化留存的痕迹，并对促使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的这些力量因素做过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对人类以往改造自然的方式进行自觉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的德国、瑞士和美国。显而易见，部分人早已注意到农业生产、水土流失与原始自然景观变化间的关系，国家的军政领导人也更为清楚地看到了战争对农村地区造成的严重毁坏。与此同时，地质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也改变了科学家及其他人对长时段内促使气候变化因素的认识。然而，总体上来看，领导者除非受到宗教观念影响外，往往并不重视短期行为与长期结果间的关系，亦即缺乏为子孙后代考虑而悉心保护土地的意识。一般而言，那些坚信世界是上帝的旨意及安排的人，认为没有理由担忧环境的变化。甚至那些世俗精英也倾向于只关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问题，其中也包括认同伏尔泰《康第德》（*Candide*）结论的那些人，即各人最好打理好自己的花园。与此同时，不论在西欧还是亚洲，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及 19 世纪的民族主义者都倾向于关注正在崛起的民族国家。

20 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人乔治・帕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大概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生态学（及环境运动）概念的人。作为一名律师、国会议员及外交家，马什曾密切观察

其家乡佛蒙特州的自然环境,并发现大铁路时代诸如高架桥的建设、筹备枕木或燃料而砍伐森林等,明显改变了鱼类的繁殖环境及植物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马什在出任美国驻土耳其及意大利王国公使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并于此后写了两本被视为20世纪"环保运动发端"的著作。第一本是出版于1864年的《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曾深刻影响了阅读过此书的读者。第二本是《被人类修改了的地球》(*The Earth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1874),明确揭示了开发与改变环境资源带来的严重后果。

然而,截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环保的关注总体上局限于一些科学家、社会评论家及自然主义者。18世纪曾强调人本与理性,19世纪皇家的领地扩张及世界市场的建立风行于全球,欧洲及北美新生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出现了强烈的扩张意识,即边疆与海外理所当然应被占领并服务于侵占者的利益诉求,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无视环境变化的凯旋主义的盛行。与此同时,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和团体逐步开始建立森林保护区,设立从事森林研究的专项科研机构(德国在这方面居于先导地位),并着眼于民众利益开辟"国家公园"(美国率先于1872年建立黄石国家公园)等。然而,保护森林及开辟国家公园的主旨并非在于保护物种并促进其繁衍,而在于农业与商业开发或为人们提供娱乐与休闲场所。依据历史学家的界定,人类对环保问题的初步关注始于19世纪下半叶马什相关论著的问世,并持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卡逊在书中指出,随美国、澳大利亚及西欧农业化工发展而广泛施用的化学杀虫剂,导致了女性不育并使母乳遭受了污染。《寂静的春天》出版时正值哺乳育婴方式得

以逐步恢复，并且核试验引发了公众对健康的极度担忧，卡逊的观点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马什及卡逊分别于 1874 年和 1962 年激发的争论，在饱受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欧洲也同样十分活跃，但环保问题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多数地区并未受到重视。新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领导者甚至有意回避这一问题，认为这是拥有技术优势的富国，为阻止落后民族与新兴国家享用其领土范围内及地下的丰富自然资源刻意提出的托词。例如在中国，人们认为历史处于周而复始的轮回之中，是天意在推动着王朝的更迭与兴衰。然而，西方的旅行者及观察家虽然逐步开始将中国（中国于 1911 年使用阳历以后，逐步放弃以轮回的观念审视自身，外来观察者眼中的中国因此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日本纳入了分析的视野，但在这些国家中很少或完全不存在“环境意识”或实质性的环境保护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例如横跨法国北部的堑壕战，战后德国所经历的贫困，奥匈帝国的彻底崩溃，以及从滩头阵地到高原地带的炮火轰击给乡村造成的严重破坏等。这一切都使下一代人非常直观地看到，人类行为造成了何等严重的环境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急剧增长的人口未经认真规划就迅速充斥了俄国、东欧、加拿大和美国的大片农田，并创造了只有通过教育、国家行为及培养环保意识才能消除的无数巨大的“垃圾坑”。当孩童在法国海岸因 20 多年前战争遗留的炮弹或炸弹死于非命时，人们更加清楚地感受到，过去的行为对现在的个人或团体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这一时期内，思想领域发生的另外两大变化使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关注，即通过良好的管理为未来保存自然资源的观念，

发展为更具广泛意义的环保意识，其中也包括物种的保持与多样化攸关人类自身生存等观点。第一大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类对长时段内气候变化日益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气候长时段内的冷暖变化对物种及人类居住地域的影响；海底运动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等。从1492年的哥伦布探险到1942年二战的全面爆发，欧洲始终为世界的核心，但此后欧洲作为核心的研究单位已很难满足现实的需求。人们日益明确地认识到，对于过去的深刻理解必须要将降雨、冰川运动、海平面上升、气温变化、水与空气污染、疾病传播等长项环境问题纳入考量的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日本、俄国及其他国家城市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美国1945年在日本第一次使用原子弹等，都较以往任何时期更加清楚地证明了，人类行为对人类自身及自然环境造成的重塑、破坏甚至毒害。

第二大变化截止到20世纪中叶仍未受到重视。蕾切尔·卡逊作为一个女性，其对环境的认识更多地反映了妇女对这一问题的特殊关注，这也成为其著作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卡逊对DDT杀虫剂的大量施用充满了忧虑，因为它污染了母乳并储藏于脂肪中，而且婴儿在出生前就通过胎盘受到了污染。随着卡逊的观点逐步被证实，美国和欧洲开始禁用DDT。显而易见，妇女运动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女性在工作场所及其他环境中更易遭受污染的侵害，这也成为推动妇女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占世界雇佣劳动力的三分之一，而大约三分之二的非正式劳动量都是由妇女完成的。随着妇女参政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也随之走到了政治的前台。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人口增长逐步成为伦理学者、神学家、

政治家、科学家、女权主义者及历史学家关注的重中之重。直到19世纪早期，人口增长虽然并不稳定，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世界经济的增长大约在1820年以后开始快速超过人口增长，西方因人均所得急剧增加出现了中产阶级。截止到1890年，西欧和美国的人口增长虽然相对缓慢（日本与俄国也体现出近似的发展趋势），但全世界的人口却保持着强劲的上升态势。人口增长对石油、水和食品供应等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移民随之成为各国决策者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1850至1930年间，世界人口翻了一番，从10亿增加到20亿，到1975年又翻了一番，达到40亿。很多评论家早在世界人口突破40亿之前便预见到，人口的增长、流动及安置将会成为未来突出的社会、政治、经济与环境问题。

七、本章小结

19世纪60和70年代，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欧洲的均势结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大国联盟及受报纸和新闻图片影响的公众舆论等，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紧张局势，并最终于20世纪初促成了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的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德国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以及摩洛哥、巴尔干和其他地区的外交与军事危机，使和平局面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遇刺，引发了导致大战爆发的严重危机。奥地利坚持塞尔维亚应对刺杀事件负责，并采取强硬立场。当澳方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奥地利首先对塞尔维亚宣战，德国、俄国、法国和英国随即表示支持各自的盟国。意大利宣布中立，但稍后又加入了协约国阵营。其他欧洲国家

相继被拖入了战争,而美国也因中立国船只不断遭袭最终参战。

德国军队试图依照施利芬计划先击败法国,然后挥师东进攻打俄国,但计划并未取得成功。德国士兵被牵制于西线,僵持局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战争过程。德国另有数百万军队被拖在了东线,直到1917年俄国退出战争以后才最终得以脱身。与此同时,两大阵营也在近东、东非、远东和世界各大洋的其他战线展开了搏杀。德国曾于1918年春季发动最后攻势,但并未能持久。截止到1918年夏,协约国在西线实现了全面突破德国最终于11月11日被迫签订了停战协议。

在战争后方,战时的计划经济预示了战后规制经济时代的来临。在双方充满敌意的宣传战的影响下,战争对社会生活及道德规范的变化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虽然蕴含着和平的希望,但协约国在赔款、惩罚德国及领土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不久便使自由与和平的希望破灭。凡尔赛和会完全被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孟梭与奥兰多四巨头垄断,他们围绕建立新国家等问题谈判、妥协、讨价还价,而俄国和轴心国完全被拒于和会的大门之外。和会虽然建立了设有协商大会的国际联盟,但这一国际组织并没有实现其支持者的初衷。

美国最终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遭战争打击的法国则极力坚持苛刻的赔偿计划。战后的德国仍然是欧洲最具潜力的强国,虽然极不情愿,但勉强接受了和约。

罢工、食物短缺及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为俄国1917年的革命铺平了道路。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明显的冲突,但温和的临时政府无力应对来自国内外的一系列危机。在此条件下,从国外流亡归来的列宁提出了革命纲领,并得到了

俄国人民的支持。

1917 年 11 月，布尔什维克首先在彼得格勒掌握了政权。布尔什维克革命虽然给俄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新政权同时也继承了俄国的许多旧有传统，例如专制独裁、由官僚主义者和管理者组成的精英集团、秘密警察以及民族主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许多未曾料及的后果，现代环境运动的发展无疑是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大变化。战争使欧洲大陆的大片区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不仅使欧洲人深切感受到了环境的脆弱性，并且这种意识将伴随科技的飞速发展与毁灭性破坏的进一步加剧而不断增强。



第四章

两次大战之间:二十年危机

撇开西方民主国家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不论,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历史与其说是极左运动,不如说是极右运动的特征更为突出。从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开始,法西斯主义就在意大利确立了统治,随后在 30 年代的德国和西班牙也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到 30 年代晚期,东欧和东南欧也出现了很多坚定的法西斯主义国家或者类似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这些法西斯主义国家是不同社会的产物,它们掌权的环境各不相同,在控制的资源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方面的差别都很大。但是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特征。法西斯统治,尤其是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统治,都是在实施民主政策甚至是社会主义政策不能获得稳定与安全的情况下产生的。几乎在任何地方,独裁者的上台都与经济萧条密切相关。并且,这些独裁者都非常善于吸引人们注意——他们惯用战争叫嚣、特殊的敬礼、精心安排的仪式,以及能够把他们的忠实信徒区别于普通群众的统一制服。

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时代(大致是从 1919 年到 1945 年)并没

有影响到法国、斯堪的纳维亚、瑞士、英国和美国,尽管这些国家可能已经有了积极活跃的法西斯政党。各地的法西斯主义实质上都是对一战造成的毁灭性影响的一种反应。一战不仅影响到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的19世纪国家,使它们发现胜利并不能带来和谐。同样影响到破碎而保守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战争中被贴上了侵略者的标签。所以,愤怒的情绪在法西斯主义国家很普遍。各国受到惊吓的人们也都用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来应对共产主义的国际威胁、全球战争,以及紧接着就是1929年后的全球萧条这些国际灾难。

按照很多观察家的说法,20世纪成了一个"焦虑的时代",特别是当欧洲国家发现它们正在走向经济混乱和政治瓦解的时候,这种说法似乎更加贴切。一战对欧洲国家的破坏远比它们意识到的程度要深得多。但是,如今已经沦为二流实力的国家却试图仍然像它们具备一流实力时那样行事,尤其是想继续奉行进攻性外交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冲突尽管并非不可避免,发生的可能性却非常高。而且,鉴于大部分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情感基础,妥协与让步基本不太可能。

"法西斯主义"这个术语已经变得几乎没有意义,好像"人人都懂",但是事实上每个人都只是知道一点,而这一点通常并不足以理解它究竟是什么。法西斯主义不同于保守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那样的政治思想体系,实际上,它既是许多旧观念的一种混合物——它对保守主义、反动势力、自由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甚至是君主专制主义都有借鉴,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又是一种新实践,它形成了实施独裁统治的不同风格和途径。

尽管各式各样的法西斯主义在细节上未必完全相同,但是其某些要素,某些"必要的谎言"还是具有普遍性的。其中第一

个就是强调国家生活中非理性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它信仰理性力量的对立面,包括权力、血统的纯正、种族以及战争,所有这些在法西斯主义的信仰体系中都排在很高的位次。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强烈情绪化的民族主义、一种深刻的民族使命感。在它看来,理性是最不重要的,因为大法西斯主义者基本上都认为普通民众就是绵羊,它们都等待着被最强有力的节奏(或者说激情的韵律)所引领。在制服、庆典、头衔和符号象征方面,法西斯主义都超过了与其类似的体制,所以纳粹分子青睐杰出的浪漫主义神话缔造者、作曲家瓦格纳也并非巧合。

法西斯主义的第二个要素是对暴力的赞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两个最重要的法西斯主义独裁者,都曾是一战中的普通士兵。他们最早的信徒都来自士兵,他们最初的抱怨和要求也都跟一战有关。他们活动的风格和诱惑陷阱也都是从军队中以及从一战中借鉴来的。他们这类人都精通煽情演讲的技巧,而且他们的演讲总是能回归这样的言论:战斗能够使“民族”得到净化和美化,人们必须忍受甚至信奉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所有的法西斯运动都会衍生出秘密部队,他们深知如何在大街上用棍棒而不是说理来对付敌人。一旦当权,所有法西斯都懂得使用恐怖行动作为日常统治手段。那些心中仍有愤怒以及曾经被和平解决方法侵害的人们,又往往相信暴力手段的作用。

法西斯运动的第三个共同要素是绝对领导原则。墨索里尼的头衔是首相,但他显然更愿意被称呼为“领袖”(Duce)。与其相似,希特勒更喜欢被称为“元首”(Führer)。法西斯主义理论对此予以了充分的说明:在任何国家,特别是被邪恶和破坏性阴谋所统摄的大国中,思想开明的政治家、选举制度和议会多数根本没有机会,人们所需要的就是找到那个命运指派的伟人,并且

信任和服从他。这个伟人当然不能事事亲力亲为,他会把权力授予他的下属,他的下属再将权力授予更下级的官员,以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权力金字塔,领导人位于金字塔顶端,下级官员处于金字塔底部,他们行使领导人权力中的一小部分。

第四个重要因素是对种族主义的笃信。正如我们在前面一章所提到的,种族主义的观点并不新鲜,但是法西斯主义者(特别是德国的纳粹主义信徒)却抓住这些旧观点并且加以补充,然后用它们来说明过去的屈辱和未来的需要。法西斯主义者把民族这个共同体的重要意义推崇到与个体的人对立起来,认为真正的民族是由单一种族构成的,要想控制这个种族除非他们其中有人背叛。例如,他们认为一战的失败仅仅是由于德国内部出现了背叛者和罪恶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具有异己的宗教、异己的种族起源,以及有别于“真正”德国人的原始“差异性”。更有甚者,法西斯分子还把这些种族主义观点与对尼采哲学(Nietzsche)的故意曲解、与戈宾诺的学说、与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实用伪科学以及许多骨相学者的理论掺杂在一起,用来证明他们津津乐道的北欧民族,也就是雅利安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性。而最为纯正的雅利安人当然就是德国人。其他的法西斯主义者在这方面比不上德国,但是也都尽其所能地鼓吹,比如墨索里尼就把他的民族,奉为罗马人和西班牙辉煌征服时代的佛朗哥(Franco)的子嗣。

最后一个要素是,所有的法西斯主义体制都信奉极权主义(这个词是由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杜撰出来的),也就是抹杀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限。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为了管理极权国家的生活,法西斯主义者从新的苏联独裁政府机关那里借鉴了很多东西。他们认为,个人的事就是政治的事,国家有权利和义务管理各个方面。首先是政府,这毋庸置疑,除此以外,

国家还干预教育和宗教信仰、恋爱和婚姻、工作和娱乐、法律和道德。法西斯国家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都摆在其民众面前,它们解释一切、证明一切。人们总是被期望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表现出他们的忠诚和顺从。法西斯主义者用完全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作借口为自己的暴行开罪。他们坚持说,只有极权体制才能最好地满足由政党解释和表达的共同体利益,因为极权体制把所有权力都用于实现那些利益。这样一来,政党的重要地位也跟着突显出来。政党是国家的合作伙伴,它不同于英国保守党、法国激进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这类的定期参加竞选的政党。法西斯主义政党就像列宁的共产党一样,他们是排斥所有其他党派的精英集团,只有他们的成员可以把持权力。

当然,各国的法西斯主义也存在差别。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都只是在掌握政权后才真正拥有了正规军队,而西班牙的长枪会(Falange)本身就产生于军队。某些东欧国家将法西斯主义手段与君主政治制度相结合,但希特勒根本没有复兴君主制的欲望,墨索里尼则是先向君主妥协,最后又凌驾于君主之上。伊比利亚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都与教会密切合作,或者至少是对教会做出了让步,希特勒则试图取代教会。当然,在法西斯国家中只有纳粹分子创造出了盖世太保(Gestapo)这样强大而且高效的镇压机器,也只有他们找到了“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如果拿他们与正处在权力顶峰的国际共产主义相比,那就相当于苏联有一个莫斯科、斯大林和克格勃(KGBs),他们有很多小的莫斯科、斯大林和克格勃。我们可以看到,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在于,法西斯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追求的那种统一的政治思想体系,不如说是一系列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民族运动,它们相似却不完全相同。

史海钩沉

比较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

1922年10月在那不勒斯演讲时,墨索里尼承认,与民族主义一样法西斯主义的核心中也存在一个致命的谎言,那是一个被如此强烈坚持的信仰,以至于它已经具有了真理的力量。墨索里尼指出这种信仰是一个神话,如果被普遍承认,它就能变成现实:

我们创造了自己的神话。这个神话是信念,是激情。它不一定要成为现实。它已经是现实,因为它是美好、是希望、是信念、是勇气。这个神话就是我们的民族,就是我们民族的伟大。为了把这个神话,把这种伟大彻底实现,其他的一切都要服从。*

这个"致命谎言"证明了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一个差别:前者更强调民族。当然,两者还有很多其他的区别。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克劳斯·爱泼斯坦(Klaus Epstein)1964年发表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出了如下的解释:

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法西斯国家与它们反对的共产主义敌人其实有着许多共同特征(比如说,使用恐怖行动、集中营、一党专政,以及破坏人的"私人领域")。但是,为了做分析,还是有必要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予以鲜明的区分。它们在公开宣称的目的、意识形态内容、获取政权的环境以及求助的集团这些方面都有所不同。法西斯主义者追求民族的伟大(这并不需要排斥种族主义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追求工人阶级的全球胜利(这也不排斥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法西

斯主义者站起来公然反抗 1789 年的思想,共产主义者却把自己标榜为那些思想的继承人和执行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错综复杂,共产主义也为其"世界观"无所不包的逻辑性而引以自豪。法西斯主义颂扬战斗的非理性世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却是和平而且和谐的理性世界(当然这并不妨碍它在最终实现乌托邦之前也推崇必要的暴力手段)。法西斯主义在某些高度发达的国家通过滥用选举程序已经取得了胜利(例如,德国),共产主义通常也是在已经被长期战争拖垮的落后国家(俄罗斯、南斯拉夫、中国)通过军事占领或者成功地使用武力夺取了政权。法西斯主义专门求助于下层的中产阶级或者部分受到惊吓的上层阶级,共产主义一般在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中影响最大。法西斯主义由一系列民族运动组成,缺乏集中、全体的方向,共产主义却是一种中央集权的世界运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服从由同一个中心发出的命令。**

* Quoted in Herbert Finer, *Mussolini's Italy* (New York: Universal, 1935), p. 218.

** Klaus Epstein, "A New Study of Fascism," *World Politics*, XVI (1964), in *Reappraisals of Fascism*, ed. Henry A. Turner, Jr.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1975), p. 10.

一、法西斯主义的首次胜利:意大利

虽然意大利是战胜的协约国集团的一员,但它却是带着挫

败感离开一战战场的。65 万意大利人在战争中丧生，另外还有 100 万人受伤。意大利的工业在战后迅速衰落，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有 10％的产业工人失业。物价飞涨，工人的工资根本无法维持生计。政府承诺给伤兵和死者家庭的养老金也被长期拖欠。罢工和骚乱开始频繁发生。许多年轻人从部队复员后除了打仗什么都不会，也找不到工作。他们整日无所事事地游荡，渴望能有言出必行的首领出现。

或许最重要的是，意大利政府开始散发宣传资料以使人们相信，他们战时的盟国正在掠夺 1915 年《伦敦秘密条约》为争取意大利加入协约国集团而许诺给意大利的领土。他们从奥匈帝国得到了的里雅斯特、特兰提诺、提洛尔的一部分（以及 25 万德国人）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伊斯的利亚地区（包括 50 万斯拉夫人），但是却没能得到事实上英国和法国在条约中已经答应的一半达尔马提亚地区。1915 年的中立国美国从未同意这样的安排，现在也不予接受。尽管意大利国内掀起了抗议的浪潮，这三个国家也不会接受意大利对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阜姆（1920 年宣布为自由市，这对意大利有利）的要求了。所以，许多意大利人认为他们的流血牺牲已经白费。

1. 墨索里尼的上台

一些支持加布里埃尔·邓南遮的意大利人攻占了《伦敦条约》本来没有划分给意大利的城市——阜姆。邓南遮在阜姆拥有自己的政府，并且一直维持到 1920 年底。1920 年 11 月，意大利政府与南斯拉夫签订了规定阜姆成为自由市的《拉巴洛协定》（*Treaty of Rapallo*），意大利军队也将邓南遮逐出了境外。

但是邓南遮的暴力方法、站在阳台上对民众做慷慨激昂的演说、直臂礼、黑衬衫、有节奏的呐喊口号以及征服计划都给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缔造者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带来了灵感。

1918—1922年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创建了一支新的政治力量并赋予了它很大的权力。1922年10月,他被国王维克多·厄曼努尔三世任用后,逐步创建了一个极权国家,并且成为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意大利法西斯在国内镇压一切反对力量,对外威胁世界和平,它在某种程度上为德国纳粹分子、西班牙长枪党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和奥斯曼帝国的几乎所有欧洲继承国建立的极权政体树立了一个效仿的榜样。

墨索里尼出生于1883年,父亲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并曾在巴枯宁(Bakunin)的影响下开始了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职业生涯。墨索里尼最初是一名小学教师,他本人年轻时也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曾经因为反对意大利与土耳其争夺的黎波里的战争(1911年)而被捕入狱。1912年,他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意大利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的编辑。

一战早期,墨索里尼反对意大利参战。他憎恶军国主义,不仅本人逃避兵役,而且力劝士兵都离开军队。作为一名激进的无神论者,他也反对民族主义,并且把意大利国旗说成是“插在粪堆上的破布”。但是1914年墨索里尼改变了想法,转而支持“相对中立”,就是说如果这条道路看似可能证明对自己有利的话,社会主义者应该支持意大利参战。当意大利社会党拒绝接受他的这个想法后,墨索里尼就辞去《前进报》编辑的工作,在米兰创办了自己的《意大利人民报》,并且开始鼓吹意大利迅速加入协约国作战。为此,他还被意大利社会党开除了。

此后,墨索里尼开始向具有相似思想的青年团体发表演说,鼓吹战争。这些团体被叫做“法西斯”(该词引自古语,意指绑在一柄斧头周围的一捆木棒,在古罗马共和国是权力的标志,在现代国家也常常被作为某种标志而使用,比如美国的硬币上)。1915 年意大利参战后不久,墨索里尼就应征入伍并被送到了前线。1917 年他负了伤,出院后他又开始编辑自己的报纸。1919 年,墨索里尼组织对现实不满的退役军人成立了他的第一个“战斗的法西斯”,并且终于在自己的私人军队里借用了由邓南遮首先使用的伎俩——黑衫、军纪以及对敌人的暴力和威胁态度。

1920 到 1921 年间,饱受赋税和通胀剥削的实业家和地主们日子更加难熬。店主和商人们希望街上的骚乱尽早结束、食品价格得到控制。物价和工人的工资都比职员的薪水涨得快,所以那些收入固定的职员们日子也不好过。警察疲于镇压地方骚乱。那些由于其战争经历而被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攻击的退役军人则变得更加爱国了。

所有这些阶层都把他们不喜欢的人视为布尔什维克。经过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巷战和暴动后,这些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开始指望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集团保护他们的利益。邓南遮的失败使墨索里尼成为他的理想继承人。1921 年,共产主义者从社会党中分裂出来,反对墨索里尼的左翼力量遭到进一步削弱。法西斯主义队伍急剧扩大,从 1920 年 5 月的 3 万人增加到 1921 年 2 月的 10 万人,到 1922 年 10 月已经超过了 30 万人。意大利自由主义议会的领导人感觉法西斯集团对左翼力量的教训很有效,于是他们鼓励军官给法西斯分子配备步枪、卡车和汽油,并且派军官去指挥他们作战。他们不仅怂恿警察对法西斯分子挑起的骚乱视而不见,而且强迫地方法官释放被捕的法西斯分

子。墨索里尼的报纸也在军队中向士兵免费发行。

一场针对社会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党党员的恐怖运动随即展开,法西斯装甲兵开着卡车在全国巡逻,他们焚烧工会办公室、报社以及地方社会主义政党的总部,并且袭击工会领袖和各地反法西斯主义政治家。从1920年10月到1922年10月,包括反法西斯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警察和旁观百姓在内的大约2000人在暴力事件中丧生。墨索里尼向人们证明:在一个分裂和惊恐的社会里,控制信息源、迅速机动加上使用恐怖和恫吓手段就可以有效地压制反对者。

在1921年5月的选举中,墨索里尼和其他34个法西斯分子被选入意大利议会下议院。一同当选的还有他们的政治盟友——10名民族党党员。此时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势头已经强劲到无法放慢速度的地步。作为冲击政权的必要步骤,同年11月法西斯主义者又成立了政党。这时候政府才开始警觉并试图采取措施阻止法西斯分子,但是太晚了,那些法西斯装甲兵太强大了,政府警察又已经习惯了与他们串通,就连那些自由主义政治家们也还没有意识到一群指挥有力的武装暴徒能够接管这个国家。

1922年秋,军队显然已经无法抵抗法西斯分子在罗马的政变。或许是因为国王很清楚军队不会向法西斯分子开战,而且他的外甥会非常乐意继承王位,所以他拒绝了签署戒严令。内阁辞职后,10月29日国王就给身在米兰的墨索里尼发电报,让他到罗马来重新组阁。第二天一早,墨索里尼就乘卧车赶到了,紧接着其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也蜂拥而至。这就是著名的"向罗马进军"(March on Rome),它其实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是一场暴动,而是法西斯头目为庆祝得到官方法律承认所举行的仪式。

2. 法西斯独裁统治和总体国家

墨索里尼一步步将他的总理任期变成了独裁统治。上台一个月后他就获得了独裁权力,这种权力本来只能延续到1923年底。宪法在理论上还有效力,但是墨索里尼已经掌握了行政权。他创建了一支为数20万人且绝对效忠于他个人的法西斯自卫队。他还扩充了常备军,并且也要求这些军人都宣誓忠诚于墨索里尼。在其独裁权力到期之前,墨索里尼又向议会争取通过了一部新的选举法,该法规定,如果一个政党在一次大选中获得的票数最多,并且得票数至少达到了总票数的四分之一,那么这个政党就应自动获得议会席位的三分之二,剩余席位再按比例分配。法西斯分子在1924年4月的选举中获得了65%的选票,随后意大利就出现了第一个完全由法西斯分子组成的内阁。与此同时,随着法西斯分子被任命为意大利各省的正副省长,地方行政权也落入墨索里尼之手。

1924年初,反墨索里尼派的领袖、社会主义者贾科莫·马蒂奥蒂(Giacomo Matteotti,1885—1924)发表《法西斯分子的真相》,揭露了法西斯分子在夺取政权道路上犯下的累累罪行。好像他还准备进一步揭露墨索里尼内阁某些成员的贪污行为,结果却在6月10日遭到了谋杀,据说指使杀人的就是墨索里尼的亲信。这桩丑闻震惊了整个意大利,甚至有一段时间似乎墨索里尼就要倒台了。最后墨索里尼果断地把所有涉案人员开除公职,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要重建法律和秩序。为了抗议这起谋杀案以及相关人员没有受到严惩,反对派的议员纷纷退出下议院,随后他们又被拒绝重回议会,这其实正中墨索里尼下怀。实

际上,马蒂奥蒂被暗杀也标志着墨索里尼真正独裁统治的开始。

接着,墨索里尼就通过一系列新法律严密控制了新闻舆论,取缔了共济会(从他早年还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时就讨厌该组织)之类的秘密组织,并由罗马直接任命官员取代了所有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反政府的人一律被逮捕并且流放到意大利沿岸的岛屿上。1926 年初,墨索里尼获得了发号施令统治全国的权力。遭到三次谋杀的他还制定了一部新法律,规定任何人从事反对国王、王后和墨索里尼的行为将被判处死刑。就在同一年,所有反对党都被取缔,法西斯党成为意大利唯一合法的政党。

意大利政府与法西斯党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墨索里尼既是法西斯党的领袖又是政府首脑。他甚至一度同时掌握了内阁的八个席位。法西斯最高委员会由大约 20 名最高党内官员组成,他们都由墨索里尼任命,负责把持着不在墨索里尼本人控制下的所有政府要职。1928 年,法西斯最高委员会被赋予了重要的立宪职权,包括为下议院选举准备候选人名单、为墨索里尼做顾问,以及建议修宪或者变更王位继承人。这样一来,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就成了凌驾于议会其他两院(上议院和下议院)之上的第三院。

墨索里尼认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都应该与国家的最高利益保持一致,代表权应该建立在"企业联合会"组织的经济利益基础之上。这样的想法并不新鲜,法国工团主义者乔格斯·索勒尔(Grorges Sorel)已经提出过同样的主张。但是索勒尔只赞成工人联合会,而墨索里尼对工厂主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同样赞成。

1925 年,雇主们承认法西斯工会的唯一权利就是议定劳工合同。1926 年 4 月,意大利政府正式承认了工业、农业、商业、海

空运输、陆路和内河航运，以及银行业这六个领域的工厂主和工人各自的联合会，再加上一个知识分子联合会，总共 13 个工团组织。每个工团组织都能讨价还价并签订合同，也能评定他们行业里每个人应得的工资，无论他是否是该组织的成员。但是，罢工和停工是被禁止的。

1928 年又通过一部新选举法，规定新一届下议院将由 400 人而不是 560 人组成。13 个工团组织组成的国家委员会可以提名 800 个候选人，每个工团组织都有一定名额，其中一半由雇主选出，另一半由雇员选出。文化和慈善基金会可以多提名 200 个候选人。当候选名单总人数达到 1000 时，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可以从中挑选 400 人，或者剔除某些候选人而换上他们自己的人选，甚至可以换成一份全新的名单。于是，广大选民再投票就只要回答一个问题："你是否同意法西斯最高委员会选出的议员名单？"选民只能对整个名单投赞成或者反对票，并不能从中选择候选人。如果大多数选民投了赞成票，这个名单就通过了；如果大多数人投反对票，上述程序就重新进行。这就是说，即使在这个非常有限的"选举"中，普选权也被取消了。并且每位选举人都必须向某个工团组织缴纳最低数额的税金或者会费。而妇女还没有选举权。

1938 年，软弱无能的下议院终于被法西斯和工团议院所取代。除了名义上由国王任命但是实际上也屈从于墨索里尼的上议院之外，由加富尔建立的旧的议会结构已经荡然无存。这种新的组织叫"总体国家"（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七个工团领域都已经被宣布为一个组织）。尽管法西斯主义信徒们把总体国家及其好处吹捧得天花乱坠，但是这个新组织似乎从来没对管理意大利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多大影响，意大利仍然牢牢地处

于法西斯内部官僚机构的控制下。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形式的计划经济在意大利出现。为使意大利在农业方面更加自给自足,全国一致努力采取行动。1932年,据意大利官方报道,其国内小麦产量可以满足国民正常需求的92%,而且人民生产其他谷物产品的动力得到了增强。政府对汽船和航空运输给予补贴,鼓励旅游业的发展,通过对外国产品征收高关税保护意大利工业。湿地被排干,土地得到开垦。大量拨款投向公共事业,水力发电取得很大进展。公共交通也变得非常高效。

国家还干预个人生活的几乎各个方面。尽管意大利人口过剩,墨索里尼还是规定移民是犯罪行为。从1926年开始,他实行了一项激进的鼓励生育政策,通过减税、提供专项贷款、对单身汉征税以及为私生子提供平等的法律权利来鼓励人们结婚并尽可能多生孩子。这其实是欧洲大陆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意大利的人口出生率几乎没有可观的增长。墨索里尼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扩充他的军队,同时支持他关于意大利必须向海外扩张的诉求。学校的课本、图书馆的藏书、大学的教授、舞台上的戏剧以及银屏上的电影都成了法西斯宣传的工具。秘密警察也努力搜查和镇压一切反抗活动。这正是运转中的极权国家。

1929年,墨索里尼通过与教皇签订《拉特兰条约》(*Lateran Pact*)解决了罗马问题,即未经教皇同意就吞并教皇国的问题。条约承认梵蒂冈城的独立,以及教皇对该城拥有世俗统治权。此外,墨索里尼还承认天主教为国教,不仅放弃了从教会或者牧师的薪水中征收特别税的权力,而且支付了1.05亿美元作为对意大利没收教皇领地的补偿。教会方面也答应以后不再公开提及政治问题。

尽管许多教会官员对法西斯运动也持同情观点,但是这些协定缔结后还是出现了麻烦。教皇庇护十一世(Pius XI,1922—1939 年在位)在一份通谕中表达了对墨索里尼经济政策的不满,并且指出总体国家其实是为了"满足特殊的政治目的,而不是为了创建一种更好的社会秩序"。于是,墨索里尼指控教会的天主教行动俱乐部(Catholic Action Club)干预政治并将其解散。紧接着,教皇不仅否认其指控,还谴责法西斯政党霸占青年人的时间和教育的行为。然而到了 1931 年,双方又达成进一步的协议,俱乐部也得以重开。

重建古罗马辉煌的愿望和国内的人口压力迫使墨索里尼采取了一项中世纪时期的扩张政策,他把这项政策叫做"我们的海洋",以此标榜自己是凯撒大帝的继承者。当时,墨索里尼想派殖民者去利比亚,他把利比亚称做意大利的"第四海岸"。但是 1923 年,五名为国际联盟工作的意大利人在划定了阿尔巴尼亚与希腊的新边界后遭到暗杀,随后墨索里尼的殖民政策就开始扩展。他为此下令炮轰并占领了紧邻阿尔巴尼亚的希腊科孚岛(Corfu),而且还一直拒绝承认国联的干预权,直到英国施压才将该事件解决。

最重要的是,墨索里尼使意大利疏远了它的早期盟友法国和英国。他的扩张政策最终导致了对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和阿尔巴尼亚的军事侵略。这促使他同另一个法西斯分子阿道夫·希特勒结成了同盟即罗马—柏林轴心国集团,并且还向法国公然索要科西嘉岛、突尼斯、尼斯和萨瓦。墨索里尼虚华的法西斯主义空想驱使着意大利努力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重建海港以及创建一支商船队和海军。

与德国结盟也导致意大利在 1938 年正式采纳了反犹太主

义政策。只有7万犹太人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长期居民的意大利其实根本没有希特勒所宣称的那种德国存在的"犹太人问题"。意大利的犹太人在语言和感情上都完全是意大利人,他们只是在宗教上与其他意大利人不同。很多意大利犹太人都是著名的法西斯主义者,另外很多人则是反法西斯主义者。意大利社会并没有多少人赞成政府采纳希特勒的种族政策,但是希特勒的独裁感召力促使墨索里尼也把犹太人赶出法西斯政党,禁止他们教书或者入学,禁止他们与非犹太人通婚,也禁止他们领取新执照去做生意。

崇尚机会主义、且残忍而机敏的墨索里尼热爱权力,但是他也确实关心意大利的命运。很多人在他统治时期生活得到了改善,另一些人的生活则十分悲惨。那个时代及其之后的许多评论家会发现他是一个愚蠢的人,一直挣扎着做自己根本力不能及的事;另一些评论家则会认为他精明、细心,并且很可能意识到墨索里尼正是凭借其反复无常却又极富感染力的性格而深深吸引了很多人,进而牢牢掌握权力的。1945年,随着墨索里尼的死亡,促使德意结盟并且把意大利引入战争的政策也宣告结束。当墨索里尼的尸体被头朝下吊在共产主义的绞刑架上时,他的性格却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二、魏玛共和国:1918—1933年的德国

1918年11月11日停战的前两天,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成立了一个共和国。1919年7月31日,共和国采用了在魏玛举行的国民大会起草的一部宪法,这个共和国也因此被称为魏玛共和国。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8年到1923年

底,共和国经受了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压力以及日益严重的经济紊乱;第二阶段从 1924 年到 1929 年后期,共和国政治稳定,履行《凡尔赛和约》的义务,实现了相对的经济繁荣;第三阶段是从 1929 年后期到 1933 年 1 月希特勒成为总理,这个阶段魏玛共和国经济衰退,右翼势力迅速发展。

1. 动荡年代(1918—1923)

德国人对 1918 年的战败深感震惊。因为,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统治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当局并没有向公众透露德国在战场上的失败达到了什么程度,而且在德国本土也没有发生战争。如今战败且士气低落的德军回国了,从小就被教育要崇拜军人的德国人当然不能接受德军战败的现实。而且,威尔逊领导下的协约国完全不理会德军的最高统帅,陆军元帅兴登堡(Hindenburg)并没有被要求向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交出兵权或者是签署停战协议,反而是德国的文职政治家被迫承受了这种耻辱。所以,协约国其实无意间给德国军方帮了大忙。

将军们宣称德国军队从未被真正打败过。关于德国是被包括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在内的平民"从背后行刺"的传言让人们深信不疑,并且在政治家尤其是那些与古老的普鲁士体制有密切联系的人,比如君主主义者、大地主、实业家和军国主义者中广泛传播。

回想起来,协约国也确实因为将"战争罪"条款纳入《凡尔赛和约》而犯下了大错。德国的签约者被迫承认了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相信(而且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也会反驳)的结论,即只有德国对战争的爆发承担责任。这项条款让德国民众更难承认战

败、肃清军国主义分子和建立一个共和国。相反,它促使许多德国人倾其所能去否认战争罪、打击那些指控他们的敌人,以及等待机会用武力证明将军们是对的——德国是被自己人背叛了。

左翼势力对稳定的威胁增强了右翼反共和派的力量。创建共和政体和防止骚乱的责任落到"多数派社会主义者"身上,他们由社会民主党和右翼独立社会党组成,社会民主党党员弗里茨·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是他们的首领。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温和集团,他们不反对土地所有制,允许容克地主保留庄园及其原有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社会民主党与实业家缔结了保证八小时工作制的集体谈判协议,但是并没有试图将德国工业国有化。

独立社会党的左翼和共产主义的斯巴达克同盟成员(Spartacists)则鼓吹俄国模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在通过苏维埃组织不能有效开展活动的情况下,左派试图在1918—1919年冬天发动一场革命。结果,艾伯特呼吁军队阻止了这次行动。当时德军将领不仅使用了正规军,而且启用了新组建的志愿军也就是自由军团(Free Corps)。这支队伍主要由原来的职业军人组成,他们怨恨德国在一战中的军事失败,也反对新民主。为了抗议政府使用军队,社会独立党的右翼退出了政府。随着国内冲突的继续,共产主义者还试图发动一场新的政变,最后也被军队镇压了。

德意志帝国的旧政党重又出现,当然它们往往贴上了新标签。老自由党的左翼现在变成了人民党,吸收了比较温和的实业家,他们拥护私有制,反对社会主义。该党的领袖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以前的改良主义者和左翼自由党现在组成了新的民主党,这是一个中产

阶级共和派民主团体,吸收了很多德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天主教中心党(the Catholic Center party)也重新出现,名字和纲领都没变,他们赞成共和政体,但是反对社会主义,并且在其工会党员的压力下,该党拥护社会立法,在其右翼贵族和实业家的压力下,该党又反对长远的改革。右翼阵营中还有以前的保守党,他们也以民族人民党(the National People's party)或者民族党的名义重新出现,但是还像从前一样由容克地主领导。该党得到一些大实业家、大多数官僚以及相当一部分不赞成共和政体的下层中产阶级的支持。

1919 年 1 月德国投票选举国民立宪会议,结果支持共和政体的党派赢得了超过 75%的席位,其中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得了将近 40%。后来,会议在魏玛召开,选举艾伯特为德国总统,并且组建了政府,该政府极不情愿地签署了《凡尔赛和约》。会议还通过了新宪法,规定:新德国仍然是联邦制国家,但是中央政府拥有为全国立法的重要权力。总统有权对不遵守宪法或国家法律的邦使用武力。内阁对下议院也即国民议会(Reichstag)负责,国民议会由 20 岁以上的全体公民(包括妇女)普选产生。

总统由每七年一次的选举产生,并且被赋予了相当大的权力,包括缔结条约、任免内阁、指挥军队、任免所有政府官员、解散国民议会以及要求进行新的选举。另外,总统还可以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来重建秩序和暂时中止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当然国民议会也可以命令撤销这些措施。总理也就是首相,由总统任命,主要负责政策的制定。总统的权力完全足以实行独裁统治,但是比例代表制要求选票必须是投给候选人的整个党派,这样就可以防止无党派政治家获得执政权,同时也鼓励分裂出来的小党派扩大队伍。

1920年3月,前官僚和反共和主义者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领导的一次右翼暴动(或者称"政变")把政府赶出了柏林。在鲁登道夫将军(Ludendorff)和自由军团首领们的支持下,柏林军区司令本来希望把一名东普鲁士的反动分子扶上台。但是,艾伯特通过发起一场几乎使德国陷入瘫痪的总罢工击溃了这次暴动。总罢工还在鲁尔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一次共产党起义。为了镇压共产主义者,德国军队开进了被《凡尔赛和约》规定为非军事化地区的鲁尔,进而引起了法国的军事干预及其对鲁尔和法兰克福地区的短暂占领。

1921年4月,协约国提出了他们要求德国支付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方案。右翼政治家主张彻底拒绝该方案,而魏玛派非常现实地断定外部入侵的威胁使得这条路不可行。这样,温和派再次被迫为一项肯定不会受到欢迎的决定承担了责任。重建部门的大臣、民主党人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1867—1922)希望"履行"政策能让协约国相信德国是讲信用的,并且在将来能换取让步。拉特瑙是非常爱国的德国人,同时也是犹太人,于是他遭到了反犹民族主义演说家们的苛刻诽谤。

右翼秘密恐怖组织开始了一场暗杀运动。1921年8月,他们谋杀了天主教中心党的一位政治家,此人签署过停战协议,也是最主要的温和派之一。凶手经由巴伐利亚逃走,其中一个被抓住了,但是法官判他无罪。后来,国际联盟又把富饶的上西里西亚省的一块重要地区(包括那里居住的很多德国人)作为奖赏划分给了波兰,这让右翼势力更加愤怒。1922年6月拉特瑙遇害,凶手相信谋杀一个犹太人就可以报复德军中的"背叛者"。受这次暗杀的影响,施特雷泽曼领导的人民党与被怀疑与谋杀

有关的民族人民党分道扬镳，转向了与天主教中心党和民主党合作。

通货膨胀不断增加造成的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为应付右翼势力日益严重的威胁所采取的政治努力。1922 和 1923 年通货膨胀已经发展到空前的程度。通货膨胀是一个还没有被充分认识的复杂经济现象，但是德国发生这次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未能通过税收来支付战争费用。德意志帝国政府本来预计会打赢一战，然后通过索要巨额赔款让战败国替德国偿付战争开销。所以它只用税收支付了 4％的战争费用。随着战败的临近，政府从银行借的钱越来越多。贷款到期时，政府就用没有黄金贮备支持的纸币来还贷。这样每还一次，就会有过量的纸币进入流通领域，物价也就跟着上涨。物价的每次上涨都会引发加薪的要求，增加的薪水又是用更多的纸币来支付的。于是就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面对这种情况，德国政府不是课以重税来削弱购买力，而是允许消费者竞相购买短缺商品，从而导致物价进一步上涨，加速了通货膨胀的整个过程。

这段时间，德国政府申请延期支付战争赔款并且请求国外贷款，但是法国人不同意。因为他们已经花费了几十亿用来重建在战争中被德国毁掉的国家，他们想要德国人买单。法国要求德国用其至关重要的鲁尔工业区做抵押。由于德国没能如期偿付战争赔款，法国不顾英国的反对，在 1923 年 1 月占领了鲁尔区，并且宣称他们是想为自己的利益经营鲁尔区的煤矿和工厂，以此来补偿德国不能支付的战争赔款。

德国人不能用武力抵抗，但他们声明法国对鲁尔区的占领是非法的，并且命令当地居民进行消极抵抗，也就是拒绝为煤矿

和工厂开工或者向法国运送货物。鲁尔区的人民遵守了这项命令。由于法国采取措施打击德国警察和工人,被占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德国自由军团成员也用游击战的方式对付法国人。法国占领鲁尔区的最严重后果是它打击了已经陷入绝境的德国经济。德国其他地区中断了来自被占领区的奇缺物资,鲁尔本地居民也在德国政府的命令下停止了工作,不得不靠政府的救济维持生活。印刷厂印出的马克越来越多,越多就越贬值。马克对美元的兑换比率从几千马克兑一美元,涨到几百万、几十亿,1923 年 12 月甚至攀升到了几百万兆。

这样的天文数字只有在我们意识到它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时才变得有意义。比如,一名学生在某个下午出发去他的大学,身上带着一张支票准备支付一年的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和娱乐费用,但是当他第二天早上到达学校时却发现,这些钱只够支付他的路费。很多人毕生的积蓄都变得一钱不值。人们往往推着装满马克的手推车穿过街道只是去买一条面包。靠固定收入过活的人完全破产了,中产阶级的投资也都化为泡影。有形资产变得不可估价,投机买卖生意兴隆,有些投机商发了大财。

对于德国工人来讲,通货膨胀倒不意味着积蓄都打了水漂,因为他们通常根本没有存款。但那的确意味着工资购买力的大大下降,于是工人的家庭就要忍饥挨饿。而且由于工会的财务状况受到破坏,它们也不能继续帮助那些脱离了工会的工人。大实业家却从通货膨胀中得利,其中部分原因在于通胀严重削弱了工会的力量,但更多的原因是通胀抵消了他们所欠的债务,使他们能够兼并小的竞争对手进而建立大型企业集团。

政治上,右翼和左翼的极端势力都因通货膨胀而大大增强。中产阶级尽管已经沦为经济上的无产者,他们也不会支持社会

民主党或者共产党中的工人阶级派别。而且即使醒悟之后，他们也不会支持主张共和的温和党派——人民党、天主教中心党和民主党。于是，民族人民党、特别是希特勒的纳粹党吸收了一大批受到惊吓和对现实不满的人。工人阶级的苦难促使许多工人从社会民主党转到了共产党。但是苏俄对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压制妨碍了一切统一的革命行动，到 1923 年秋，组织不力和强大的政府镇压又注定了他们的那次努力要失败。

就在德国处于危机的煎熬中时，施特雷泽曼于 1923 年秋出任了总理，并且宣布德国不能继续在鲁尔地区消极抵抗。他下令工厂复工，并且继续支付战争赔款。右派拒绝接受新政策，于是政治动荡加剧。在巴伐利亚骚乱的高潮中，阿道夫·希特勒闯进正在一家慕尼黑啤酒馆举行的一个右翼政治会议的现场，宣布"国民革命"已经开始。紧接着，被通缉的希特勒极力拉拢其他的地区领导人支持他在柏林搞游行。但是军队只用很小的伤亡就驱散了那次示威。希特勒把对他的审判当成了宣传自己思想的讲台，不过他还是因叛国罪被判处了五年徒刑。此后希特勒发誓要通过合法手段夺取政权，再也不犯这种错误。事实上，他在监狱里只待了八个月，期间还完成了《我的奋斗》一书的大部分创作，这本书后来成为纳粹党的圣经。

1921 到 1922 年，巴伐利亚形形色色的右翼组织中又出现了一个新派别，这就是希特勒领导的德意志工人民族社会主义党（简称"纳粹"，也就是民族一词的缩写）。希特勒生于 1889 年，作为一个奥地利海关公务员的儿子，他似乎总是经受痛苦和挫折。1907 年，被维也纳艺术学院拒绝后，希特勒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常常徘徊在饥饿的边缘。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就是从那些年开始的。因为卡尔·马克思本人有犹太血统，又因为很

多维也纳犹太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希特勒就把社会主义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二者都应为他个人的不幸负责。

从我们在第一章提到的很多反犹太主义的核心人物那里,希特勒为自己的仇恨找到了哲学和伪科学方面的支持。他吸收了戈宾诺关于"日耳曼"和"雅利安"种族优越的理论、尼采的"超人"思想、杰出的浪漫主义歌剧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戈宾诺的忠实读者)对德意志民族神话般历史的光辉礼赞,以及瓦格纳的养子、英国人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反对民主政府、资本主义和犹太人的观点,这些综合起来就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一个强大混合体。

1913 年希特勒来到慕尼黑。1914 年他应征加入德军,作为一名下士参加了一战,然后又回到了慕尼黑。在受聘为部队做政治教官期间,希特勒发现了一个自称德意志工人党的小政治集团,他们拥护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激进主义。1919 年希特勒加入这个政党并且很快脱颖而出。他极力宣传把所有德国人团结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德国,把犹太人踢出政治生活、保证充分就业、没收战争红利、大型企业国有化、鼓励小企业以及将土地分给农民。

希特勒是一个极富魅力的演说家,具有几乎可以把一群人催眠的天赋,到 1921 年他已经使自己成为纳粹党的绝对领袖和独裁者。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1881—1934)领导的纳粹党体育运动部(Gymnastics and Sports Division)巩固了希特勒的地位。原来的一战协约国要求解散了自由军团,纳粹党体育运动部就招募了自由军团的成员。1921 年底,这个"俱乐部"已经成为纳粹的"冲锋队"(SA),他们身着准军队化的服装,即标志性的褐色衬衫(效仿了墨索里尼的黑色衬衫)和红色的纳粹十

字臂章，并且很快就公然在大街上打击自己的敌人了。冲锋队也为群众集会巡逻，给希特勒当保镖，并且为他们的领袖和政党充当私人军队。

希特勒的最亲密同伙包括：赫尔曼·戈林（Herman Göring，1893—1946），他是曾击落20架协约国飞机的战时"王牌飞行员"，主要职责是为冲锋队增光；鲁道夫·黑斯（Rudolf Hess，1894—1987）是希特勒的秘书，肩负着协调纳粹党各个不同部门的使命；阿尔弗莱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是一位以其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狂热仇恨出名的波罗的海德国人，党报的第一位编辑，后来成了纳粹主义的御用哲学家。以上这几位和其他一些人共同杜撰出了纳粹主义的基本理论，我们注意到，其中有些内容其实是借鉴了他们非常仇恨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相信不能指望中产阶级政治家把德国人民救出苦海，因为这些政治家无法将思想和武力团结在一个组织中。而这正是希特勒决定去做的，因为他感觉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做到了，即把思想意识和恐怖行动融合到一个运动中。

2. 经济复苏（1924—1929）

共产主义的骚乱和纳粹啤酒馆暴动标志着通货膨胀时期到了最后阶段。希特勒暴动前不久，施特雷泽曼已经将特别财政权交给了两位务实的中立派人士——财政部长汉斯·路德（Hans Luther，1879—1962）和银行家兼财政专家雅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所有的旧币印刷工作都被叫停。成立了一家新银行发行与战前的马克等值的新马克。新

货币不是基于黄金储备,而是建立在以德国全部工农业财富做虚构的"抵押"的基础上。通胀时的一百万兆马克相当于新币一马克。与此同时,政府各部门都实行严格的节约措施,税收也增加了。尽管公众强烈抗议,这些举措还是坚持实施到产生了预计的效果。然而,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也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物价下跌了,过度膨胀的企业倒闭了。失业率骤升,工资仍然很低,工人超时工作的现象比较突出。

1924年,协约国终于通过制定《道威斯计划》(*the Dawes Plan*)帮助德国结束了经济危机,该计划以美国金融家、加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872—1933)执政时期的副总统查尔斯·G.道威斯(Charles G. Dawes,1865—1951)的名字命名。《道威斯计划》建议法国从鲁尔地区撤军,成立一个专门银行接收战争赔款,前五年的赔款额逐年递增,提供一笔国际贷款资助德国偿付第一年的赔款。接着由美国提供一系列贷款从根本上资助德国偿付战争赔款。民族党人抨击这些建议就是外国统治者企图奴役德国的阴谋,在1924年5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他们和纳粹党、共产党都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温和党派则遭受了失败。但是到了8月份,以保证民族党在内阁中的席位为条件组成了一次政党联合,进而接受了《道威斯计划》。在12月份举行的新选举中,纳粹党和共产党继续处于劣势,社会民主党和温和派则取得了胜利。1925年初,天主教中心党—人民党—民族党联盟上台执政。尽管德国已经明显转向右翼,但是其对外政策一直由施特雷泽曼控制,并且旨在促进和解。从1923年11月到1929年10月去世,施特雷泽曼在历届德国政府中一直担任外交部长。

这几年还不太动荡,经济处于稳步恢复中,到1929年德国

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 1913 年。一流的德国设备配合高超的技能，加上系统地采用美国的大规模生产方法，造就了高效的工业机器。这种产业“合理化”提高了产量，但是也导致了过度借贷和一定的失业。纵向托拉斯（即在一个大公司里囊括了一种工业生产过程从煤铁开采到成品被产出的所有环节）和卡特尔（为自身利益而控制销售和价格的独立企业的联合体）成为德国体制的特点。重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这意味着一项庞大的军备计划能够确保持续繁荣。自始至终，战争赔款都没有损害德国经济，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道威斯计划》的帮助下循环利用从美国借来的钱。

1925 年，艾伯特总统去世后，德国进行了一次由三个候选人竞争的总统选举。天主教中心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支持中心党候选人。民族党、人民党和其他右翼集团都支持当时已经 77 岁的陆军元帅兴登堡。共产党放弃了自己的候选人，从而帮助了兴登堡。他以微弱多数赢得了选举。但是让大多数民族主义集团感到苦恼的是，直到 1930 年兴登堡都完全按照宪法办事。尽管这个时期的国内问题开始升温，但是都通过民主程序解决了。在 1928 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重新拿回政权。繁荣已经让人们变得温和并且越来越支持共和政体。

对外事务方面，这个时期德国对集体安全体系的参与逐渐增多。1925 年，德国与原协约国集团成员签署了《洛迦诺公约》（*the Locarno treaties*），该公约规定法国军队撤出莱茵地区。作为交换，莱茵区变成中立区和法德边界，由英国和意大利保证其安全。另外，建立仲裁机构处理德国与其邻国的纠纷。但是，这些条约并没有担保德国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1926 年，德国被允许加入国联。1928 年，德国接受了规定侵略战争

为非法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the Kellogg-Briand Pact*)。

1929年,根据另一位美国人欧文·D.杨格(Owen D. Young,1874—1962)命名的一项新的赔款计划实际减少了协约国最初要求的赔款总额。杨格是该计划起草委员会的主席。《杨格计划》还确定了比《道威斯计划》更慢的赔款支付速度,并且允许德国在他们的集体安全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30年6月,协约国集团撤出了莱茵区,比《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期限提前了四年。

3. 德国与世界大萧条(1929—1933)

经济萧条开始动摇繁荣与温和的基础。经济萧条是贸易和普遍繁荣的急剧衰退。在1873至1896年的世界范围大萧条中,物价暴跌、农业困难加剧——这种情况在欧洲更加严重,因为夏季雨水太多导致了农业歉收,来自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生肉、加拿大和美国的谷类又引发了竞争——银行纷纷倒闭(奥地利和法国尤为严重)。尽管学者们并不赞同这种长期原因的说法,但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是,1929—1934年这次新的"世界萧条"尽管短暂却极为剧烈,特别是摧毁了美国、德国和奥地利中产阶级的信心。

实际上,这次经济萧条早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溃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由于生产过剩和分配不当引起物价下跌,加上股票市场投机行为导致了普遍的金融恐慌,农业已经衰退。美国银行纷纷从欧洲撤资。1931年,法国人出于本国经济的迫切需要而取走其短期存款后,当时奥地利最大的商业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the Austrian Kredit-Anstalt)也被迫宣布破产。在德国,资金和国外贷款的短缺很快缩减了工业产量,进而

导致出口下降和对运输业（尤其是海运）需求量的减少，这一切又进一步引发了大范围的失业。

对计划经济的需要似乎很明显，左翼和右翼的极权运动又普遍做出了要实行这种长期计划的承诺。于是那些受这场很快就举世闻名的“大萧条”伤害最重的人们纷纷转向这些极权运动而远离了自由市场经济。对资本家来说，布尔什维克式的解决方法是不可取的；对民族主义者来说，他们相信大萧条是由另一个国家不健康的经济行为引起的，所以关税是一种解决办法。由于法西斯运动主张经济民族主义和统一的国家计划经济，他们很快赢得了新的拥护者。失业保险为德国工人缓和了第一次冲击。然而刚刚遭受通货膨胀打击、还在痛苦恢复中的下层中产阶级，却没有这样的屏障可以为他们抵挡贫困。正是这些人的绝望帮助了希特勒，本来在德国履行《凡尔赛和约》的那些年里希特勒的机会已经减少了。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在准备武力手段，特别是创建了由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指挥的纳粹党卫队(Defense Force, or SS)，这是一支由精锐力量组成的、身着黑衫的仪仗队。党卫队的成员资格强调“种族纯正”，其成员可以成为盖世太保或者“秘密警察”的核心分子。

1930年，德国政府由于无法在失业保险抚恤金问题上达成一致而垮台。兴登堡任命天主教中心党党员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为总理，并且指示他成立一个不受党派忠诚束缚的紧急内阁。当时已经82岁的兴登堡总统已经深受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将军(General Kurt von Schleicher，1882—1934)的影响，施莱歇尔将军是一位有野心又很精明的政治军事家，早就为自己设计好了取信于总统的发展

道路。兴登堡希望按照宪法授权,在紧急情况下依靠政令统治国家。国民议会没能通过布吕宁的经济计划,于是就给了兴登堡渴望的机会。

总统令宣布了新预算,但是国民议会表示反对,兴登堡随后解散国民议会,并且要求 1930 年 9 月举行新选举。纳粹党和共产党上街抗议而且都取得很大胜利,只有温和派蒙受了损失。纳粹党的国民议会代表从 12 名增加到 107 名,共产党则从 54 名增加到 77 名。布吕宁只好继续反对选举,在兴登堡一个人的支持下,他现在也转向了独裁。

当时的政治麻烦几乎完全是由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为了避免出现一个有纳粹党参加的新政府,社会民主党决定支持布吕宁。国民议会开会时,纳粹党和共产党虽然在会外制造混乱,但是会上却联合投票反对政府的议案。这些议案能够获得通过,仅仅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投了赞成票。1931 年,布吕宁试图成立一个德奥关税同盟以协调两国的关税政策,帮助两国在不影响各自政治主权的情况下克服经济萧条。这样的安排在两个同样遭受失业痛苦的国家是否真能成功实施还无法猜测。但是德奥政治结盟的冲动可能已经证明不会太受欢迎。因为无论如何,这个计划在协约国特别是法国看来都是“大德国”的幽灵,而且国际法庭也会否决这个方案。

纳粹党、民族党、退伍军人组织“钢盔团”、容克地主的农业联盟、工厂主和从前的王室代表组成了一个反对布吕宁的联盟。这个联盟有强大的财政来源、群众支持,甚至还有纳粹冲锋队和党卫队这样的私人军队,以及其他一些准军事组织。由于左翼已经分裂,除了掌握军队的兴登堡之外,这个新生右翼联盟通向政治胜利的道路毫无障碍。1932 年初,希特勒受邀到煤钢巨头

们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他已经赢得了这些巨头的财政支持。希特勒的某些信徒当时迫不及待要发动一次新暴动，但是希特勒不许他们行动，因为他相信纳粹党可以合法地取得政权。

在 1932 年 3 月的总统选举中，希特勒作为纳粹党候选人、兴登堡作为天主教中心党、社会民主党及其他温和派政党的候选人参选。希特勒获得了 11,338,571 票，兴登堡获得了 18,661,736票，比规定多数少了 0.4%。在最后的选举中，民族党支持希特勒把选票拉到了 1340 万张，但是兴登堡还是赢得了 1936 万票。然而，作为温和派候选人当选的这位 84 岁高龄的元帅本人已经不再是温和派，反而成了容克地主和军队的工具。

为了应付来自政府的压力，布吕宁和兴登堡试图取缔纳粹冲锋队和党卫队，但是遭到了施莱歇尔等人的坚决反对。兴登堡发现自己纳错了谏，他告诉布吕宁自己将不再签署任何紧急政令，布吕宁随即辞职。施莱歇尔又说服兴登堡任命了天主教贵族也是天主教中心党的极右翼成员弗朗兹·冯·巴本(Franz von Papen，1879—1969)为总理，巴本成立了一个由其他贵族组成的内阁。

然而，天主教中心党却不承认没有任何政治党派或集团支持的巴本。纳粹党也只是暂时容忍了巴本，因为他同意取消对纳粹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禁令。事实证明，巴本在对外政策方面比布吕宁成功，因为协约国放弃了《杨格计划》而要求德国只需向一个用于全欧洲重建的基金支付 30 亿金马克。

1932 年 7 月 31 日，应巴本的要求举行了新的国会议会选举。巴本原以为纳粹党的巅峰时期已过，其选票会减少，随后他们就会在新政府中采取合作态度。然而，早在 7 月 20 日巴本解散了普鲁士的政府，原因是它不能维持公共秩序，在普鲁士已经

发生了 500 多起纳粹冲锋队与其所谓敌人的冲突。结果这一举动正中希特勒下怀,他因此赢得了 230 个席位从而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共产党也获得了胜利,受损的主要是社会民主党。民主党和人民党几乎从国会中消失了。

巴本失算了。他当时是想吸收一些纳粹分子进政府,但是纳粹党要求得到总理职位,而兴登堡又不准备把它交给希特勒。于是巴本决定解散国民议会并重新选举。如此反复进行,巴本希望每次都能削弱希特勒的势力,直到希特勒转而支持自己并且接受一个副职。巴本还向支持希特勒的实业家施加压力,结果导致纳粹党的经费开始枯竭,给希特勒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困难。1932 年 11 月 6 日的选举证实了巴本的预计,纳粹党的席位从 230 下降到 196。尽管共产党实际上获得了胜利,但是巴本也赢得了支持。

于是,备受鼓舞的巴本设计了一项有可能使魏玛共和国更接近总体国家政策的宪法修正案,即把政权还给有产阶级的精英。施莱歇尔一方面奉劝兴登堡相信这个方案很幼稚,另一方面也极力试图组成一个新的多数派。但是正走下坡路的施莱歇尔最终失败了,这就为希特勒扫清了道路,他现在成了既有系统规划又有公众支持的唯一人选。于是,希特勒要求出任总理。巴本同意了,但是前提条件是希特勒必须严格按照议会程序处理政事。他本人则将出任副总理。巴本还以为自己能够控制政府,因为 11 位部长中只有 3 位是纳粹党员。所以他劝说兴登堡接受了希特勒出任总理。然而,巴本低估了希特勒。尽管希特勒向兴登堡发誓他将维护宪法,但是他没有遵守诺言。从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出任总理的那一刻起,魏玛共和国就注定要灭亡了。

三、1933—1939 年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

在掌权的第一周,希特勒就致力于将他的总理任期变成独裁统治。他解散了国民议会,要求重新选举。在大选期间,纳粹党的反对者都遭到了暴力和威胁的恐吓,并且被剥夺了听广播的权利,也不能自由使用新闻媒体。2 月 27 日夜,国会大厦神秘失火。听说这个消息后,希特勒兴奋地大叫:"现在我可以收拾他们了。"因为他知道这场大火可以用来栽赃共产党。第二天早上,4000 名共产党员被捕,到了中午,希特勒已经说服兴登堡宣布紧急状态中止公民的基本权利。逮捕、无限期的拘留和恐怖活动充斥全国。德国事实上成了独裁国家。

然而在 3 月 5 日的选举中,纳粹党只赢得了 44%的选票,在国民议会中获得了 288 个席位。于是希特勒用纳粹冲锋队不断实施恐吓,骚扰国民议会。结果在 3 月 23 日的投票中,除了 94 位社会民族党议员(共产党被取消了席位)以外,所有人都支持通过授权法案取消了魏玛宪法。与墨索里尼不同的是,希特勒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获取了政权,并且利用议会实现了自己的独裁统治。

1. 独裁统治

此时的希特勒可以为所欲为,不受法律的羁绊了。他组建了以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1897—1945)为部长的宣传部,剥夺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并且从柏林直接任命可以凌驾于地方议会之上的行政长官。1934 年 8 月兴登堡去世,希特勒成

为德国总统兼总理,但是他更喜欢“元首”的称号。这次新变动受到公民投票的支持,当时希特勒赢得了88%的赞成票。

反对希特勒的政党都被强行解散。1933年5月政府取缔了共产党和社会党。1933年6月民族党自行解散。1933年7月政府又取缔了天主教政党。1934年2月取缔了所有主张君主制的团体。钢盔团则被并入了纳粹党。1933年7月,纳粹党正式宣布成为德国的唯一合法政党。

对于缺乏民主传统的德国人民而言,纳粹的吸引力不仅在于他们对议会制度的“混乱”不满,而且也因为他们更愿意接受一个做什么事都能在民众中引起共鸣的强势人物。在1933年11月的选举中,没有反对党候选人,92%的选民都投票支持纳粹党,在661个席位的议院中只有2名非纳粹党代表。就像在法西斯意大利和共产主义俄国一样,纳粹党得到青年团体的支持,从而很快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地方组织,该组织遍布德国并且吸收了身居国外的德国人。

然而在纳粹党内部,那些笃信希特勒关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激进言论的纳粹分子制造了麻烦。这些纳粹分子很多都集中在冲锋队,其成员大多来自于下层阶级,希特勒对待冲锋队的方式让他们很苦恼。他们对希特勒的上台功不可没,现在却成了希特勒的绊脚石。冲锋队不再受尊重,当然也不像党卫队特别是军队那样得到希特勒的支持。

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指挥并亲自参加了通常也被称做“长剑之夜”的“血腥清洗”。包括恩斯特·罗姆、天主教行动会的头目、施莱歇尔及其妻子在内的1000多人被杀。为了给这次大屠杀和软禁巴本的行为辩解,希特勒宣称冲锋队正在策划发动政变,而那些异己分子和违背公共道德的人(因为罗姆是同性

恋)也必须肃清。在此之后,对希特勒来说就不存在任何有影响的反对派了。

2. 实践中的种族主义和政治理论

授权法通过后不久,希特勒开始了打击犹太人的活动。在人口接近6000万的德国,有工作的犹太人只占总人口的不到1%。但是,犹太人是各专业领域和艺术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为德国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由于大部分犹太人都是爱国的德国人,如果允许的话,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可能成为纳粹党员。然而,反犹太主义的纳粹学说却无情地排斥他们。

种族主义现在成为德国国家政策的一部分。犹太人经营的生意和从事的职业都受到联合抵制,他们也被禁止从政。1935年9月15日的《纽伦堡法案》规定,祖父母中只要有一方为犹太裔的人都属于犹太人,这些人不享有德国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的"种族污染"行为。禁止犹太人悬挂国旗,写作或发表文章,举办画展或者音乐会,在舞台或者荧屏上表演,在任何教育机构执教,在银行或者医院工作,进入政府的劳动或专业机构就职,以及出售书刊或古董。他们没有资格享受失业保险和救济。很多城镇和乡村甚至不允许犹太人在他们的社区内居住。

1938年11月,一个17岁的犹太男孩因为无法忍受父母被迫害而开枪打死了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名秘书。两天后,一伙有组织的德国暴徒就洗劫了德国境内所有的犹太商店,焚烧和炸毁了犹太教堂,闯进犹太人的家里袭击住户并且盗取他们的财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水晶之夜"或者"碎玻璃之夜",

即使在外国观察家看来,该事件也清楚地表明德国已经正式推行反犹太政策。随后,德国政府就强迫犹太人修复那些受到破坏的财产并且缴纳罚款。犹太人被迫使用特殊的名字,佩戴黄色的大卫之星(Stars of David),并且都被送到所谓的德意志帝国"犹太人联合会"。然而把犹太人驱逐到聚居区的做法还只是个开始,二战期间纳粹就用毒气室对犹太人实施肉体上的消灭了。

对"种族纯正"的狂热追求促进了对优生学的研究、大规模运动会的举行、对身体健康的崇拜,以及把希特勒吹捧成事实上的救世主。金发、碧眼、完美的"纯种日耳曼人"被迫早早地结婚并且生育很多孩子。当时的妇女一般到了 24 岁就被要求生育。为了保持种族纯洁,绝育手术也被引入德国以预防遗传病的发生。战争期间还对"劣等"种族的人们包括犹太人、波兰和其他的斯拉夫人、吉普赛人实施了恐怖残忍且没有任何科学价值的药物实验。这些行为都是纳粹"优生学"法规的直接后果。

外交方面,德意志种族主义提出征服所有德国人居住的领土是合法的。生存空间理论(不断扩大的"日耳曼种族"需要"生存空间")又主张兼并非德国人居住的地区也是合法的。希特勒甚至宣称德国人有权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因为他们是上等民族。

有些德国知识分子还把德国的历史追溯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称其为德意志第一帝国。既然一战已经终结了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国,他们希望缔造第三帝国,吞并旧有的领土,而不管现在是谁居住在那些土地上。这也是希特勒用"第三帝国"这个术语来描述他宣称会延续一千年的纳粹德国的用意。以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1869—1946)为首的"地缘政



1933年4月1日，纳粹在德国掌权不及三个月后开始抵制犹太人商业，柏林蒂茨商业街的一份告示写道："为了保护自己，德国人不要购买犹太人的商品。"(National Archives)

治学”教授们为生存空间理论提供了“科学”基础。豪斯霍费尔宣称英法已经衰落,小的国家必将灭亡,因此德国必须无情地扩张,占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区”进而统治世界。另一派理论则主张德国的未来取决于和苏联的结盟,从而将苏联取之不尽的劳动力与德国的工业生产效率和军事技术紧密结合。

希特勒还重建了德国的司法体制,废弃了传统的法律原则,而代之以他宣称可以让个人完全服从于人民的“人民”司法。由希特勒任命法官的人民法庭在 1934 年 5 月成立,主要审判各种叛国罪,这种犯罪现在已经从逻辑上延伸到包括了很多对“人民”的轻度侵犯行为。随即建立了很多用于关押国家敌人的集中营,而且这些敌人可以不用上诉就被处决。1933 年 4 月在普鲁士正式组建的盖世太保(秘密国家警察)到 1934 年已经遍布全国,他们可以随意拆阅私人信件、窃听电话以及对公民进行监视。

所有经济生活都在帝国的统摄之下。农业方面,纳粹的目标是实现自给自足和控制农民阶级。容克地主受到保护,帝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剥夺他们的巨额财产。1933 年通过了一部特别法,保护小农场不被强制出售和抵债,此举又为希特勒赢得了小农场主的支持。但是要由政府决定农场的必要产量,确定农场的价格、工资以及分配农场产品的费用。荒废的土地都被重新耕种,城市居民也不得不在温室里种植蔬菜以备战争之需。

工业方面,希特勒在 1933 年宣布了一个四年计划,1936 年又公布了第二个。第一个计划的目标主要是复苏经济。男女劳改所、重整军备,以及公共建设工程都帮助降低了失业率。第二个计划是为了备战而制定的。原材料的产量增加了,这些材料首先供应给军队和其他战争相关产业,劳动力也以类似的方式

分配，物价和外汇都受到控制。为了快速调动货物和军队，国家还修建了战略高速公路（Autobahnen），这也是最早的现代高速公路。

1933年纳粹党取缔了所有的工会，1934年又取缔了雇主协会。为了取代这些组织，他们成立了一个包括所有雇佣劳动者、工薪阶层、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雇主的劳动阵线（Labor Front）。工人无权罢工和停工，但是只要接受这个体制，他们就有保障获得工作。另外，劳动阵线还是一个间谍组织，长期警惕工厂里的反纳粹主义者，并且可以降低他们的工资，解雇甚至把他们送进监狱。

第二个四年计划开始实行时，工人的流动性已经减弱。每个工人都有一个工作簿详细记录着他们过去受过的培训和从事的岗位，除非国家认为更合适，否则他们不能得到新工作。所有的中学毕业生都必须到劳动就业机关登记注册，达到劳动年龄的男女都可以被征募为劳工。就在二战爆发前，所有的农业和矿业工人以及某些工厂工人都被固定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与此同时，大企业联合成了德国工业组织的普遍特征，这是一种国家控制下的营利性垄断体制。经济部长有权控制工厂的扩建和进出口，确定价格和成本以及分配原材料。

这些协调程序被应用到德国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教育和艺术。据说戈林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我一听到有人谈论文化，就会伸手拿我的左轮手枪。"希特勒本人的艺术观也极其简单：他谴责大部分现代艺术都是非雅利安的。于是，学校的课程（尤其是历史课）都必须按照纳粹的"鲜血与祖国"理论来教授。纳粹的种族理论、德国的辉煌历史孕育出的伟大成果、尚武精神，以及健壮的体魄都是新教育的基础。



图为第三帝国时期一名德国妇女在向希特勒欢呼时失声痛哭的场景。这幅颇有感染力但却日期不明的照片并没有表明这位妇女哭泣的真正原因。她是因看到元首后感情失控而哭泣?抑或是因为她了解甚至亲历了纳粹制度的残忍在并不情愿的欢迎仪式上流露出的忧伤?(Franklin D. Roosevelt Library)

新教和天主教的基督教会对纳粹党来说都是麻烦。希特勒的极端主义信徒主张恢复神秘的异教信仰和瓦格纳歌剧所赞美的德国传统众神。作为一名天生的天主教徒,希特勒本人曾经说过德国就是他唯一的神。但是权力政治要求他与教会妥协,因为教会仍然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为了避免国家的控制,路德教的牧师在 1933 年组织了一次全国大会,但是由于纳粹党委派了自己的主教,大会险些被纳粹势力立刻接管。极端纳粹分子企图取消圣经和废弃十字架的行为也引起了不满。

1933 年 7 月,希特勒和梵蒂冈达成了一项宗教协议(也是纳粹的第一份国际条约),保证信教自由并允许学校里有宗教课程,天主教徒有权成立青年团体和指定神学教授。然而纳粹党并没有遵守这些条款。天主教会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天主教孩子在希特勒的青年团体中接受的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反对的。1937 年,教皇还颁布了一道教谕批判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天主教徒仍然支持希特勒的领土野心,教会在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方式问题上也采取了模糊立场。总的来讲,希特勒谨慎避免了与教会的直接冲突,教会也保持了沉默。

四、伊比利亚的独裁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年代,不仅在意大利和德国,而且在西班牙、葡萄牙、哈布斯堡帝国的继承国(捷克斯洛伐克除外)以及东欧和东南欧的其他国家都出现了非民主的独裁政府。

1. 西班牙

1918 年的西班牙仍然存在地方忠诚与民族情感的斗争。

加泰罗尼亚人(Catalonians)和巴斯克人(Basques)继续为建立独立国家而斗争。虽然天主教曾经在中世纪团结西班牙人战胜了穆斯林,16 和 17 世纪又打败了新教徒,但是教会已经不再是一种足够强大的团结力量了。尽管西班牙有时也能在农业和工业原料方面基本自给自足,但是其土地贫瘠、农业落后,而且农村地区人口过剩。贫穷随处可见,民众对国家领导者的不满日益增加。

西班牙还经受着声望降低的痛苦。它在 1898 年的短期战争中输给了美国,在一战中保持了中立。政府对于农业的发展几乎无所作为,加泰罗尼亚的农民得不到足够的土地养活自己。当时存在很多小块土地和很多大地产,但是没有富农需要的中等规模的土地。饲养的西班牙绵羊竞争力不及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的牧场羊群。由于运输不方便,从卡斯提尔(Castile)运到巴塞罗那的西班牙谷物比从北美洲运来的外国谷物成本还高。到一战时,除了软木之外西班牙在欧洲已经没有自己的出口市场了,但是从软木出口中受益的是已经最发达的地区,由此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

西班牙工业以纺织业为主导,但是其产品大都局限在棉花消费远不如东欧地区的国内市场。作为西班牙工业中最重要的部分,棉纺织业却不能像在法国、瑞士和比利时那样推动工业化发展到新阶段。而且,纺织业给西班牙带来的小规模繁荣也主要局限在加泰罗尼亚。西班牙几乎没有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煤炭,毕尔巴鄂(Bilbao)的钢铁业直到 1914 年都在使用英国的煤炭。西班牙的铁路系统也不得不依赖英国的投资,直到一战迫使其缩减进口量,西班牙所有的铁轨和车辆都要依靠进口。简言之,西班牙没有取得现代工业化的突破,农业水平仍然很低,

贫富差距非常严重,而且这些情况似乎并没有改善的迹象。

当西班牙人转向革命学说时,他们主要接受的是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信仰,随后是索勒尔的工团主义。事实上只有西班牙才真正坚持了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加泰罗尼亚的产业工人和不再参加弥撒的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农民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想要完全毁掉这个国家而不是征服和利用它。然而,无政府主义尽管在巅峰时期达到了 100 至 150 万信徒,它也只能袭扰而不能推翻政府。这场运动具有深刻的清教徒主义和反天主教性质。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们不仅焚烧天主教堂而且杀死了教士。暗杀风潮把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General Miguel Primo de Rivera,1870—1930)推上台,他从 1923—1930 年一直掌握西班牙政权。期间,他宣布了戒严令,解散了西班牙议会,实行审查制度,并且把自由主义评论家都流放到了国外。

20 世纪 30 年代,西班牙还有一个力量不断增强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政党。该党拥有自己的工会联盟,他们发展的第一股力量主要来自卡斯提尔以及西班牙北部矿业和钢铁制造中心的城市工人。1931 年西班牙成为共和国时,社会主义党又增加了许多农村支持者。1934 年其成员达到了 125 万。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是温和派,他们曾拒绝加入 1920 年的共产国际(Comintern),但是几年后还是加入了复兴的第二国际。政见不同者就组建了一个小共产党,而加泰罗尼亚人还有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组织。

西班牙王室正统派(Carlism)是极右势力,起源于 19 世纪的一场支持觊觎王位的唐·卡洛斯(Don Carlos,1788—1855)的运动。西班牙王室正统派主张重建宗教裁判所,他们视铁路和电报为罪恶之源,并且反对哥白尼的宇宙学说。西班牙王室正统

派也拥有很多下层支持者,尤其是西班牙北部纳瓦拉(Navarre)的造反农民。

国王阿方索十三世(King Alfonso XIII,1886—1931 年在位)在西班牙执政到 1931 年。"自由党"和"保守党"利用贿选和恫吓在政府中轮流执政,但真正的权力在地方权贵手中。这些轮流执政的政府只控制着其实很小的政治中心。西班牙战时中立带来的繁荣一结束,无政府主义者、左派和极右势力之间的冲突就使很多人感觉普里莫将军的统治很有必要。

普里莫辞职和去世后,阿方索国王恢复了宪法。1931 年 4 月举行的地方选举被视为是对君主制的一次全民投票。结果,代表城市下层中产阶级、小商人、知识分子、教师和记者的共和党人赢得了胜利。阿方索国王没有退位就离开了西班牙。1931 年 6 月的立宪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共和—社会主义多数派,11 月份国民代表大会就宣布禁止阿方索回国并且没收了他的财产。于是,西班牙成了共和国。

1931 年 12 月,国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规定了一个责任制内阁、一院制议会,以及由选举院挑选的总统,选举院由议会和公民投票产生的同等人数的选举人组成。然而很明显,一旦机会成熟,军队就会起义反对这个共和国,并且得到教会和大地主的支持。另一方面,共和国只是暂时得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拥护,并没有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所以它其实面临着来自左派和右派两方面的威胁。

第一次危机出现是由于新宪法对教会地位的规定。国民代表大会拒绝了很有可能被大多数天主教徒接受的温和提案,即保留教会作为一个特殊的社团,让其拥有自己的学校。相反,它通过的法律非常极端,不仅关闭了教会学校,两年后又取消了国

家给教会的拨款。这就使共和党人失去了很多支持者,特别是那些下层教士。

1933 年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大规模起义表达他们的不满,政府用武力镇压了起义。监狱已经爆满,失业率也居高不下。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使共和国失去了左派的很多支持,但是又没有从右派赢得支持。右派在 1933 年 11 月的选举中迅速回升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于是,政府只能无助地倒向右派,许多它以前的法规,特别是针对教会和工人阶级的法律都未能实施。

此时社会主义者为争取西班牙工人的忠诚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竞争,罢工和骚乱急剧增加。1934 年 10 月,社会主义者呼吁大罢工以抗议政府吸收了法西斯主义者,结果宣布成为独立共和国的加泰罗尼亚被剥夺了自治权。西班牙北部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地区的煤矿工人在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下发动起义,最后不仅被镇压而且死了 3000 多人。强烈的仇恨直指新任国防部长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将军。

于是右派也失去了很多公众支持。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左派开始联合组成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参加 1936 年 2 月的选举。工团主义者第一次参加投票,并且支持了共和党人、社会党和共产党。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承诺赦免那些参与过暴动的人,左派最后获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左翼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1869—1946)并没有进入内阁而是参加了起义,他似乎是想获取政权,不过他没有自己的军队。因此只有在右派企图发动军事政变,政府武装工人对付右派,而且工人又最后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左翼革命主义者通往权力的道

路才可能打开。

同在1936年,西班牙右派中还出现了长枪党(Falange),这是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儿子何塞·安东尼奥(José Antonia,1903—1936)1932年创建的一个政党。作为法西斯主义者,安东尼奥并不反对土地改革和其他的社会主义计划。长枪党用一束箭和一个轭作为自己的标志,以“前进西班牙!”为口号。该党的纲领是呼吁在非洲扩大疆土,吞并葡萄牙,以及在南美建立帝国。长枪党像希特勒当时一样建立了青年团体和私人军队。尽管在1936年的选举中得票相对来说很少,但是它与军队、君主主义者、教士以及西班牙王室正统派的团体合作进行反革命活动。形势越来越明朗了,每个人都知道一场反政府的军事政变即将在西班牙爆发。果然,1936年7月在佛朗哥将军的领导下,政变就发生了。

西班牙内战(1936—1939)是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冲突中的第一个行动。交战双方都很残忍,同时又都强调原则和意识形态,所以民主国家的很多人对它的认识也不太一样,这一点与他们对30年后越南战争的感受很相似。1936年11月,右翼造反者扶持佛朗哥成为西班牙陆海空军参谋长。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果断援助下,佛朗哥的军队长驱直入夺取了最终胜利,1939年占领了共和国的要塞——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内战期间,软弱的共和国政府被很多工人委员会篡夺了职权,后来由拉尔戈·卡瓦列罗领导的人民战线政权于1936年9月上台执政。期间地方恐怖活动盛行,最初是无政府主义者制造恐怖,他们被镇压后就是苏联支持下的共产主义者无情地打击政府中的敌对左派政党。

佛朗哥政权借助其法西斯主义伎俩,在内战结束后仍然依

靠那些原来支持西班牙君主制的阶级,包括地主、军队和教会。城市和农村的穷人都反对这个新政权,但是由于各阶级都极其恐惧再次发生内战,他们又不敢公开反抗,于是佛朗哥一直统治西班牙到1975年去世。

2. 葡萄牙

就在同一时期,另一位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萨尔(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1889—1970)的上台阻止了西班牙长枪党吞并葡萄牙的阴谋。葡萄牙参加了一战。1910年共和政权驱逐了国王曼努埃尔二世(Manoel II,1908—1910年在位),并且一直统治葡萄牙到1926年被军事政变赶下台。两年后,在被授予了广泛经济权力的前提下,科英布拉(Coimbra)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萨拉萨尔出任葡萄牙财政部长。萨拉萨尔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对合理信贷的关注为他赢得了许多支持者,1932年他就出任首相并且逐步利用他的职权将其政党变成了葡萄牙人民的唯一合法选择。萨拉萨尔试图在日益加剧的欧洲冲突中保持中立,而且他的独裁统治并没有激起左派的实际反对。直到1968年萨拉萨尔下台,葡萄牙的海外帝国领地事实上仍然保持完整,只是他的独裁统治越来越僵化了。

五、哈布斯堡帝国的继承国

独裁主义右翼势力在东欧的胜利可能有几个原因:缺乏议会传统、没能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普遍畏惧布尔什维主义。或许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胜利

造成的表面印象。至少从 1935 年以后,成功的办法似乎就是穿统一的制服、宣布极端民族主义的教义,以及发动一场针对敌人和邻国的勇敢战争。

1. 奥地利

一战结束时的奥地利拥有大约 800 万人口,其中 200 万左右居住在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仍然是一个世界都市,但是已经不是一个大国的中心。尽管广大的物资供应地区需要市场,工业制成品的供应商也希望去农业省,但是维也纳还是被政治边界和关税壁垒与其原来的领土隔开了。1922 到 1925 年间,奥地利的财政处于国际联盟的直接监管之下。尽管 1919 年 3 月新奥地利共和国的议会投票同意了建立德奥同盟,但是这条唯一可能挽救经济的道路最终还是由于政治原因遭到了协约国的禁止。

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社会党之间的持续政治斗争使得经济生存和与德国联盟这两个问题变得复杂。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拥有众多城市支持者的温和派马克思主义政党。基督教社会党则是一个保守的教权主义政党,它在农村和城市下层中产阶级中拥有很多信徒,并且党内领袖有很多就是牧师。

20 世纪中期,这两大敌对政党都组建了私人军队:基督教社会党的军队叫家乡卫队(Home Guard),社会民主党的军队叫防御联盟(Defense League)。社会民主党统治维也纳,他们通过向富人征税启动了社会救济和保障工人住房的措施。1930 年以后,墨索里尼开始支持基督教社会党,使其增加了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前景。布吕宁的德奥关税同盟计划失败及其相关的维也

纳信贷银行破产使局势更加紧张。1931 年 9 月,家乡卫队发动的第一场政变以失败告终。1932 年筹备多瑙河经济合作计划的努力由于意大利和德国的反对也成了徒劳。1933 年初希特勒上台后,许多基督教社会党党员就公开加入了纳粹党。

然而,身为基督教社会党成员的奥地利首相恩格尔伯特·多尔夫斯(Engelber Dollfuss,1892—1934)却极力限制纳粹党。为此目的,他于 1933 年 3 月取消了议会政体,还禁止政治团体穿制服,并且试图驱逐纳粹党的煽动者。作为报复,希特勒把德国人前往奥地利旅游的价格定得极高。由于纳粹挑起骚乱,多尔夫斯又取缔了纳粹党。与此同时,多尔夫斯也打击社会民主党,取缔了除他自己的祖国阵线(由纳粹以外的所有右翼团体组成的一个同盟)之外的所有政党,并且建立了一种教权主义合作体制。一次对社会民主党总部的突然袭击引发了工人暴动。政府随即轰炸了社会民主党领袖避难的工人新公寓,此举虽然瓦解了社会民主党,但是也疏远了工人并使他们团结在政府的对立面。于是多尔夫斯不得不依靠意大利支持他抵御来自希特勒的威胁。

多尔夫斯的继任者库尔特·冯·许士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1897—1981)奉行相同的政策。但是墨索里尼此时需要希特勒支持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的侵略。许士尼格试图将权力集中在自己而不是家乡卫队手中。他还努力同法国及其盟国达成谅解以代替与意大利的关系,但是没能成功。为了避免暴力,他只好向奥地利纳粹党的首领阿塔尔·赛斯-英夸特(Artur Seyss-Inquart,1892—1946)做出让步。随后又到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在他的山区疗养院里拜访了希特勒,这次拜访让许士尼格倍感屈辱。希特勒以全面进攻相威胁,许士

尼格只好同意纳粹党加入祖国阵线,并且遵从希特勒指定的对外政策目标。另外,他还同意任命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而这正是指挥政变的理想职位。

回到维也纳后,许士尼格意识到自己已经背弃了奥地利,于是他呼吁立即进行公民投票,并且非常希望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这也促使希特勒采取来行动。3 月 2 日,希特勒不顾赛斯-英夸特的意见,入侵了奥地利,并且宣布奥地利成为德国的一个省。4 月,一场关于奥地利与德国结盟(也叫德奥合并)的公民投票获得了 99.75%的支持率,于是原本无所作为的前同盟国也终于可以为它们曾经的正确选择感到满足了。

2. 匈牙利

1918 年 10 月 31 日,距离一战宣布停战还有 11 天,卡罗伊·米哈伊伯爵(Count Michael Károlyi,1895—1955)出任匈牙利总理。此前匈牙利已经终止了与奥地利的联系。卡罗伊是匈牙利最富有的大土地贵族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民主党人。为了证明自己作为社会改革家的诚意,他把自己的五万英亩地产拿出来分给了农民并且制定了一部土地改革法。他还尽一切努力希望与少数民族达成和解契约,但是这些少数民族不愿再相信任何马扎尔人。协约国军队的法国元帅要求匈牙利人撤出斯洛伐克。于是 1919 年 3 月,卡罗伊宣布辞职以抗议匈牙利失去特兰西瓦尼亚。

受挫的民族主义与日益增长的激进主义相结合。由列宁的追随者贝拉·库恩(Béla Kun)领导的左翼政府开始上台执政。库恩在匈牙利颁布了革命性的国有化法令并且建立了苏维埃政

治体制。协约国当然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布尔什维克留在匈牙利。于是，罗马尼亚人入侵匈牙利并且赶走了库恩。1919 年全年一直到 1920 年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占领着匈牙利并且掳走了一切可能搬走的东西。与此同时，在法国的保护下，一个反革命政府重现布达佩斯。由于哈布斯堡国王的缺席和不受欢迎，出身上流社会的海军上将尼古拉二世·霍尔蒂(Admiral Nicholas Horthy，1868—1957)于 1920 年 3 月成为匈牙利名义上的统治者和国家元首。

1920 年 6 月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the Treaty of Trianon*)给匈牙利造成的损失包括：一小块狭长地带割给了奥地利，特兰西瓦尼亚给了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给了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连同其他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领土都给了南斯拉夫。从此以后，匈牙利统治集团最重要的政治议题就是修正主义，也就是努力修改这个条约并拿回这些土地。

然而，大多数匈牙利人相对来说并不关心修正主义。因为，匈牙利没有土地改革，最大的地产没有变化，贵族和绅士阶层仍然处于支配地位。议会制政府的背后其实是专制独裁政权统治着这个国家。这个专制政权由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辅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表现出法西斯主义特征。1927 年与意大利缔结的一项条约使匈牙利与墨索里尼开始了密切合作。

在意大利人向匈牙利人提供武器的同时，希特勒也支持匈牙利与他一起搞修正主义。奥地利落入希特勒之手后，匈牙利也成为他的囊中之物。1939 年 3 月希特勒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时，匈牙利人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最东端的卢西尼亚和斯洛伐克的一小部分地区。为了贯彻修正主义，匈牙利人不得不追随希特勒，因为只有他才能提供机会让匈牙利人按照自己的意愿

重新划定版图。二战爆发前,匈牙利也退出了国际联盟,并且按照纳粹的方式颁布了反犹太人的法律。不过,希特勒也需要罗马尼亚,所以他并不会把特兰西瓦尼亚全部拱手让与马扎尔人。匈牙利也因此继续依赖德国的外交政策。

3. 南斯拉夫

1918 年 12 月宣布成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联合王国,是来自奥地利、匈牙利以及原塞尔维亚王国的南斯拉夫人第一次组成一个国家。从领土的角度看,它基本上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国家,所以修正主义对它来说不是主要问题。但是这个新国家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满足各个民族团体诉求的政府体制。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失败了,南斯拉夫建立了独裁政权。

塞尔维亚人的政治野心推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塞尔维亚的人口数量比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人口的总和还多,所以很多塞尔维亚人认为这个新国家应该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塞尔维亚”。这些信奉东正教、使用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经历过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后来又获得解放的塞尔维亚人常常瞧不起克罗地亚人。信奉罗马天主教、使用拉丁字母、几个世纪以来都反对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的克罗地亚人则倾向于认为塞尔维亚人是野蛮的东方人,所以应该让他们在新国家中完全自治。于是,战线便拉开了:塞尔维亚支持的集权主义对抗克罗地亚支持的联邦主义。

克罗地亚人在其农民领袖斯蒂芬·拉迪奇(Stephen Radić, 1871—1928)的领导下,联合抵制 1920 年的立宪会议。塞尔维亚人则通过了一部宪法准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

双方都拒绝让步。1928 年 6 月拉迪奇在国会的议员席上被谋杀,由此引发了一场危机。直到 1929 年 1 月国王亚历山大二世(King Alexander II,1921—1934 年在位)宣布实行王室专政,危机才得以平息。亚历山大试图通过取消过去人民对地方的效忠来解决问题。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地方政权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流经那里的主要河流命名的新的行政单位。整个国家也重新命名为南斯拉夫,以表明不再有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但是它仍然是塞尔维亚人的政府,这一点克罗地亚人不会忘记。选举由政府操纵,所有的政党都被解散。

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加强了克罗地亚极端主义者的力量,他们希望像哈布斯堡时代那样,有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于是在南斯拉夫的敌人即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支持下,他们把自己的独立要求与恐怖主义结合起来。这些克罗地亚极端主义者被称为乌斯塔沙(Ustashi)(造反者),他们得到墨索里尼的帮助。1934 年 10 月亚历山大在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遭到暗杀,乌斯塔沙与这件事有很大关系。随后亚历山大的堂弟摄政,继续在南斯拉夫实行独裁统治。直到 1939 年夏,政府才与克罗地亚人达成协议同意建立一个自治的克罗地亚。但是当时已经太晚了,因为战争很快就吞食了巴尔干半岛。

六、欧洲其他独裁政权

在波兰,为独立而长期奋斗的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Marshal Jósef Pilsudski),于 1926 年 5 月 11 日发动了一场反对民主政府的军事政变,并且建立了以他为首的空前独裁的军事专政统治。这次政变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政府没有给

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也没能解决战争和波兰被占领期间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导致政党分裂的极端仇恨使毕苏斯基的统治更加容易。他一赢得政权,就求助于大地主和大工业家,依靠他们的支持和他自己的军事集团建立了政府。

在罗马尼亚,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腐败与议会体制共存。罗马尼亚也存在普遍的反犹太主义,这是罗马尼亚法西斯政党铁卫军(the Iron Guard)的主要纲领。这些铁卫军身穿绿衬衫,脖子上挂着装有罗马尼亚土壤的小包。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们开始暗杀温和派政治家。世界范围的农业萧条带来的经济混乱和农民们的不幸,增强了铁卫军和其他法西斯团体的力量。为了阻止铁卫军的政变,国王卡罗尔二世(King Carol II)于 1938 年建立了自己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尽管铁卫军的首领们都"在试图逃跑时被枪杀",罗马尼亚还是不能避免来自德国的压力。在希特勒同意苏联夺取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Bukovina),并且把特兰西瓦尼亚北部(1940 年 8 月)给匈牙利之后,卡罗尔就被迫退位,希特勒的人在铁卫军的支持下接管了罗马尼亚。

在保加利亚,共产主义的威胁是一个严重问题。而且,保加利亚像匈牙利一样追求修正主义,因为它没能按照与南斯拉夫和希腊签订的和平条约得到马其顿。成千上万马其顿难民的出现使这一问题更加紧张,这些难民都想加入革命的恐怖主义国家。保加利亚没有严重的少数民族问题,没有富裕的地主,没有贵族,也没有大企业,但却产生了比那些存在普遍经济不平等的国家更激烈的政治反抗。1920—1923 年间,农民政治家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Alexander Stambolisky,1879—1923)执政是保加利亚政府相当受欢迎的时期。但是即使是他也要压

制媒体,因为他要同时对付马其顿恐怖分子和共产主义者。征收高额所得税也使他疏远了中产阶级。1923年,右翼分子谋杀了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并且建立了强有力的独裁政权。从那时起,共产主义的阴谋、爆炸和马其顿恐怖分子的争斗就折磨着这个国家。1930年后,鲍里斯国王(King Boris,1918—1943年在位)与意大利人结婚,并且因此与墨索里尼建立了关系。1934年一伙军官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裁统治。但是1936年鲍里斯国王又强行建立了王室专政,其统治一直持续到二战期间他去世。

希腊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主要问题是应该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以及如何克服因为从土耳其迁移来125万希腊人所产生的经济难题。在政体问题上,希腊人摇摆不定,他们1920年投票赞成君主制,1924年又赞成共和制,1935年又回到了君主制。经济混乱加强了难民和工会组织中的共产主义力量。政治不稳定是长期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很多次政变,有些是共和主义的将军发动的,有些是君主主义者发动的,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是独裁主义者。其中最后一位政变者约翰·迈塔克萨斯将军(General John Metaxas,1871—1941)是最大的法西斯主义者。1936年8月迈塔克萨斯实施独裁,他废除政党,实行审查制度,对其反对者进行政治迫害,但是也实施了一项公共建设工程计划。

巴黎和会期间成立的这些新国家被迫保证在其境内公正、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战胜国并没有做这样的承诺)。结果尽管程度不同,却没有一个国家履行承诺。它们不仅实行系统的种族歧视政策,而且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的所有国家很快都恢复了独裁政体,它们主要是通过编写自己的辉煌历史、排外,以及

法西斯国家的独裁主义来完成这种复辟的。然而这些东欧政权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因为在意大利和德国,政权至少最初是依靠相当多的民众支持的,尽管这种支持往往靠宣传来维持。但是在东欧,独裁统治依靠的却是警察、官僚机构和军队,而不是大众。大部分独裁者(佛朗哥是个例外)都制造个人崇拜。大多数国家(但不是全部国家)的犹太人都遭到有组织的迫害。不过,尽管不同的法西斯国家有很多共同点,法西斯主义却从来没有成为共产主义明确追求的那种普及的国际运动。

七、苏联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危机中,苏联原来的独裁政府变成了极权主义独裁统治,尽管这是一个左派而非右派政府。俄国从 1914 年起就一直处于混乱中。1921 年,随着内战的结束,其工农业遭到严重破坏,物资配给接近崩溃,共产主义政权也面临着失去公众支持的危险。1921 年初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者叛乱,直到 1922 年中期才被平息,当时列宁曾表示他非常担忧国家的未来。1921 年 3 月,彼得格勒(Petrograd)附近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的水兵发动兵变,并且由此引发了政策变化。兵变者呼吁通过普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没有共产主义者的苏维埃”、言论和集会自由、释放政治犯、取消粮食征收政策。托洛茨基(Trotsky)这时意识到无产阶级自身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他们显然需要进一步的教化。革命也不大可能会席卷欧洲,俄国在一段时间内将是资本主义海洋中一块革命的社会主义小岛。于是,托洛茨基动用红军镇压了叛乱。与

此同时,列宁也开始进行经济改革。

喀琅施塔得叛乱直接导致了新经济政策(经常用其首字母简写为 NEP)的实施。但是这种转变的深层次原因是重建的需要,而重建似乎只有通过至少是暂时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才可能实现。其次,安抚农民和避免更多大范围的叛乱也是非常必要的。最后,既然预计的世界革命还没有发生,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源对协助俄国的重建就很有帮助。

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政府不再征收农民的全部粮食,而只征用满足军队、城市工人和其他非农业群体的最低需要所必需的数量。农民仍然需要负担很重的粮食税,但是已经允许他们出售余粮。整个体制倾向于使富农更富,使贫农变成没有土地的雇佣劳动者。

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国家对经济的其他方面(包括重工业、银行、交通和外贸)仍然处于列宁所说的“控制地位”。但是在国内贸易和轻工业方面,私营企业重新获得了经营许可。这就是所谓的经济中的私有资本部分,这些部门的工人可以根据其产量获得报酬,工厂管理者可以用部分产品交换原材料。

列宁本人称新经济政策是对资本主义的局部回归,他鼓励共产主义者学会做生意。但是新经济政策一直只是准备作为权宜之计来实施的。列宁认为,还需要 20 年才可能使俄国农民相信合作农业会更高效。而且,暂时放松政府干预将增加工业的产量,同时有效地帮助俄国人提高经营技巧。

经济复苏的确实现了。到 1928 年,苏联的工农业生产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然而共产主义的领导们并不喜欢新经济政策,他们对自己信仰的全部教条都被颠倒过来感到非常震惊。怀有敌意的官员常常用卑鄙的手段迫害那些借助新经济政策获

益的人,这些官员设法减少他们的赢利、对他们课以重税、以投机的罪名把他们送上法庭。富农(Kulaks)基本也有相同的经历。所以,政府经常是出于经济原因好像在鼓励私营企业,但是同时又出于政治原因妨碍其发展。

1.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夺权力的斗争(1921—1927)

在经历了一次暗杀袭击和 1922 年 12 月的一次中风发作后,列宁于 1924 年 1 月去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他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又影响到列宁的继承人问题。他们对"如何管理工业","给有组织的工人什么样的地位"以及"与资本主义世界要维持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取决于对实际形势的评估,也要猜测什么答案可能带来政治优势。1928 年胜出的共产党书记约瑟夫·斯大林正是得益于巧妙回答了这些问题。

1921 到 1927 年期间,特别是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为争夺权力展开了一场殊死斗争。列宁早已预见到这场斗争,并且十分担忧。列宁认可托洛茨基的才干,但是担心他过于自信。列宁也清楚斯大林利用共产党书记的职位已经大权在握,但是他担心斯大林不懂得如何运用权力。斯大林曾经违背他的命令粉碎了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共和国而不是与其领导人达成和解,列宁对此颇为愤怒,甚至提到斯大林应该被革除总书记职务。

那些年,托洛茨基主张在工厂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管理队伍,让计划经济成为政府可以用来控制和指挥社会变革的工具。他赞成农业机械化和通过鼓励农村合作来削弱农民的个人主

义。但是随着权力的逐渐丧失，托洛茨基开始支持共产党个人批判政府的权利。他还断言，只有其他国家也爆发革命，才可能使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最终目的。只有先进西方国家的工业产品和技术手段都在共产主义的支配下，苏联才有希望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要么世界革命必然爆发，要么苏联社会主义注定失败。

托洛茨基的反对者找到了他们的主要发言人，这就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真理报》编辑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1888—1938）。作为新经济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布哈林缓和了严格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提出只要无产阶级国家掌握对大资本的控制权，社会主义一定能取得胜利。这种观点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渐进主义立场比较接近。布哈林不相信快速实现工业化。他支持合作农业，但是反对（从理论上讲）什么东西都由农民集体占有的集体农业。在外交方面，布哈林迫切希望与可能对苏联有用的非共产主义集团合作。他还主张苏联与中国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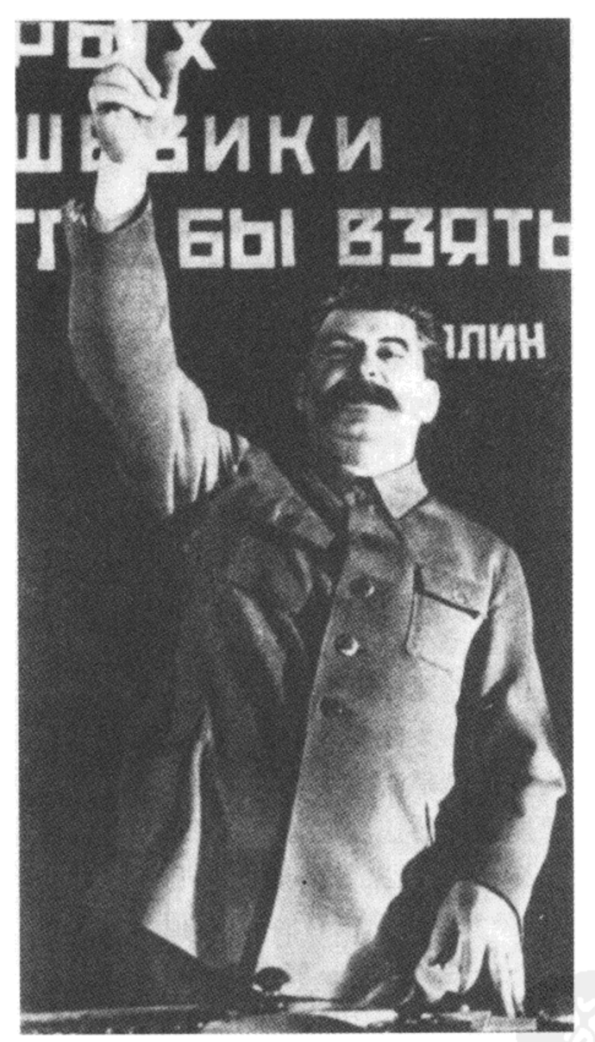
斯大林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利用布哈林的观点败坏了托洛茨基的名声，然后又利用托洛茨基的许多政策除掉了布哈林。斯大林开始赞成快速实现工业化，并且认识到这就意味着一个空前巨大的资金投入。1927 年底，由于苏联农业的产量已经跟不上工业发展的步伐，斯大林改变了原来支持农民的立场，公开倡议实行农业集体化，宣称农业必须像工业一样被改造成一系列大规模的统一企业。

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只在一个国家不可能实现的观点，他坚持认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存在。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因为斯大林强调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能够鼓舞和帮助各地的共产主义运

动。而且在各地共产主义者取得胜利之前的过渡时期里,强大的俄罗斯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以存在并且进行地区性扩张。在国际关系方面,该理论允许苏联在认为最有用的时候奉行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在认为恰当的时候也可以奉行武装支持共产主义革命的政策。斯大林的理论反映了他本人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这不同于托洛茨基更倾向于普世主义和西方的观点。

内战快结束时,斯大林担任民族人民委员,负责处理新生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 1.4 亿居民中 6500 万居民的事务,并且主管创建新亚洲"共和国"的工作。这些共和国只要是以共产主义的方式管理,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政府存在,可以有自己的经济和教育发展规划,也有机会使用自己的地方语言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事业。1922 年,斯大林建议成立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取代当时的共和国联邦。在新苏联中,莫斯科将控制战争、对外政策、贸易和交通,以及调配财政、经济、食品和劳动力。从理论上讲,共和国可以管理国内事务、司法、教育和农业。各民族团体选出同等人数的代表组成民族理事会(Council of Nationalities),理事会作为上议院加入最高苏维埃(the Supreme Soviet),由此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部长理事会(the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也就是苏联政府。

斯大林也是工农监察人民委员,职责是消除政府机关各部门的无能和腐败,以及培养新的公务员队伍。他的工作小组在政府各部门间自由活动,视察并建议改革。尽管这种监察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但是它的确赋予了斯大林控制成千上万的官僚进而控制政府机构的权力。



图为约瑟夫·斯大林正在向1933年的共产党代表大会发表讲话，这一“铁人”至此已经消灭了所有现实或潜在的竞争者，成为苏联的真正主宰者。(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斯大林还是苏共政治局的成员。苏共政治局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是一个非常小的党首组织,整个内战期间只有五个人。斯大林的工作是对共产党进行日常管理。他还是政治局与组织局之间唯一的常务联络官。组织局负责安排党内人员在工厂、机关或者军队单位担任各种职务。除了这些职位,斯大林还于1922年出任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主要负责安排政治局会议的议程,为会议讨论的要点提供参考文件,以及将决定传达给下级机关。斯大林控制着所有党内职务的任免、提拔和降职。他确保所有的地方贸易组织、合作组织和军队单位都由对他负责的共产党员控制,而且还掌管着记录全部工厂管理者和其他党员的忠诚和功绩的档案。1921年苏共成立了一个有权开除表现不佳的党员的中央管理委员会(Central Control Commission),斯大林作为这个委员会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联络官实际上就控制了旨在保持党内纯洁的肃清活动。

在中央集权的一党专制国家中,一个拥有斯大林那样的野心并且掌握了这么多关键职位的人,在夺取权力的斗争中当然会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当时的苏联如此年轻,与托洛茨基执掌的国防部相比斯大林的这些职位又那么不突出,而且斯大林的态度还常常那么温和,结果等到斯大林上台的可能性变得明显时,要阻止他已经太晚了。在政治局中,他与另两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蛊惑民心专家格雷戈里·季诺维也夫(Gregory Zinoviev,1883—1936)和教条专家列甫·加米涅夫(Leo Kamenev,1883—1936)——组成了一个三人小组。季诺维也夫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共产国际的首脑。加米涅夫是列宁的副手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

事实证明,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合无人能

敌。这三个人用秘密警察镇压所有针对他们的阴谋。托洛茨基提出的改革要求本来可以给苏共带来一定程度的民主，并且加强托洛茨基的地位而削弱斯大林，但是遭到了“三驾马车”的抵制。三个人在列宁将死之前发起了对他的崇拜，并且从那时起一直保持其狂热程度。于是托洛茨基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议似乎都是一种不恭行为。他的亲信也都被派出国外任职，从此分散开来。

1925 年初，斯大林及其同伙就强迫托洛茨基辞去了国防部长职务。之后不久，三人小组也解散了。斯大林又与布哈林以及政治局中的其他右翼成员结盟，并且开始在政治局中安插自己的亲信。他还运用自己不断增长的权力在所有政策问题上打击原来的盟友。1926 年，这些人改与托洛茨基结成了一个新的但是没有权力的同盟。这时候，斯大林先以季诺维也夫在军队中策划阴谋的罪名撤销其在政治局的职务。紧接着，托洛茨基被开除出政治局。季诺维也夫又被撤销了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在 1927 年 12 月的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并且遭到流放。最后，所有人都被斯大林处死了——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枪决，托洛茨基在 1940 年流亡墨西哥时被谋杀，斯大林取得了胜利。

2. 全国动员(1928—1940)

共产党代表大会还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并且宣布新的“社会主义攻势”将于 1928 年开始。1928 到 1940 年的 12 年将出现俄罗斯生活的巨大变化，包括集体农业、快速工业化、强制劳动、大清洗、消灭所有政治异己、建立专制主义国家机器，以及在社会和文

化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恢复资本主义时期的水平。

1928 年,苏联农民没能按照要求向城市输送足够的粮食,这就使得 1917 年土地分配和新经济政策提供的优惠条件中潜藏的危险突出起来。小块个人所有土地的农业生产率不足以养活城市人口,于是食品价格攀升。富农不仅想要更多的土地,而且开始囤积粮食。于是,本来 1928 年公布的政府经济计划是规定到 1933 年最多有 20%的俄罗斯农场实现集体化的,可是到了 1929 年斯大林就宣布立即开始实施农业全面集体化了。

苏联政府既没有财力或者信誉去进口粮食,也没有国家机器能强迫农民交出他们囤积的粮食。于是政府招募了一些小农,让他们帮忙找到并且交出富农囤积的粮食。作为交换条件,政府许诺从集体农场中分给他们土地,这个集体农场将由富农的土地组成并且配备富农的工具。1929 年下半年,斯大林宣布消灭富农阶级。他们大概有 200 万户,总人口估计有 1000 万,其土地全部被征用,同时又被禁止参加新的集体农场。由于不向这些富农供应食品,这次行动实际上把农业集体化变成了一场经济和社会的噩梦。

农民是在机关枪下屈服的。富农们被流放到强制劳动营或者西伯利亚的荒芜地区。拼命反抗的农民焚烧粮食、砸坏耕犁、宰杀和吃掉牲口也不上缴国家,然后逃往城市。苏联西部半数以上的马、45%的牛以及三分之二的山羊和绵羊都被屠宰,土地也被荒废,进而导致其后的几年中有几百万人死于饥荒。早在 1930 年 3 月,斯大林就表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下了难以置信的错误,而且还批评了那些据他说是太急于实施该项计划的地方官员。尽管如此,那一年还是有 50%的俄罗斯农场被草率地合并到集体农场中。接下来的三年又合并了超过 10%。于是

到 1933 年,共有 60%的农场已经实现集体化。到 1939 年,完成集体化的俄罗斯农场超过了 96%。

就在斯大林不断加速、近似疯狂地实施农业集体化的同时,他又转向了强行推进工业发展,一开始还是渐进推行,后来就变冒进了。1928 年开始进入五年计划时期,每个计划都为其后五年的产量设定雄心勃勃的目标。1929 和 1930 年,斯大林批准了空前高额的拨款用作资本投入。1930 年 6 月他又宣布那一年的工业产量必须增长 50%。根据 1928 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生铁的年产量预计将从 350 万吨增加到 1932 年的 1000 万吨,但是在那一年斯大林要求的产量却是 1700 万吨。生铁没有生产出来,斯大林对产量的要求却预示了他努力想把俄罗斯从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速度。

斯大林之所以想要这么快的速度,部分原因在于农业集体化本身的驱动,因为大规模的耕作必须是机械化的耕作。但是到 1928 年底,整个苏联西部只有 7000 辆拖拉机。斯大林在 1929 年又弄到了 3 万多辆。于是工业部门不得不生产几百万台机器和大量的汽油以使这些拖拉机运转。由于农村必须通电,这就需要建设成千上万的电站。不仅如此,还有数百万农民不得不学习怎样操作机器,可是又没人教他们,更没有工厂生产机器。

工业化的另一个动力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原则本身。俄罗斯挑战了马克思的所有预言,它在一个缺少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实施了无产阶级革命。尽管共产主义取得了最初的政治胜利,但是斯大林仍然感到只要苏联还是一个农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比共产主义在苏联拥有更牢固的基础。于是共产党下决心创造苏联尚不存在的大量城市无产阶级。

1932 年虽然苏联宣称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全面完成,实际

上其目标并没有实现。紧接着就开始实施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则被希特勒的入侵打断了。每个五年计划都强调重工业部门,包括钢铁、电力、水泥、煤炭和石油。1928 到 1940 年间,钢铁产量增加了 4.5 倍、电力 8 倍、水泥 2 倍多、煤炭 4 倍、石油接近 3 倍。化工和机器制造业也呈现类似的发展。铁路建设大大加快,货运量与苏联自己的车皮产量一起增长为原来的 4 倍。1940 年苏联的重工业产量已经接近德国。欧洲其他国家在大约 75 年里取得的发展,苏联用大约 12 年就完成了。

所有这些都是以可怕的艰辛为代价取得的,然而见过那段历史的人都说苏联工人就像战场上的士兵一样充满了热情。昂贵的机器经常被毫无经验的工人破坏或者损毁,于是维修、替换、在产量和原料消耗之间找平衡、把工人安置在新的中心,这些问题没完没了而且浪费了数不清的生命。

苏联经济是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管理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五年计划并且在管理层面上监督其实施。国家银行控制资本的投入。一个经济理事会管理着各部门的工作,主要是冶金和化工、国防、机器工业、燃料和电力、农业、采购和消费品。生产企业联合控制着矿山、冶金高炉和轧钢厂,它们就是所谓的康拜因(combinats),或者叫"高产联合企业"。每个工厂的管理者都有责任在许可成本的上限范围内完成额定的产量。

这种经济计划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影响。苏联的城市人口数量从 1926 年占总人口的 18%增加到 1940 年的将近 33%。新经济政策时期相对的择业自由消失了。个体工业企业与集体农场签订了劳动合同,规定一定数量的农场工人必须到工厂劳动。抵制集体化的农民都被拖入劳动营。工厂里的工会成了国家的

工具，主要职能就是实现产量和效率的最大化。尽管工会能够执行社会保险法，并且通过谈判来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但是它们不能罢工或者与管理人员争吵。

这样一来，斯大林就站在了传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平等原则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被搁置一边，代之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新口号。原来列宁规定任何政府成员的收入都不能超过熟练技工，现在斯大林建立了一套新的激励机制。一小部分官僚、熟练技工、工厂管理者和成功的集体农场主收入都远远高于不熟练的工人和农民，加上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演艺人员和运动员这些用天赋为政权服务的人，他们（通常是男人）成了新的精英。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愿意发展这个让他们拥有了一切的政权。原来的贵族地主特权阶层在革命时期就受到了削弱，现在已经不复存在。革命时期才刚刚开始形成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业资产阶级，尽管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暂时得救，但在1928年之后还是被肃清了。曾经支持革命的旧知识阶层大多到最后不能接受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选择了移民，留下来的人则被寄希望于专心研究技术进步和能够加速国家改革进程的新管理设备。他们将成为"社会主义工程师"、高级官僚和新社会的鼓吹者，而且他们不会质疑新社会的基本原则或者发展方向。

1928年以后，斯大林的政策威力又开始强制实施系统的思想动员，这种思想动员实际上适时地变成了思想控制。马克思曾经认为通过控制社会环境就可能彻底改变人性。但是列宁又认识到，新的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存在一种"新男性"和"新女性"，他们必须作为革命的一部分被创造出来。只有当服务于国家需要的应用性思维取代了非生产性的思考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

化才能见成效。因此,不仅经济学、哲学和心理学领域需要这种改造,历史学和文学也必须变革。而为了使其变革,就必须对其进行控制。

苏联的经济学家非常出名,他们的支持曾经对新经济政策获得信任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他们其中有些人认为国家计划的可能范围极其有限,有些人则认为完全实行计划都是可能的;有些人对工业化进步的速度感到乐观,有些人则比较悲观。结果那些与斯大林的政治需要观点相悖的经济学家都被指责为企图破坏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斯大林只是批评这些经济学家不能跟上胜利的步伐,苏联哲学家们却迅速领会了他的意思,并且转向了把哲学应用于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

心理学领域,像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1849—1936)这样的研究者,强调怎样用生物学的反射作用解释人类行为。心理学也影响教育,很快教育学家又提出四个因素决定行为,即遗传、环境、训练和自我训练。于是,学校不再努力提供可能塑造人格的环境,而变成了适合于制造有生产能力的忠实公民的机构。

从文学和历史领域明确实行审查制度就可以看出,在这两个领域进行思想动员的需要是最明显的。文学之所以重要并非它是通往真理之路,而是因为它影响人民。苏共中央委员会宣称中立的艺术是不存在的,它全力支持苏联本土作家,于是产生了一大批以激励人民提高生产力和荣誉感为主题的工业小说。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1868—1936)正是在这时成为某社会主义杂志的编辑,他和几个人一起创办了集中描写苏联工业成就的丛刊,记录了苏联工业发展的历史。

共产主义的党派性被当作历史学的指导原则。起初,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还能开展工作。但是随着红色专家学会

(1921 年)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社团(1925 年)的成立，苏联的历史编纂界越来越不能容忍那些不把历史看做一门科学，或者是继续把彼得描述为“伟人”，又不把凯瑟琳二世描述为“放荡的罪恶女人”的史学家。不过后来，当斯大林意识到世界革命越来越不可能发生，而且用爱国主义应对希特勒挑战的需要愈加明显时，历史学家又可以重新描写那些能给俄罗斯人民带来骄傲感的历史人物了。

为了有效地控制思想和改变环境，也有必要实行严格的限制和最后审查制度。1922 年苏联成立了一个审查机构，即报刊保密检查总局(the Chief Administr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State Secrets in the Press 俄语简称 Glavlit)，主要负责审查新闻、手稿、照片、广播、讲座和展览。1923 年又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审查戏剧、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的下属机构。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在每个出版社、电台和海关等单位都建立了办公室，以监督法律的执行情况。只有某些出版物，例如苏联的官方报纸《消息报》(*Isvestiya*)，不在审查之列。另外，各自治共和国都可以成立自己的检查局。

在斯大林想要的那种越来越有文化的社会里，对新闻界的控制显得格外重要。政府鼓励创办报纸作为引导和教育人民走向革命社会主义的工具。到 1927 年，苏联已经有 1105 家报纸和 1645 种期刊。1965 年二者更是分别涨到了 6595 种和 3833 种，共计 65 种语言。为了控制这种势头，1935 年成立了苏联电讯社(the Telegraphic Agency of the Soviet Union)(也叫塔斯社 Tass)作为中央信息机关。直到 1961 年，塔斯社都垄断着所有国外信息在苏联的传播以及苏联各个共和国之间的全部信息流动。

文献记载

落后的危险

斯大林 1931 年的一次演讲表露了其动机的强硬。

放松步伐就意味着落后,而落后者就要挨打。我们不想挨打。不,我们不想要……过去的俄罗斯……她因落后而不停挨打。她被蒙古的大汗打败,她被土耳其的首领打败,她被瑞典的封建领主打败,她被波兰—立陶宛的贵族打败,她被盎格鲁—法兰西的资本家打败,她被日本的男爵打败,她被所有这些人打败——都是因为她的落后。由于军事落后,由于文化落后,由于政治落后,由于工业落后,由于农业落后。她被打败了,因为打败她有利可图而且不受惩罚。我们落后于先进国家 50 年或者 100 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改善这样的滞后状况。要么我们改变,要么他们压垮我们。

Quoted in Isaac Deutscher, *Stalin* (New York: Mentor, 1950), p. 328.

3. 斯大林模式的国家(1931—1943)

斯大林的计划并不是没有遭到反对就轻易完成了。1931 至 1932 年的危机期间,工业目标没有完成和全国闹饥荒就在苏联政府内外引起了不满。有些官员散发传单主张共产党行使权力,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于是斯大林以谋反罪将他们逮捕。有一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还自杀了。此时斯大林的第二任

妻子也谴责他的残忍,说他是在从事恐怖行为。后来她在1932年也自杀了。1934年12月,盛传将接替斯大林职位的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1888—1934)在列宁格勒被暗杀,这次暗杀很可能是奉了斯大林的命令。利用基洛夫的死作借口,斯大林又清除了党内的对手,以参与暗杀的罪名枪决了几百人,并于1936年将他的老同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送上了公开审判庭。这两位和其他14个人或者承认了参与暗杀活动,或者在为他们编造的口供上签了字,最后都被处死了。另有17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1937年举行的又一次审判中,声称他们知道托洛茨基曾与德国和日本情报机关密谋将苏联的领土割让给德国和日本。这17个人也都被处死了。1937年6月还进行了一次对苏联红军高级统帅的秘密清算,他们被指控与"一个不友好的外国"(德国)密谋企图搞破坏。在宣布他们已经认罪后,这些人也都被处死了。最后一场公开审判发生在1938年,包括布哈林在内的21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承认了类似的指控并且也都被处死。

这些公开审判和对将军们的秘密审判还只是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揭示了清洗的严重程度。大清洗当时已经变成了臭名昭著的恐怖时期。当年列宁政治局的全部成员,除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以外,要么被杀,要么就为逃避处决而自杀了。两名外交部副部长和苏联外交使团中的多数大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1名成员中的50名、出席审判和给那些将军们定罪的几乎所有军事法庭法官、秘密警察的前后两任头目、以前清洗运动的那些领导人、所有非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总理和主要官员——这些人全都被杀或者消失了。

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魔法审判或者审讯的时代(也不可能

以这么大的规模),所以才有这么多人经受了对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忠诚的测试,也不是因为这是法国大革命时代所以才有这么多人由于不能通过测试而被处死。1936 和 1937 年,被逮捕的人数激增了 10 倍。任何事都可能成为被捕的理由,比如:与日本外交官跳舞时间过长、从原来是富农的人那里购买杂货、不揭发自己的邻居是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等等。某一天一个人可能只是出去工作,结果就再也没回来——要么被杀了,要么被送进了很多外观一模一样的大型监狱中的一间,要么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大多数学者和作家已经把流放和坐牢当成了生活周期的正常组成部分。到 1938 年,至少有 100 万苏联人在坐牢,大约 850 万人被逮捕,其中大部分人被送到了监狱集中营和殖民地,还有大约 70 万人已经被处死。

很显然,斯大林是想彻底消除将来发生谋反的所有可能性。于是他捏造罪名打击任何可能组成新政府以推翻其统治的人。然而,苏联并没有因为发生了这些清洗运动而瓦解。斯大林培训的新官员占据了所有的高级职位,恐怖活动又被尊崇为行政管理的原则,从而使所有官员都对自己的生命和工作保持不变的担忧。最后,清洗者也都被清洗了,他们本来是遵照斯大林的命令开展恐怖活动,结果却被斯大林当作了替罪羊。甚至连托洛茨基也被追踪和杀害了,1940 年 8 月,一名刺客跟踪托洛茨基到了他在墨西哥的避难所,然后用斧头杀了他。

斯大林在 1936 年的恐怖活动中宣布了一部新宪法。从条文来看,这部新宪法并没有像以前的宪法那样剥夺教士和原贵族以及资产阶级成员的公民权。在字面上,公民的自由还扩大了,尽管这些自由可以根据“劳动者的利益”需要而受到限制。作为一党制国家,苏联的选举只是全体一致通过的一种表达方

式。最高苏维埃候选人的提名权属于共产党组织、工会、合作社、青年团和文化社团，但是这些组织都完全由苏共支配。苏共挑选候选人，而且每个职位都只有一个候选人介绍给选民。共产党控制着苏维埃，党的领导层和政府的领导层是相互重叠和联系的。

每个公民都可以向党的地方组织申请成为党员，地方党组织经过一年的考察后投票表决其申请。共产主义儿童团为青年团培育力量，青年团再为共产党培育力量。共产党根据地域和职能建立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它在底层的工厂、农场和政府机关都设有党组织。这些党组织由苏共在农村和城市的地方单位聚合在一起，这些地方单位再由各地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大会聚合在一起。党组织推选出全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再选出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党组织金字塔的每一层级都有宣传鼓动机构、组织指导机构，以及军事和政治培训机构。共产党几乎完全控制着政府。

政府的最高机关就是最高苏维埃，它由两院组成，即建立在全体国民基础上的联盟苏维埃和根据民族行政区选举产生的民族苏维埃。从理论上讲，最高苏维埃每四年选举一次。最高苏维埃自身做的工作不多，它任命一个主席团，由主席团来公布法令和开展最高苏维埃休会期间的工作。最高苏维埃还任命部长理事会(长期以来被称为人民委员会)。正是这个内阁，而不是最高苏维埃或者其主席团，制定大部分法律，因此它既是国家立法机关也是行政机关。斯大林同时兼任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主席，以及共产党的总书记。而且他还是国防人民委员，也就是在战时将管理整个国家的国防委员会的首领和最高军事统帅。

随着新宪法的颁布以及斯大林的敌人被消灭或者恐吓，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革命的热情渐渐冷却下来。与此同时,随着大清洗和新宪法的实施,粮食供应得到增加,个体农民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田产,新的奖章和荣誉称号奖励给工厂里的优秀工人、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军官。红军恢复了古老的沙皇时期的官兵级别,并且第一次授予了元帅军衔。随着消费品的生产受到鼓励,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提高,工人们也被吸引去购买一些他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小奢侈品。

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党破坏了旧学校体制,废除了家庭作业和考试制度,还允许孩子们同教师一起管理学校。于是,入学率下滑,学校成了年轻人的革命俱乐部,对教师的培训也被忽视。大学的质量也降低了,因为任何人只要年满 16 岁都可以上大学。学位制也被废除,技能训练成了重点,而且取消了其他学科。新经济政策时期,这种混乱状况得到纠正,提高文化水平的基础问题受到了重视。但是通常的学校课程都被换成了严格强调劳动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共产党自己接管了大学,整肃了全体教员,并且强迫学生每三周中就要有一周在工厂工作。

不过,现在这套体制又一次发生剧烈变化。对教师的培训改善了,其薪水也得到提高,而且还被承认了国家公务员身份。革命前的大学招生和学位体制也像革命前的学校课程一样得以恢复。对政治教育的强调有所减弱,男女同校教育也被取消。中学恢复收学费使得大多数人很难继续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一般只有出身新精英阶层的孩子,或者是非常有天赋能够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孩子才有这种机会。但是苏联国民的识字率已经上升到大约 90%。

斯大林最后(而且是极其不情愿地)修改了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的传统立场。早期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激进的无神论。他

们的态度背后隐藏的不只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认为宗教是毒害群众的鸦片，而是因为东正教会一直是沙皇制的重要支持者。然而多年来对宗教的打击并没能把东正教从人民中根除。1937年希特勒在柏林建造了一个俄罗斯教堂，而且利用一切机会友好地谈论东正教会，于是斯大林不得不做出回应。苏联政府也宣布基督教徒对俄罗斯的历史辉煌做出过贡献，不仅停止了反宗教宣传，而且允许人们去教堂。尽管早期的革命者都抨击家庭是败坏社会秩序的主要原因，斯大林还是恢复了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并且强调家庭及其发展的重要性。政府降低了对教会财产的征税额度，同时任命了当局能够信赖其服从性的新主教。

一直蔑视和不喜欢俄国的卡尔·马克思如果当时还活着，他一定会感到困惑，因为唯一一次重要的欧洲共产主义革命居然发生在这个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农业国家。也许是马克思错了，或者可能俄国所发生的一切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因为很显然，马克思没有正确估计到俄国农民阶级中潜藏的革命力量。1883年马克思就去世了，所以他不能预见到沙皇政权的最终失败、苏联高效工业化的开始、一战造成的紧张程度，以及1917年临时政府的软弱。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正是由于列宁对农民阶级重要性的承认、对紧急局势的控制、敢于冒险的精神，以及他的好运——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使用了适当的武器——布尔什维克才取得了政权。

另一方面，俄国革命的确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一旦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他们所面对的实际情况将修正原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很正常。当内战和外国干涉使国家陷于混乱时，新经济政策给予了必要的缓解。后来斯大林又以世人不曾预见的方式结合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残

忍的政治统治,尽管这种统治没有达到目的,但是斯大林的计划毕竟创造了一个能够抵挡希特勒打击的工业国家。尽管苏联人民都是国家的奴仆,他们被强迫实行集体化、工业化、被清洗、被恐吓,其中几百万人挣扎着活在强制劳动营里或者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尽管如此,苏联人民在二战期间还是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打败了希特勒及其同盟。

八、本章小结

1919 到 1939 年的这个时期以右倾运动的胜利为显著特征。尽管这些运动是不同社会的产物,它们也有其共同之处:由于其不能带来稳定而对民主失望、进攻性民族主义、不满情绪、极权政府和种族主义。

法西斯主义最早在一战后的意大利取得胜利。直到一战期间都还是社会主义者的墨索里尼抛弃旧有信念,转向了激进民族主义。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墨索里尼在一场恐怖运动中夺取了政权,成立了法西斯独裁政府,并且通过控制新闻媒体和取缔反对党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墨索里尼还建立了一个总体国家,其中劳动力和资本的需要都服从于国家的利益,工人和生产者辛迪加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或者影响力,权力都掌握在法西斯官僚机构手中。此外,墨索里尼还在地中海沿岸、西属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巴尼亚奉行侵略性外交政策。

一战结束后,德国在魏玛共和国统治下经历了 15 年的民主政府时期。魏玛德国走过了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从 1918 到 1923 年,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威胁都存在,国家陷于经济混乱;第

二阶段从 1924 到 1929 年，出现了政治稳定和相对的经济繁荣；第三阶段从 1929 至 1933 年，希特勒领导的右派开始掌权，经济萧条削弱了繁荣的基础。

希特勒很快就建立了独裁统治。他利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威胁取消了立宪制政府，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国家，解散了持反对立场的政党，并且粉碎了纳粹党内的反对派。希特勒一上台就着手消灭犹太人，种族主义从此成为一项国家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纳粹种族主义政策甚至扩张到对任何德国人居住的地方都提出了所有权。

在西班牙，1931 年国王阿方索死后，左派与右派的分裂导致国内骚乱加剧。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佛朗哥将军在意大利和德国军队的帮助下战胜了左派，随后他就在西班牙建立了由地主、军队和教会支持的独裁政权。

在葡萄牙，另一位独裁者安东尼奥·萨拉萨尔掌握了政权。在东欧地区，哈布斯堡帝国的继承国家都缺少议会制传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些国家也都建立了独裁政权。

1924 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苏联上演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争斗。斯大林利用其在党内的强大支持基础迫使托洛茨基下台。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左翼专制独裁政权得到加强。

到 1928 年，苏共已经抛弃了旨在实现内战后重建任务的列宁新经济政策。1928 至 1941 年间，斯大林强行推动苏联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包括集体化、工业化、清除异己、使社会和文化生活回归资本主义水平。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斯大林又动员作家和历史学家宣扬俄国的历史从而强化俄罗斯民族主义，因为当时的苏联已经面对着一个发誓要消灭共产主义的法西斯独裁政权联盟。

第五章

民主国家与非西方世界

以威尔逊总统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本来预计，罗曼诺夫(Romanov)、哈布斯堡(Habsburg)和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帝国的崩溃，将会自动带来民主国家数量的增加。然而，恰恰相反，很多欧洲国家都出现了敌视自由民主的政权。20世纪20、30年代，民主的中心还是在北大西洋沿岸的大国——英国、法国和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小国，低地国家，瑞士，以及英国传统的继承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毫无疑问，极权主义的侵略者对又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很大责任。然而，民主国家未能组成统一战线对抗那些威胁世界和平的极权国家，也是导致二十年休战期间国际形势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30年代早期，英国、法国和美国都被国内问题所困扰。但是，也正是这个时期国际问题同样需要给予急切关注。由于经济萧条和关税壁垒日益严重，国际贸易逐渐减少；由于复兴和极权民族主义的出现，和平的前景日益渺茫。然而这些还

不是全部问题。在二十年休战期间，民主国家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非西方的、其中很多还处于殖民统治下的人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亚洲和中东，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刚刚开始主张各自的民族主义和要求摆脱殖民帝国的束缚。

因此，我们通常称其为"世界历史"组成部分的、割裂的、非西方民族的历史现在也成了"西方文明"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于是，两三个世纪前就该被认为非常独特的那些问题现在才呈现出全球性的重要意义。

一、英国

英国虽然是一战的战胜国，但是它一直深受经济危机的困扰。移民到英国的人数逐渐与离开英国（特别是前往北美）的人数持平。英国尽管也在尽力复苏，但其经济已经缺乏动力，增长速度仅为战前的一半。

1. 持续到1921年的战后经济危机

一战给英国带来的不仅是惨痛的人员伤亡，还有严重的经济损失。战争结束后，英国的国债达到了1914年的10倍。很多海外投资都被折现用来购买食品和战争物资。40%的英国商船在战争中被敌军摧毁。1918年，英国赖以生存的国际贸易网络有千余处被破坏，而且在一战后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下也不可能很快得到恢复。战时为了补给英法两国的战争所需，美国、加拿大和印度的工厂都被调动起来，这就促使它们在战后的和平时期成为英国工厂的更有力竞争者。此外，很大程度上是靠

美国贷款资助的德国工业，也像战前曾经给英国造成恐慌一样再次成为英国工业的对手。

总之，维多利亚时代被称做“世界工厂”的英国再也不能为其数百万工人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了。那些工人现在根本无法接受比战前更低的生活水平，因为他们曾经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期望参加一战并且打败了敌人。而且政府许诺他们，战败的敌人一定会为战争买单，德国将被榨干，英国也将从此有一个新的开始。

然而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英国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赔偿。恢复和平后，为了向人民提供那些在战时已经停止向平民供应的商品，英国的工业生产突然出现繁荣。与之相伴的是物价的急涨，随后很快工业繁荣又遭遇同样突然的崩溃，全国陷入严重的战后萧条。到 1921 年夏已经有 200 多万人失业，超过了英国劳动力总数的五分之一。面对日益增长的物价，英国政府也增加了微不足道的失业救济金。但是，大范围的失业即将成为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灾难。很多人再也没有重返工作岗位，一些年轻人也是直到二战爆发前夕才找到工作。

尽管诸如南威尔士的产煤区之类的严重衰退地区已经开始呈现永久落败的迹象，英国的经济萧条并不是灾难性的。总体而言它是一种相对衰落，经济放缓是为了适应动态的增长。同时也是让劳动人民在心理上适应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中产阶级也同样适应传统的舒适生活条件。因为，英国人通过小报、电影、广播也非常清楚地知道，美国和其他外国人正在享用汽车、无线电、冰箱和电话，而这些物资都是他们接触不到的。

英国正在承受后工业时代发展的负面影响，并且它是第一个承受这种痛苦的国家。比方说，英国仍有大量的煤炭资源，但

是其中很多开采成本都太高，因为那些最容易开采且成本低廉的煤层已经面临枯竭。煤炭工业的管理很差，很多规模小、效率低的矿场在亏本经营，其机器设备和生产工艺与美国和欧洲大陆的新煤矿相比也都已经落后，每工时的生产率相当低。最糟糕的是，20 世纪 20 年代，煤炭的主要竞争资源——石油和水力发电迅速增长，从而导致了英国煤炭出口的下降。由于不列颠群岛没有石油，也没有丰富的水力发电潜能，所以只能开采煤炭。工人们有统一的工会组织，他们根本不接受减薪，而煤矿主也不想继续亏本经营。于是在 1921 年 3 月爆发了引起全国关注的大罢工。7 月，英国政府同意向工人支付津贴作为增加工资的补偿，罢工才得以平息。

2. 保守党和工党的政纲

在英国，虽然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分化可能不像在许多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尖锐和清晰，但是这种分化确实很重要。保守党(通常也被称做托利党)往往得到有产者、中产阶级等阶层的支持，这些人相信解决新问题应该用传统的“大不列颠”方式，坚持政府干预的最小化。工党代替了曾经所向披靡的自由党成为英国第二大党，他们往往得到工会组织、左翼知识分子等阶层的支持，这些人认为英国正面临规模空前的问题，因此要求比传统解决方式更多的政府干预。在保守党与工党的斗争中，老自由党成了可怜的牺牲品。

尽管面临多方挑战，自由党还是在 1906 年的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并且在战前的政治骚乱时期一直把持着政权。1916 年 12 月，自由党经历了致命的分裂，原因是党内两个最重要的人

物围绕如何以最佳方式打赢一战的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大多数党员站在了后来成为自由党首相的 H. H. 阿斯奎斯(H. H. Asquith)一方。少数党员追随大卫·劳合·乔治与统一的保守党结成同盟形成了新的多数派,并且组建了以劳合·乔治为首而彻底排除阿斯奎斯和正统自由党人的政府。一战结束后,劳合·乔治领导的这个同盟又维持了几年,直到后来保守党意识到不再受欢迎的战时领导人已经变成累赘时,保守党退出了同盟。当英国政治重新恢复无需结盟的正常状态时,破碎的自由党已经不可能再次团结起来,于是工党取代自由党成为英国第二大党。1922 年同盟解体后,保守党赢得大选,并且在 1945 年前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处于执政地位(或者单独或者与其他党联合)。期间,工党只组建过两届弱势政府,而自由党(尽管历史辉煌)则沦落到"三流政党"的地位,与现在英国自由党的地位稍有不同。

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英国发现在自由贸易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转向自给自足(基本都是靠关税支持的),于是这个时期的很多保守党人感觉到,约瑟夫·张伯伦 1903 年提出的关税改革计划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用。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困难为英国提供了很好的理由采取措施抵挡高关税的外部世界,并且通过自己的关税政策把英帝国团结在一起。该计划的问题就在于它成功的可能性很吸引人:它可能为英国及其殖民地建构一个关税保护下的安全市场,但是与此同时它还有两个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暴露的缺点。一是英国最大的殖民地(现在叫自治领)都正在努力发展现代经济,它们不希望仅仅作为英国的原料产地,或者英国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市场,以及服务于英帝国对外政策的武装部队的征兵基地。它们期望建立自己独立

的国家，并拥有自己的工业体系。二是国内政治困难，即关税意味着短期内更高的生活成本，这对生活已经十分困难的大多数选民来说更是一个额外的负担。这一点早在 1906 年就使保守党遭受了严重失败。

工党的对策是主张实行社会主义者一直追求的“国有化”，也就是由政府收购并经营关键企业，同时给予这些企业的私营老板公平的补偿，当然，只有最激进的少数派建议像苏联那样实行没收政策。所谓“关键企业”，包括交通运输、公用事业、煤炭、钢铁，甚至可能还包括纺织品、餐具、陶器和机床——所有这些似乎最好是通过大规模经营才能繁荣的工业。但是，即使是国有化的企业仍然面临着只有出口足够多的商品才能维持经济运行的根本问题。因此工党坚持认为，国有化通过消除破坏性竞争和低效生产，也能促使英国工业生产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就业率会上升，市场会重新得到开发，工业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新的就业岗位。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减少会促使物价降低，而工人能购买更多商品又会促进繁荣。只不过，工党的这种展望和措施直到 1945 年在英国才有了一次实际的尝试。

3.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治(1918—1936)

这些年英国的政治逐渐由斯坦利·鲍尔温(Stanley Baldwin, 1867—1947)和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 1866—1937)这两位几乎在任何方面都完全不同的人物主导。这是两位风格迥异的首相。鲍尔温出身于富商之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中年才步入政坛，一战前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战争爆发后才显示出管理和政治才能。1922 年劳合·乔治的同盟土

崩瓦解后,鲍尔温在其中崭露头角,成为仅次于新任保守党首相安德鲁·伯纳尔·劳(Andrew Bonar Law,1858—1923)的第二号人物,不到一年,伯纳尔·劳的健康状况恶化,鲍尔温就继任了首相职位。鲍尔温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不仅思维缜密,而且笃信自己坚持了英国人性格中最优秀的部分。贬低他的人则认为他惰性十足、缺乏想象力、好走中间路线、凡事缩手缩脚。实际上鲍尔温极受欢迎,各阶层的选民都对他有认同,因为他更愿意关心自己的庭院、家庭和管乐,而不是鲁莽的行动和没完没了的解决方案,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合·乔治的不光彩作风有关。鲍尔温在政治上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也犯过不少大错误,某些政党人士认为他不可原谅,选民们却常常能原谅他。于是鲍尔温也总是能弥补过失。

麦克唐纳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他出生于苏格兰的乡村,是一个私生子,从小就生活贫困,完全靠自学成才,很早便开始信仰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作为工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06年进入议会,从此成为工党的首领。麦克唐纳曾出于道德考虑而反对一战,并且因此声望大跌,但是此后他又重建了威望,再次成为工党政坛上的显赫人物。

由于1924年大选中三党竞争出现了混乱局面,麦克唐纳得以组成一个少数派政府(得票最多但是未超过半数)执政了十个月,并且一度还得到当时的自由党的支持。1929至1931年间,麦克唐纳重遇类似的情况,结果他的政府被另一个联盟取代了。麦克唐纳高大英俊、能言善辩,极富组织才能。尽管他宣扬社会主义很多年,事实证明却只是个改革者而不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深渊中他也畏惧改革,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个讲绝对道义的人。麦克唐纳一直作为工党之父而备受崇

拜，然而他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还是痛苦脱离了工党，并且因此被视为对政党和阶级的背叛而再也没有得到完全原谅。

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无法全面实行自己的政纲。保守党受挫是因为英联邦国家只承认某些有限的帝国特惠权。两届工党政府尽管得益于依靠自由党获得了议会的支持，最后仍然因为政府不够稳定而无法推行像工业国有化这样争议颇大的政策。

1926 年，大约 250 万工会成员试图发动为期几周的总罢工以支持抗议削减工资的煤矿工人。尽管总罢工失败了，但是它的短暂过程揭示了英国民众的基本态度。当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时，成千上万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们自愿行动起来，维持国家重要部门的运转。双方都保持了冷静与克制，没有一方准备在这场阶级大战中获得完全胜利。罢工平息后，煤矿工人最终不得不按照矿主的要求重回矿井。1927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贸易争端与工会法案》规定所有反对政府的同情性罢工或罢工本身都属违法行为。

与此同时，早在 1832 年就已经开始的英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又取得了两项重要进展。1918 年，政府在筹备大选的过程中通过了一项改革法案，规定取消对男性普选权的所有旧的限制条件，给予年满 21 岁的全体男性公民选举权。作为女性参政主义者长期努力的结果，该法案也赋予了女性选举权。但是，它限定女性参选的合法年龄是 30 岁，从而确保男性选民要多于女性。这种规定太不合理，尤其是当事实证明女性与男性的政治行为方式有分歧之后，该规定根本无法维继。1928 年议会又通过了新法案把女性公民的法定选举年龄也改为 21 岁。

尽管经济弊病持续显露，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英国还是实

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但是随后就爆发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原本就很贫弱的英国又是最早遭遇危机的国家之一。短短 18 个月内,英国的失业人数就从 100 万急剧上升至 250 万。面对严重的政府赤字,以及关于如何解决赤字的分歧,即削减社会公共开支还是增加税收的问题,麦克唐纳的第二届工党政府于 1931 年 8 月辞职。

这就为保守党、自由党与麦克唐纳领导的右翼工党的联盟铺平了道路,这一联盟的首领还是麦克唐纳。很多工党成员认为麦克唐纳投降了资本主义势力,他们感到很失望,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工党内部的严重分裂降低了它的效率。对于很多忠诚的工党党员来说,他们的领袖成了“最大的叛徒”。新成立的联合政府,也就是所谓“国民政府”削减了社会公共开支。1931 年末,英国政府采取决定性步骤,取消了金本位制,允许英镑贬值。1932 年,它又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通过实施保护性关税放弃了自由贸易原则,同时停止向美国偿付战债,尽管这些措施并不能改善英国的失业状况或者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困难。在 1931 年 10 月和 1935 年 6 月的两次大选中,或许也是由于工党内部混乱的原因,国民政府又赢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

国民政府由保守党领导,1935 年大选结束后,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尔温成为首相。英国经济逐渐走出大萧条的低谷,政府预算也恢复平衡。但是在 1936 年,鲍尔温内阁面临的大问题不是经济或者社会问题,而是政治体制上的问题,即内阁强迫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1894—1972)在其即位的当年便退位。因为,爱德华爱上了一位离过婚又极善交际的美国女人,并且想和她结婚。英国王室、内阁以及大多数英国民众都反对爱德华,于是他宣布退位,其弟乔治六世(King George VI,

1936—1952 年在位)继承了王位。

4. 爱尔兰问题(1916—1949)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十年似乎为爱尔兰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契机。1916 年,在进行西线战争的同时,英国坚决镇压了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都柏林复活节起义,起义者不屈的顽强导致将近 100 人为爱尔兰独立献出了生命,同时也把一场前途渺茫的起义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转折点。起初,爱尔兰人民似乎并不同情起义军,但是他们很快就开始怀念这些人并且接受了他们的分离主义事业而不再寻求自治。1918 年 4 月,英国政府威胁要向爱尔兰征兵,而这本来是英国国家服役法已经对爱尔兰免除的义务,于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抵制英国议会,曾经被一战耽搁的 1914 年爱尔兰危机也再次一触即发。

然而到了 1919 年,地方自治已经不能满足很多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一个叫做新芬党(Sinn Fein)(盖尔语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的新政党开始寻求通过武力实现完全独立。1919 至 1921 年间,爱尔兰到处充斥着暴力、暗杀、纵火和游击战争。秘密的爱尔兰共和军及其越来越庞大的同情者队伍开始拥护他们自己的非法议会组织"爱尔兰共和国众议院"(Dáil Eireann)。他们与警察、英国军队以及被叫做"黑棕部队"的非正规武装展开战斗。这是一个暴力的年代,暴行经常遭遇暴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称其为"黑暗中杀戮者的决斗"。但是,英国国内并不能一直维持这种铁血政策,与此同时爱尔兰的决心和反抗似乎又日益强烈。

这段暴力革命时期的直接后果是一次妥协,因为新芬党发

生了分裂。温和派希望接受妥协:新教阿尔斯特地区(Ulster)仍然由英国直接统治,天主教各郡则获得自治地位并且拥有一个独立的议会。温和派与英国政府谈判,并在1921年为爱尔兰南部26个郡赢得了自治,新国家叫做“爱尔兰自由邦”,拥有自己的议会(即爱尔兰共和国众议院)以及完全的自治权、自己的军队和外交机构,但是接受英王为象征性国家元首。阿尔斯特地区六个主要信仰新教的郡与英帝国保持原有的关系,包括有权向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议会派遣议员,同时他们也获准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成立自己的议会以及拥有了相当大的地方自治权。从此以后,英国正式更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蒙·德·瓦勒拉(Eamon De Valera,1882—1975)领导的新芬党激进派坚持要求整个爱尔兰(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地区)作为一个统一的共和国获得完全独立。对激进派来说,温和派通过谈判实现的妥协是无法接受的,于是爱尔兰革命变成了自由邦派与单一共和国派的内战,又回到了纵火、伏击和杀戮的局面。温和派领导人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1890—1922)曾经是激进革命者,后来转而拥护妥协。他被暗杀后,公众舆论就开始抛弃极端分子。由于不愿宣誓效忠英王,德·瓦勒拉拒绝参加爱尔兰共和国众议院,他参与了内战,但是最终还是决定于1927年带领他的共和党(the Fianna Fáil)加入了议会。

德·瓦勒拉的政党在1932年的众议院选举中赢得了多数票,1933年又赢得了多数席位。此后,它就废除了对英王效忠的誓词,斩断了自由邦与联合王国的联系。1938年德·瓦勒拉成为首相。1939年自由邦通过在二战期间保持中立表明了自己已经脱离英国的统治。1949年,英国承认爱尔兰共和国完全

独立,爱尔兰问题最终解决。

5. 英联邦(1931—1939)

宪法承认自治领的实质独立似乎使它们变得更加忠诚。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象征性地改变了一些术语从而赋予了自治领新的地位。它们不再被认为是英帝国的一部分,而是英联邦国家的自由成员。在这种新型关系中,英国将不得不像对待外国一样与英联邦国家就关税、贸易条件和移民问题进行谈判。

虽然英国无法在其自治领之外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同盟,但是到1939年这些自治领还是最终都选择了站在英国一边参战。而且它们是自主地做出这种决定的,因为它们这时都像爱尔兰一样具有了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合法权利。这说明英帝国向主要自治领的权力转移实际已经完成。

二、法国

一战和战后的困难给法国带来了比英国更为严重的混乱。法国遭受的人员损失和物质破坏比其他任何主要交战国都多。200万正值壮年的法国人要么丧生,要么严重伤残已经无法正常生活。在这个仅有3900万人口而且人口出生率很低的国家,这样巨大的人员损失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30万房屋和2万座工厂、商店被毁。在这个绝大多数生产都没有大规模机器设备的经济结构落后国家,这种物质损失也将产生长期影响。胜利根本无法从心理上弥补四年战争给法国人造成的创伤。

1. 战争的影响(1918—1928)

法国希望尽一切可能报复德国。尽管经济学家指出德国根本无法偿付巨额赔款,它还是不断增加赔款数额。不仅如此,法国更积极坚持让德国在国际关系中陷入孤立并且失去发动战争的物质条件。

与此同时,法国也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部分原因在于重建被战争破坏地区花空了政府的资金,但是其中只有少部分是由德国赔款支付的。其他方面的原因还有:供养武装部队(因为法国人不敢裁军)的高昂费用,国际贸易秩序普遍混乱,以及战争期间法国政府陆续举借的大量外债(正如德意志帝国政府一样,法国政府也选择了贷款而非征税)。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法郎已经由战前的 20 分兑换 1 美元跌落到非常危险的大概 20 分兑换 2 美分。后来是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总理通过实行新税法和严格的经济措施才阻止了法郎的贬值。1928 年法郎的官方汇率调回到 20 分兑换 3.92 美分。

法国的通货膨胀尽管不如德国严重,但是也引起了经济和社会混乱。由于货币贬值,那些向法国政府借款的人现在只能收回自己原资金价值的五分之一。如此巨大的损失对下层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打击特别严重。然而,受伤害最大的还是那些靠积蓄或者相对固定的收入维持生计的人们。所以,通货膨胀削弱了长期以来作为法国共和主义的社会支柱的阶级,加剧了社会紧张局势,而这种社会紧张已经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国内历史的主题。

2. 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1928—1936)

一战期间,法国人暂时搁置了他们从1789年继承来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冲突传统。但是战争结束后,曾经带领法国战斗的政党"神圣同盟"很快就解散了,传统的纷争重新出现。这种纷争有时也被称做"两个法国",也就是左翼的共和派法国和右翼的保皇派或者极权派法国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简单的贫富之争。右翼富人阶级中的很多人公开反对议会国家的存在,并且得到了保守农民、小商人和投资者的支持。这些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虽然不像他们一样反对第三共和国,但是也坚决反对任何增加社会公共开支以建设福利国家的措施。

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则拥护福利国家制度,他们得到了比较激进的工人、很多白领阶层特别是政府公务员,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是,战后左翼的发展受到重创,因为不仅走莫斯科路线的共产主义者与拒绝莫斯科路线的社会主义者发生了分裂,法国的主要工会组织——总工会(CGT)内部也发生了分裂。激进社会党长期以来都是第三共和国的主要政党,它现在虽然名义上还是左翼的一部分,实际却在走政治中间路线,已经不急于发展福利国家了。在法国南部的农民阶级、白领阶层和专业技术工人中,激进派的力量很强大。

20世纪20年代后期,第三共和国的国内困难似乎有所改善。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法国的打击比较晚,而且与美国、英国或者德国相比,对大规模工业依赖相对较少的法国经济曾一度看似可能更容易经受住危机。但是法国同样依赖国际贸易,特别是奢侈品的出口,因此到1932年经济危机袭来时,法

国政府也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困境。

金融丑闻斯塔维斯基(Stavisky)事件使人们想起了19世纪90年代的巴拿马运河丑闻,从而导致1934年2月法国的政治危机达到顶峰。塞尔日·斯塔维斯基(Serge Stavisky)其实是个骗子,却拥有很有权势的人脉关系网,特别是在激进社会党的圈子中交往很深。1933年12月斯塔维斯基终于被揭穿,随后就逃到了阿尔卑斯山藏匿并且在那里自杀了。很多人认为他或许是被警方杀死的,为的是避免他牵连重要的政治家。后来参与调查此案的一名法官也神秘死亡。该事件震惊了整个法国。在极右势力中,保皇派长期由一个叫做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的压力集团领导,并且正在从上层社会的年轻人中招募力量。"国王的仆人"(Camelots du Roi)是法兰西行动的武装力量,他们负责打击共产党,而且双方发生了械斗。退伍军人组织"火十字团"(Croix de Feu)虽然不是典型的法西斯组织,但是也支持右翼。在斯塔维斯基事件引起的骚动中,"国王的仆人"、"火十字团"以及其他右翼团体都参加了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左翼则以短暂的总罢工予以回应。结果有14名示威者被杀,进而也引起了许多人对法国再次爆发革命的担心。

3. 人民阵线(1936—1937)

就像德莱弗斯时期一样,共和派力量再次团结起来应对威胁,并且在克服危机后,法国重新转向了左派。激进派总理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1884—1970)辞职后,除保皇党、社会党和共产党以外的所有党派结成同盟组建了一个国民政府,其中还包括了所有在世的前任总理。但是,法郎再次出现贬

值。1935 年，总理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1883—1945）——曾经是社会主义者，现在是保守派——试图借用十年前普恩加莱成功实施的方法来削减政府开支，然而这次却没有奏效。于是，左翼力量又组成了人民阵线，并且第一次联合了激进社会党、社会党和共产党。这时的法国总工会已经暂时弥合了共产主义工会与非共产主义工会的分裂，它也支持人民阵线。人民阵线赢得了 1936 年的大选，其中社会党得票最高。社会党人、犹太知识分子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1872—1950）因此获得了总理职位。

人民阵线带着选民的授权上台执政，这些选民希望政府更公平地分配财富。1936 年 6 月，政府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工人获得了每周 40 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带薪休假，以及要求强制仲裁劳动纠纷的权利。法国的银行、铁路和军火工业都实行部分的国有化。诸如“国王的仆人”、“火十字团”之类的准法西斯团体都被勒令解散。

然而该计划遭遇了很大障碍。接受莫斯科领导的共产党并不真正进行合作，他们不仅拒绝加入布鲁姆内阁，而且在议会和新闻界诽谤攻击它。工厂主们对法国总工会的壮大以及 1936 年 6 月法国产业工人静坐罢工的威力感到十分惊恐，这次罢工是法国工人第一次大规模使用这种可怕的经济武器，工人占领了所有罢工的工厂，并且阻止了工厂主停工。

国家很快截然分裂为支持人民阵线和反对人民阵线的两派。商人和农民阶级通常都不愿缴纳收入所得税，但是增加所得税是满足社会公共开支所必须的。经济发展方式还非常依赖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国家需要太多的资金用于不同的项目，然而资本却很快离开法国而被投资或者储存到国外。有产阶级也

不愿认捐巨额的国防贷款,但是如果法国军队要为似乎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的话,这些贷款又很必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对力量,1937 年布鲁姆被迫辞去总理职务,一位激进分子取代了他的位置,人民阵线由此解体。

人民阵线瓦解后,法国人的士气严重低落。在 1938 和 1939 年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下,激进社会党总理达拉第领导法国加入英国一边反对罗马—柏林轴心,并且通过采取包括实际取消一周 40 小时工作制在内的多种缩减措施使法国经济避免了崩溃。但是,工人们怨恨人民阵线的失败,1938 年 11 月几乎实现了一次总罢工,后来法国政府对铁路工人实行军事管制才阻止了罢工。另一方面,有产阶级却被布鲁姆的政策激怒了。他们中的很多人确信自己的救世主就是一个法兰西极权国家。1939 年遭遇战争的法国不仅在军事上准备不足,在心理和精神上也是分裂的,因为它不确定自己将为何而战以及要对谁开战。

很多法国人仰仗他们的伟大帝国恢复衰退的士气和国家的物质潜力。法国殖民地的军队,特别是塞内加尔和北非的军队,曾经在一战期间弥补了法国军力的不足,二战期间或许还能如此。痴迷者还说包括殖民地在内的法国是一个拥有 1 亿人口的国家。然而在法国的殖民地,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和法属印度支那,人民已经开始要求地方自治和独立了。尽管某些法国左派领导人极力主张对这些要求做让步,但是几乎都未被接受。1936 年人民阵线政府与叙利亚和黎巴嫩谈判并达成协议,答应给它们独立,同时也附加了很多保留条件维护法国利益的优先地位。不过即使是这种让步,法国国民议会也不能接受,它拒绝了批准该协议。或许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任何政策都不能阻止法兰西帝国的解体,帝国在二战期间和战争结束后

就走向灭亡了,但是那些毫无创见的政策的确无助于安抚法国殖民地人民中的民族主义者。

三、美国

无论是从人员伤亡还是物质方面来看,美国在一战中的损失都根本无法与英法两国相比。美国的人员损失是死亡 11.5 万人,负伤 20.6 万人;法国的相应数字是死亡 138.5 万人,负伤 304.4 万人,占到其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而且单从物质上讲,美国可能还从战争中获益了。但是在某些方面,美国人战后的厌战情绪也像在英国、法国和战败的德国一样突出。厌战情绪推翻了从 1913 年以来一直控制着联邦政府的民主党。共和党连续赢得了 1920 年(这一年妇女首次获得选举权)、1924 年和 1928 年的总统选举。

1. 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1920—1933)

美国人的厌战也表现为孤立主义,他们希望摆脱西半球之外的国际政治纷争。整个美国都在渴望回到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总统描述的"正常"状态。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已经为打败德国做了需要他们做的一切,再进一步参与欧洲政治的纷争只会丧失美国的清白和美德,甚至可能灾难性地卷入欧洲的世故和邪恶。当欧洲的谈判进行了几个月都无法形成最终决定时,很多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能采取的唯一有效行动就是撤出。1920 年 3 月 19 日,美国参议院最终拒绝了包括国际联盟成立在内的《凡尔赛和约》。

美国的孤立主义也表现在具体政策上。1922 年和 1930 年美国的税收制度连续提高了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这突出了美国人的观点,即他们的高工资水平需要免遭廉价外国劳动力的冲击。孤立主义思潮和不断发展的种族歧视运动——其中三K党(Ku Klux Klan)是美国历史上种族歧视运动发展的高峰——还推动了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移民限制政策的实施,放弃了此前几乎不限制移民的政策。对新近主要是来自南欧和东欧的天主教及犹太教移民的普遍歧视更加剧了美国移民政策的转变。1924 年美国通过法案规定,以后每年美国接受各国移民的人数不得超过 1890 年从该国到美国定居人数的 2%。事实上,自从 1890 年以后才有大量的东欧和南欧人移居美国,该法案规定这个时间就突然减少了来自这些地区的移民。另一方面,北方国家比如英国、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又根本用不完它们的移民配额。

然而,孤立主义并没有应用于所有事务。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一直坚持要同盟国偿还所欠的债务。而且,美国国会根本不理会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的观点,即欧洲国家只能靠在美国市场上销售商品换取美元才能偿还贷款。实际上,美国的关税政策致使这种偿付根本不可能实现。

况且,美国并没有完全从国际政治中撤出。相反,作为一个没有正式盟友的独立国家,美国继续奉行似乎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很传统的政策,而不是各国逐渐联合对付正在崛起的独裁政权。1928 年共和党国务卿弗兰克·B. 凯洛格(Frank B. Kellogg,1856—1937)建议主要大国都放弃战争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工具。该建议与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提出的类似建议一起于当年正式写入了

《巴黎公约》,也就是著名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并且最终有23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尽管后来该公约被证明是无效的,但是公约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美国的倡导,而且美国也是公约的签字国之一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即使美国不想加入任何正式的同盟,它仍然关心全世界的稳定与和平问题。

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都致力于为自己在二战后取得的世界领导地位奠定基础。美国商人遍布全世界,美国贷款使德国工业的复苏成为可能,美国的汽车、冰箱、打字机、电话以及其他产品被销往世界各地。在远东,美国领导谈判签订了1922年的《九国公约》,规定它自己和其他大国(包括日本)都要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十年后,当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反对日本企图吞并中国和其他远东国家的领土时,他正是在遵循自己的共和党前辈制定的路线。

2. 繁荣和危机(1923—1933)

国内事务方面,20世纪20年代对很多股民来说是一个疯狂繁荣的时代。这也是一个禁酒、地下酒吧和造私酒者并存的年代。美国的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杂志、广播和动画都使人们感觉整个国家充斥着短裙、性解放、新舞蹈和私烧锦酒。当然,这只是很少一部分人的行为,就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的"生奶油"文化并不代表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但是20世纪20年代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从未找回幸福感的农业工人和那些仍然坚持维多利亚时代行为规则的人们会因此而认为无穷的财富、社会空虚和罪孽都是上层阶级的特性。

这也是一个工业发展显著、国有工厂和生产潜力稳定提高的时代,印证了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的论点,“企业就是美国的事业”。这个时代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稳步提高,这种生活水平以前还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而且在某些知识分子看来还很粗俗。当然,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的世界上仍然属于新事物。欧洲人对这种新生活方式既陌生又羡慕,无论粗俗与否,它是几乎每个人都非常向往的。在这个时代,美国已经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

大萧条的开始终结了这个时代。1928 年,华尔街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繁荣。上百万投机者跻身股票市场,买进股票并且希望很快以高额利润卖出。他们只用现金支付一小部分成本,然后从经纪人那里借差额,或者也常常借现金投资。不仅股票,还有房子、家具、汽车以及其他消费品,他们都可以用借来的钱购买。在这样大规模的放任经济中,信用无限膨胀到已经失去合理的基础。精明的投资人察觉到泡沫即将破灭,于是他们开始抛售手中的股票。结果就导致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股价暴跌,从 1929 年 10 月开始几乎不间断地持续到 1933 年。投机者和放贷者统统破产。

美国股市的崩溃引发了全球经济萧条,几乎没有国家能幸免,但是导致经济弊病的原因又远不止这一个灾难。十年来,美国和欧洲的农业发展都落后于相对或者确实繁荣的工业和商业,1929 年农产品的价格只相当于其十年前价格的一半左右。煤炭业是欧洲经济的另一个基本部门,或许没有农业损失那么严重,但也差不多。正如我们所知,来自石油和水力发电的竞争破坏了世界市场,于是诸如英国这样的传统产煤国不得不低价出售开采和运输都很廉价的煤炭。

西方经济中信贷的使用对于理解大萧条的爆发及其强度也很重要。农场主和制造商通过借贷扩大生产以满足战时的需求。农业和采矿业最先感觉到供大于求的后果，当工业或多或少还在繁荣时，农场主和矿业公司已经萧条，并且常常由于持续下跌的物价而无法偿还贷款。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在比较繁荣的经济部门靠工资过活的工人们，即使是在美国，其购买力增长也都相当缓慢。工人们常常通过购买房子或者汽车来提高生活水平，但是他们都是靠背负长期分期付款的负担，用贷款来支付的。

这里我们还必须考虑各国不同经济政策的影响：新兴国家比如南斯拉夫和波兰都建立了关税壁垒，从而促使诸如美国和法国这些传统的高关税国家进一步提高了关税。甚至英国也于 1931 年开始放弃其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而转向了约瑟夫·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计划，尽管它并不像另外一些国家实行得那么彻底。这场世界范围的运动既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最终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导致全球经济萧条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贷款、战争赔款和战债之间的复杂联系。战胜国希望战败国特别是德国为战争造成的损失支付巨额赔款，然而无论哪一届德国政府都不情愿甚至根本不想全额支付这笔巨款，特别是不能接受法国和比利时期望的数额。根据《道威斯计划》，来自美国的定期贷款以及美国私人资本挽救了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德国货币体系的崩溃。该体系支付了部分战争赔款，同时也救活了德国经济，因为 200 多亿马克的贷款只有三分之一被用在了支付赔款上。于是，当 1928 年美国银行开始对欧洲经济失去信心，《道威斯计划》和美国私人投资也开始枯竭时，整个欧洲的金融体系都受到

冲击。欧洲各国都停止向美国支付战争赔款和国际战债,银行业摇摇欲坠而后纷纷倒闭,欧洲信贷体系开始瓦解。

1931 年,英国废除了英镑直接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制。英国政府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英镑兑换黄金的比率,于是作为整个工业时代世界金融本位的英镑也出现贬值。其他货币立即或者随后就取代了英镑的地位。事实上,这场金融危机(至少从理论上讲)对世界财富的影响相对小得多。

并非单纯是纽约股市崩溃导致了大萧条。不平衡的繁荣、虚假的欧洲复苏、国际关税竞争以及其他很多问题都已经先于股市崩溃出现了。美国国内不规范的信贷体制早在十年前就产生了危害。但是,美国经济作为欧洲复苏的发动机,作为全球最具吸引力因此也最过热的经济,其全球最大股票交易市场的崩溃的确注定了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损失最大的危机。

这次大萧条在全球很多国家都非常严重,但是最严重的还是持续遭受危机的美国。这种影响可以通过一个数字说明,那就是 30 年代初美国最低的失业人数为 1600 万——相当于全国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从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个公认的评价经济是否健康的统计数值来看,美国 1933 年的数值比 1929 年减少了大约一半。

不过,美国经济的这次严重危机几乎没有引起有组织的反抗运动或者革命威胁。30 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确求助于“社会意识”,马克思主义也在作家和艺术家中赢得了信徒。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抛弃他们的基本信念,他们相信现存美国制度提供的合法手段能够克服危机。早在 1932 年富兰克林·D. 罗斯福(1882—1945)当选总统之前,美国的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机构已经做了很多努力缓解失业人口的困境。它们得到金融重建

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的援助,该公司主要致力于解救那些受破产和银行倒闭风潮严重影响的金融机构的冻结资产,从而增加政府的信贷。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基本信仰自由放任哲学,但是除了成立金融重建公司,他的政府几乎没做什么来缓和大萧条的影响。于是在1932年,希望更强有力解决经济问题的人们投票支持了民主党。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人投票给社会党或者共产党候选人。在这场大萧条的危机中,两党制仍然符合大多数美国人的基本政治需求。

3. 罗斯福新政(1933—1941)

民主党赢得大选从而获得了调度联邦政府的资源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明确授权。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D. 罗斯福正式上任。当时美国正处于金融危机,全国的银行都已经停业。罗斯福立即召集了国会紧急会议,宣布全国银行放假,逐步让健全的银行重新营业,由此开始了新政的第一阶段。1933年初的几个月,仅仅是联邦政府在努力应对危机的事实就大大鼓舞了国民士气。民众从银行休假中重新找到自信,他们重复着罗斯福就职演说中的话,"除了'恐惧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恐惧"。

罗斯福新政包括一系列政策措施,有些旨在解决当前的困难,有些旨在永久改变美国的社会结构。它是在大萧条的特殊压力下把欧洲国家正在试验的措施应用到美国,而这些措施往往会造就福利国家。

通过解除美元与黄金的联系,新政的短期措施旨在降低美国产品的价格以适应正在放弃金本位制的世界市场。通过扩大

金融重建公司的活动范围以及成立包括房主贷款公司(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在内的新政府贷款机构主要致力于解冻信贷。通过大规模公共建设工程救济失业人口,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保护银行存款,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规范投机行为和其他股市活动。1933年的《全国工业复兴法》建立了工业生产的规范,以控制竞争和确保工人参加工会及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所有这些革新措施都是由联邦政府而不是私人企业、各州或者地方政府实施的,因此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然,新政的长期措施更为重要。1935年美国通过《社会保险法》实行了全国范围的失业保险、养老金,以及与英国劳合·乔治时期相似的其他福利政策。国会通过扩大和调整税收结构,包括1913年宪法第十六次修正案批准的个人所得税,实际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分配了社会财富。国会还通过了有关劳资关系的一系列法案,加强和扩大了工会组织的作用。有关农业的系列法案规范了粮食种植和价格并且提供了大规模的补贴。另外还成立了一个大的地区规划机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旨在运用政府的权力改变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生活,主要途径是通过检查农田的侵蚀情况,控制洪水,以及由政府修建水坝生产廉价的电能。

罗斯福在1936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极其广泛的支持。但是新政再也没有恢复在他第一任期内表现出的势头。现在回想起来,罗斯福政府采取的措施显然是结合美国制度和文化具有的弹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摆脱了萧条。当然,完全复苏是到了二战爆发带来繁荣时才实现的。



1933年的新老权力交替：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出席罗斯福接替胡佛出任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即将离任的胡佛总统见证了因大萧条而急剧下降的支持率，但整个国家对于罗斯福的计划却知之甚少，只是许多人都希望实施彻底的改革措施。(Franklin D. Roosevelt Library)

1939年春夏，如果说欧洲坚持开战的话，美国人则急于保持中立。罗斯福与共和党就此问题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斗争。不过在1939年国际危机的紧要关头，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虽然不是完全团结但是也没有发生严重分裂。就像美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那样，口头政治的暴力掩盖了基本立场的一致，他们其实只是习惯于比欧洲政治家使用更激烈的语言。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美国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争取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为的是新世界可能再次

修正旧世界的不公。1930 年,在美国外交出现所谓的罗斯福革命之前,胡佛总统的国务院就发表了一个备忘录,专门指出门罗主义并非只关心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反对外部世界干预西半球的事务。美国不再派海军登陆中美洲共和国。相反,美国的政策是努力加强西半球的团结。在这些政策的基础上,罗斯福总统又提出了其著名的针对其他美洲国家的睦邻政策,美军撤出古巴,并且开始取消形式上的美洲帝国。

四、东西交汇:西方历史与世界历史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还有一个突出特征,是所谓“西方文明”国家与亚洲、中东,甚至也包括非洲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尽管在帝国主义阶段整个世界实际上都被纳入了欧洲和美国的轨道,西方人并不承认亚洲和非洲国家也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虽然由于贸易往来、文化融合、人口迁移和帝国的建立,西方历史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历史已经相互影响,但在从前像日本、中国这些国家的历史对于理解西方历史来说并不重要。现在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西方历史与世界历史已经密不可分。

1. 日本

在非西方民族中,只有日本在帝国主义的黄金时期仍然保持着完全的政治独立。不仅如此,20 世纪初期,日本正经历着工业革命并且努力向大国地位迈进,尽管并不受欢迎,日本已经全面参与了对帝国位置的争夺。但是由于日本人在取得这些显

赫成就时并没有彻底改变其传统的寡头和专制政治结构，所以即使他们已经成为西方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仍然完整保留了“东方性”。

一战后的十年中，日本曾表现出逐步实现政治制度自由化的势头。20 世纪 20 年代的日本内阁中有很多商人，他们支持积极的海外扩张，但同时也要求在国内推行某些谨慎的自由主义政策。比如，逐步扩大选举权，1925 年所有的男性公民都获得了选举权，女性则是到 1949 年才取得同样的权利。特别是在城市中首次出现了西方式的政党，它们给相对软弱的日本议会注入了新的活力。日本的工会组织也开始拥有支持者。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并没有发展成为议会民主制国家。到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政治权力就逐渐落入了陆海军军官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出身封建武士阶层。这个军官集团反对日本出现自由主义文官政府，同时对商人阶层也充满了嫉妒和不信任。他们从天皇制中找到了强大的政治武器，天皇被赋予绝对的政治权威，类似于西方人所说的神权君主。这些海陆军元帅们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天皇，借天皇的宣召实现自己的目的。

于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日本陷入了军事独裁统治。尽管公民选举仍然进行，但其结果并不受重视。出于恐惧或是希望从海外扩张行为中攫取利润的商人阶层也支持这个新政权。对天皇的崇拜日益增长，主要是让民众忠诚于天皇的神圣使命，进而确保其服从于借天皇之名统治国家的军人们的意志。有一支专门由残忍的特务组成的特种部队，被称为“思想警察”，主要任务就是迫害那些被怀疑有“危险思想”的民众。总之，此时的日本政府利用了许多日本独有的传统，但其操作又与欧洲的极权政

府明显相似。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与欧洲极权主义最为相似的就是对外政策。像希特勒德国或者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一样,日本也宣称由于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自己显然是一个缺乏资源的穷国。与此同时,日本又尽其所能鼓励人口增长。1853 年以前日本经历了 125 年的人口零增长。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提高了生活水平,巩固了自然资源,并且开始城市化和资本积累。现在日本刚好进入一个经济和人口持续增长的时期。从 1850 年到 1950 年的 100 年间,尽管有对外侵略战争,日本的人口还是从 3200 万急剧增长到 8400 万。这期间,日本人也在不停抱怨其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市场有限。

在这些抱怨的背后隐藏的实际经济问题是如何在大萧条和国际贸易全球崩溃的形势下维持日本经济,以及如何解决民众的吃饭和就业问题,因为 1930 年日本的人口已经达到 6000 万。为了寻求通过帝国扩张来解决这些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的军国主义者走上了西方世界业已设定的道路,这也是 1895 年夺取中国台湾以及 1910 年吞并韩国的日本军官和政客们已经指出的道路。一战期间日本企图征服中国但没能成功,到二战时,日本显然几乎就要得逞了。

曾因孤立而被称为"隐遁的王国"(the Hermit Kingdom)的韩国直到公元 668 年才第一次实现统一。现在,从 1910 年到 1945 年,韩国被日本统治,并且被迫更名为"朝鲜"(Chosun)。20 世纪 20、30 年代,日本国内针对韩国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种族歧视日益严重。1923 年的毁灭性地震席卷日本关东平原,将整个横滨和三分之二个东京都夷为平地,夺走了 14 万人的生命,而在此期间,还有 6000 名韩国人遭到空虚狂暴的日本人杀害。

2. 中国

此时的中国正致力于一场摆脱西方殖民大国统治的伟大斗争，而这绝不是一次民族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单纯斗争。特别是它由于两个额外的原因而变得复杂：一是奉行扩张主义的日本日益威胁中国的独立；二是越来越严重的共产主义对中国政治的干涉。中国斗争的前景很可能只是更换一下帝国主义领主。

由于向欧洲列强和日本出让海军基地和经济政治特权，到1900年中华帝国已经丧失了很多实际主权。189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后，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向中国索取更多的让步。于是在中国爆发了强烈反抗这种帝国主义侵略狂潮的活动。被逼无奈的满清政府支持成立了排外的民族主义秘密团体，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义和拳”(the Fists of Righteous Harmony)。传教士们称这个组织为“拳民”(Boxers)，这些人造反时，西方媒体就借用了这个名字。1900年的拳民暴乱(the Boxer Rebellion)杀死了200多外国人，其结果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列强为保护其国民和财产不被拳民伤害而使用了军队。1901年，列强又迫使满清政府支付巨额赔款，并且给了它们进一步损害中国主权的权利。

于是，1911年的中国革命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在抵抗外国帝国主义方面表现无能的满清政权。这场革命运动同样反对西方，包括西方列强本身以及被视为西方列强代理人的地方统治者。然而这次革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由西方思想和先例引发的，并且往往是由完全“西化”的中国人领导。

一开始，两个主要革命集团对用什么性质的新国家取代满

清政权持对立观点。其中一个集团组成了国民党,由孙逸仙(1866—1925)和一些曾在西方留学和生活过的青年知识分子领导。他们希望在尽可能多地保留中国传统家庭和乡村结构的同时,以西方政治体制为模板建立民主的议会制共和国,从而将西方工业社会嫁接到中国。而以袁世凯(1859—1916)为首的另一个集团则希望建立一个基本结构还是独裁主义的强大中央政府,但是权力不是掌握在皇帝和传统的极其保守的达官贵人手中,而是掌握在那些能够自上而下推动中国完成现代化的强人手中。

1911年后选举产生的议会与袁世凯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最后孙逸仙的国民党被打败。1914年,在清除了议会内的国民党成员后,袁世凯就颁布宪法声明,为自己获得了十年的总统任期。孙逸仙和他的信徒们没能将中国变成议会民主制国家,而袁世凯在1916年死后,新生的共和国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前景,只剩下虚幻的中央统治和地区强人掌握着实际权力,中国从此进入了地方军阀的新时代。

就在同一年,中国还面临着日本的侵略企图,日本准备趁欧洲列强混战之机夺取其远东帝国利益。早在1915年,日本人就秘密地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相当于要求成为中国的保护国。此时正处于力量低谷的中华民国通过向同盟国宣战的方式予以反抗,结果至少获得了英法名义上的保护。由于无法藐视西方国家的反对,日本人只好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租界地。战争结束后,获胜的协约国在美国领导下遏制了它们这个新军事伙伴的野心。1922年,日本被迫签署了保证中国独立地位的《九国公约》。这次挫折对日本来说只是加深其敌视美国的一系列事件的开始,这种敌意最终在20年后导致了战争。

因此，一战后中国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力量就是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侵略者。孙逸仙死后，国民党由他的连襟，曾在日本接受训练的陆军军官蒋介石(1887—1975)领导。国民党中的民族主义者一直致力于希望建立有力的中央政府以抗衡地方军阀的斗争，只是斗争并不成功。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最初是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直接帮助下产生的，接受苏联同志的指导，并且受到国民党领导人的鼓励。有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像是国民党的左翼，但是很快他们就与蒋介石领导的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分裂了。

共产党在早期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表现不佳。1926年蒋的部队发动了一场迫害和暗杀共产党的运动。1927年共产党就被国民党排挤出来。之所以遭受这次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有力支持，因为当时正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内斗时期。由于在如何"修正"苏联的对华政策方面存在分歧，这两位苏联巨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后来斯大林占了上风，但是他认为在中国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于是苏联选择不帮助自己的中国同志。

为了争夺5亿中国人的主动顺服或者被动接受，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从口头宣传到实际行动都大费周折，这5亿中国人中大部分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所以，为了把中国改造成西方意义上的国家，需要的不仅是建设铁路和工厂，或者宣传学习现代科学而不是中国的古典作品，它还需要让中国农民把自己看做中国公民，这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开始了。

1931年9月日本攻打满洲，这是中国北方的一个边远省份，而且对日本侵略者来说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目标。因为，

亚洲和太平洋(1910—1926)



图为毛泽东在长征结束时作总结讲话。为摆脱政府军的堵截，红军在 1934 年 10 月至 1935 年 10 月间进行了从江西到陕西长达 6 千英里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追随者大概只有十分之一最终到达了目的地。这位年轻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在经历了这次严峻考验后，最终成为共产党的主席和红军总司令。长征终结了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主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并同时开启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时期。(Franklin D. Roosevelt Library)

满洲有丰富的煤铁矿藏，并与已经被日本侵占的韩国相邻。另外，日本人认为自己在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中将俄国人赶出了满洲，所以日本理所当然是俄国的继承者。到 1932 年，日本人已经具备足够的实力宣布满洲为独立的“满洲国”，并且扶植亨利·溥仪(Henry Pu-yi，1905—1967)建立了傀儡政权，溥

仪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旧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中国人通过抵制日货表示抗议,于是日本人就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港口城市上海。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中国人要进行有力的反抗就需要强大的外部力量全力支持,但是西方大国和国联给中国的仅仅是口头声援,所以中国人不得不放弃抵制行动,日本人留在了满洲。中日两国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存在,日本人很快决定吞并其余的大部分中国领土。1937 年 7 月,日本不宣而战开始全面入侵中国。

日本人在军事上进展很顺利。到 10 月份中国的南方重镇广州沦陷时,日本已经控制了中国沿海和人口稠密的内河流域的所有战略要点。蒋介石被迫到内陆省份四川避难,并在长江上游的重庆建立了陪都。凭借西方国家的援助,国民党政府在那里一直坚持到二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溃败。

然而即使是在侵华成功的顶峰时期,日本也只不过是通过驻军占领了中国的狭长地带,控制着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他们控制着铁路,但是时常受到游击队的袭击,而且一旦远离相对稀少的现代交通线,日军就会孤立无援。名义上已经成为日军占领区的很多中国村庄在被占领期间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日本人根本无法使中国人民接受其统治。

国民党中的民族主义者从一开始就领导了对日本人的反抗运动,但是他们最终也没有赢得中国人民的完全忠诚。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军事原因,因为蒋介石的军队无法与控制着中国少数几个工业城市的日本军队相抗衡。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期流亡四川时期,民族主义者的士气衰退了。这种严峻考验没有净化和增强他们的力量,反而使他们对中国百姓更加疏远,加上他们自身的腐败和钩心斗角,以及无法实现孙逸仙和国民党早期的承诺。于是,最终的胜利落到了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手中。

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早期，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变化。30 年代共产党寻遍大半个中国，最后在中国北方的延安建立了根据地，其战略地位有点类似于在四川的蒋介石。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区别，在被日本人占领的数年里，蒋介石及其军队和官僚机构始终在重庆，而共产党则成功地在北方敌占区的内部和周围，包括南到沿海省份北至满洲的广大地域上建立了庞大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和地方委员会网络。到 1945 年，共产党已经准备好与国民党的成功对抗了。

3. 印度

一战对印度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越来越多接受西方传统教育的南亚人在协约国宣传造势的影响下都开始支持战争，希望为民主拯救世界。通货膨胀和战争导致的其他混乱进一步刺激了南亚人对自治的要求。早在战争期间，英国总督和他的专家们就已经在计划实施改革，但是这些方案都受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紧张关系的制约。英属印度总人口的大约四分之一是穆斯林。在印度河流域、西北部旁遮普省的部分地区以及东部孟加拉的部分地区，穆斯林教徒都占居民的多数，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则是散居于印度教徒和其他非伊斯兰教徒中间。

尽管他们在社会上、在行政部门或者英国的官僚机构中可能也打交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彼此都非常反感对方。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笃信的宗教导致的。穆斯林教徒反对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他们认为印度教对很多神的崇拜是无法接受的，印度教还把那些神描述成各种人的形象，甚至常常很色情，这都是亵渎神灵的。印度教徒则认为世界上很多东西都



图为印度诗人和政治家萨罗吉妮·奈都与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也尊称为圣雄或圣灵)在1930年抵制盐税运动中的合影,这一运动表面的目的是抵制英帝国政府征收的盐税,但实际目标是终止英国对次大陆的统治,这一目标最终于17年后得以实现。(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是神圣的，他们可能崇拜牛或者别的动物，穆斯林却宰杀这些动物。印度教徒认为穆斯林教徒的行为不纯洁，穆斯林教徒认为印度教徒的行为不神圣。正是由于这种对立，所以在一致针对英帝国的反抗运动过后，20 世纪的印度又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团体——印度国民大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和全印度穆斯林联盟(All-Indian Muslim League)。

尽管有这些困难，一战后的印度人民仍然坚定不移地追求自治和独立。印度教徒方面，20 世纪的一位伟大领袖莫罕达斯·K. 甘地(Mohandas K. Gandhi，1869—1948)有力地团结了国大党并且对民众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甘地出身于零售商或者叫小店主阶层，毕业于牛津大学，因此对西方世界很了解，他还曾作为一名年轻的律师专为南非的印度少数民族打官司，所以对现实政治也非常精通，这些经历使得甘地能够出色地与英国人和印度教徒两边打交道。他发明了被称为"非暴力消极抵抗"或者"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该方式符合印度教徒的基本信仰，即暴力是虚幻的因而也是无效的。他倡导的典型做法就是有组织的印度人联合抵制英国商品。被尊为"圣雄"的甘地也反对印度教搞歧视，他有时候进行绝食就不是针对英国人，而是对印度的贱民阶层被排除在社会阶级体制之外表示抗议。

其他的国大党领导人，特别是地方领导人，都愿意效仿西方的煽动、宣传和暴力方法逼迫英国不断做出让步。随着印度人在地方自治和行政部门中获得了政治经验，他们相信印度的自主地位即将实现。这正是二战爆发时的情况。等到二战结束时，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的相互敌视却表明他们要求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印度而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这将导致 1947 年印度的分裂。

文献记载

乡村民主

莫罕达斯·甘地一直在追求独立,他也经常提到独立。1921年他试图解释"独立的奥秘"。

居民们必须改变他们的时尚观念,至少暂时停止穿那些并不经常穿在身上的好衣服。他们应该培养自己去发现洁白无瑕的手织棉布中蕴含的艺术和美,学会欣赏其柔软的不均匀质地。居民们必须学会像守财奴使用他的积蓄一样使用布料。

即使居民们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穿衣品味,还是要有人为织布者纺纱。但是这只能靠每个人在闲暇时出于爱好或者为了赚钱而纺纱来完成。

在被英国殖民前的印度经济中,纺纱是印度妇女的一种体面而且从容的职业。这是一种只属于印度妇女的艺术,因为她们有更多的闲暇。由于纺纱优雅、悦耳,又不需要很大的力气,它已经成为女性的专利事业。但是其实它与音乐一样对男性和女性来说都是优雅的。手工纺纱可以保护妇女的美德、避免饥饿以及维持物价的较低水平。其中也隐藏着独立的奥秘……我们的先人屈服于外国制造商的邪恶势力而犯下罪孽,手工纺纱的复兴是我们为此所必须做的最起码的忏悔。

我想拨回进步之钟的时针吗?我想用手工纺纱和手工织布代替工厂吗?我想用乡间马车代替火车吗?我想完全毁掉机器吗?有些记者和公众人物曾经提出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不会因为机器的消失而悲伤,也不会认为那是灾难。但是我并没有打算这样对待机器。目前我想做的是通过我们的

工厂增加纱和布的产量，节省我们花向印度之外的数百万资金，而把这些钱用在我们自己的村舍上。

正如我们离开呼吸和吃饭就不能存活一样，没有国内纺纱业的复兴，我们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独立和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消除贫困。我认为纺车和炉子一样在每个家庭都是必需品，再没有其他计划能够永远解决人民日益加剧的贫困问题了。

M. K. Gandhi, *The Village Reconstruction*, *by* M. K. *Gandhi*, ed. Anan T. Hingorani (Bombay: Bharatiya Vidya Bhavan, 1966), pp. 5—7.

4. 中东

欧洲国家想在中东建立帝国的历史由来已久。1914 年以前中东地区一直穷困不堪，但是在 1914 年，该地区第一次发现了石油，今天的中东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不过，石油资源在中东的分布并不均衡，已经发现的主要油田都集中在西南波斯、伊拉克的河谷地带以及波斯湾地区。这些新发现的财富更增加了欧洲国家对中东的兴趣，而且在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美国专家开始担忧西半球的石油储备枯竭，美国商人也进入该地区争夺英法两国的既得利益。

尽管西方人企图维持对中东地区的充分控制以确保正常开采石油，他们也努力避免比较粗鲁的政治帝国主义方式。一战后，古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地都是由西方托管而没有作为西方殖民地被吞并。法国获得了对叙利亚及其半基督教邻国黎巴

嫩的委任统治权。已经作为埃及保护国的英国被授予了对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唯一享有类似完全独立地位的主要阿拉伯国家是沙特阿拉伯。它实质上是一个中世纪国家,由部落酋长阿卜杜拉·沙特(Iban Saud,1880—1953)一手创建。战后的托管统治把太多的阿拉伯国家置于帝国控制之下,从而阻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抱负。他们的活动往往结合使用了民族运动的常见要素——西式教育、对西方人的仇恨、学习西方技术的愿望,以及对伊斯兰教的忠诚和共有的阿拉伯身份意识。

阿拉伯民族主义也集中表现在具体的巴勒斯坦问题上,因为英国 1917 年发表《贝尔福宣言》承诺要把这块阿拉伯人口聚居的领地辟为“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特别是纳粹在德国掌权后,大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其人口比例从大约 10%增加到 30%左右,并且导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不断冲突。英国人试图安抚犹太民族主义(或叫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但是基本徒劳无功。二战爆发前夕,英国开始限制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和在托管地购买阿拉伯土地,这就为战后严重的巴勒斯坦问题种下了祸根。

法国人几乎没有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做任何妥协,他们在镇压 1925—1926 年的起义时炮轰大马士革还激怒了叙利亚人。十年后,人民阵线政府本来打算给予叙利亚和黎巴嫩至少一定程度上的独立,但是由于法国议会拒绝批准草约导致希望破灭,进而加剧了阿拉伯人的被出卖感。随后,阿尔及利亚以及后来突尼斯的民族主义领袖就开始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阿拉伯人协商如何完成反抗法国的共同事业。

英国则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给予它的某些附属国名义上的独立。一战后埃及的民主主义骚动促使英国宣布埃及成为

由国王福阿德一世(King Fuad I,1868—1936)统治的独立的君主国。但是,英国仍然保留在埃及驻军的权利,同时坚持要求普通的埃及法庭无权审判定居埃及的西方人,只有西方法官占多数的混合法庭才有权审判西方人。1936 年的英埃协议才最终结束了这种混合法庭,并且规定除了驻扎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地区以外的所有英军一律撤出埃及。与此同时,埃及还继续保持与英国的紧密同盟关系。

土耳其也经历着一次政治新生。一战削减它的领地使其成为单一民族国家,也就是以土耳其人为主要人口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为了保卫这个核心地区不被希腊人和战胜的协约国进一步瓜分,土耳其人掀起了一场激烈的民族主义复兴运动,迅速扩大了 1914 年前由青年土耳其党发起的改革。这场新政治革命的领袖是天才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他将希腊人赶出了安纳托利亚,并于 1923 年在洛桑与协约国谈判签订了对土耳其更加有利的条约。在他的领导下,1922 年土耳其宣布成立了共和国,虽然实行一党制,却也按照西方的议会路线制定了宪法。

凯末尔还强制实行迅速、大规模,甚至有时残忍的西方化措施。女性获得了选举权,并且开始在议会中担任议员。尽管即使凯末尔也不敢倡导立法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戴面纱,但是至少在理论上,女性摆脱了伊斯兰教义的束缚。而且,他的确要求男性穿着西式服装。欧洲法律法规取代了伊斯兰宗教法规,文明婚姻取代了一夫多妻制,采用了西方的历法,禁止建造新清真寺和修缮旧清真寺。引入西方字母改造了土耳其语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因为由于古奥斯曼土耳其语包含大量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单词以及复杂的阿拉伯语书写方式,以前只有极少数土耳其人能够使用这种语言。另外,凯末尔还要求所有土耳

其人改成西方式的姓,他本人的姓氏也改为“阿塔图尔克”(Atatürk,土耳其之父)。到1938年逝世时,阿塔图尔克已经彻底变革了他的国家。而且,他还确立了土耳其独立于西方的地位,这一点很快由二战期间土耳其的中立给予了证明。

伊朗(波斯)作为中东地区另一个传统的独立大国也以土耳其为榜样,于1905—1906年间开始了反抗英俄帝国主义侵略的伊朗革命。自中世纪延续下来的政治结构被改成有限君主制,成立了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但是,革命很快就流产了。受其强大而富有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还有部落的影响,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伊朗国王不愿放弃他的传统权力,英俄两国也不愿放弃他们的势力范围。所以,一战期间两国都在表面中立的波斯驻扎了军队。

俄国革命减轻了沙皇对波斯主权的威胁,一战结束时,波斯民族主义者又强迫政府拒绝了英国的签约要求,因为英国企图借此把波斯变成事实上的英国保护国。波斯民族主义者的领袖礼萨·汗(Reza Khan,1878—1944)是一位有才干但是几乎没受过教育的军官,他对俄国人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凭借多次军事胜利,礼萨·汗先是成为国防大臣,后于1923年出任了首相。此后,他极力操纵议会服从于他的意志,并且赢得了军队和内阁的支持。在圣城库姆(Qum)与教士协商后,伊斯兰宗教势力也站到他一边。1925年议会废黜卡扎尔(Qajar)王朝,宣布礼萨成为礼萨·沙赫·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礼萨·沙赫对西方缺乏了解,他反复尝试让自己的孤立国家走向现代化,结果屡试屡败。于是他的统治变得越来越专制,还表现得越来越同情纳粹党。1941年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后,为了保护经由伊朗到苏联的供给线,英国和苏联就派军队进驻伊朗并且强迫礼萨·沙赫退位了。

历史写真

命名与民族主义

现代化和民族主义都需要改变那些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又被视为是贬义的、错误的、不能恰当表明新社会价值观的旧名称。或者是改变那些仅仅是因为在西方新的音译方式已经取代旧的音译所以就显得过时了的旧名称。本章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中国的首都长期以来被叫做北平（Peking）（这里也这样叫），现在改成了北京（Beijing）（在接下来的几章将这样叫）就是由于把汉字及其发音直译成英语的方法的现代化。波斯（Persia）现在官方叫做伊朗（Iran），尽管如此，把伊朗公民叫做波斯人（Persians）仍然是正确的，因为一个是用作名词，另一个是用作形容词。

因此，不仅在改变地名方面，而且在它们的发音、名称的创造、词句的翻译这些方面，历史都表现出它的偏见并且很快就会过时。即使是在如此明显的一个简单例子中，比如说原来英国的东非殖民地肯尼亚（Kenya）的发音就潜藏着历史变迁的声音，因为在独立以前该殖民地被叫做“keen-ya”，而独立后的国家正确的发音就是“ken-ya”。历史学家如果想要准确描述某个时代，就必须注意这些差别。

礼萨·沙赫的命运提醒了我们，非西方世界某些表面上的主权国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反抗大国和维护其独立的程度。到二战爆发时，帝国主义链条已经被松动但是情况并不严重，更没有达到业已摧毁的地步，全面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还没到来。

五、本章小结

英国是第一个遭受后工业时代发展弊病的国家。一战后，保守党希望维持私有工业，并且赞成实行保护性关税以应对外国竞争，工党则提倡对关键产业实行国有化。

政治民主化在英国继续发展，所有年满 21 岁的男性公民都取得了选举权。1928 年，年满 21 岁的女性公民也最终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刚刚出现复苏的英国经济很快又遭遇了大萧条。

1919 年，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开始要求彻底从英国独立出来，而不是地方自治。1921 年，南方 26 郡成立了爱尔兰自由邦，但阿尔斯特 6 郡仍然隶属于英国。尽管英国于 1949 年承认了爱尔兰共和国的完全独立，北爱尔兰问题依然存在。

无论从人员伤亡还是物质损失来看，法国都是受一战影响最甚的国家。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重建工作的开始，法国又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其他经济和社会混乱。法国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分裂在战后的法国重新出现。

深受经济和政治困难打击的法国政府不顾左翼力量的反对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做出了让步。1939 年，军事装备和心理准备都不充分的法国被迫应对战争的威胁。

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印度支那的法属殖民地人民纷纷要求地方自治或独立。法国的托管地叙利亚和黎巴嫩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但是没有获得独立。

一战后，美国的孤立主义情绪表现在关税制度和强行规定限制移民的配额政策上。尽管如此，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仍然

卷入了欧洲和世界事务。

美国国内，1929年的股市崩溃终结了柯立芝时期不均衡的经济繁荣和华尔街前所未有的投机买卖。大萧条在美国造成的危害之重和持续的时间之长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富兰克林·D. 罗斯福实施新政改善了形势。但是美国经济的完全复苏是直到二战爆发才出现的。

随着20世纪30年代军人取得政治权力并且强制推行军事独裁，一战后日本出现的自由化趋势就结束了。与德国和意大利一样，日本政府开始奉行扩张主义政策，要求生存空间、资源和新市场。

在中国，1911年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中国奋力争取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奴役，但是这种努力被内战和日本的扩张威胁打断了。1931年日本进攻满洲，1937年正式发动了侵华战争。

20世纪20、30年代的印度人一直鼓动自治，但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妨碍了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大党领袖甘地主张非暴力不合作，赢得了很多印度教徒的支持。

在中东，欧洲列强急于保证自己获得该地区的石油资源。国际托管制度维持了欧洲对中东的控制，阻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事业。尽管埃及独立了，英国仍有权在那里驻军。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强制推行了大规模西方化。伊朗国王礼萨·沙赫迅速实施现代化的努力却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第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历史上，没有什么结果是“刚刚开始的”。很多新的发展势态是事件的原因，但是其中大多数又同时就是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这场20世纪的第二次战火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一战结束时不成功的和平安排的后果，同时也是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混乱和大萧条本身造成的。另外一些可能的原因就是，几百年的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极权国家受挫的军国主义，甚至还有民主国家间善意的同情。1919年后的20年里，国际关系是如此动荡，二战距离一战的时间又如此接近，以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有时就被称为“二十年的休战期”。或许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这两次战争完全视为一场冲突，正如他们现在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看做实际是一场战争一样，但是就目前来说，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把它们视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一战（1914—1918）和二战（1939—1945）。

一、两次大战之间的国际政治

英国和法国在二十年休战期的第一阶段掌握着民主世界的国际领导权。尽管它们在道义上,有时也在实践上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是已经越来越无力阻止那些敌视其政府形式的国家崛起,包括意大利、德国、苏联、日本。到最后,德国再次向1918年的主要协约国集团成员发动了侵略战争,而且这一次德国还联合了两个它原来的敌人即意大利和日本,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对自己1918年的分赃所得不满意。

纳粹德国坚持认为,第二次战争是所谓凡尔赛"独裁和平"的直接后果。在很多同情者的支持下,纳粹党声称德国被"战争罪"条款羞辱,被掠夺了领土和殖民地,被强加了根本无力支付的巨额赔款,还被剥夺了主权国家拥有军备的正常权力。实际上,《凡尔赛和约》的确使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国背负了沉重的负担,而且这些负担在某种程度上是协约国出于报复和恐惧而强加给德国的。事后看来,协约国更明智的政策本该是帮助这个新政府,而不是给它太过沉重的包袱,然而事后之明不是历史。

1. 西方

这个时期欧洲对和平的美好期望都寄托在后来被称为"集体安全"的理念上,即相信通过很多国家彼此承诺共同援助任何被侵略的受害国就能够保障安宁。这种信仰在《国联盟约》以及几乎所有20世纪20年代的众多国际协定中都有体现,其中1925年在瑞士洛迦诺签订的系列条约可以说是样本。由德国

外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提议,并且得到他的英法同行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1863—1937,约瑟夫·张伯伦的长子)和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支持的洛迦诺协定是这个所谓"履约时代"的无上光荣。协定意在表明,德国是值得信赖的,它承认凡尔赛和约确定的与法国和比利时接壤的西部边界。英国和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也作为担保国与这三个国家一起签署了协定,承诺将向任何签约国提供军事援助抵御来自其他签约国的侵略。德国向法国和比利时保证它们绝无后顾之忧。法国自占领鲁尔失败后也重新确立了温和的对德政策。英国和意大利表面上也保证它们对邻居们的和平承诺。集体安全似乎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甚至有一段时间,政治家们经常用"洛迦诺精神"劝导德国接受一项也保证其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类似协定,但是事实证明这是徒劳的。

在法德总体繁荣和两国外长的政策支撑下,洛迦诺协定表面上维持了几年。1926 年德国获准加入国际联盟,该事件似乎表明它不仅恢复了国际声誉,而且接受了国联成员的和平目的。1928 年德国又签署了宣布战争为非法的《凯洛格—白里安和平公约》,这虽然是一个高尚却不切实际的条约,但在形式上似乎更加证实了上述乐观印象。于是,1929 年法国就同意在 1930 年前全部撤出其在莱茵兰的最后占领军,从而比《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日期大大提前结束了协约国对德国的占领。

美国虽然不是国联的成员,却在推动国联的一个主要目标即裁军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1921—1922 年冬,几个海洋大国在华盛顿召开海军会议并且一致同意在建造主力舰(界定为战列舰和重型巡洋舰)方面"休假"十年。1930 年的伦敦会议在限制非主力舰(包括潜艇)方面取得的进展不大。伦敦海军会议的

部分失败是个不祥的征兆。经过长期准备,两年后国联又召集会议讨论限制军备问题。不仅国联成员,美国和苏联也派代表到日内瓦参加了会议。但是,1932 年的这次世界裁军大会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到 1932 年,洛迦诺精神就消失了,履约时代也宣告结束。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 1929 年爆发了全球大萧条。在德国,萧条对希特勒的上台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民主国家,萧条也对世界和平产生了严重影响,因为它削弱了士气,打击了人们的信心。其实即使是在最成功的履约时代,也已经有清楚的预警证明表象与现实并不完全一致。局势正在朝着所有人都不希望的方向发展,德国拒绝了以洛迦诺方式安排其东部边界,因为各个党派的德国政治家都不接受经过东普鲁士的波兰走廊存在。法国人也放弃了对欧洲集体安全的希望,转而依靠新的联盟体系和法德边界上的所谓"马奇诺防线",这是法国国防部长安德烈·马奇诺在任时开始修建并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庞大防御工事。而德国方面也已经开始与苏联政府秘密合作,希望以此抵消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

苏俄也是一个不安定因素。西方国家将其视为不能完全融入国际体系的革命力量。苏联是西方政治家憎恶的革命信仰的中心。西方人显然不会信任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信仰基础上的政府,因为马克思主义相信经过一场暴力的阶级战争,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都注定灭亡,并且蜕变为共产主义国家。

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了二战的爆发,那就是三个大的西方民主国家即英国、法国和美国总是不能形成统一战线。尽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但其政府的性质不同。美国国内有很多不同的种族团体,虽然它们都自称起源于欧洲但是却对欧洲

正在出现的问题持完全不同的立场。英国和法国在国联中经常发生矛盾,而美国由于不是国联的成员,所以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调和它们的分歧。

疲惫不堪且人口锐减的法国还在努力以其仅属二流水平的资源发挥一流大国的作用,同时它也越来越惧怕复兴的德国。法国人不仅努力推动全面落实旨在削弱德国的《凡尔赛和约》,而且希望弥补俄罗斯的不足,以形成其对抗德国的东部联盟。从 1921 年起,法国开始与德国东部的小国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结盟。其中,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还形成了所谓的小协约国(the Little Entente)。很多英国政客由此认为 20 世纪 20 年代的法国似乎又要觊觎欧洲霸主地位了,因为从百年战争直到拿破仑时期的英法冲突都是由此而起的。

那些"光辉孤立"政策的拥护者刚刚经历战争的劫后余生,他们促使英国人不愿再用武力干预欧洲大陆的事务。尽管英国的确接受了洛迦诺公约及其惩罚违约者的义务,但是在此前一年,英国主要是在自治领的影响下已经拒绝了更全面的日内瓦议定书,因为该议定书规定签署国有义务强制仲裁国际争端。于是,英国及其自治领的和平主义情绪进一步强化了德国人的意识,使他们确信英国不会阻止其对欧洲大陆的有限侵略。

英法合作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国联软弱无力。日内瓦议定书遭否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了国联的宏伟目标是如何因英法分歧而受挫的。议定书本来是得到法国支持的,结果却被英国否决了,因为英国担心议定书的执行最终会完全依赖自己。还有一个例子是 1923 年墨索里尼在与希腊的争端中攻打并且一度占领了爱奥尼亚的科孚岛(the Ionian island

of Corfu)，这种行为完全是无视国联的存在。另外，国联也没有执行其决定的手段，作为一个头重脚轻的机构，国联全体代表大会不如英法控制的小理事会有决定权，一旦这两个大国发生分歧，国联根本无法运转。科孚岛危机期间，国联就是因为英法在法国的鲁尔政策问题上不和而陷入了瘫痪。1935 年以后，德国开始了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单边军备竞赛”，而当时的美苏两强都基本不在总体均势之中。

2. 苏联的对外政策

1919 年列宁创建了第三国际，后来改称共产国际。它号召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团结起来反抗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格雷戈里·季诺维也夫被任命为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他的主要助手基本都是俄国人。保加利亚、挪威、意大利、西班牙的工党、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党派，纷纷开始追随这个新组织，后来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显然是在利用其秘密警察和军队在俄国建立独裁统治，有些空想家又厌恶地退出了共产国际。尽管共产国际一直与苏联外交部配合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它也经常明确反对苏联。这种二元性使苏联的对外政策表现出与众不同，有时还反复无常的特点。

苏联与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了条约，用承诺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换取了贸易。这些协定虽然对苏联外交部有约束力，实际上并不影响共产国际。1922 年，苏联又应邀参加了在热那亚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英法两国认为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回归资本主义，于是它们拟定了一份投资俄国的计划。结果苏联人不仅拒绝该计划，甚至还与战败的德国缔结了《拉巴洛协定》(1922 年 4 月)，其中声明苏联

放弃全部赔款要求,也暗示德国愿意承认苏联工业的布尔什维克国有化。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当然不愿给予这种承认,因为它们早在十月革命前都在俄国有大量的投资。

1923 年在洛桑,苏俄就海峡的国际制度问题与英国产生争执并且输给了英国,后来又在阿富汗问题上与英国出现更大的矛盾。尽管如此,英国还是在 1924 年承认了苏维埃政权。英国很多工党党员都清楚苏俄在流血,但是他们仍对列宁实现俄国社会现代化的惊人速度羡慕不已。1924 年下半年,据说是教给英国共产党革命技巧的所谓"季诺维也夫的来信"在英国发表。信件显然很可能是伪造的,但是的确影响了英国选民,结果导致鲍尔温的保守党政府取代了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1927 年,一家苏联公司在伦敦的营业所遭到袭击,进一步证明了英国存在的共产主义骚动,于是英国政府与苏联彻底断绝了关系。当时美国还未与苏联建交,它是直到 1933 年罗斯福出任总统后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

1918—1927 年间,共产国际对苏联的外交失败做了统计。首先,苏联在 1921 年没能遏制住意大利左派势力,因而促成了墨索里尼在第二年的成功。其次,苏联在保加利亚没能与开明的农民政权实现合作,结果让右翼集团在 1923 年取胜。最严重的是苏联在德国的失败,因为 1923 年随着法国占领鲁尔区,革命形势实际上已经出现。

苏联人在波兰也失败了,1926 年他们帮助毕苏斯基获得了独裁权力,随后毕苏斯基就转过来反对他们。苏联人在穆斯林和殖民地世界也遭遇了失败,但他们最大的失败还是在中国。1923 年,中国民族主义革命领袖孙逸仙同意采纳共产党的建议,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优秀代表迈克尔·鲍罗廷(Michael

Borodin,1884—1953)。鲍罗廷帮孙逸仙重组国民党并且吸收共产主义者入党。结果孙逸仙去世后,1926 年 3 月蒋介石领导了一场反政府叛乱,并且开始逮捕共产主义者。斯大林当时错误地主张,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必须先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帮助蒋介石完成这场革命,这其实是自 1917 年 4 月列宁回到俄国以来布尔什维克党从未采纳过的理论,其严重后果就是中国共产党被蒋介石大肆屠杀,苏联也因此威信扫地。

斯大林显然从未真正相信过共产国际能够完成世界革命。但是,掌权后的斯大林并不能抛弃共产国际,一是由于他可能因此招来批评,二是因为他打算削弱和清除其他国家某些共产主义者存在的托洛茨基情结。他把在国内对付共产党的相同手段应用在共产国际上,利用苏联代表团确立了对共产国际的全面控制。共产国际从此就被操纵用于声讨斯大林的敌人:1924 年是托洛茨基和左派,1928 年是布哈林和右派。结果,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部之间再也没有出现分歧。

随后共产国际就被带入了激进革命活动的新时期,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被抨击为“社会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的最危险敌人。由于斯大林对世界革命的可能性早就失去了信心,他对国外共产党的行动缺乏兴趣也直接导致了 1933 年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因为曾经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德国共产党现在认为他们最大的敌人是社会民主党而不是纳粹党,于是他们在街上与纳粹党斗争,在议会里又与纳粹党联合。他们相信纳粹党胜利后紧接着就会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所以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后,苏联人还与德国续签了互不侵犯条约。

后来斯大林也开始支持集体安全体系,这一方面是由于他

对希特勒曾经明确表示要清算共产党的扬言已经变成了现实感到震惊,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苏联可能很快也会身处危险的担忧。在希特勒拒绝与斯大林一起保障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后,苏联于 1934 年 9 月加入国联。苏联代表李维诺夫(Litvinov)也在国际联盟中积极鼓吹全面裁军和严惩侵略国。没过多久,为平衡西欧国家达成的一致,苏联开始协商准备缔结一个"东洛迦诺"安全条约。但是由于波兰和德国对苏联的敌意,该条约体系没能实现,苏联只是于 1935 年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达成了协议,规定在国联的框架下磋商,并且在遭受侵略时相互援助。前提是,如果捷克遭受侵略,只有在其盟友法国首先履行义务后,苏联才会向捷克斯洛伐克伸出援手。

随着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共产国际也调整了阵线。1935 年,共产党的新敌人社会民主党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派都被吸收成为对抗法西斯主义威胁的盟友。共产主义者都要加入反抗法西斯主义的人民战线,而且无论是多保守的人都可以加入该阵线,只要他们愿意在这条原则上支持共产主义。为此,共产国际还减弱了革命宣传以及反对资本主义的呼声。

苏联和西欧集团都假定,对方是要把希特勒即将发动的进攻从自己这边转移到对方。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希特勒打算进攻了。1936 年 9 月 12 日,他已经明确指出:"如果我有乌拉尔山取之不尽的原材料储备、西伯利亚的广袤森林以及乌克兰的无垠麦田,民族社会主义领导下的德国将如鱼得水。"* 西欧集团据此相信希特勒的进攻会指向苏联,而这也是斯大林下定决心要避免的局面。

---

* Adolf Hilter, *My New Order*, ed. Raoul de Roussy de Sales (New York: Reynal and Hitchcock, 1941), p. 400.

苏联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表明了斯大林的真实立场。因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得到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援助,急于向西方大国表达尊重的苏联人虽然很不情愿干预西班牙内战,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如果不能帮助西班牙共和国就将失去全世界的支持。只是苏联人的"志愿军"、金钱和武器援助都来得太晚了。他们本以为西方大国也会干预,结果西方大国在西班牙保持了中立,这也促使斯大林相信了西方同盟是靠不住的。

更严重的是西方国家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1938 年 9 月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缔结《慕尼黑协定》标志着绥靖政策达到了顶峰。在苏联看来,《慕尼黑协定》把捷克的土地献给希特勒,同时法国又不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从而导致苏—捷同盟无法生效,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要将希特勒引向东方。斯大林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法国支持捷克,他也会支持捷克。然而法国却没有采取行动,这就促使斯大林做出了最好尝试与希特勒达成谅解的决定。所以在 1935—1939 年间,斯大林与西方大国是不可能结成一个真正有效的同盟了。

当英国人和法国人意识到绥靖已经不能阻止希特勒时,他们才极不情愿地寻求与苏联人建立一个更稳固的同盟。1939 年 3—8 月间,斯大林既保持着与西方的协商,也在推动与德国人之间渐趋成熟的谈判。但是,最终派往莫斯科的英法代表团成员规格太低,没有赢得苏联的信任,而且西方国家也不会同意斯大林接管芬兰和波罗的海共和国作为对抗德国的堡垒。

与此同时,德国人又越来越渴望达成互不侵犯条约,于是斯大林就抓住了使苏联暂时避免战争的机会。1939 年 5 月,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1890—1986)取代李维诺夫出任苏联外交部长,原因是作为犹太人的李维诺夫不能

与德国人谈判。1939年8月23日,莫洛托夫最终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双方承诺一旦战争爆发两国将彼此保持中立。两国还在附加的秘密协定中瓜分了波兰,这也是希特勒正准备攻打的目标,然而如果德国继续进攻的话,这种瓜分其实相当于向西推进了苏联的边界。

由于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公布,国际共产主义阵线也被迫做出紧急调整。这时共产党又需要把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作为敌人评判,同时也要把希特勒在几天内对波兰发动的战争称为"帝国主义战争",并且指出交战双方没有差别,共产党不应加入任何一方。总之,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导致1939年9月爆发战争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通往战争之路(1931—1939)

20世纪30年代中期,很多评论家都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不可避免。在中国、埃塞俄比亚、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发生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事件,加之英国、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时常犹豫不决的反应,导致了全面战争日益逼近。1931—1939年间的这些事件预示着世界将再次陷入战争。

1. 第一步:1931年的满洲

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是二战爆发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胡佛总统的国务卿亨利·L. 史汀生(Hery L. Stimson,1867—1950)对此做出反应,宣布美国不会承认任何武力所得。史汀生希望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能够追随美国的立场,但是他的愿望

彻底落空了。国联的确派出了由李顿(Lytton,1876—1947)伯爵率领的代表团,1932年的李顿报告也谴责日本的行为是侵略。然而,美国和国联都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支持其口头抗议,结果日本不仅拒绝接受该报告,还于1933年3月退出了国联。此次危机唯一有用的结果就是导致英国人放弃了他们自1919年以来就信奉的“十年”规律,即宣称从现在起十年都不需要担心有大战争。

2. 第二步:德国重新武装(1935—1936)

下一个破坏国联结构的是德国。1933年10月希特勒暴露了准备冒险的自信和意愿,首先是退出国联,1935年3月又发生了更多情况。英国发表《国防白皮书》表明了重新武装的计划,从而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都是依靠外交保证安全的政策。随后,希特勒也抛弃凡尔赛和约的义务,先是宣布德国已经建成了空军(德国本不该有空军,但是事实上它从魏玛时期就一直在筹建),一星期后又公开了大规模征兵的立法。

国际社会对希特勒这些违法行为的反应基本一样。4月17日,国联谴责德国不履行条约义务,但这已经不能制止德国重新武装。几天前,原协约国集团成员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还在意大利的斯切萨(Stresa)开会讨论国际局势,同意结成媒体所谓的“斯切萨阵线”,承诺相互合作并保持警惕而密切的交流,但是这些国家又缺乏对彼此的真诚和信任。有些观察家甚至认为这种猜疑早在5月就被证实了,当时法国已经与苏联签订了防范德国侵略的单边同盟条约,而德国也仍在重新武装。6月,英国又与德国签订了一份海军协议,限定德国海军规模为英国

海军总数的三分之一,潜艇部队为英国的 60%,这就意味着希特勒虽然不能指望建立如此规模的水上舰队,但却可以随时筹建潜艇部队,而且还想建多少就建多少。正是彼此猜疑破坏了"斯切萨阵线",英国人和法国人都用怀疑的目光审视对方,忧心忡忡的比利时再次选择了官方中立(这是它 1937 年采取过的措施),墨索里尼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

希特勒接下来采取的冒险行为更具挑衅性:1936 年 3 月,德国军队"收复"了位于法国边界上的莱茵兰非军事区,从而再次践踏了凡尔赛和约。很多德国将军认为希特勒这次做得过火了,他们都准备好了迎接冲突。结果冲突并没有发生,因为那些本质上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仍然按兵不动。

3. 第三步:1935 年的埃塞俄比亚

英法两国外长在斯切萨时就常常担心弱小而孤立的埃塞俄比亚(当时叫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之所以仍然保持独立主要是因为它的帝国邻居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既不能达成一致瓜分意见,又不允许三国中的任何一个独吞它。埃塞俄比亚虽然身处 20 世纪,但是从科技、政治和经济上看它都不是个 20 世纪的国家,因为它还实行绝对君主专制,没有真正的选举或者议会,皇帝常常通过阴谋和刺杀夺取政权,奴隶仍然随处可见,读书识字却没普及。不过,埃塞俄比亚从未威胁过其他国家,而且它还是国联的成员。尽管如此,墨索里尼的野心还是指向了埃塞俄比亚,并且他已经掌握了毗邻埃塞俄比亚的意属索马里。英法两国也找不到反对墨索里尼的理由,因为它们想利用"斯切萨阵线"把墨索里尼与自己的事业绑在一起,同时也让他远离其

法西斯同类希特勒。

1934年，在意属索马里的一处沙漠哨所发生了边界纠纷，不过也可以说纠纷发生在埃塞俄比亚，因为双方都宣称那里是自己的领土。英法两国出于联合墨索里尼对抗希特勒的需要而对意大利采取了姑息政策。结果1935年10月，墨索里尼就派兵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英法又不顾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1892—1975)的多次抗议，于12月秘密向墨索里尼提出了后来被称为《霍尔—赖伐尔(Hoare-Laval)条约》的建议，准备给墨索里尼更多的埃塞俄比亚领土并让他控制其余地区。意大利这时还是国联成员，所以它不得不维持埃塞俄比亚在一个形式上仍然是独立君主国的假象。于是墨索里尼准备接受英法的建议，但是条约草案的消息被泄漏给了巴黎和伦敦的媒体，随即在英国引起了普遍义愤，法国国内也众说纷纭。为了保存颜面，墨索里尼只好否认整个事件并且继续军事行动。1936初，意大利国王最终宣布自己兼任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当时的大国中只有德国敢公开表示支持。此后的一年之内，墨索里尼就宣布意大利退出国联，并且成立了罗马—柏林轴心。

国联已经正式谴责了日本对满洲的侵略和德国对《凡尔赛和约》裁军条款的践踏。1935年它也及时宣布意大利入侵国联成员埃塞俄比亚的行为违背了国联盟约的义务。现在，国联又做出采取实际行动的重大决定，并且得到了国联大部分成员的支持和英法两国的积极推动。海尔·塞拉西还用埃塞俄比亚的母语即阿姆哈拉语(Amharic)在日内瓦向国联做了报告，虽然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对其欷歔不已，报告的确感人至深。1935年10月11日，51个国联成员国最终投票赞成执行国联盟约的第16条款，准备对无视自己承诺而诉诸战争的成员国实施经济制裁。

然而对意大利的制裁并不成功,因为其中存在很多漏洞,特别是在对意大利禁运的商品清单上竟然不包括石油这种意大利本身储备很贫乏但是又不可或缺的战争物资。另外,国联成员之间也对一些问题争吵不休,比如,"什么物资应该列入禁运清单","英法为什么不阻止意大利通过当时由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运送军队和军火",加之德国已经不是国联的成员,所以完全不受国联决定的影响,而且主要大国也不严格实施制裁,因此根本无从验证经济制裁的效果。实际上,国联对日趋紧张的局势几乎束手无策,所以当 1937 年 12 月意大利像日本和德国一样退出国联时,也没人感到惊讶。

4. 第四步:西班牙内战(1936—1939)

1936 年 7 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可以说是唤醒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情感催化剂。战争是右翼法西斯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与左翼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少数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较量。它像多数大规模内战一样没有真正的中心,而且是一场准宗教战争,其激烈程度与教义战争非常相似。由于战争期间有很多个人从国外招募士兵,同时其他国家也主动但是秘密地进行干预,西班牙内战几乎从一开始就牵动着西方人的感情。

事实证明,西班牙内战只不过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战争的演练,法西斯国家其实是在利用战争测试武器。比如,1937 年 4 月低空飞行的德军飞机摧毁了巴斯克的格尔尼卡镇(the Basque town of Guernica),这也是第一次故意针对平民的空投轰炸。相比而言,意大利和德国的干涉果断而有效,苏俄的

干涉次之,英法的干涉最无力。1939年初,随着巴塞罗那的沦陷,西班牙内战结束了,又一个法西斯主义倾向的集团获得了胜利。

5. 第五步:1937年的马可·波罗桥

中日之间本来已经休战了,1937年7月7日夜,两国军队在北平附近的马可·波罗桥(卢沟桥)发生的一场小冲突又导致了全面战争再次爆发。尽管事后双方都宣称是对方挑起了新的冲突,其实只是日本才有理由这么做,于是这也促使中国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一个月前,日俄两国军队在阿穆尔河(Amur River)的摩擦已经证明苏联远东军并不可怕,但是在中国和日本,民族主义浪潮导致彼此的仇恨迅速升级,并且已经超出了政治家所能控制的范围。

由于北平和上海相继被日本人占领,中国政府上诉到国际联盟。国联的制裁只有美国加入才能奏效,美国国务卿却建议与英国"分别"而不是"联合"采取行动,罗斯福总统尽管明确反对日本挺进远东,他也只是要求对侵略国进行"封锁"。不过紧接着日本就在长江袭击了美国的"班乃岛"号炮艇,于是美国人似乎又愿意协商英美联合采取经济行动了。然而当时的英国已经想要一份政治军事协议,这就超出了美国准备接受的选择。

6. 第六步:1938年德奥合并

德国一系列逐步升级的侵略行为直接导致了二战的爆发。1935年希特勒开始公开重建军队。1937年11月5日在与德军将领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希特勒透露了他的计划,明确表示

最后必须要对付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最大的潜在敌人,而眼前他打算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表示非常愿意在与民主大国的交锋中完成其目标,对于某些将领的"怯懦"表现,他根本没放在眼里。

奥地利自1918年以来就一直强烈希望与德国结成某种联盟或者合并,但是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德奥联合,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一直反对这种动向。1934年,奥地利纳粹分子本打算仓促挑起暴动,墨索里尼也表现出不满并且把军队派到了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后来由于"斯切萨阵线"瓦解、莱茵区重新武装、德国支持入侵阿比西尼亚以及1936年的罗马—柏林轴心这些铁的事实,墨索里尼又转而接受了德奥合并。

1938年初,出生在奥地利的希特勒开始采取行动,他利用新闻、广播和演讲对奥地利政府的所谓罪行发起猛烈的宣传攻势。1938年2月,希特勒把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召唤到贝希特斯加登并对其大加恐吓。1938年3月,希特勒就在没遇到任何实质抵抗的情况下把军队开进了奥地利。奥地利不仅从此失去独立,而且被迫改名为德意志帝国奥斯马克(Östmark)省。

7. 第七步: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1938—1939)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一战后中欧或东欧唯一一个成功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由于继承了老哈布斯堡帝国的一些最发达工业地区,其经济发展中工农业的平衡也大大好于其他东欧国家。这种健康的经济发展也反映在社会结构上,捷克斯洛伐克的农民、中产阶级和产业工人之间基本就业平衡。然而捷克

政府最终还是没能使这个国家避免被外界压力摧毁，这种压力主要是针对其敏感的少数民族问题。因为苏台德地区的325万德裔少数民族根本看不起斯拉夫民族的捷克人，他们抵制这个新生共和国。从1933年起，纳粹分子就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日益严重的骚乱。

1938年初，已经吞并奥地利的希特勒又向布拉格政府提出了相当于苏台德区完全自治的要求。9月12日，他在纽伦堡发表激进演说，强烈要求苏台德区的德国人实现民族自决，这可以说是捷克斯洛伐克爆发普遍骚乱的信号，紧接着捷克总统霍华德·贝奈斯(Eduard Beneš，1887—1948)领导的政府就宣布了戒严令。鲍尔温的继任者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也就是约瑟夫·张伯伦的儿子、奥斯丁·张伯伦的弟弟，确信只有自己能挽救和平。于是1938年9月，张伯伦就向希特勒提议由他亲自访问德国以平息捷克争议。这位69岁的首相自认为取得了两次复杂的成功。一方面，希特勒变得狂热而强硬，坚决主张德国必须吞并苏台德区；另一方面，张伯伦同样坚决主张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比欧洲战争可取，但是希特勒必须同意用和平方式完成肢解。最终在希特勒信任的墨索里尼的帮助下，张伯伦获准“说服”希特勒同意召开四国会议解决这件事。1938年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在慕尼黑会晤，而且会议没有捷克代表参加。

结果希特勒大获全胜。捷克斯洛伐克被部分肢解，其苏台德边界地区被德国接管，特青(Teschen)和其他地区被迫移交给波兰，原来完整的经济和运输系统也遭到削弱，并且由于失去了边界山脉和防御工事，捷克已经不可能防守其边境。斯洛伐克还获得了一个联邦国家中的自治地位，于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拼

写方式也正式变为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的领导人早就发现,没有法国和英国的帮助,他们不可能抗衡德国,而且他们的人民已经痛苦地默认了慕尼黑协定。不可否认,德国人巧妙利用了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捷克与仍然主要发展农业的斯洛伐克之间的差别。但是即使这个国家本来是非常团结的,慕尼黑协定仍会摧毁它的士气。况且希特勒还迅速采取了行动,1939 年 3 月他在没遇到任何实际抵抗的情况下把军队开进了布拉格,接管了剩余的捷克土地。急于要回其部分失地的匈牙利在德国的认可下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东部最大的省份卢西尼亚。

对慕尼黑协定和绥靖政策能做的最好的辩护就是,西方国家要么是真心试图避免战争,要么是在争取时间准备一场它们已经知道无法避免,但是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战争。然而事实上,1938 年 9 月民主国家的军事实力是强于德国的,直到 1939 年 9 月这种力量对比才颠倒过来。同样的事实是,张伯伦与达拉第不同,他明知德国的要求并不是基于那些可以追溯到 1919 年不完美和平的过分抱怨,结果他还提议与希特勒谈判,而且像他与任何政治家进行的谈判一样,这绝对是一个荒谬的错误。张伯伦与达拉第达成了一致,准备拿苏台德区满足希特勒和德国的胃口,全世界的数百万人显然也同意了这个计划。某些西方人甚至希望希特勒与他们一起对抗苏俄,或者让希特勒深陷东欧进而挑起一场俄德战争。但是,希特勒的言行并没给这种希望任何现实的依据。早在 1937 年 11 月,希特勒就对他的贴身顾问表明了他不变的计划,即先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挺进波兰和乌克兰。

人们对于 1939 年 3 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实际灭亡似乎并不

感到奇怪，但这次事件在西方引起的幻灭、谴责和决心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绥靖时代结束了，英法明确表达了它们要保障波兰边界的意愿，而且英国已经开始了和平时期的征兵。纳粹领导人也毫不隐瞒他们的感觉，他们认为英国人和法国人不仅颓废无能而且极其懦弱，根本无力抵抗斗志昂扬、充满活力的德国。希特勒显然至少期待一场与波兰的局部战争，并且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充分准备好了迎战法国和英国。他已经通过5月22日与墨索里尼缔结的攻防“钢铁盟约”加强了自己的体系，而在此仅仅六个星期前墨索里尼也已经征服了阿尔巴尼亚。这两个国家显然都打算进一步扩大侵略。

8. 最后一步：1939年的波兰

波兰很明显将成为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德国人把波兰走廊视为一种侮辱，因为它把东普鲁士与德国的其他领土分隔开了，位于波兰走廊边缘的但泽自由市在语言和传统上都是属于德国的，现在被划出了德国。1939年3月23日，希特勒夺取了波兰北部邻国立陶宛的港口城市默默尔(Memel)。3月末英法就做出反应，承诺将在波兰遭受德国进攻时给予波兰援助，但是希特勒根本不相信它们会履行这一承诺。

在这紧张的半年时间里，导致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的关键问题是，波兰是否会经历与捷克斯洛伐克一样的灾难并且得不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英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它决不再后退，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苏联的态度，因为希特勒完全有理由担心战争中受到主要大国的两面夹击。但是苏联人极其不信任张伯伦领导的英国保守党，这种不信任又没有被1939年夏英法两国派去苏联的外交使团打消。西方国家本来提议签订互助条

约,可是谈判却进行得拙劣而缺乏诚意,英国的谈判代表级别还不够高。同时也在与苏联谈判的希特勒却派出了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亲自做此工作。结果英法向莫斯科的提议没有成功,苏联领导人已经清楚地断定,如果不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就会遭到他的进攻。

让西方感到恐惧的是,1939 年 8 月 23 日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9 月 1 日,德军就开进了波兰。9 月 3 日,英法履行承诺,对德宣战。民主国家没能制止这个执著、残忍,而且组织有序的国家。大萧条以来,西方民主国家一直致力于帮助他们的公民获得最低水平的物质舒适条件,通常它们会先生产黄油才去生产枪。另一方面,他们的极权主义对手却能说服或者胁迫其人民同意,如果需要的话,将来用枪就可以获得黄油。极权国家根本不用以军事准备的名义就已经说服他们的公民这样做了,民主国家却发现除非战争确实已经开始,否则很难让他们的人民做出这种牺牲。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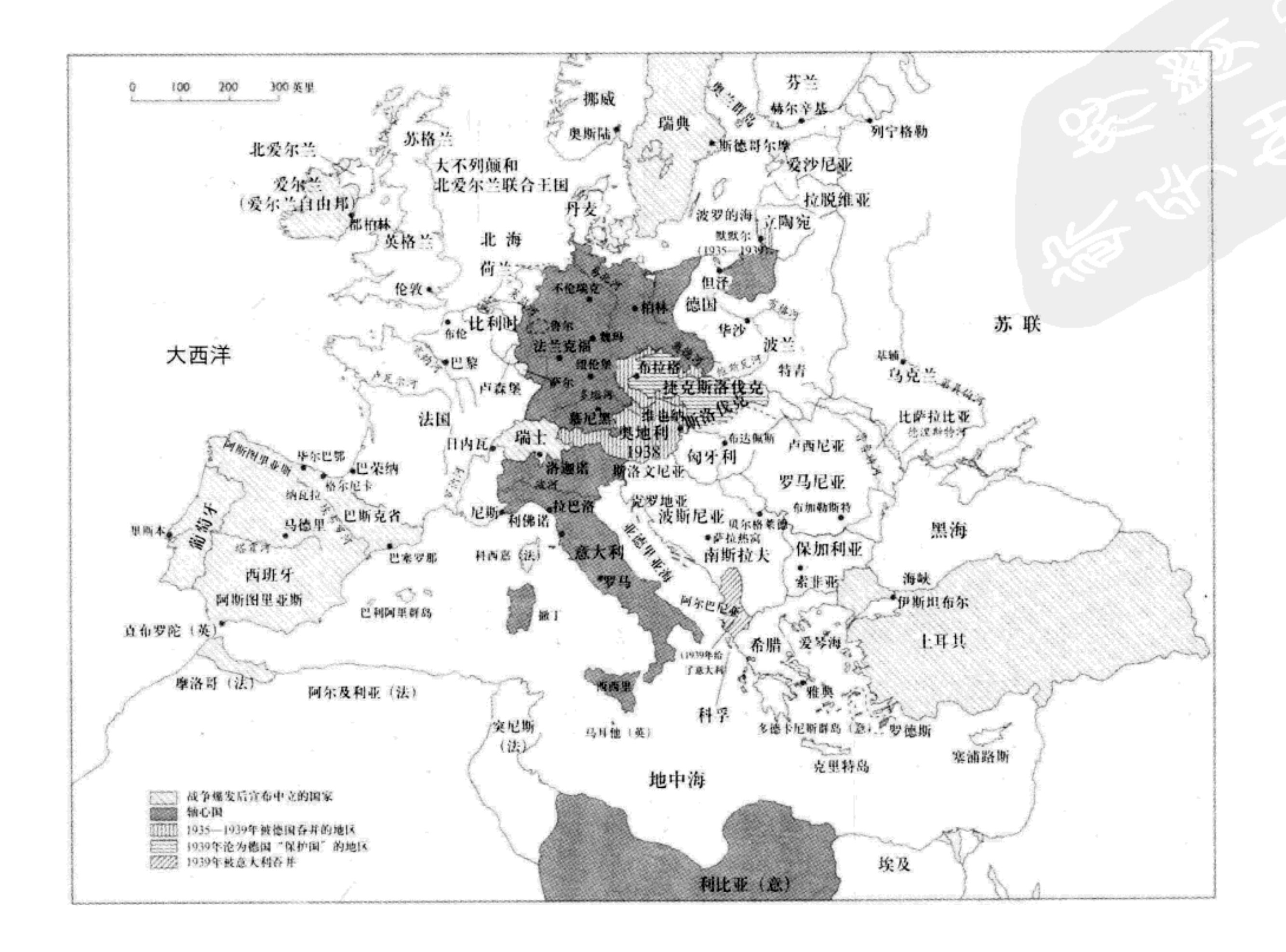
军事专家往往在筹划下一场战争时就为最后的战争做了准备,20 世纪 30 年代的法国和德国都已经在它们共同的边境上修建了对峙的防线。法国一边的马奇诺防线和德国一边的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都远比 1914—1918 年间的战壕更难对付。随着战争的爆发,大多数人预计其结果将主要取决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区域对抗,并且将是一场十分有限的局部战争,可能非常短暂,最多在世界其他地区有一些仅仅是为了转移注意力的活动。

然而，随着轴心国成员意大利和日本加入德国一边，美国加入反法同盟一边，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已经成为一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彻底的世界战争。

1939年，德国已经准备好了战争，法国和英国却都没有充分准备。这时的德国不需要两线作战，因为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的条约已经保证了苏联的中立，而一战中只需单线作战的法国现在却不得不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边界两线部署军队以防御它们的进攻。人们还断定德国的胜利将是速战速决，否则美国可能再次被拖入战争，英国会赢得时间从其自治领补给军队和资源，而且明显占优势的英国海军也将开始切断德国的食品供应。

在陆地上，德国的军队无疑占优势，他们的装备比法军和英军都好，但是法国军队的名声极佳，于是德国就把击败法国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得知法军在坦克和防空方面尤其薄弱后，德军转向了一种完美组合作战方式，即大量使用坦克并紧密配合使用飞机，特别是能俯冲轰炸敌人据点的斯图卡(Stuka)轰炸机。

德国的计划全都集中于通过"闪电战"迅速推进。当墨索里尼自称是"不好战者"时，这一点更是毋庸置疑。没人怀疑墨索里尼是支持德国的，但是人们以为他不会主动让自己的军队投入战争。对英国和法国来说，最终的胜利取决于拖延，即阻止德国速胜直到通过控制海洋、先进的工业生产以及世界舆论的支持(英法认为这将对自己有利)能够弥补他们的备战不力。因为，苏联仍然捉摸不定并可能转向，如果希特勒果然被迫在两线打一场真正的战争，纳粹国防军(武装部队)就可能损失惨重并被拖住，从而削弱西进的力量。然而这在1939年似乎不太可能，事实上直到1944年，随着苏联或者东线消耗了德军的实力，盟军才得以胜利攻入被占领的法国。



二战前夕的欧洲(1939年8月)



图为 1938 年 9 月 29 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乘坐敞篷车接见欢迎群众的场景。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随后签订了认可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但最终并没有能够保障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所谓的“我们时代的和平”。(National Archives)

德军为结束战争使用了无人驾驶飞机和火箭弹在所有战场实施空中轰炸，以期让城市平民厌恶战争。军事专家们本来倾向于相信城市平民不可能忍受空中轰炸，任何其城市遭受持续轰炸的国家都将被迫求和。然而，欧洲和亚洲的广大平民挨过了数月的袭击，据估计仅德国就有大约 50 万平民死于空中轰炸。有组织的避难系统和对居民的部分疏散使得像伦敦、柏林和东京这些遭受严重轰炸城市的人民承受住了事实上与前线一样的环境。

就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一项新技术的应用完全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这就是由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专家在德国和意大利流亡者的科学支持下秘密研发出的原子弹。1945 年 8 月 6 日它被美国首先用在了日本的广岛市,仅一颗就摧毁了大半个城市。三天后投在长崎的另一颗不同的原子弹造成的破坏稍轻一些。两颗原子弹在这两个城市夺去了超过 10 万人的生命。

1. 轴心国的早期胜利

二战的第一次战役实现了预期结果。没有人真指望孤立的波兰能长期抵挡德国和苏联的军队,或者指望英国和法国能果断地采取足够迅速的行动帮助他们的波兰盟友。但是德军征服波兰的速度的确让几乎每个人都感到吃惊。德国空军很快掌握了绝对制空权并用它破坏波兰的通信,同时用俯冲轰炸机传播恐惧。专门的全机械化德国特遣部队消灭了机动化较差的波兰军队。

希特勒的同伙斯大林也迫不及待地从东面入侵波兰,还占领并且接着吞并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几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对德国的担心加之帝国主义的扩张欲望还驱使苏联于 1939 年 12 月发动了对邻国芬兰的战争。或许是错误地估计了芬兰人的力量,苏联起初打得非常艰难。英国和法国曾一度考虑给芬兰大规模援助。然而到 1940 年 3 月,苏联军队终于拖垮了芬兰人,他们不仅获得了基地还吞并了靠近列宁格勒的芬兰土地。这场与芬兰的"冬季战争"促使希特勒于 1941 年做出了向苏联开战的重大决定,因为德国军事专家根据苏联的困难断定德军将有可能轻而易举取得胜利。

1940 年 4 月,德军巩固了北翼。未经宣战,他们就从海空两

路入侵了保持中立的丹麦和挪威。毫无准备的丹麦几乎没有抵抗就被占领了。挪威尽管也没有准备,但是借助国内崎岖的地势进行了坚决的反击。英法的援助仅限于象征性力量,于是到4月底挪威的抵抗也被突破了。德军扶植挪威法西斯分子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1887—1945)成立了傀儡政府,"吉斯林"从此也成为英语中"卖国贼"的同义词。德国人这时就有了对付英国的极好的空中和潜水艇活动基地。

宣战八个月以来,伟大的民主国家并没有与纳粹国防军直接和全面地交锋,似乎更多的只是静坐和等待,与此同时希特勒和斯大林却在吞并周边地区。英国人给这种按兵不动取了个绰号叫"虚张声势战",并且急切地想知道真正的战争何时开始。终于,1940年5月10日德军在毫无预先示警的情况下发起了猛攻,先是入侵低地国家,进而绕过了马奇诺防线。比利时与荷兰在20世纪30年代都急于避免连累自己,因此拒绝了同英法联合抵抗德国可能发动袭击的计划,现在他们承受了全部后果。

借道位于法国—比利时边界的阿尔登(Ardennes)山,德军把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输入法国。在闪电行动中,德军再次吸取了1914年的教训,抵制住立刻进攻巴黎的诱惑,而是通过法国北部径直向英吉利海峡推进,5月26日就攻克了布洛涅(Boulogne)港,此时距离战争开始刚过两个星期。德军通过这次进攻切断了英国、比利时和相当一部分法国军队与南部法军主力的联系。

这时候张伯伦已经辞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继任英国首相。张伯伦既不是行动派也不是有吸引力或者英雄式的人物,丘吉尔却将证明自己具备这些甚至更多的品质。

文献记载

温斯顿·丘吉尔的领导才能

领导才能中最有价值的技巧是用言传和身教去影响别人的能力。温斯顿·丘吉尔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和公共演说家。1940年5月13日,他向下议院开出了获取胜利的可怕处方。

正如我曾对参加本届政府的成员说的那样,我要向下院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极为痛苦的严峻考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漫漫无期的斗争和煎熬。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要说,那就是用我们的全部力量,用上帝给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和空中进行战争,发动战争去对抗一个在人类黑暗、可悲的罪恶史上都前所未有的恐怖暴政。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你们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那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无论多么可怕,也要取得的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取得的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没有生存。

在英国最黑暗的时期,也即希特勒的队伍已经到达英吉利海峡,英国的最后一个大陆盟友法国已经陷落时,丘吉尔号召英国人民投入一场非凡而团结的战斗。

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我们要在陆地上战斗,我们要在高山上战斗。即使出现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的情况——我们的岛国或者其中一大部分已经被征服或者正受到封锁,我们也决不会投降。因为我们的帝国在海外、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

下，还将继续战斗，直到上帝认为合适时，新世界就会全力以赴前去拯救和解放旧世界。

From Hansard, *British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Commons, June 4, May 13, 1940.

绝望的英法试图从南北两面联合进攻以截断德军插入的机械化部队，但是组织不力的比利时决定投降，法国和英国也都不能振作士气实施行动。5 月底，德国军队困住英军但是没能将其消灭，英军就乘船从法国北端敦刻尔克(Dunkirk)附近的海岸撤回了英格兰。在皇家空军的掩护下，各种船只(包括私人游艇和汽艇)拼凑的一个临时小舰队只能把人运走，大部分装备都被迫丢弃了。

关于德军为什么没有在敦刻尔克推进他们的优势的原因尚不清楚。有些历史学家相信这样的理由，即希特勒本人同意放过困在海岸的英军，因为他相信英国不再是一个真正的威胁，而且或许这个岛国还能因此退出战争。实际上，暂停进攻好像最早是德国战区司令而不是希特勒下的命令，而且两天后发动进攻时，英国已经巩固了防御带并且完成了 5 月 26—27 日的"敦刻尔克奇迹"：尽管不得不抛弃了所有重型装备，但是 22.4 万多英军和 11 万盟军都成功撤回了英国。由于 5 月 28 日比利时的投降，德军对这一切几乎没有关注，而是开始了向巴黎的大举推进。法军无力组织防御，德军一路向南几乎未遇抵抗。6 月 13 日，法国政府逃离巴黎，宣布巴黎为开放城市。第二天巴黎就落入德军手中。

法国的战斗其实到 1940 年 6 月中旬已成定局。但是,法国人或许本该继续努力防守南部地区,如果不行的话,还可以利用其海军和商船将尽可能多的部队经过地中海运到法属北非,在那里他们或许还能在英国的援助下继续与德军战斗。有些法国领导人就愿意这样做,其中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将军呼声最高。为了说服法国领导人,丘吉尔还向法国提出特别建议,把两个国家合并成一个完整的政府以继续战斗,然而他的提议遭到了拒绝。

我们还很难确定法国是如何以及为什么那么容易就陷落了。德军的确难对付,但是法国同样有一支了不起的陆军和庞大的空军力量。其溃败可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高层的政治和军事指挥都太差,特别是与德军司令卡尔·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Karl Gerd von Runstedt, 1875—1953)的周密计划和实施战斗相比,这种情况更明显。很多德国人和所有的德国军队 20 年来一直关注着一个目标,即抹去 1918 年的羞辱。然而,法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却背负着政治、道德、社会和阶级分裂的三代重担,70 年来频发丑闻、长期不稳定、官僚倦怠以及与所有欧洲国家一样经历了十年的经济混乱——所有这些都集中在第三共和国,它从 1871 年以来就没能取得过左派或者右派的满意。法国的溃败还与一个事实有关,即许多法国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和憎恨超过了“纳粹主义”,甚至有些法国人相信或许希特勒其实是对的。法国的溃败还可能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1914—1918 年的可怕牺牲,上一次与德国的战争给法国造成了可怕的破坏和成千上万的人员死伤,以至于很多法国人 20 年来一直被 1917 年的著名警句“别再来”困扰着。总之无论是什么原因,法国已经在一个月内被打败了。

6月16日，一战英雄，84岁高龄的亨利·贝当（Henri Pétain，1856—1951）元帅取代保罗·雷诺（Paul Reynaud，1878—1966）出任法国总理。贝当及其同僚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换取和平，1940年6月22日法德在贡比涅（Compiègne）签署了停战协定。根据协定，法国退出战争，并且把五分之三的法国本土包括整个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沿岸地区都交给德国占领，只保留了中部和地中海地区还处于德国的严密监管下。“未被占领的法国”定都小旅游城市维希（Vichy），贝当在那里建立了以他为首的独裁、反民主国家。贝当政府通常被称为维希法国。

贝当的支持者有些是亲德派，但是大部分人是确信希特勒已经打赢了战争，并且准备屈服于在他们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全面胜利。他们不相信英国能够成功抵抗已经打败了法国的德国战争机器。他们遣散了陆军，海军也要么困在了法国，要么分散在北非的港口。维希法国的处境极其微妙和暧昧，谁勾结德国、谁抵抗德国的问题甚至在战争结束后又困扰了法兰西民族很多年。

即使是在1940年6月的黑暗时期，夏尔·戴高乐领导的少数法国爱国志士也拒绝放弃战斗。在英国的帮助下，戴高乐成立了总部位于伦敦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撤出敦刻尔克的法军中坚力量，加上此后几年中离开法国的难民又组成了“自由法国”（Free French）或者叫“战斗法国”（Fighting French）。他们回到法国后，秘密抵抗运动就逐渐形成，为最后的解放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在维希政权控制的最强大的法属殖民地北非，有些殖民地也从一开始就团结一致支持“自由法国”。“战斗法国”虽然不强大，但是至少是个力量会聚点。他们在英国成立了一个有影响的广播电台，从那里进行反对维希政府和德国的宣传

运动,并且跨过英吉利海峡向法国国内转播。

1940 年 6 月 10 日,墨索里尼把意大利人带入对英法的战争,但是已经太晚了,并不能影响法国战争的结果。这种被富兰克林·罗斯福称为“背后捅刀”的行为进一步激怒了美国的公众舆论。意大利急于取得某种形式的胜利以平衡其德国盟友的巨大成功。直到这时,战争还局限在北欧和西欧,但是很快将蔓延到地中海。

2. 不列颠之战

德国人还没有制定出对付英国的实际计划。希特勒本来确信,随着法国退出战争,英国会与德国签订一个单独妥协的和平条约,其中德国将控制欧洲大陆,英国保留其海外帝国。希特勒对英国除了仇恨,还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以为德国和英国是天生的盟友。然而事实上英国与法国不同,希特勒在英国找不到可利用的天生盟友。英国已经扣留了国内所有的德国公民(包括犹太难民),并且逮捕了大约 800 名法西斯主义英国联合会(the 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的成员,包括他们的头目奥斯瓦德·摩兹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1896—1981)。400 多年来,英国总是宁可卷入战争,也不会同意由一个国家统治西欧和中欧或是侵占低地国家。

希特勒主要指望这种可能性发生,即德国潜艇能最终切断英国来自海外的食品和原材料供应,进而迫使英国投降。但是这需要很长时间,希特勒又没有耐心。德军明显能做的是尝试在英国登陆,然而他们也没有做好两栖作战的实际准备并且没有专门设计的登陆船只。在德军用各种船只仓促拼凑的一支小

型舰队惨遭英军飞机摧毁后，1940 年 8 月初希特勒及其空军司令戈林就做出了仅用空军承担登陆任务的重大决定。

随后的不列颠之战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8 月到 9 月初，纳粹空军企图用白天突袭消灭英国的货船护卫舰、皇家空军基地和停在陆地上的飞机。目光短浅的德国人只攻击了少数一些根据“无线电侦查和测距”原理工作的新式预警雷达系统设备。第二阶段从 9 月初开始，德军改变战术转向了大规模轰炸伦敦城，也就是旨在恐吓平民和惩罚英国抵抗的“闪电战”。不过，9 月 17 日希特勒就中止了他的“海狮行动”(Operation Sea-Lion)侵略计划。德国仍然有很强的空中打击能力，但是其空军蒙受了巨大损失也没能取得空中优势。作为一名非常有影响的战时领导和激发民族自豪感的大师，丘吉尔把这时称为“国家的最美好时刻”。尽管对英国的空袭一直持续到 1942 年，但是不列颠空战已经结束。整个 1940 年德军都在实施夜间轰炸，然而即使是在特别受到巨大打击的工业城市考文垂(Coventry)，虽然历史上著名的大教堂都被命中和毁坏，其工业生产能力却没有严重下降。这些城市的平民士气也没有受挫。相反，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夜间轰炸加强了英国人的斗志。

在不列颠之战期间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大西洋战争，因为从北美带来急需供给的海上运输队只有经过大西洋才能到达英国。事实证明英国海军出色完成了任务，它们负责护送运输船队横渡海洋，清除德军藏匿在海上漂浮物中的地雷，以及搜寻战斗力很强的德军潜水艇。1940—1941 年间，英国的海运损失上涨得惊人。由于不能用空中轰炸摧毁德军潜水艇，英军开始用雷达在海上追踪它们。德国的水上海军最初在法国沿海和印度洋作战，但是在 1941 年 5 月英国空军和巡洋舰合力击沉其重型

战舰“俾斯麦号”以后,它们就被赶出了大西洋。此后,英军控制了海面,德军则仍在水下逡巡。尽管战争期间盟军和中立国的海运损失达到了2300万吨,但是,雷达、声纳、护航航母和驱逐舰队有效地抵消了德国的潜艇优势。

3. 地中海和苏联战役

希特勒此时面临长期僵持的可能性。他起初准备在英国通往印度和东方的地中海生命线上将其打败。不料其盟友墨索里尼却在没有通知希特勒的情况下,于1940年10月由阿尔巴尼亚入侵了希腊,后又被希腊人赶回到阿尔巴尼亚中部。面对这种情况,德军只好出手解救了墨索里尼。

我们并不清楚希特勒本人究竟想在地中海投入多少。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重视借道西班牙攻打英国的堡垒直布罗陀的建议。主要是因为佛朗哥要价太高,他想从法国获得补偿才同意德军借道西班牙,而希特勒并不愿意冒险过分逼迫仍然控制着法属北非的维希法国。于是,德国不得不答应支持在希腊的墨索里尼,以及从意大利的殖民地利比亚进攻埃及。它们还试图在中东组织反对英法的地方行动,但是叙利亚的英军和自由法国的军队没费多大力就制止了这种企图。

承诺帮助在希腊的意大利军队大大分散了德军投在1941年春的另一项任务上的兵力。尽管希特勒强迫南斯拉夫仅存的受惊政府签订了条约,允许德军可以自由地穿过南斯拉夫前往希腊,但是塞尔维亚人起义推翻了南斯拉夫政权,此后德军就不得不忙于对付游击队的抵抗和肢解南斯拉夫了。英国也尽全力支持了希腊盟友,只不过这一次他们的力量又不够强大。德国空军

重创了位于地中海的英国海军力量，到了5月，轴心国就征服了希腊本土。表面看是英国彻底失败了，实际上德国也在巴尔干战役中投入了太多军备。

德军在1941年春需要完成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征服苏联。希特勒曾经坚定地避免卷入两线作战，然而从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开始，他让自己陷入的正是这样的战争。苏联的确是个诱人的目标。纳粹党的计划一直把波兰和俄国南部的肥沃地区作为德国扩张的自然目标。在对波兰、西欧和当时的希腊成功实施了闪电战后，希特勒及其军事专家都相信在进入冬季之前，他们就可以仅用一次战役打败苏联，甚至英美的军事顾问私下里也这样认为。一旦苏联被征服，德军将毫不费力就能解决掉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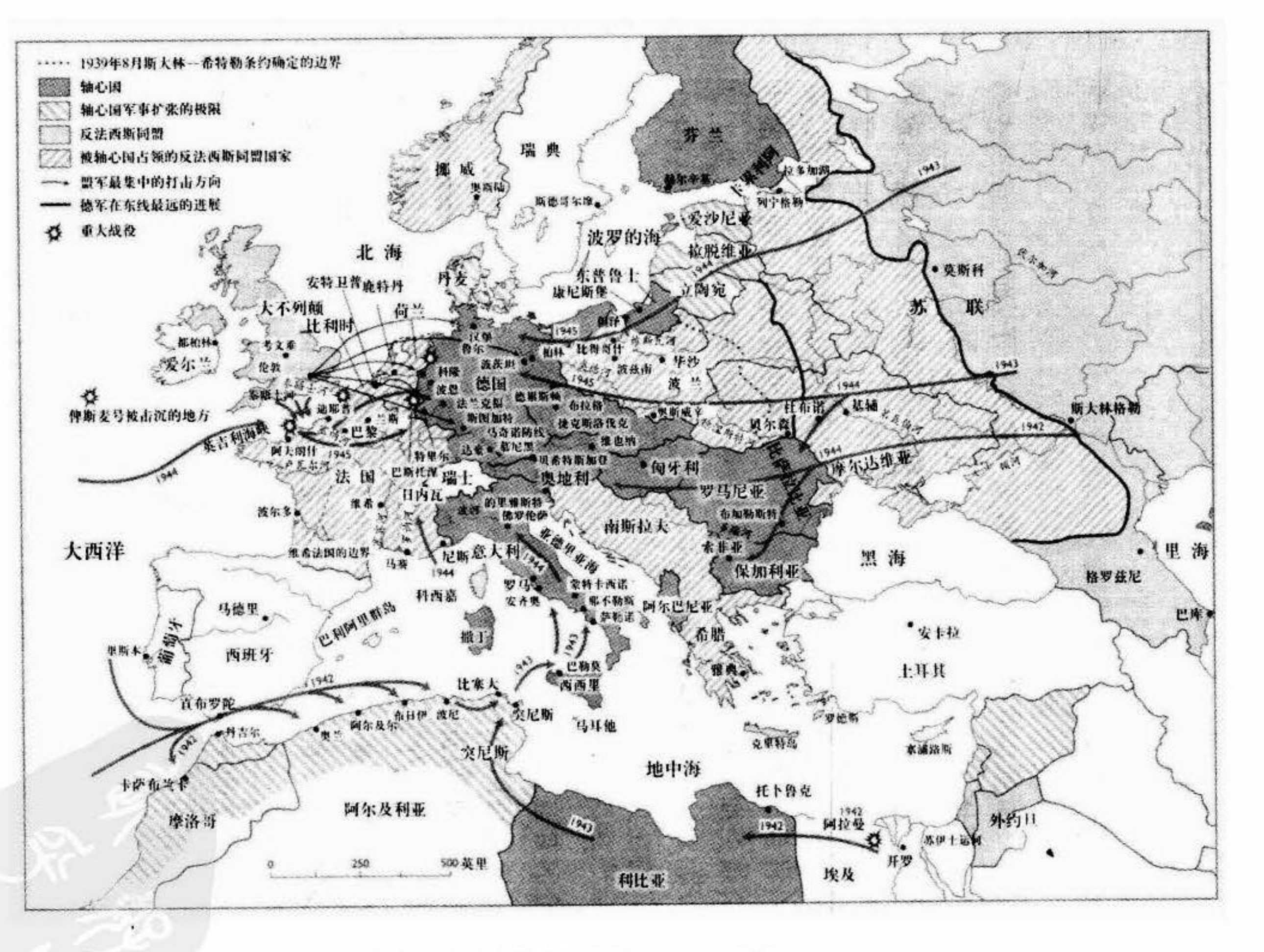
另外，1939年11月到1940年3月，斯大林曾与芬兰进行了短暂的“冬季战争”。尽管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苏联军队及其指挥者们在从狭小且人口稀少的芬兰夺取和控制疆土时表现都不佳。这一切都被德国看在眼里，希特勒由此认为迅速打败俄国巨人也许比较容易。

而且，希特勒又恢复了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有猜疑。他知道斯大林同意跟德国签订条约是出于投机心理，苏联随时可能改变立场。条约已经摧毁了这两个敌人之间的天然屏障即波兰。苏联又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扩张从而强化了希特勒的不信任感。1940年6月，斯大林曾要求得到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省和北布科维纳。德国人只希望苏联夺取比萨拉比亚而不包括北布科维纳，尽管他们也认可了苏联的吞并，并且警告罗马尼亚人别指望得到希特勒的帮助，但是希特勒与斯大林在东欧的合作至此走到了尽头。重新吞并比萨拉比亚使苏联占据了多瑙河

口,控制了一条重要通道。苏联人似乎就要进入东南欧了,而德国人并不打算让他们在那里单独行动。

苏联夺取罗马尼亚领土后仅几周,希特勒就表明了自己的东南欧利益,先是迫使罗马尼亚人割让领土给匈牙利,随后宣布保护新罗马尼亚边界的安全,而这种担保针对的只能是苏联。很快德军又出现在芬兰,对此希特勒解释说是“为了加强在挪威的德国军队”,1940 年秋德军进入罗马尼亚也完全是“为了保护罗马尼亚的油田不被英国破坏”。希特勒在新边界上的这些举动让斯大林深感不安。1940 年 10 月意大利又进攻希腊,把战火烧到了巴尔干,德军也进入了苏联认为对自己的国防至关重要的保加利亚。随着德军在南斯拉夫立足以及 1941 年 5 月在希腊取得胜利,斯大林意识到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入侵苏联。

尽管苏联未被征服,但是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计划几乎得逞。那是一次成功的闪电战,两个月内德军就打到了列宁格勒门前,10 月底就征服了乌克兰,苏联的损失上升到几百万人被杀或者被俘。从直线距离看,德军深入苏联的程度超过了深入法国的两倍。然而随着俄国冬天的临近,德军既没有攻下莫斯科,也没有拿下列宁格勒。苏联的重工业大多被转移到了遥远的乌拉尔,留在当地和西伯利亚的工厂也都得到加强。苏联的大量资源仍能充分满足苏联人的需要,政府并未倒台,国民士气依然高昂。而且,德国人就像在不列颠之战中一样,再次暴露了他们的计划远非完美。他们的军队装备也不足以承受俄国严冬的折磨。自信夏秋两季就足够结束战斗的德军指挥们根本没考虑冬季。结果在 1941 年 12 月到 1942 年 5 月的冬季战斗中,苏联人收复了很多有用的地方。



二战中的欧洲和地中海战区(1939—1945)

4. 美国参战

尽管美国存在一批强硬的孤立主义分子,而且还有一些纳粹的同情者,但是从1939年德军进攻波兰开始,美国的公众舆论就一直是几乎一致口径地反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其一致程度远超过1914年美国对同盟国的声讨。随着1940年法国沦陷,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如果希特勒在欧洲取得胜利,美国将会是他的下一个猎物,这种观念使美国民众反对轴心国的情绪更加强烈。然而与此同时,支持参战的美国人却很少。尽管如此,1940年底美国民众还是同意了该国的第一份和平时期军用征兵法案。

1940年6月到1941年12月间,在国会同意和美国公众舆论的普遍支持下,罗斯福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仅次于战争"的步骤援助英国和后来的苏联。美国政府转让了50艘"旧式"驱逐舰给英国,以此换取了位于英国殖民地的大西洋海军基地,同时向英国提供了武器,并且用美国海军帮忙把这些补给运过了大西洋。特别是根据1941年3月的《租借法案》,美国同意向"总统认为其防务对美国的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提供防务所需的物资,包括食品。于是补给物资立即开始源源不断进入英国和后来的其他反轴心集团国家。同样在1941年初,美英两国的军事参谋已经开始秘密商讨美国参战后双方如何配合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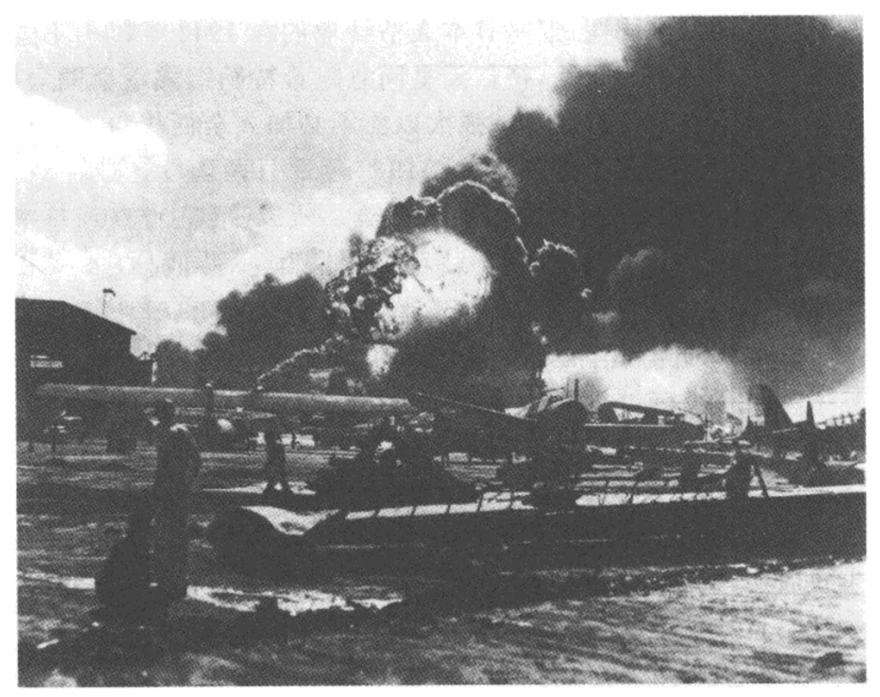
1936年德国和日本已经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承诺在遭到苏联进攻时彼此相互援助。1939年3月,在准备欧洲战争时,希特勒又逼迫日本裕仁天皇(Hirohito,1901—1989)加入与德国

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但是日本人估计他们在1942年以前不会准备太平洋战争。于是，裕仁天皇同意跟希特勒结成军事同盟，条件是日本在感觉自己足够强大以前不必加入全面战争。结果希特勒拒绝接受这个附加条件。1940年9月两国才达成一致，日本同意在美国攻打德国时加入战争。所以事实上，直到日本提前预定计划于1941年12月攻击了美国，三国轴心才真正形成。

与此同时，日本人还利用了法国、荷兰的沦陷，以及英国的软弱。就在继续推进对中国大陆的战争时，他们又在维希法国的许可下进入了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美国政府仍然反对它所认定的日本侵略行为。日本政府也逐渐落入军事领导者手中，这些人感觉与美国的战争不可避免，而且他们倾向于在美国民主政府能够充分做好准备之前就对其发动进攻。如果美国愿意放弃对日本扩张的坚决反对，太平洋战争或许还能避免，但是美国人仍然很坚定。

1941年夏秋两季，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信贷，停止向日本提供原材料，并让日本人撤出中国和印度支那。就在日美之间关于这些问题的谈判还在进行时，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了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美军的舰船和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它在太平洋的力量并没有被摧毁。而且，这个“国耻日”促使美国国内几乎一致支持立即对日本宣战。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也履行它们对轴心国伙伴的义务，对美国宣战。于是从1942年开始，二战真正成为一场世界战争。

据说罗斯福及其政治顾问们早就料到日本的计划，并且为了确保美国同时对日本和德国开战他们其实是允许袭击发生的。



图为1947年12月7日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遭袭炸的场景，这一天被罗斯福称为“耻辱之日”。(Franklin D. Roosevelt Library)

的确，美国的密码译解人员在代号为“魔术”(Magic)的行动中已经开始破译日本外交部门的密码，但是这项行动还处于初始阶段，而且并没有迹象显示珍珠港将是目标，也没有提到12月7日。尽管不可否认，美国在脆弱的夏威夷据点上是谨慎有余而准备不足的——例如，夏威夷的军事指挥们并不完全了解“魔术”解码的结论，而且日本人打算断绝外交关系的消息直到袭击发生后才传到了珍珠港——但是还是没有可信的理由证实罗斯福政府参与了任何传言中的阴谋。

美国对日本正式宣战是在珍珠港被袭后的第二天。一开始

有些人还不知道这些事件如何影响了欧洲战争，但是这种合理的困惑很快就消除了，因为三天后德国和意大利就支持它们的日本盟友而对美国宣了战。希特勒本来是个臭名昭著的条约义务破坏者，却选择了信守 1940 年的德国—日本—意大利三方条约，当然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可估量的错误，其严重程度只有他的进攻苏联决定能够匹敌。

尽管美国此时远比 1917 年准备得充分，但它仍处于不利地位。对抗德国，美国能做的只是增加对英国和苏联的援助以及参加打击德国潜艇的战斗。对抗日本，美国几乎是无能为力。其太平洋前哨基地关岛、威克岛和菲律宾接连失守。英国和流亡的荷兰政府都不能保住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这些地方也遭到日军袭击。到 1942 年春天，随着新加坡的沦陷，日本人迫使英国军队做了历史上最大的投降。日军已经从荷兰手中夺取了印度尼西亚，占有了婆罗洲(Borneo)的石油和马来国家的橡胶，并且实际上控制了泰国和缅甸。

日军袭击珍珠港只有靠空中和海上力量的紧密配合才能实现。他们有紧挨着澳大利亚海岸的歼击轰炸机，并且在迅速征服马来半岛期间日军已经清楚表明了他们控制的海域至少到了太平洋中部。当日军空袭泰国海湾摧毁了苏伊士东部仅有的英国主力舰“威尔士王子号”战舰和“反击号”巡洋舰时，公众舆论极其震惊。那些认为自己将为太平洋战争承担主要责任的美国人也意识到，如果美国的空中打击力量能够进入远东海域的话，他们必须把日本海军赶回去。

四、盟国的胜利

随后的战争有几个转折点。最早是一系列阻止了日本扩张

的海军行动,从航母上起飞的美军飞机在这些行动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42 年 5 月 7 日,在太平洋西南部珊瑚海(the Coral Sea)的战斗中,盟军的海空力量破坏了日军可能对澳大利亚及其所属岛屿发动的入侵。6 月份,美国的海空力量驱散了试图征服中途岛的日军舰队。尽管日军在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Attu)、吉斯卡岛(Kiska)登陆了美国领土,但是他们并未严重威胁夏威夷或者美国大陆。

在欧洲,美国和英国仍不能对苏联要求在大陆开辟第二战场的压力做出反应。但是 1942 年 11 月,他们确实在法属北非登陆,并且迅速地实际控制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北非漫长海岸的利比亚部分自地中海战争开始以来就被德国及其盟友意大利控制着。在登陆北非时,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Bernard Montgomery,1887—1976)指挥英军在靠近阿拉曼(El Alamein)的埃及边境内守住了一条防线。1942 年 10 月 23 日,英军就发起了向西的攻势,从而按计划配合了法属北非的盟军总司令、美国将军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1890—1969)向东的进攻。夹击之势慢慢收紧,1943 年 5 月自由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军队攻克了轴心国在突尼斯和比塞大(Bizerte)的最后据点,接受了大约 30 万轴心国军队的投降。

北非战役显然是一个转折点。盟军成功实现了大规模的两栖登陆,并且歼灭了"沙漠之狐"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1891—1944)指挥的轴心国集团最著名的一支部队。北非虽然不是主战场,但它却是盟军获得自信和声望的一次重要战役。

欧陆战场的重大转折点是苏军斯大林格勒(现在叫伏尔加

格勒)保卫战的胜利。1941—1942 年冬在苏联陷入僵持后,德军就把 1942 年的夏季攻势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转向了盛产石油的东南部地区。朝苏联产油区的推进使德军深入到苏联内部,但它没能达到蕴藏石油丰富的格罗兹尼(Grozny)和巴库(Baku)地区。战线拖得太长的德军已经无力承受俄罗斯的辽阔疆域、恶劣天气、充足人员和反击能力。德军被赶回了斯大林格勒,并且 1943 年初苏联就开始了向西的远征,直至两年后到达了柏林。

还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转折点是盟军在供给战中的胜利,然而这个胜利却是最重要的。即使对苏联来说,美国也是一个重要的补给来源。但是美国与它的盟友们被广阔的水域阻隔着,宝贵的补给品必须穿过海洋才能送达。如果德国人能够阻止或者大大削减这种活动,他们或许还能取胜。德军的确在潜艇方面做了重要改进,但是仅靠潜艇并不够,盟军的反措施包括雷达、海军舰艇与飞机的配合,以及护卫舰系统还是逐渐减少了沉船的数量。

轴心国的防守

战争的最后两年轴心国处于防守地位。盟军在欧亚两洲用地面力量沿着确定的行军路线发动进攻,虽然还是传统的作战方式,但是战争中的两个新内容(空中力量和现代宣传或者叫心理战)使这种方式对陆军来说相对容易了。至少在原子弹投到广岛之前,空中轰炸并不是崇尚空军力量的人们预言的完美武器。但是,随着占优势的盟国空军力量不断增强并且被系统地用于破坏敌军在诸如滚珠轴承、机床、机车和石油这些重要物资

上的生产能力,再加上美军飞机在相对薄弱的日本城市投掷燃烧炸弹,空军力量的确大大摧毁了轴心国的抵抗意志。

获取情报也很重要。在波兰知识分子早期工作的基础上,从 1940 年起英国就组织了一批学者、猜谜爱好者和技术人员,开始破译"牢不可破的"德国"英格玛"军用密码。这套密码系统需要用高度机密的设备从很多组看似随机的数字中创造代码,破译它是一次重大行动,直到战争后很多年都一直严格保密。这次成功行动以及从中获取的机密也都被冠以代号"超级"(Ultra)。到 1943 年,英国的"超级"、美国的"魔术"和其他相关行动意味着英国已经在系统地获悉大部分德国高层通讯,美国也在破解日本的军事和外交情报。

从陆路对德国和意大利发起的进攻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即苏联从东面,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他盟国从南面和西面。南面的盟军在突尼斯取得最终胜利的两个月内,又经过一次成功的两栖作战(1943 年 7 月)穿过北非到达了西西里岛。从西西里岛出发,六个星期后他们登陆了意大利本土的萨勒诺(Salerno)和安齐奥(Anzio)。尽管登陆付出的代价很大,盟军被困住了好几个星期,而且德军支持的意大利战争比盟军预计的时间要长,但是 1943 年夏盟军取得的胜利成功迫使意大利退出了战争。意军高级将领和国王的亲信在持不同政见的法西斯头目帮助下,不仅于同年 7 月发动政变推翻和囚禁了墨索里尼,而且促成了盟军与彼得罗·巴多里奥元帅(Marshal Pietro Badoglio,1871—1956)领导的意大利新政府之间的一些谈判。

德国人当然不愿放弃他们的意大利防线。希特勒采取了一次罕见的表现其法西斯忠诚的行动,1943 年 9 月他派了一支德军小分队去营救墨索里尼,并且扶植他在北部做"法西斯主义共



这是一张美国军队通信兵摄于 1944 年二战后期的照片，图中希特勒率领德国官员视察空袭造成的损害。这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因为法西斯专制者不像英国女王或首相丘吉尔，很少公开强调战争中遭受的损失。(National Archives)

和国”的首领,墨索里尼在这个位置上一直维持到 1945 年 4 月被其同党处死。1944 年 6 月,经过在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附近异常激烈的战斗后,盟军成功突破了已经被宣布为开放城市的罗马,8 月就到达了佛罗伦萨(Florence)。但是,此后直到 1945 年初德国人在其中心地带最终崩溃,盟军都没能继续向北取得实质性进展。

1943 年 12 月,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晤,决定开辟已经推迟很久的第二战场。1944 年 6 月 6 日也就是“登陆日”(D-Day)这天,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盟军开始在法国登陆。盟军选择诺曼底海岸让德国的高层指挥感到吃惊,他本以为登陆会在靠近北面和沿英吉利海峡的东面发生。在这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和两栖进攻中,最初的两天就有超过 10 万人的盟军部队在 4000 艘海军舰艇和 1 万架飞机的支持下登陆了敌军严防死守的海岸。三个月内,又有 200 万人加入进来。虽然在四年的占领期间,德军沿法国海岸线构筑了防御工事,但是盟军也用这四年的时间研究、模拟和制定了周密的登陆计划。联合登陆艇、两栖卡车、海空支援、人造码头和组织有力的供应系统先为盟军的登陆部队夺取了一个滩头阵地。从这个阵地出发,登陆日后一个月左右盟军就在阿夫朗什(Avranches)开战,并在美国将军乔治·S. 巴顿 (George S. Patton,1885—1945)指挥的一场重要侧翼行动中把德军赶回了塞纳河对岸。

1944 年 8 月 15 日盟军实施了计划已久的在法国地中海沿岸的辅助登陆,紧接着向北进军罗讷—索恩(Rhône-Saône)河谷,而且几乎都没有遇到抵抗。各地的法国抵抗运动都热烈欢迎包括 1940 年自由法国的继承者在内的众多解放力量。8 月底,作为一个象征和城市的巴黎也获得了解放。



1944 年诺曼底登陆日:这是从登陆艇上拍摄的美军冒着德军炮火登岸的场景。在这一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登陆战役中,盟军在 4 千多艘舰船及 1 万多架飞机的支援下,战役的前两天就有 10 多万人登陆。(Franklin D. Roosevelt Library)

德国人被击退了,但是并未瓦解。1944 年 7 月,德国军队和平民中的保守分子试图刺杀希特勒以铺平和谈的道路。但是希特勒躲过了针对他的爆炸,处死了密谋者,并且通过杀害了 5000 名被怀疑是共犯的人进而仍然牢牢控制着德国政府。盟军受到 7 月和 8 月取得迅速胜利的鼓舞,准备在冬天之前消灭德军或者切断其与国内的联系,结果巴顿的机械化部队却提前用光了燃料。德军又用新式的无人驾驶飞机和由火箭发射的导弹限制了盟军用安特卫普(Antwerp)作为补给港,所以直到秋

季末,他们才井然有序地退回了齐格菲防线。

尽管在撤退,德国人还是希望像在一战中那样防止德国本土遭受攻击。战场上仍有 1000 万德军。希特勒也在加紧发展喷气式飞机,希望能挽救德国。为了再赢得一个冬季的时间,1944 年 9 月下旬希特勒召集了最后的预备役部队,命令 16 到 60 岁之间所有身体健全的男性都入伍。艾森豪威尔当然不想给希特勒这个冬天,他下令发动空袭以跳过莱茵河下游的德军防线,但是地面与空中联合打击的计划进展并不顺利,甚至连空军也需要被营救。盟军由于已经用光补给而被迫暂停了攻势,随后希特勒就下令发动最后的反攻以扫平位于盟军补给港安特卫普的阿登(Ardennes)森林。12 月 16 日,在靠近德国边界的坦克大决战(the Battle of the Bulge)中,德军利用浓雾、大雪、系统的渗透和完全的突袭发动装甲进攻,威胁要击退盟军,并且在巴斯托涅(Bastogne)全面包围了一个美国空降师。后来随着天气转晴,盟军的空中打击和德军的燃料短缺才阻止了希特勒的反攻。

此时的德国再没有更多的人力和供给可以投入战斗了。德国的石油生产已经遭到致命打击,坦克不得不用牛拉到前线。燃烧弹这种灾难性技术也被用到了战场上。1945 年 2 月 13—14 日,英军用大规模燃烧弹袭击点燃了德累斯顿(Dresden),造成 13.5 万人丧生,其中很多人是来自东部、从苏联前线逃来的难民。

自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苏联人就被无情地卷入了战争。在 1943 年的战斗中,西方盟国忙于意大利战场,苏联成功夺回了 1941 和 1942 年丢失的大部分领土。整个冬季,苏军都保持着压力,而且初春又在南面打响了战斗。1944 年秋,苏军已经

能打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与约瑟夫·布罗兹(Josip Broz)元帅也就是铁托(Tito,1892—1980)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游击队会合,而且准备好了进攻匈牙利。在中部和北部战场,苏军已经收复了所有失地并准备从东面穿过波兰攻打德国。夹在进攻的苏军与撤退的德军中间的波兰这时已经亡国。8 月,在伦敦的波兰临时政府下令华沙群众起义。华沙城内的战斗持续到 10 月,德军最后成功镇压了起义,20 多万波兰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苏军在华沙城外并没有干预这场战斗,只是等待波兰抵抗运动被摧毁,因为这样他们就可能扶植自己的同伙了。这次行动可以说是德军最后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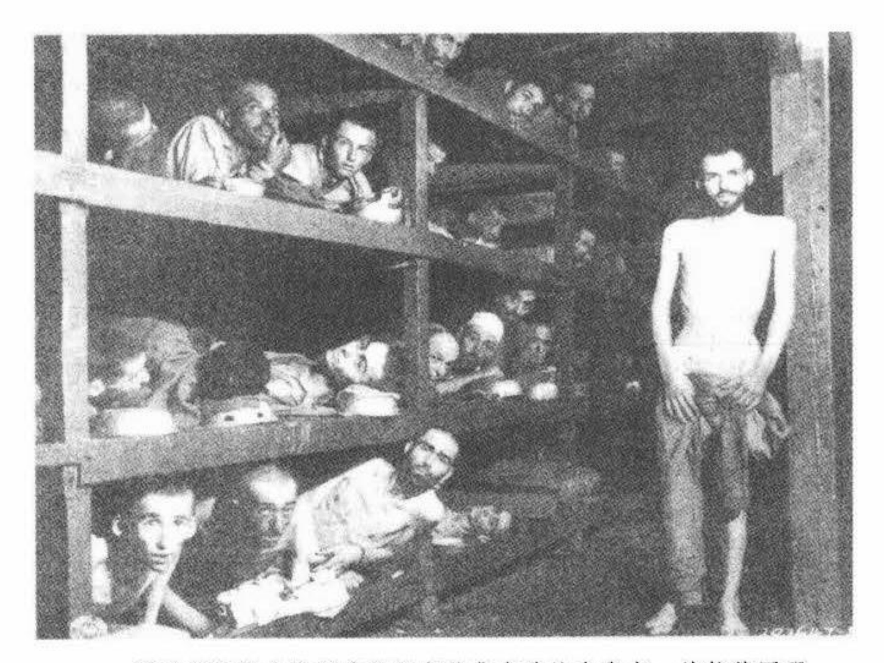
随后德国战争就迅速结束了。苏军不仅在冬季没有停止进攻,而且在 3 月初已经穿过波兰直逼柏林。西方盟国也在 2 月突破了齐格菲防线,穿过莱茵河,进入德国中心地区。1945 年 2 月初,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召开了又一次首脑会议,确定了战胜德国的最后计划。德军显然不能坚持多久了。这几位盟军首脑打算和平安排在打败德国后他们各自将要占领和管辖的德国领土,并且最终决定把占领柏林的荣耀给了苏联,这实际上就同意了苏联对波兰的控制。在当时,这种意见似乎承认了一个事实,即在成功向德国发动攻势的两年中,苏联歼灭的德军要远多于西方盟国。斯大林进一步要求德国支付 200 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其中一半要给饱受战争蹂躏的苏联。很快苏军就打进了已经被西方盟国的空军力量彻底摧毁的柏林。希特勒及其原来的情妇在他的地堡密室里一起饮弹自尽,他们的尸体也被浇上汽油焚烧了。

希特勒在欧洲掀起的这场战争造成了至少 1700 万士兵和 1800 万平民死亡。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欧洲战争如此摧毁和

腐蚀了进步学说以及相信人类有理性的观念。随着战争激烈进行期间被新闻审查员隐瞒的更多战争细节逐渐向公众披露,已经意识到这场战争究竟有多么不可预料、多么具有毁灭性的人们也大大减少了对战争胜利的欣喜感。

纳粹党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把常住的犹太居民赶出德国,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用粗暴的威胁手段驱逐犹太人。掌握政权后,他们又立刻将其转变为国家政策,到 1938 年,德国 50 万犹太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移居国外。尽管 1938 年德奥合并又把原来奥地利的 20 万犹太人归入了德国,但是到 1939 年 9 月,扩大后的德意志帝国仅剩 35 万犹太人。随着战争的到来,移民急剧减少,纳粹党又转向了驱逐政策。他们甚至妄想过要在法属马达加斯加岛上建立一种由纳粹党控制的犹太人居留地,这种荒谬的计划后来没有实施。只是根据这个计划他们一致同意在纳粹党的控制下集中犹太人(纳粹党已经是使用"集中营"的专家),而随着纳粹德国不断征服东欧,这种集中也不断扩大。负责实施该计划的是党卫队官员、人称"刽子手"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1904—1942)和阿道夫·艾奇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谋杀成为他们处理这么多被俘人民的偏爱手段,甚至在官方政策决定建立死亡营之前,已经有超过 100 万犹太人被杀害了。

1942 年,德国公布了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决定",并且在德国和被占领的波兰建立了六个死亡营。年底之前,这种强硬政策就开始实施,德意志帝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无论身在何处都一律要被杀害。用纳粹党的话说就是,犹太人种将被消灭。他们喜欢用氰化物气体让犹太人窒息而亡,不过也有数百万犹太人是直接被枪杀的。用来销毁受害者尸体的火葬场现在都声



图为德国耶拿近郊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纳粹德国强迫体格强壮的犹太人及其他“不受欢迎者”集中劳动，并在体力耗竭后将其消灭。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德国瓦解前夕，图中的这些人刚被美军第八十师解救。(National Archives)

名狼藉了，但在当时它们都被毁掉证据的繁重任务压得不堪重负，于是刽子手们还采用了古老的合葬办法。这种滔天罪行在当时和现在都是触目惊心的，同样惊人的还有纳粹的大规模后勤投入。大战期间，数千万人员、大部分铁路系统、无数的军需品，当然还有巨额资金都被投入到组织有力的谋杀数百万非战争人员的行动中。这项谋杀计划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丝毫没有减弱，甚至在战争趋势转向对德军不力时，死亡营仍在继续其残忍的工作，也就是种族灭绝，或者说是谋杀一个民族。如果战争继

续下去的话,欧洲大陆的所有犹太人极有可能就被消灭了,结果不亚于臭名昭著的大屠杀(Holocaust),其中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德国、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乌克兰的犹太人及其文化几乎荡然无存。

盟军进入德国后还第一次全面揭露了纳粹党处理其他民族的恐怖行径,包括吉普赛人、同性恋者、所有国籍的斯拉夫人特别是波兰人,这些都是纳粹思想体系所谓的"劣等"人。当然,纳粹党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政治对手、知识分子、很多神职人员,以及事实上所有被认为用任何方式反抗第三帝国的人。1945年间,德国、奥地利、波兰的一个又一个集中营和死亡营获得解放,于是奥斯威辛(Auschwitz,最臭名昭著的死亡营,害死了200万人)、贝尔森(Belsen)、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达豪(Dachau)、北豪森(Nordhausen)、毛特豪森(Mauthausen)等这些名字就与残酷的虐待和种族灭绝战争联系在一起了。另外还有不知道几千万人被饥饿、暴行、荒诞的医学实验夺去了生命。

这种大屠杀的后果是毁灭性的。试图掩盖、解释,或者为这种恐怖行为开脱的努力损害了几代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那些接收犹太移民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则大大受益。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和早就梦想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建立新的犹太人国家以色列,结果导致了近东和中东地区几乎一直处于不宣而战状态。与此同时,离散的犹太人也将以希特勒的种族歧视理论永远无法想象的方式为新社会创造财富。

战后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有些德国人明知道这是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而没有提出抗议?为什么苏军进入波兰后没有阻止屠杀?为什么西方盟国没有把解放犹太人作为早期目标?为什

么罗马教皇没有仗义执言？或者为什么犹太人自己在集中营里也没有组织更系统的反抗？关于这些问题几乎没有统一答案，但是人们同样几乎不会怀疑大屠杀的惨重以及那些死亡提出的问题的确极其重要。

1945年5月8日，丘吉尔和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1972)，即同年4月罗斯福去世后继任的美国总统一起宣布了德国抵抗的结束以及欧洲胜利日(V-E Day)的到来。但是由于斯大林对西方盟国已经在法国的兰斯(Reims)接受正式投降感到不悦，双方还为应该由谁代表反法西斯同盟的问题发生了争议。就在同一天，斯大林又选择由苏联方面单独宣布了对德国的最终胜利。

五、太平洋战争

战胜日本的日子(V-J Day)现在成为盟军全力以赴的目标。苏联的政策是只要德国仍然是个威胁，就尽力避免让日本也成为正式的敌人。而英国和美国又急于让苏联加入对日作战，于是这种需要也促使它们在德国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对斯大林做了很多让步。

对日本的进攻集中在三个主要方向。首先，在美国媒体很快称之为“跳岛战术”的作战过程中，美国海军从太平洋中部直趋日本。美国海军用空中支援和两栖作战的方法一个接一个地攻克了沿途的小岛基地。包括塔拉瓦(Tarawa)、埃尼威托克(Eniwetok)、夸贾林环礁(Kwajalein)、硫磺岛(Iwo Jima)、冲绳岛(Okinawa)、塞班岛(Saipan)和关岛(Guam)，每个岛屿都需要一场激烈的抢滩攻击和稳扎稳打的战斗。

第二,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帮助下,通过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菲律宾群岛这些更大的岛屿到达西南太平洋。由美国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指挥的这场战役,其基地是澳大利亚以及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和新赫布里底群岛(New Hebrides)这样的边远岛屿。到1944年10月,海军已经打赢了在菲律宾海的战斗,并为麦克阿瑟部队成功登陆莱特岛(Leyte)和从日本手中夺回菲律宾诸岛提供了可能。

第三方的进攻来自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盟军的主要努力是向蒋介石和在重庆的中国国民党提供物质支持,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削弱在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的日军力量。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控制和封锁了"缅甸公路"(Burma Road),从而使得盟军只能通过空中与蒋介石国民党联系。尽管西方盟国没有把绝大多数资源投入中国—缅甸—印度战区,但是它们的确帮助维持了中国的正规战斗。并且随着1945年决战的临近,英军在中美的援助下已经遏制住该战区的三支日本野战军。

日本战场的终结非常突然,几乎完全出人意料。1945年春夏两季,太平洋岛屿基地的美军飞机已经对日本工业实施了毁灭性打击。日军舰队几乎被摧毁,潜艇战基本扼杀了日本经济,日本军队的士气也在衰落。尽管如此,美国领导人坚信只有使用他们新近发明的原子弹才能避免原计划两栖作战进入日本本土可能造成的严重人员伤亡。有些评论家认为,虽然原子弹实际上没有来得及用于影响欧洲战争,但是种族歧视也是导致美国决定在日本而不是任何欧洲民族使用原子弹的一个原因。美国的另一个动机则是想要向苏联显示美国的新武器有多强大,因为很多人已经担心苏联会在战争的最后时刻转向对付盟军。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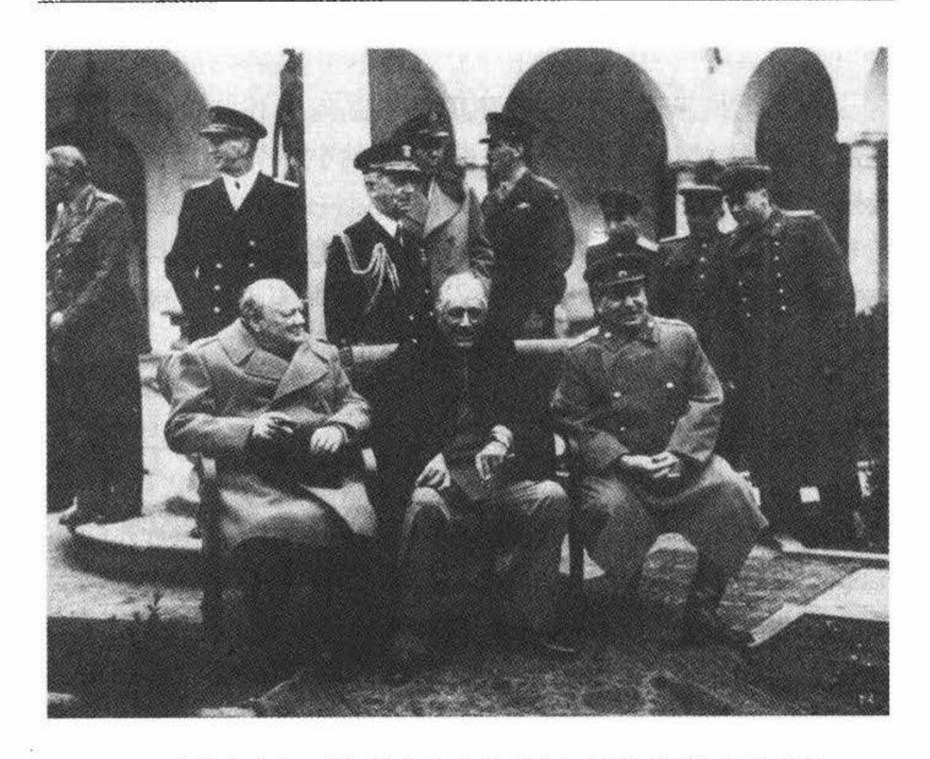
在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8 月 8 日，承诺一旦打败德国就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全力进攻了满洲。美国又将第二颗原子弹投向长崎后，自认为必然失败的日本政府决定放弃在本土的最后一搏。9 月 2 日，日本在东京湾正式投降，放弃了海外征服地并且屈服于美国的军事占领。在肃清了大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后，日本政府在名义上的盟国（实际是美国）的监督下继续执政。

反法西斯同盟

丘吉尔喜欢称之为伟大的同盟（the Grand Alliance），也就是后来的联合国家（the United Nations）集中了压倒性力量对付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这些法西斯轴心国在巴尔干、东南亚和西欧争取的同伙。英国及其联邦国家、苏联、美国是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国民党中国尽管很无能，但是也牵制了成千上万的日军。法兰西帝国的资源和法国人民在国内外的抵抗运动也是有价值的。盟军还依靠了很多拉美国家的丰富资源。比如巴西就曾是同盟中积极的一员，在这场真正的世界大战中，巴西军队曾经在意大利战场上与美国（包括日裔美国人）、法兰西帝国、英帝国、支持盟军的意大利人、波兰，以及其他军队并肩作战。而且在欧洲战争的最后时刻，阿根廷也对德、日宣战了，尽管其法西斯领导者胡安·庇隆（Juan Perón，1895—1974）将军本来希望德国取得胜利。

反法西斯同盟运作的主要形式是三巨头即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与其政治军事专家顾问们举行的峰会，以及更为频繁的英美会议。早在美国参战之前，罗斯福与丘吉尔就在纽芬兰



这是丘吉尔(不久因竞选失败下台)、罗斯福(患有严重疾病)、斯大林于1945年2月4—11日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会晤的场景。会议标志着盟国合作的顶峰期,三巨头在消除德国军国主义、鼓励在解放区域建立民主政府以及建立更富效力的国际组织以取代国联等问题上均达成了协议,但雅尔塔的承诺从未转变为现实,世界很快将经历长达45年的冷战。(National Archi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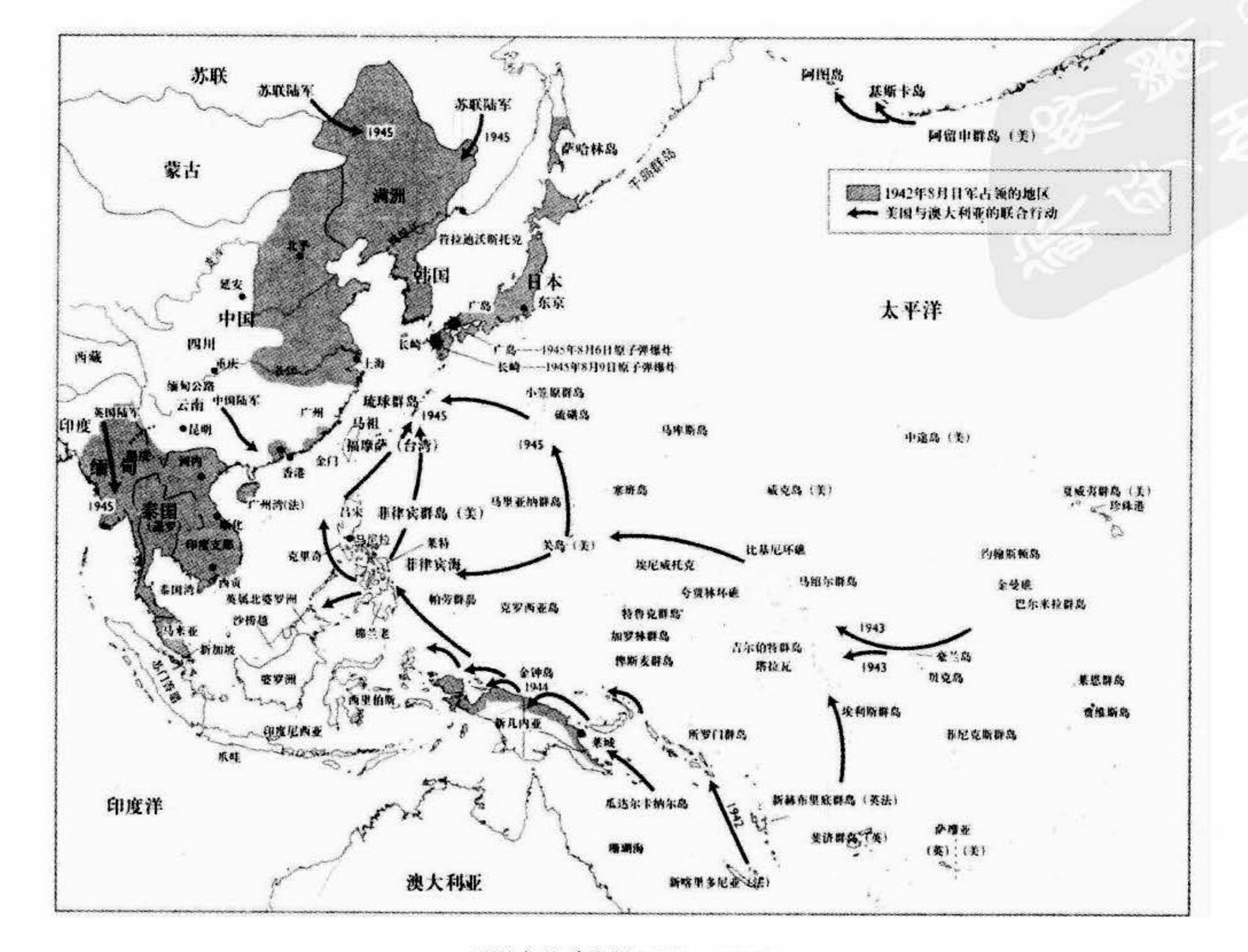
(Newfoundland)会晤并发表了《大西洋宪章》(1941年8月14日),宣称支持公海自由、各国平等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废除侵略行为、恢复被征服民族的权利。罗斯福与丘吉尔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8月在魁北克,以及三巨头在德黑兰和雅尔塔召开的正式会议又缔结了一些在政治和军事层次上稳定实施的协

议。1945年7月17日到8月17日，英、美、苏在位于被征服的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召开的最后会议进一步确认了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并且这次还有两位新人物即杜鲁门总统和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1883—1967)首相与会。

除此以外，仍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问题需要解决。为保证同一战区的明确作战方向，英美决定构建一个完整的参谋人员相互配合的网络，其中全都是这样安排：如果美国人担任指挥，就有一个英国人为其做副手；如果英国人担任指挥，就有一个美国人为其做副手。甚至两国的情报搜集装置也是紧密配合的。在最高层次上，也是由联合参谋长与英美政府的高级官员密切联系，共同制定全面作战计划。但是，苏联人并没有被纳入这种紧密的军事合作，苏联军队在战场上总是单独作战。

战争期间，盟国一致同意必须迫使法西斯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德国人必须被打败，盟国军队必须作为征服者进驻柏林，根本不需要有政治谈判，只能是轴心国无条件的军事投降。但是在作战过程中，英国和美国还是有些人反对这项政策，一方面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担心期望无条件投降反而会坚定德国人的抵抗意志，或者把支持希特勒的这个国家团结起来。的确，希特勒似乎不太可能与盟军谈判，而且在1944年刺杀希特勒的努力失败后，德国人自己也基本没有机会推翻纳粹政府。

另有一个政治问题甚至在英美之间造成了非常明显的不和。主要是，如何才能证明法国、意大利和其他被占领地区的反德分子是足够民主的，能够获得西方大国支持的力量。关于这个问题，美英政策基本论调的分歧明确表现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不同观点上。罗斯福坚信，如果盟军不去干预和支持被占领



亚洲太平洋战场(1941—1945)

地区的保守主义者和反动分子，而是允许这些人自由选择他们的政府形式，他们就会选择民主。丘吉尔没有这么理想主义，他急于扶持任何敌视德国人的力量，甚至不在乎这些人的敌意是不是刚刚出现而已。此外，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罗斯福还敦促丘吉尔承诺（特别是对印度）实行非殖民化，但是丘吉尔已经明确回应说他不会主持大英帝国的解体。

英美的这种分歧在法国政治方面还由于罗斯福对戴高乐的猜疑而进一步复杂化。戴高乐是法国解放运动选出的领袖。对丘吉尔来说，他是一位难对付但又不可或缺的盟友。结果在法国解放后，戴高乐派在法国国内有组织的抵抗运动配合下接管了法国本土的文官政府，并且通过自由的公民投票重建了民主政体。1946 年，意大利人也通过有限的选举成立了共和国。于是，获得解放的人民自己解决了美英政策之间这个一度可能导致危险的严重问题。

然而二战后最大的政治问题还是苏联可能统治东欧和东南欧。雅尔塔会议上，西方大国曾答应斯大林向西推进军队，并且指望他承诺允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地区举行自由选举。二战前大部分较小的东欧国家都已经转向了法西斯极权主义，所以现在转向共产党极权主义并不困难。从来不信任斯大林的丘吉尔在战争期间又不敢冒险放弃苏联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因此安抚斯大林似乎绝对很重要。战争的最后时期，西欧国家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已经接近赤贫状态，根本无力在它们遵循的均势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于是苏联和美国很快成为唯一两个超级大国。美国也违背自己的希望和公众的预期，深深卷入了欧亚事务。

伴随战争结束的是对代价的评估，显然各国都遭受了前所

未有的损失。苏联至少损失了 750 万军队和另外 1000 万平民死亡;日本总共损失了 200 万人;德国损失了 350 万军队和 100 万平民;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各损失了 40 万人;美国也有 29 万军人丧生。中国的损失无法估算,但是专家们认为这个大国承受了至少 250 万人的总伤亡,甚至还可能是这个数字的 5 倍。这些只是举例说明。我们前面提到过,还有超过 600 万犹太人和其他被纳粹狂热分子迫害的人们死在了俘虏他们的人手中。金钱损失高达 4 万亿美元。战争导致的物质破坏更是无法估量:像德累斯顿和广岛这样的城市几乎名存实亡,很多古迹和遗址被毁,艺术珍宝都不见了,整个环境(可能是永远地)都遭到了污染,技术最先进的大陆上的工业、医疗保健和运输设施都被摧毁,成千上万的人们挣扎在饥饿边缘,勉强维持着生命。

战争结束了,和平并没有到来。德国和日本战败后几乎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侵略者即苏联,它的意图已经发出了清楚的警告。长期的热战之后紧跟着就是苏联与其原盟友们的尖锐对立,这种敌对的程度如此激烈,所以很快就被称为了冷战。

六、后果

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这一战争造成的损失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总共有至少 5000 万人丧生,其中多半是平民。除美国以外,所有参战国的重要城市都遭到毁坏。即使战后的人口出生率激增,并且实施了大规模经济重建计划,这样的损失也永远不能完全弥补。而且,世界又面临着新的恐怖问题:随着德意志第三帝国在东西两面盟军入侵的巨大压力下崩溃,1945 年 4 月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当世界上最早的原子弹在广岛和

长崎爆炸后，对日战争也很快于同年 8 月告终。一种如此强大的武器出现在世人面前，的确让人担心又一场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很可能导致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灭绝。美国和随后的苏联首先成为能够发起和实施核战争的国家。两国在地域、资源和人口方面都同样远远超过其他大国（中国此时正忙于自力更生迈向工业现代化），于是两国就分别成为一个重新组合的两极世界在意识形态、工业以及金融领域的领导者。人们普遍把接下来半个世纪美苏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竞争称之为冷战。

战后的安排

敌人的攻击和占领给苏联国内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并且让数百万幸存者穷困潦倒。然而其资本主义盟友美国不仅本土没有受到攻击，还发明和使用了原子武器。于是，斯大林也用了四年时间研制核弹追赶美国。苏联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成就，一方面无疑是由美国国内的苏联同情者提供和苏联在西方的间谍网络获取的科技情报作了重要贡献，但是从根本上讲，只有高水平的苏联科学技术以及斯大林主义独裁统治，能够为此目标集中资源的绝对权威才可能取得这种成就。

除了不可能与德国或日本缔结和平条约，苏联及其原来的西方盟国都已经同意与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缔约。而且，苏联也与芬兰签署了和平条约，并且占有了一部分卡累利阿（Karelia）。它还再次从罗马尼亚取得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吞并了原东普鲁士的部分领土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最东面部分。

1946 年，活下来的主要纳粹头目在纽伦堡接受了审判，其

中 12 人以战争罪被判处死刑。战败的德国被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即美国占领区、英国占领区、法国占领区和苏联占领区。苏联占领区从德国东部一直到柏林的西部,柏林作为德国原来的首都也被分割成四个占领区,每个同盟国各占一个。这种安排本来是为了暂时的军事占领,但是由于无法达成协议,所以就延续下来。不能做出关于德国的任何安排也成为欧洲悬而未决的最严重问题。

1949 年,三个西方国家把它们的占领区合并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首都为波恩。作为回应,苏联也在其占领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很多西德人迫切希望与苏联占领区的德国同胞实现统一。但是,苏联人最害怕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德国重新统一,他们认为这将意味着侵略会卷土重来,而西方大国同样也不能容忍一个完全共产主义的德国。

在亚洲,最严重的是中国方面的问题。曾经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占领期间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活动。1949 年,他们打败蒋介石并且迫使其逃到台湾,由于共产党没有舰队所以就没再追击。在最后几年的战斗中,蒋介石失去了对中国人民的控制,他自己的军队士气也很低落,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也破坏了中国经济。到 1950 年,中国大陆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成为苏联集团的一员,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则加入了美国集团。这可以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失败。

苏联在世界其他地方也通过各个共产党组织的帮助追求其世界共产主义的目标。几乎每个国家都存在共产党组织,只是它们对苏联共产党(CPSU)和苏联政府的从属程度不同。相比

之下，美国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意识形态上受过训练的支持者。

这两个超级大国各自成为一个大同盟的领袖，同盟成员被自身利益的纽带联系在一起。1945 年成立的松散的美国同盟包括：西半球国家、大不列颠、英联邦、西欧、日本和菲律宾。苏联同盟包括东欧国家以及 1949 年加入的中国。两大阵营的边界最终沿着欧洲大陆上一条不规则的南北线划分开来，向西是斯堪的纳维亚、西德、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希腊，向东是巴尔干诸国、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1946 年 3 月 5 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威斯敏斯特学院接受荣誉学位并发表演说时，丘吉尔提出，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正在落下。从此时起，这条线及其象征的分裂在西方拥有了一个生动的名字和近乎神圣的意义。

土耳其属于西方阵营，但它又因一系列条约而与中东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紧密联系。两大阵营的漫长边界线在亚洲也有延伸，这就是南北韩的分界线，其中苏联占领北韩、美国占领南韩。在这条漫长的边界线上，苏联的进攻性探测行动引发了多次危机，并且有几次还导致了战争。

西方阵营多次做出缓和双方关系的姿态。1946 年，斯大林拒绝参加联合国家原子能委员会。1947 年，美国又提出一项由美国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以使欧洲从战争的破坏中加快复苏进程的国际计划，也就是根据美国国务卿乔治·C. 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1880—1959)将军命名的“马歇尔计划”。结果苏联不仅自己拒绝接受援助，也不允许其卫星国参加马歇尔计划。原来的西方盟国随后于 1949 年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核心。此前苏联阵营已于 1947 年成立共产党情

报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继承了原来的共产国际,为了应对北约,1955 年它也缔结华沙条约将东欧国家联合起来。另外,美国和英国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还试图阻止核武器扩散,并且提出了被称为联合“多边核力量”(MLF)的计划。但是由于德国要参加,法国就拒绝了该计划,并于 1966 年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撤出了军事力量,还强迫北约总部搬出法国。

在中东,事实证明《巴格达条约》及其后续的中央条约组织(CENTO)只不过是美国、英国、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一系列不稳定协议。随着 1959 年伊拉克从《巴格达条约》中退出,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之间就没有了直接的同盟联系。中立国家仍然处于两大阵营之外。像瑞士和瑞典这样一些国家仅仅是维持它们不与任何大国同盟联合的传统政策。但是大多数保持中立的还是新独立的国家。其中印度最有影响,它也借此从两大阵营都获取了很多急需的经济援助。由于经济援助成为冷战的一种工具,中立国往往能成功地帮助一方压倒另一方,而这两个大国也轮流争取把新独立的国家变成了自己的附庸国。

于是,二战后的十年见证了通常所谓两极世界的产生,也就是各自由一个敌对的超级大国领导的两个国家集团主导的世界。继承了所有这一切的一代人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只能适应这个两极世界,适应冷战这种双方在政治、军事、智力和经济领域的无情竞争。尽管两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友之间不会有核交锋,但是世界上很多人已经习惯了生活在相信这场浩劫完全可能的阴影中。虽然双方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经常谈判,甚至私下里也相互妥协,但是两个大国集团在公开场合从不向对方让步。20 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史海钩沉

苏美对抗与冷战

1947 年冷战爆发初期，就在苏联继续在全欧洲扩大影响时，杰出的美国政策分析家乔治・凯南（1904—　　）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探讨了美国应采取什么行动抵制苏联的影响。尽管他在这篇文章中用了笔名“X”，其实早在 1946 年 3 月他已经把自己的观点写在名为《苏联行为的起源》的电报中直接呈给了美国国务院。当时凯南是美国驻莫斯科的二等外交官。《外交》杂志上的文章是这样转载的：

事实上，美国政策的可能性决非仅限于维持这条线和期望最佳结果。美国完全有可能通过行动影响俄国国内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发展，俄国的政策也主要是由此决定的。这不仅是美国在苏联和其他国家进行信息活动这种温和措施的问题，尽管那也很重要，这更是一个程度问题，即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在世界人民中普遍树立起这样一种国家形象：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够成功处理国内生活难题和承担世界大国责任；具有能在时代的主要意识形态潮流中保持自我的精神生命力。如果能够达到树立和维持这种形象的程度，俄国共产主义的目标一定会显得枯燥而荒谬，莫斯科支持者的希望和热情也必定减退，而且还会给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政策增加更多的负担。因为共产主义哲学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衰落。甚至是美国不能经受早期的经济萧条都会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产生深远和重要的反响，其实自从战争结束以来，红场的乌鸦们就曾经那样得意而自信地估计过萧条的结果。

美国的犹豫不决、不团结和国家内部分裂同样对整个共产

主义运动起了兴奋剂的作用。苏联阵营已经表现出这种迹象: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洋溢着充满希望和激动的喜悦感;莫斯科的脚步重现欢快;新的外国支持者集团也倒向了在他们看来是唯一可能获胜的国际政治一方;苏联在国际事务东西分界线上的压力也增加了。

如果说单凭美国的行为不需要帮助就能操纵共产主义运动的生死大权并且让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先倒台,这样说是有点夸张。但是,美国完全有能力大大增强对苏联的政策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更为温和、谨慎的行为方式,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形势发展以最终决定是瓦解还是逐步软化苏维埃政权。毫无疑问,如果美国不能最终调整自己以适应苏联的行事逻辑,救世主运动可能会长期遭受挫折,尤其是因为那不是克里姆林宫自己的行动而是由我们发起的。

所以,最终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国自身。苏美关系的问题实质上是在考验美国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员的全部价值。为了避免垮台,美国其实只需要遵循自己的最优秀传统并且证明自己作为一个大国存在的重要意义。

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XXV (July 1947), pp. 581—582.

七、本章小结

今天的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仅仅是二十年停战期。虽然如洛迦诺精神所示,20 世纪 20 年代曾经出现和平的希望,然而帮助希特勒掌权的大萧条又毁灭了这种希望。

1918 至 1938 年间,苏联领导人越来越不相信爆发世界共产

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希特勒在德国的成功上台对苏联构成威胁，于是斯大林就试图通过谈判阻遏这种威胁。事实上，当时西方国家和苏联都想把希特勒的侵略转向对方。

1931—1938年的突出特征是各种国际危机纷纷爆发，而每次危机都让世界更接近战争。主要危机包括：日本占领满洲（1931年）；德国重新武装（1935—1936）；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5年）；德国和意大利干涉西班牙内战（1936—1939）；日本侵略中国（1937年）；德奥合并（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解体（1938—1939）；德国入侵波兰（1939年），这也是迫使英法放弃绥靖政策的最后一次危机。

1939年9月德国做好了战争准备。希特勒已经同斯大林达成协议，保证德国安全避免了两线作战。战争的开始阶段，德国的闪电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轴心国控制了西欧大部分地区。德军还用空中轰炸把平民也置于了战争前线。

德国企图靠切断英国到印度的路线以削弱英国，从而卷入了巴尔干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战争。1941年希特勒又攻击了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也卷入战争。1942年春，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达到了顶峰。

1942年出现了战争的转折点。在太平洋地区，珊瑚海战役阻止了日本对澳大利亚的侵略。北非战场的胜利（1942—1943）、苏联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及盟军成功保护了供给线，最终迫使轴心国于1943年转向了防守。1945年欧洲战争的结束揭露了灭绝营的全部罪恶并且引发了关于为什么会允许大屠杀发生的争论。

在太平洋战场，美国和盟军部队从多个战线同时进攻日本。最后，美国人决定使用新研发的原子弹，以防止进攻日本本土可能造成的严重伤亡。

大事年表

1883—1885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1888—1918	德皇威廉二世在位
1888	奥地利建立社会民主党
1889	巴黎建成埃菲尔铁塔
1889	文森特·梵·高:《星夜》
1890	发明马克沁机枪
1890	阿尔佛雷德·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891	确立电影摄影机专利
1892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诞生)
1892	克劳德·德彪西:《牧神午后》
1892	保罗·高更:《游魂》
1893	卡尔·本茨发明汽车
1893	赫伯特·斯宾塞:《综合哲学提纲》
1894—1917	法俄联盟
1894—1895	甲午战争

1894—1906	德莱弗斯事件
1894—1917	俄皇尼古拉二世在位
1896	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雅典举办
1896	阿杜瓦战役
1896	设立诺贝尔奖
1896	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国》
1898	法绍达危机
1898	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发现镭
1898	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党
1898	美西战争
1898	德国颁布第一部《海军法》
1899—1902	布尔战争
1900—1946	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在位
1900	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
1900	义和团运动
1900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
1901—1908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执政
1901	古列尔莫·马可尼第一次跨越大西洋发送无线电报
1902—1910	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在位
1902	列宁:《将做什么》
1902	约翰·A.霍布森:《帝国主义研究》
1903	约瑟夫·张伯伦推行关税改革
1903	福特汽车公司建立
1903	布尔什维克控制俄国社会民主党
1904	英法协约
1905—1906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

1905—1907	安东尼奥·高迪:"卡萨公寓"(巴塞罗那)
1905	俄国革命
1905	俄国成立国家杜马
1905	克劳德·德彪西:《香格里拉滨海》
1905	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
1906	英国工党成立
1906	出现无畏级战列舰
1906	芬兰妇女获得选举权
1906	自由党在英国大选中获胜
1907	英俄协约
1907	阿诺德·荀伯格:《第一室内交响曲》
1907	巴勃罗·毕加索:《亚威农少女》
1908	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
1908	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1908	乔治·索莱尔:《关于暴力的思考》
1909	罗伯特·E.皮尔到达北极
1909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罗比之家"(芝加哥)
1910—1936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在位
1911—1912	中国辛亥革命
1911	《议会法》
1911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1911	罗阿德·阿蒙森到达南极
1911	中国革命
1912—1913	巴尔干战争
1912—1921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执政
1912	瓦西里·康定斯基:《即兴28》

1912 泰坦尼克号首航沉没

1913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

1913 挪威妇女获得选举权

1913 纽约军械库艺博会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 巴拿马运河通航

1914 1050 万移民进入美国

1914 马恩河战役

1914 坦能堡战役和马祖里战役

1914 战争中首次使用毒气

1915 路西塔尼亚号沉没

1915 D. W. 格里菲斯:《一个国家的诞生》

1916 爱尔兰复活节起义

1916 坦克首次应运于战争

1916 日德兰海战

1916 劳合·乔治当选英国首相

1917 俄国三月革命

1917 美国加入协约国

1917 第三次伊普尔战役

1917 《贝尔福宣言》发表

1917 俄国十一月革命

1918—1919 2000 万人死于大流感

1818—1921 俄国内战

1918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

1918 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十四点纲领”

1918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1918—1919	德国斯巴达克起义
1918	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
1918	英国妇女获得选举权
1919—1922	爱尔兰革命和内战
1919—1922	德国纳粹党建立
1919	凡尔赛和会召开
1919	国际联盟建立
1919	第三共产国际建立
1919	罗伯特·威恩:《卡利加里博士内阁》
1920s	现代环保运动兴起
1920	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
1920	卡尔·荣格:《心理类型学》
1920	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
1920s—1930s	印度独立运动兴起
1921—1928	苏联新经济政策
1921—1927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
1921—1923	阿诺尔德·勋伯格创作十二音系音乐
1921—1922	华盛顿会议
1922	《拉巴洛协定》
1922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
1922	T. S. 艾略特:《荒原》
1922—1943	墨索里尼统治意大利
1922—1923	德国经济崩溃
1923—1925	法国占领鲁尔区
1923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1923	第一个节育诊所在纽约诞生

1923	乔治·格什温:《蓝色狂想曲》
1924	道威斯计划
1924	贾科莫·马蒂奥蒂:《法西斯分子的真相》
1925	《洛迦诺公约》
1925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
1925	沃纳·海森堡和马克斯·普朗克创立量子力学
1925—1926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在德国德绍创办包豪斯建筑学院
1925—1940	苏联迅速城市化
1927	赫尔曼·海塞:《斯蒂芬瓦夫》
1927	查尔斯·林德博格飞越大西洋
1928	世界第一次电视广播
1928	D. H. 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1928	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盘尼西林
1928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
1928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1929—1930	勒·柯布西耶在法国普瓦西塞纳河畔设计萨伏伊(别墅)
1929—1939	苏联强制实行集体化
1929	《拉特兰条约》
1929	E. M. 雷马克:《西线无战事》
1929	维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子》
1929	纽约证券交易所崩盘
1929—1934	大萧条
1931	《威斯敏斯特法案》
1931	亨利·马蒂斯:《舞》

1931	日本占领满洲
1932—1933	苏联大饥荒
1932	英国实行保护性关税
1932	世界裁军会议
1933—1945	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美国执政
1933—1945	阿道夫·希特勒统治德国
1933—1934	"一体化"与纳粹独裁统治的建立
1934—1936	红军长征
1934	法国发生史塔文斯基事件
1934—1938	苏联"大清洗"
1935—1936	德国重建军队
1935	德国颁布《纽伦堡法》
1935	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
1935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1936	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在位
1936—1937	利昂·布鲁姆总理领导法国人民阵线
1936—1939	西班牙内战
1936—1952	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在位
1936	J. M.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937	日本入侵中国
1937	巴勃罗·毕加索:《格尔尼卡》
1937	教皇通谕谴责纳粹主义
1938—1940	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任命法西斯独裁政府
1938	德国吞并奥地利
1938	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梅梅尔
1939—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	纽约世界博览会
1940	法国败降
1940	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
1940	不列颠战役
1941	奥逊·威尔斯:《公民凯恩》
1941	德国入侵苏联
1941	日本偷袭夏威夷珍珠港
1943	意大利向盟国投降
1944	盟军在法国登陆
1945	德国投降
1945	艾德里出任英国首相
1945	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
1945	日本投降
1945	雅尔塔会议
1945	联合国成立
1946	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
1946	纽伦堡战犯审判
1947	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
1947	发现《死海古卷》
1948	柏林空运事件
1949	苏联试爆原子弹
1949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
1949	东德和西德建国
1949	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获胜
1949	乔治·奥威尔:《1984》
1949	西蒙波娃:《第二性》

中英文词汇对照表

A

Abbey Theatre	阿比剧院
Abolition movement	废奴运动
Abortion	堕胎
Abstract expressionism	抽象表现主义
Abyssinia,or Ethiopia	阿比西尼亚,或埃塞俄比亚
Action Française	法兰西行动
Afternoon of a Faun(musical composition)	《牧神午后》(乐曲)
Agadir	阿加迪尔
Age of Anxiety	焦虑的时代
Agiprop	宣传鼓动
Agrarian League(Germany)	农业联盟(德国)
Agricultural collectives	农业集团化
Air bombardment	空中轰炸
Algeciras conference	阿尔黑西拉斯会议
All-India Muslim League	全印度穆斯林联盟

All-Union party congress(Soviet Union)	全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
American Indians	原住民印第安人
Amritsar massacre	阿姆利则大屠杀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Anarchist revolt	无政府主义者叛乱
Anarcho-syndicalism	工团主义
Anschluss	德奥合并
Anti-Comintern Pact	《反共产国际协定》
Anti-Semitism	反犹太主义
Anzac troops	澳新军团
Appeasement policy	绥靖政策
April Theses	《四月纲领》
Ardennes forest	阿登森林
Argonne forest	阿贡森林
Armistice Day	停战日
Army Order No. 1	"一号军令"
Assimilation	同化
Atlantic Charter	《大西洋宪章》
Atom bomb, or Nuclear weapons	原子弹或核武器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原子能委员会
Atomic theory of matter	原子论真理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奥斯威辛集中营
Ausgleich	奥匈协定
Austria-Hungary	奥匈帝国
Autarky	自给自足
Authoritarian regimes	独裁政权
Autobahnen	高速公路
Auto-Emancipation(Pinsker)	《自我解放》(平斯克尔)
Avanti(newspaper)	《前进报》
Axis powers in World War II	二战轴心国

B

Baghdad Pact	《巴格达条约》
Balkan Wars	巴尔干战争
Baltic states	波罗的海国家
Bank holidays	银行休假
Barter system	实物分配制度
Battle maps	战场图片
Battle of Britain	不列颠之战
Battle of the Bulge	坦克大决战
Battle of Cambrai	康布雷战役
Bauhaus art school	包豪斯建筑学派
Belsen concentration camp	贝尔森集中营
Berlin-Bagdad railway	柏林—巴格达铁路
Big Four	四巨头
Big Three	三巨头
Birth control movement	生育控制运动
Birth deficits	生育不足
Birth rates	出生率
Bismarck(battleship)	俾斯麦号(战舰)
Black and Tans	黑棕部队
Black Hand	黑手党
Black Hundreds	黑色百人团
Blitz	闪电行动
Blitzkrieg	闪电战
Bloody Sunday	血腥星期日
Bloomers	灯笼裤
Blue Horsemen	青骑士社
Bolsheviks	布尔什维克
Bourgeoisie	中产阶级

Boxer Rebellion	拳民暴乱
Boycotts	联合抵制
Bread riots	面包暴动
Brenner Pass	布伦纳山口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英联邦国家
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	法西斯主义英国联合会
Brown lung disease	褐肺病
Bucharest, Treaty of	《布加勒斯特条约》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Buddenbrooks(Mann)	《布登勃洛克一家》(托马斯·曼)
Byzantine Empire	拜占庭帝国

C

Cabaret music	酒吧歌曲
Calvinism	加尔文教
Camelots du Roi	国王的仆人
Candide(Voltaire)	《康第德》(伏尔泰)
Capital ships	主力舰
Carlism	西班牙王室正统派
Cartels	卡特尔
Catholic Action Clubs	天主教行动俱乐部
Catholic Center party(Germany)	天主教中心党(德国)
Censorship	审查制度
CENTO	中央条约组织
Central Control Commission(Soviet Union)	中央管制委员会(苏联)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Soviet Union)	中央执行委员会(苏联)
Central Powers	轴心国
Chamber of Deputies	下议院
Chamber of Fasces and Corporations (Italy)	法西斯和工团议院(意大利)
Cheka	契卡

Chlorine gas	氯气
Christian Democrats(Italy)	基督教民主党(意大利)
Christianity	基督教
Christian Socialists(Austria)	基督教社会党(奥地利)
Clericalism	教权主义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
Coalition system	同盟体系
Coal miners'strike	煤矿主罢工
Cold War	冷战
Collectives	集体化
Collective security	集体安全
Collective unconscious	集体无意识
Colonial Society	奴隶社会
Combinats(Soviet Union)	康拜因(苏联)
Cominform(Soviet Union)	情报局(苏联)
Comintern(Soviet Union)	共产国际(苏联)
Commanding heights	控制地位
Communism	共产主义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共产国际
Communist Manifesto(Marx)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Compiègne armistice	《贡比涅停战协定》
Concentration camps	集中营
Concordat of 1801	1801 年协议
Congress of Berlin	柏林会议
Congress of soviets	苏维埃代表大会
Conscription	征兵
Conservation movement	保守运动
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
Conservative party	保守党

Constituent assembly	立宪国民代表大会
Constitutional Democrat party	立宪民主党
Contraceptive devices	避孕工具
Copernicus, theory of	哥白尼学说
Corporative state	总体国家
Corsica	科西嘉
Cortes(Spain)	议会(西班牙)
Council of Ministers(Soviet Union)	部长理事会(苏联)
Council of Nationalities(Soviet Union)	民族理事会(苏联)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Soviet Union)	人民委员会(苏联)
Council of the Empire(Russia)	帝国委员会
Crash of Stock market	股市崩溃
Creative arts	创新艺术
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
Croat party(Hungary)	克罗地亚党(匈牙利)
Croix de Feu	火十字团
Cubism	立体派
Cult of self	个人崇拜
Curzon line	寇松线
Customs unions	关税同盟

D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达豪集中营
Daguerreotypes	达盖尔银板照相制版法
Dáil Eireann(Ireland)	爱尔兰共和国众议院
Danub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scheme	多瑙河经济合作计划
Dawes Plan	道威斯计划
D-Day	登陆日
DDT	杀虫剂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soldiers	《士兵权利宣言》
Defense of the Realm Acts(Great Britain)	《王国国防法》(英国)
Deficit financing	赤字财政
Demilitarized zone	非军事区
Democracies	民主国家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
Der Blaue Reiter	青骑士社
Diet	议会
Direct action	直接行动
Disarmament	解除武装
Dollar-a-year men	无薪人员
Dominions of Great Britain	自治领
Draft,or Conscription	征兵
Dreadnought(ship)	无畏级战舰
Dream interpretation	解梦
Dual Alliance	二元同盟
Dual Monarchy	二元帝国
Dumas(Russia)	杜马(俄国)
Dunkirk invasion	敦刻尔克入侵
Dust bowls	垃圾坑

E

Eastern front	东线
Eastern Locarno security pact	《东洛迦诺安全协定》
Easter rebellion	复活节起义
Ecology	生态学
Edwardian period	爱德华时代
Egalitarianism	平等主义
Ego	自我
Electra complex	恋父情结

Elitism	精英主义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解放宣言
Enabling Act(Germany)	《授权法案》(德国)
Enigma(code)	英格玛(密码)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自我利益
Enlightenment	启蒙
Entente Cordiale	《谅解协议》
Ententes	谅解
Environmentalism	环境决定论
Era of fulfillment	履约时代
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Gobineau)	《论人类的不平等》(戈宾诺)
Eugenics	优生学
Expansionism	扩张主义
Expressionism	表现主义

F

Fabian Society	费边社
Falange	长枪党
Fasci de combattimento	战斗的法西斯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Fascist Grand Council(Italy)	法西斯最高委员会(意大利)
Fatherland Front(Austria)	祖国阵线(奥地利)
Fauves	野兽派
February Revolution	二月革命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ederal Reserve Act(U. S.)	《联邦储备法案》(美国)
Feminism,or Women's(feminist) movement	女权主义
Fianna Fáil	共和党
Fifteenth Amendment of U. S. Constitution	美国宪法第十五次修正案

Final solution to Jewish problem	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
Firebird, The	《火鸟》
First Chamber Symphony	《第一室内交响曲》
Fists of Righteous Harmony	义和拳
Five-year plans, Soviet	五年计划,苏联
Foreign correspondents	驻外记者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amberlain)	《十九世纪的基础》(张伯伦)
Fourteenth Amendment of U.S. Constitution	美国宪法第十四次修正案
Franco-Prussian War	普法战争
Free association	自由联想
Free Corps	自由军团
Free enterprise	自由企业
Free French	自由法国
Free market	自由市场
Freemasons	互济会会员
French National Committee	法兰西民族委员会
French Radicals	法国激进党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革命
Fundamental laws, of duma	杜马基本法

G

Gas masks	防毒面罩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CGT) (France)	总工会(法国)
General strikes	总罢工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Keynes)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凯恩斯)
Genocide	种族灭绝
Geopolitics	地缘政治学
Germanization	德国化

German Workers'party	德意志工人党
Gestapo	盖世太保
Glavlit	报刊保密检查总局
Gleichschaltung	一体化
Gold standard	金本位
Good Neighbor policy	睦邻政策
Gosbank	国家银行
Gosplan	国家计划委员会
Grand Alliance	伟大的同盟
Grand Fleet	联合舰队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
Great Man theory	伟人理论
Great Powers	大国
Greco-Turkish War	希—土战争
Greek Orthodox religion	希腊东正教
Gulf of Siam	泰国海湾
Gumbinnen, battle of	贡宾年战役
Gymnasia	高级中学

H

Habsburg Empire	哈布斯堡帝国
Hague conferences	海牙会议
Halftone screen	网目版视屏画
Heimwehr(Austria)	家乡卫队(奥地利)
Hemophilia	血友病
Hinduism	印度教
Hoare-Laval pact	《霍尔—赖伐尔条约》
Hohenzollern Empire	霍亨索伦帝国
Holocaust	大屠杀
Home Owners'Loan Corporation	房主贷款公司

Home Rule Bill(Great Britain) 地方自治法案
House of Commons(Great Britain) 下议院
House of Lords(Great Britain) 上议院
House of Savoy 萨沃王室
Hundred Years'War 百年战争
Hungarian nationalities law 匈牙利少数民族法
Hunger strikes 绝食抗议
Hydroelectric power 水力发电
Hygiene 卫生
Hypnosis 催眠

I

Iberian Peninsula 伊比利亚半岛
Id 本我
Illustrations 插图
Il Popolo d'Italia 《意大利人民报》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Impressionism 印象派
Income tax 所得税
Independent Socialists(Germany) 独立社会党（德国）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印度国大党
Indian Ocean 印度洋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Infant mortality rates 婴儿死亡率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The (Mahan)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马汉)
Influenza epidemic 传染性疾病
Inquisition 审查

Institute of Red Professors	红色专家学会
Intelligentsia	知识阶层
Internationalism	国际主义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he (Freud)	《梦的解析》(弗洛伊德)
Iranian revolution	伊朗革命
Irish Free State	爱尔兰自由邦
Irish Home Rule	爱尔兰地方自治
Irish immigrants	爱尔兰移民
Irish Nationalist party	爱尔兰民族党
Irish Question	爱尔兰问题
Irish Republican Army	爱尔兰共和军
Iron Curtain Speech	铁幕演说
Iron Guard(Romania)	铁卫军(罗马尼亚)
Iron law of oligarchies	寡头统治铁律
Isolationism	孤立主义
Italia irredenta	《消息报》
Italian front	意大利战线

J

Jet plane	喷气飞机
Jewish State, The (Herzl)	《犹太国家》(赫茨尔)
Jim Crow laws	吉姆克罗黑人法案
Jingoism	侵略主义
Junkers	容克地主
Jutland, battle of	日德兰战役

K

Kadets(KD)	立宪党人
Kanto earthquake	关东地震
Kellogg-Briand Peace Pact	《凯洛格一白里安和平条约》

Kindergarten	幼儿园
King's Henchmen(France)	"国王的仆人"(法国)
Kredit-Anstalt	信贷银行
Kristallnacht	水晶之夜
Kronstadt naval base mutiny	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兵变
Ku Klux Klan	三 K 党
Kulaks	富农
Kuomintang(China),or Nationalist Party,in China	国民党(中国)
Kurds	库尔德人

L

Labor Front(Germany)	劳动阵线(德国)
Labor unions	工会
Labour party(Great Britain)	工党(英国)
Laissez faire policy	自由放任政策
Land reform	土地改革
Lateran Pact	《拉特兰条约》
Latifundia	大庄园
Lausanne, Treaty of	《洛桑条约》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	三皇同盟
Lebensraum	生存空间
Left	左派
Legion of Honor	军团荣誉勋章
Legitimist party(France)	正统派(法国)
Leisure time	闲暇
Lend-Lease Act(United States)	《租借法案》(美国)
Les Demoiselles d'Avignon(painting)	《亚威农少女》(绘画)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Liberal party	自由党

Lib-Labs	自由劳工党人
Life expectancy rates	预期寿命
Linotype	排版
Literacy	识字率
Little Entente	小协约国
Locarno treaties	《洛迦诺公约》
Lockout	停工
London, Treaty of	《伦敦条约》
Low Countries	低地国家
Lutheran religion	路德教
Lytton Report	李顿报告

M

Madame Matisse(painting)	《马蒂斯夫人》(画像)
Magic(code)	魔术(密码)
Maginot line	马奇诺防线
Magyars	马扎尔人
Majles	伊朗议会
Majority socialists	多数派社会主义者
Malay States	马来亚国家
Man and Nature(Marsh)	《人与自然》(马什)
Manchuria	满洲
Mandate of heaven	天意
Mandate system	指挥系统
Man of Property(Galsworthy)	《有产者》(高尔斯华绥)
Man on horseback	马背人
March on Rome	向罗马进军
March Revolution	三月革命
Marne, battle of	马恩河战役
Marshall Plan	马歇尔计划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Marxist Socialist party(Spain)	马克思主义社会党(西班牙)
Maut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	毛特豪森集中营
Means of production	生产工具
Meliorism	社会改善论
Men of push and go	应征人士
Mensheviks	孟什维克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Merchant marines	商船队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Russia)	军事革命委员会(俄国)
Minimum wage	最低工资
Ministry of Munitions(Great Britain)	英国军需部
Modernism	现代主义
Modernization	现代化
Monarchies	君主国
Monotype machines	单字铸字机
Monroe Doctrine	门罗主义
Mortality rates	死亡率
Muckrakers	探听丑闻的人
Munich agreement	慕尼黑协定
My Apprenticeship(Webb)	《我的学徒生涯》(韦伯)

N

National American Suffrage Association	全美选举权协会
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	女性选举权社团联盟
National Assembly(France)	国民大会(法国)
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Germany)	国民立宪会议(德国)
National Government(Great Britain)	国民政府(英国)
Nationalist party	民族党

N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y	工业国有化
National Recovery Act(*NRA*)	《全国工业复兴法》
National self-images	国家的自我形象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Germany)	国家社会主义党(德国)
National sovereignty	国家主权
Native Americans	土著美国人
NATO	北约
Naturalism	自然主义
Nazism	纳粹主义
Neapolitans	那不勒斯
NEP or New Economic Policy	新经济政策
New Deal	罗斯福新政
New 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
Newtonian physics	牛顿物理学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	长剑之夜
Nine-Power Treaty	《九国公约》
Noncapital ships	非主力舰
Nord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	北豪森集中营
Normandy landing	诺曼底登陆
November revolution	十一月革命
Nuclear testing	核试验
Nuremberg trials	纽伦堡审判
Nuremburg laws	纽伦堡法案

O

October Manifesto	十月宣言
October Revolution	十月革命
Octobrists	十月党人
Oedipus complex	恋母情结
Old New Land(Herzl)	《古老的新地》(赫茨尔)

Oligarchies	寡头
Open Door policy	门户开放政策
Operation Barbarossa	巴巴罗萨行动计划
Operation Sea-Lion	海狮行动计划
Orgburo	组织局
Orthodox religions	东正教
Otherness	他者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P

Pacifism	和平主义
Pact of Paris	《巴黎条约》
Pact of Steel	《钢铁盟约》
Pale of Settlement	隔离定居区
Panay	班乃岛号
Pan-Germanism	泛德主义
Panther	豹号
Pan-Turanian movement	泛突雷尼运动
Papal States	教皇国
Paris peace conference	巴黎和平会议
Parliament Act(Great Britain)	《国会法案》(英国)
Peaceful coexistence policy	和平共处政策
Penis envy	阴茎嫉妒
People's Budget	人民预算案
People's party(Germany)	人民党(德国)
Petite bourgeoisie	小资产阶级
Phony War	虚假的战争
Phrenology	骨相学
Planned Parenthood	现代计划生育机构
Plessy v. Ferguson	普莱西控告弗格森

Poison gas	毒气
Polish Corridor	波兰走廊
Polish Resistance	波兰起义
Politburo(Soviet Union)	政治局(苏联)
Political ideas	政治思想
Political Parties(Michel)	《政治党派》(米歇尔)
Polonium	钋
Popular Front	人民阵线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增长
Portsmouth, Treaty of	《朴茨茅斯条约》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Post-impressionism	后印象主义
Potato famine	马铃薯危机
Potsdam conference	波茨坦会议
Prague University	布拉格大学
Pravda	《真理报》
Presidium(Soviet Union)	主席团(苏联)
Prince of Wales(battleship)	威尔士王子号战舰
Prisoners of war	战犯
Private capital sector	私人资本领域
Progressive Bloc(Russian duma)	进步集团(俄国杜马)
Progressive party(Germany)	进步党(德国)
Protestantism	新教教义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Russia	临时政府
Psychoanalysis	心理分析
Psychological warfare	心理战
Psychology	心理学
Psyc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The(Freud)	《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

Putsch	暴动

Q

Qajar dynasty	卡扎尔王朝
Quantum theory	量子理论

R

Race patriots	种族爱国主义者
Race to the Sea	向大海赛跑
Racialism	种族主义
Racial segregation	种族隔离
Racism	种族歧视
Radical Socialist party(France)	激进社会党(法国)
Radioactivity	放射性
Radium	镭
Rapallo, Treaty of	《拉巴洛协定》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RFC)	金融重建公司
Red Army	红军
Red Cross	红十字会
Red Sea	红海
Red Shirts	红衫军
Reichstag	国民议会
Reinsurance Treaty	《再保险条约》
Reparations	赔款
Reproductive rights	生育权
Republican party, U. S.	美国共和党
Repulse(cruiser)	“反击号”巡洋舰
Restoration	重建
Revanchism	恢复失地运动
Revisionism	修正主义

Rites of Spring (ballet)	《春之祭》(芭蕾)
Roman Question	罗马问题
Rome-Berlin axis	罗马—柏林轴心
Rotary press	轮转印刷机
Royal Air Force	皇家空军
Russian immigrants	俄国移民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俄罗斯东正教会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Russification	俄罗斯化
Russo-Japanese War	日俄战争

S

Samurai class	武士阶层
Savoy Hotel	沙威酒店
Schutzstaffel(SS)	纳粹党卫队
Second Empire(France)	第二帝国(法国)
Second-hand food	二手食品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证券交易委员会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民族自决
Senate	参议院
Separate but equal doctrine	隔离但平等原则
Seventeenth Amendment of U. S. Constitution	美国宪法第十七次修正案
Sèvres, Treaty of	《色佛尔条约》
Siegfried line	齐格菲防线
Silent Spring (Carson)	《寂静的春天》(卡逊)
Sinn Fein	新芬党
Sit-down strikes	静坐示威
Sixteenth Amendment of U. S. Constitution	美国宪法第十六次修正案
Skyscrapers	摩天大楼
Social class	社会阶层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Democrats(SD)	社会民主党
Social diseases	社会疾病
Social engineers	社会工程师
Socialist offensive	社会主义攻势
Socialist party	社会党
Social Revolutionaries(SR)(Russia)	社会革命党(俄国)
Social Security Act(United States)	《社会安全法》(美国)
Society of Marxist Historians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社团
Somme offensive	索姆河战役
Soviet of Nationalities	民族苏维埃
Soviet of the Union	联盟苏维埃
Soviets(councils)	苏维埃(部长会议)
Soviet Union	苏联
Spanish-American War	美西战争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
Sparticist party	斯巴达克同盟
Specialization of function	专项职能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狭义相对论
Spectator, The	《旁观者》
Speed of light	光速
Square deal	公平待遇
Stahlhelm	钢盔团
Stalin's purge	斯大林肃清运动
Standard Oil Company	标准石油公司
State Department, U. S.	美国国务院
Statute of Westminister	魏玛宪法
Steam presses	蒸汽印刷
Stream-of-consciousness writing	意识流
Stresa Front	斯切萨阵线

Stuka bomber	斯图卡轰炸机
Sturmabteilung(SA)	冲锋队
Subatomic particles	亚原子微粒
Submarines	潜水艇
Superego	超我
Superman myth	"超人"思想
Supreme Court, U. S.	美国最高法院
Supreme Soviet	最高苏维埃
Supreme War Council	最高战争委员会
Surface raiders	海面攻击
Swaraj	自治领
Symbolism	象征主义
Syndicates and syndicalism	辛迪加及工团主义
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Spencer)	《综合哲学提纲》(斯宾塞)

T

Talking cure	闲谈治疗
Tariff Reform and Imperial Preference (Great Britain)	关税改革与帝国特惠制(英国)
Tass news service	塔斯社
Teheran conference	德黑兰会议
Temperance movement	禁酒运动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田纳西河谷管理局
Third International	第三国际
Third Reich(Germany)	第三帝国(德国)
Third Republic(France)	第三共和国(法国)
Thirteenth Amendment of U. S. Constitution	美国宪法第十三次修正案
Thought police	思想警察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Freud)	《性学三论》(弗洛伊德)

Thus Spake Zarathustra (*Nietzsche*)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尼采)
Tigers(Hungary)　猛虎(匈牙利)
Times(London)　《泰晤士报》(伦敦)
Toolmakers　工具制造者
Tories　托利党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Trade Disputes and Trade Union Act(Great Britain)　《贸易争端与工会法案》(英国)
Trench warfare　堑壕战
Trialists　三元论者
Trianon, Treaty of　《特里亚农条约》
Tripartite Pact　三方条约
Triple Alliance　三国同盟
Triple Entente　三国协约
Triple monarchy　三元君主帝国
Tripolitanian War　的黎波里战争
Truth of ultimates　终极概念
Tsushima Strait, battle of　对马海峡战役
Turco-Italian War　土一意战争
Twenty-One Demands　二十一条
Twenty years' truce　二十年休战
Typesetting　排版

U

Ultra(code secrets)　超级(密码)
Unconscious　无意识
Uniate Church　天主教会
Unilateral armaments race　单边军备竞赛
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s (USSR)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　俄国人民联盟

Unitarianism 唯一神教派

V

V-E Day 欧洲胜利日

Versailles, Treaty of 《凡尔赛和约》

Vertical trusts 纵向托拉斯

Vichy France 维希法国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Vital lies 致命的谎言

V-J Day 日本败降日

W

War communism 战时共产主义

War criminals 战争罪

Warsaw Pact 《华沙条约》

Warsaw uprising 华沙起义

Wehrmacht 纳粹国防军

Weimar Republic 魏玛共和国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

Western civilization 西方文明

Western front 西线

Western frontier zone 西部战区

White Paper on Defense 国防白皮书

Will to power 权力意志

Winter War 冬季战争

Woman's Party 妇女党

Women's(feminist)movement 女权运动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WSPU) 女性社会与政治联盟

Workers'and Peasants'Inspectorate(Soviet Union) 工农监察

Workers'riot 工人暴动

World Court	国际法庭
World Disarmament Conference	世界裁军大会

Y

Yalta conference	雅尔塔会议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黄石国家公园
Young Plan	青年计划
Young Turks	青年土耳其党

Z

Zemski sobor	咨询会议
Zemstvos	地方自治组织
Zeppelins	齐柏林飞艇
Zinoviev letter	季诺维也夫来信
Zionism	犹太复国主义



译者后记

翻译的具体分工如下：贾文华负责翻译第一至三章、图片说明、年记等部分，同时负责全书的统稿、校译和修订工作。李晓燕负责翻译第四至六章及中英文词汇对照等部分，并在修改与校对过程中做了大量辅助性工作。需要说明的是，石鑫（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曾花费大量时间，查阅了书中的人名、地名及其他专有词汇，并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性翻译，为本书翻译工作的最终完成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译者对此表示由衷的谢意。丛日云教授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曾提供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指导与帮助，译者在此亦表示诚挚的感谢。

贾文华

2008 年 11 月 22 日

EUROPE
1890-1945